

目錄

唐潼關形勢詩見文人對長安的眾像——以詩題或詩文載明關名為例.....	1
「蓋」河：基隆旭川河的歷史變遷.....	29
賽音諾顏部盟旗四至八達方位分析：以蒙古遊牧圖校勘蒙古游牧記及蒙古志.....	63
清乾隆年間朴仔籬番界的變遷及界外地土牛角的開墾.....	91
從廈門到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的重構到解殖.....	121
廟宇・公學校・社區實踐：從《樸樹之蔭》論應用史學的歷史人文.....	141
史學與合唱藝文的應用結合：以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音樂企劃為範例.....	153

唐潼關形勢詩見文人對長安的眾像——以詩題或詩文載明關名為例

蔡坤倫*

提要

《唐六典》記載玄宗開元年間天下關有26座，按層級定為上、中、下三類，潼關兼具京城四面關與驛道而列為上關之一，此關宿衛唐代長安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全唐詩》中潼關形勢詩20首作為文本，分為「過關」(10首)與「駐關」(10首)兩類，過關詩又分為奉和皇帝(6首)與個別詩人(4首)作品，藉由逐首分析詩中眾像，呈現文人如何書寫長安城，期能援詩入史拓展關道學研究新視野，進而管窺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學理。

關鍵詞：唐代、長安、潼關、形勢、眾像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Situational Poems of Tong-Guan in the Tang Dynasty Reveal the Literati's images of Chang-an——Take the Example of the name of the Guan in the title of poem or the content of poem

Kun-Lun Tsai*

Abstract

"Tang-Liu-Dian" records that there were twenty-six guans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Kaiyuan period of Xuan-Zong,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upper, middle and lower. Tong-Guan has both the four-sides of the capital and the Yidao and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upper gua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uan in guarding Chang'an in the Tang Dynasty is self-evident. The article uses twenty situational poems of Tong-Guan in the "Quan Tang-shi" as the text analysis, divided into "pass through guans" (10 poems) and "stay guans" (10 poems). The poems passing through guans were divided into works by follow Emperor (6 poems) and individual poets (4 poems). The works present how literati wrote about Chang'an by analyzing the various images in the poems one by one, hoping to expand the new horizons of Guan-dao studies by integrating poem into history, and further gain insight into Chen Yinke's theory of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poem and history.

Keywords : Tang Dynasty, Chang-an, Tong-Guan, Situation, Images

* Doctoral degree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present.

壹、前言

《唐詩多功能辭典》依主題分為 55 類，¹其中名勝旅遊類的陝西省細目有潼關詩 3 首；地理類的關隘細目有潼關、函谷關、武關詩各 1 首，可見同一關即隨作者、主編之個人標準，而有不同的分類大項與細目。筆者以為這意味著此項目有另立專類的可行性，關隘與交通兩者如唇齒密切，唐詩中理應有一類為「關道」。關道是關隘與道路的合稱，道路包括驛道、非驛道及其沿線的驛站、館舍。²個人提出「關道學」一詞涵蓋關隘、驛道驛站、非驛道館舍等主題，而切入「關道學」的視角之一可從文學中的唐詩去建構。³

「關道學」除從「文學」視角之外，另有「歷史地理」與「制度」兩層面，但純粹就制度而論鮮少，⁴歷史地理切入仍居多。以潼關而言大致分三類，第一是概述，如〈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函谷關與潼關〉、〈崤函古道「四關」〉；⁵第二是位置與遷徙，如〈潼關古城的遷徙〉、〈潼關沿革考〉、〈潼關天險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三〉、〈潼關創建年代考辨〉、〈古代潼關城址的變遷〉、〈潼關古城的建制〉；⁶第三是戰爭，如〈漫話潼關〉、〈安史之亂中潼關為何失守〉、〈論曹操平定關隴的奠基戰役——潼關之戰〉、〈「哥舒白谷兩英雄，痛哭催軍萬年淚」——唐軍與安史叛軍的潼關、靈寶之戰探析〉、〈唐代潼關述略——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歷代潼關軍事設防〉。⁷上述文章從關城的指標、位置、遷徙、創建時間、戰爭而論，填補「關道學」中關隘的認識與價值。

「關道學」中文學層面的驛路詩是晚近興起的研究觸角，一系列的唐詩之路研究叢書如雨

¹ 靖宇主編，《唐詩多功能辭典》（瀋陽：遼海，2011.4，1版）。案：55類依序是山水旅遊、田園生活、植物、動物、名勝旅遊、人物、天文、地理、氣象、飲食、四季、節令、時辰、友誼、交際、離別、旅行、鄉思、愛情、家庭、生理、心理、倫理、文化、文學、藝術、咏史、邊塞、軍事、愛國情懷、政治、經濟、法律、工業、農業、商業、醫學、建築、科技、交通、外交、民俗、民族、宗教、服飾、體育、教育、官廷、居住、器物、哲理、言志、人才、悼亡、災祥。

² 李德輝：「唐代在重要路段設置驛站，次要路段則置館舍，平均約三十餘里有一驛，四五十里有一館，驛站與館舍合稱驛館或館驛。」詳參氏編著，《唐宋館驛與文學資料彙編》（南京：鳳凰，2014.10，1版），「前言」，頁3-4。

³ 胡可先，《唐詩之路與文學空間研究》（北京：中華，2023.3，1版）。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北京：中華，2023.8，1版）。戴偉華，《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北京：中華，2023.11，1版）。

⁴ 如館驛制度：李德輝編著，《唐宋館驛與文學資料彙編》。李德輝，《唐宋館驛與文學》（上海：中西，2019.12，1版）。

⁵ 張榮芳，〈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收錄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新文豐，1992.11，初版），頁737-766。李健超，〈函谷關與潼關〉，收錄氏著，《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西安：三秦，2007.7，1版），頁595-605。陳隆文，〈崤函古道「四關」〉，《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頁39-42。

⁶ 史念海，〈潼關古城的遷徙〉，收錄氏著，《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聯書店，1981.5，1版），頁176-180。許正文，〈潼關沿革考〉，《人文雜誌》，1989年第5期，頁93-97。關治中，〈潼關天險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三〉，《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35-39。艾冲，〈潼關創建年代考辨〉，《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頁10-13，轉17頁。艾冲，〈古代潼關城址的變遷〉，《歷史地理》（第十八輯）（上海：上海人民，2002.6，1版），頁122-129。梁建邦，〈潼關古城的建制〉，《滄桑》，2005年第2期，頁17，轉24頁。

⁷ 梁建邦，〈漫話潼關〉，《渭南師專學報》（綜合版），1989年第1期，頁103-106。賀潤坤，〈安史之亂中潼關為何失守〉，《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4期，頁47-50。關治中，〈論曹操平定關隴的奠基戰役——潼關之戰〉，《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頁27-31。劉樹友，〈「哥舒白谷兩英雄，痛哭催軍萬年淚」——唐軍與安史叛軍的潼關、靈寶之戰探析〉，《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頁27-34。穆渭生，〈唐代潼關述略——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陝西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63-66。張晶、梁建邦，〈歷代潼關軍事設防〉，《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15期，頁69-75。

後春荀攢露而出。首先是詩中驛路、驛站，如《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係》、《驛路傳詩與唐詩之發展》、《追隨唐人走天涯：驛路唐詩邊域書寫研究》。⁸其次是詩中絲路，如《唐詩鏡像中的絲綢之路》、《西域文化與唐詩之路》、《絲綢之路與漢唐文學的關係》。⁹接著是區域詩路的探索，《地域文化與唐詩之路》是宏觀地域文化與唐詩關係；¹⁰聚焦廣東西部有《粵西唐詩之路的探源與詩人尋蹤》；¹¹川東重慶有《巴渝唐詩之路的文化緣起與地域流布》；¹²浙江東部有《浙東唐詩之路學術文化編年史》、《浙東唐詩之路唐詩全編》、《浙東唐詩之路的會變與嬗變》；¹³江西、廣東邊境的大庾嶺有《唐代大庾嶺詩路研究》。¹⁴最後是詩中貶謫文化與路線，如《貶謫文化與貶謫詩路——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作為中心》。¹⁵以上均涉及唐詩中區域驛路、驛站，對於深化「關道學」的交通與館驛方面如虎添翼。

國學大師錢穆提出「制度」與「歷史地理」是歷史學的兩隻腳，¹⁶師承錢穆的嚴耕望於 1946 年提出「國史人文地理」概念，¹⁷認為交通尤為歷史人文地理之首，¹⁸遂先以唐代交通為起始，希冀透過交通完成朝代人文地理，最終書寫通史人文地理。交通如人體血管，驛路暢通與否關係國家穩定，¹⁹驛路上的關隘、驛站如人體關節，扮演交通上節點。²⁰強調關隘在戰爭中重要性。蘇秉琦認為關卡的設置是國家的象徵。²¹呂思勉：「古代列國之間，交通多有制限，是為關梁。」²²認為「關」制限交通，實為點睛之論。關之重要性在於扼守交通路線，關與交通的密切性不言而喻。嚴氏晚年偏重在歷史地理，援詩入史，引唐詩關隘、驛站等考證唐驛道，完成五大冊《唐代交通圖考》。唐代「關道學」涉及史學中歷史地理與制度，文學中唐詩，本身結合文史、詩史的互證互補，呼應錢氏史學兩腳的重要性，並接踵嚴氏未竟之業，建構「關道學」

⁸ 吳淑玲，《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係》（北京：人民，2015.2，1版）。吳淑玲，《驛路傳詩與唐詩之發展》（北京：中華，2023.11，1版）。吳淑玲，《追隨唐人走天涯：驛路唐詩邊域書寫研究》（北京：中華，2024.10，1版）。

⁹ 石雲濤，《唐詩鏡像中的絲綢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20.6，1版）。海濱，《西域文化與唐詩之路》（北京：中華，2022.10，1版）。石雲濤，《絲綢之路與漢唐文學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24.4，1版）。

¹⁰ 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詩之路》（北京：中華，2022.8，1版）。

¹¹ 莫道才編，《粵西唐詩之路的探源與詩人尋蹤》（北京：中華，2023.4，1版）。

¹² 黃賢忠編，《巴渝唐詩之路的文化緣起與地域流布》（北京：中華，2024.7，1版）。

¹³ 李招紅編著，《浙東唐詩之路學術文化編年史》（北京：中華，2022.3，1版）。盧盛江編撰，《浙東唐詩之路唐詩全編》（北京：中華，2022.6，1版）。楊瓊、胡秋妍主編，《浙東唐詩之路的會變與嬗變》（北京：中華，2024.4，1版）。

¹⁴ 吳強，《唐代大庾嶺詩路研究》（北京：中華，2024.6，1版）。

¹⁵ 尚永亮，《貶謫文化與貶謫詩路——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作為中心》（北京：中華，2023.7，1版）。

¹⁶ 嚴耕望，〈從師問學六十年〉，氏著，《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北：臺灣商務，1992.3，初版），頁 46。

¹⁷ 嚴耕望，〈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氏著，《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1988.11，5版），頁 139。嚴耕望，〈我對於歷史地理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氏著，《治史答問》（臺北：臺灣商務，1985.6，初版），頁 15。嚴耕望，〈我撰「唐代交通圖考」的動機與經驗〉，《興大歷史學報》，第 3 期（臺中，1993.4），頁 1。

¹⁸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序言」，頁 1-9。

¹⁹ 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專刊，1967.12），章群序。周一士，《中國公路史》（臺北：公路，1957.8，初版），頁 1。

²⁰ 尉繚，《中國古代八大兵書——尉繚子兵書》（北京：北京燕山，2008.6，2版），卷 20，〈踵軍令〉，頁 212：「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漢·劉安撰，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1998.10，1版），卷 15，〈兵畧訓〉，頁 1073：「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

²¹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1999.1，1版），頁 153。

²²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2005.7，1版），頁 549。

早已落實於筆者多年的學術關懷。

遼耀東〈城裡城外〉一文提到城池雛形是耕地田堤與家園藩籬。田堤、藩籬透過溝渠、門戶與外界往來。並引李濟之說法，長城內是種植、築城的「我群」，長城外是遊牧民族的「你群」。²³長城作為古代區分我群與他群的邊界城牆，為加強軍事防衛，往往與關隘同時設置，「關裡關外」同樣具有區隔我族與他族，牽動著邊界之國家安全。如果說函谷關作為漢代內陸第一關，潼關則是唐代陸路第一關，兩關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扮演著漢唐都城長安東側關鍵角色。《唐六典·尚書刑部》「司門」條將玄宗開元時天下關 26 座按層級定為上、中、下三類，²⁴位於華州華陰縣的潼關隸屬上關之一，肩負著當朝出東入西的要關，地理形勢尤為重要，錢穆語：「入關中有三道：潼關為入關正道也；武關為入關孔道，高祖由此入咸陽；及後往來關中，常由臨晉，又入關之隙道也。」²⁵兩京道上的潼關作為出入關中的正道，可謂雄關險峻。

「唐詩，是詩的巔峰」，²⁶中國詩沿革史在唐代發展達到鼎盛，詩人與稱號無出其右，如詩仙、詩俠李白、詩佛王維、詩魔白居易、詩鬼李賀、詩豪劉禹錫，尤以詩中之聖，詩能現史、記史的詩史杜甫能達到文史合一境界。唐人孟棻《本事詩》：「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²⁷詩史之稱源於唐朝，因杜氏遭逢安史之亂，以詩記載其流離於隴、蜀的前因後果。換言之，詩與史得以互證互補，作為材料之一的《全唐詩》可用於研究唐史。²⁸

唐代關道詩依詩文大致分成形勢、聚離、戰爭三類，作為屏障唐代長安東側，維護國家安全的潼關，潼關形勢詩的表象是關城內、外圍地理險峻的直接鋪陳；意象是文字背後抽象概念，包含隱晦典故、讀者閱讀後喚起想像畫面或情感波動等；實像是詩中核心意涵，詩中歷史，可說是「詩眼」或「歷史眼」。²⁹意象與實像是唐詩中亟需梳理之處，因詩中富含時空背景、典故與人事多元面向。潼關詩呈現的不僅是關隘，也是唐人對長安眾像的表徵，因為出入潼關即遠離或接近京城，³⁰而眾像實由表象、意象與實像三者構成。

爰此，本文竭澤而漁，初步網羅唐詩中詩題或詩文載明的潼關為文本分析，同時聚焦於關城形勢。除前言與結語外，將 20 首唐代潼關形勢詩分成「過關」（10 首）與「駐關」（10 首）兩類，過關詩又區分為「奉和皇帝」（6 首）與「個別」詩人（4 首）作品，逐首分析詩中的表象、

²³ 遼耀東，〈城裡城外〉，氏著，《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2019.8，3 版），頁 188-190。

²⁴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1992.1，1 版），卷 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 195-196。

²⁵ 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2001.7，1 版），卷 8，〈秦地名〉，頁 374。

²⁶ 章雪峰，《唐詩現場》（臺中：好讀，2018.9，初版），頁 2 自序。

²⁷ 唐·孟棻撰，李學穎校點，《本事詩》〈高逸〉，收錄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點，《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上海：上海古籍，2012.8，1 版），頁 98。

²⁸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1960.4，1 版），「點校說明」，頁 1：「作者等人於康熙 44-45 年（1705-1706），以不到兩年時間，在明清學者基礎上編成，總計收錄 48900 餘首唐詩，作者 2200 餘人，計 900 卷。」

²⁹ 寧欣，《從唐詩走進歷史》（北京：新星，2023.4，1 版），「自序」。

³⁰ 石繼航，《千里向長安——《全唐詩》中的大唐鏡影》（杭州：浙江教育，2024.7，1 版）。辛曉娟，《人生得意在長安》（新北：畢方文化，2025.3，初版）。

意象與實像。昔日周敦頤提及「文以載道」，³¹聖賢之道以文章闡述，文人則是透過寫詩入道，所謂詩亦載道，期能援詩入史、詩文互證方式拓展關隘研究的新視野。³²

貳、奉和聖製過關詩

一、唐太宗與許敬宗

《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記載李世民三次西入潼關。首先是高祖武德六年：「冬，十月，……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兵還。……十一月，丁亥，上校獵於華陰。己丑，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³³西元 623 年 11 月，世民尚為皇子，屯兵并州防突厥，李淵詔兒子西返長安並親迎。其次是太宗貞觀十二年：「二月，乙卯，車駕西還；自洛陽西還長安。癸亥，幸河北，觀砥柱。……庚午，至蒲州。……甲戌，幸長春宮。……丁未，車駕至京師。」³⁴西元 638 年 2 月，皇帝世民自洛陽西返長安。最後是太宗貞觀十五年：「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辛丑，還宮。十一月，……壬申，車駕西歸長安。」³⁵西元 641 年太宗啟程巡幸洛陽，11 月回長安。

不論是從并州或洛陽西返長安，〈入潼關〉詩即作於西入潼關時：

嶠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霜峰直臨道，冰河曲繞城。古木參差影，寒猿斷續聲。冠蓋往來合，風塵朝夕驚。高談先馬度，偽曉預雞鳴。棄繻懷遠志，封泥負壯情。別（向）有真人氣，安知名不名。³⁶

詩文中的「霜峰」、「冰河」透露季節在冬，則第二種說法顯然與冬季景象不符。楊乾坤在後期著作中持第一種說法（623），認為詩文用「終軍棄繻」典故，表明三年後發動玄武門之變不謀而合。³⁷然而，楊氏在早期著作則持第三種說法（641），認為此年正月，世民欲至泰山封禪，行至洛陽後，在夏六月，有彗星出現，以為不祥，遂停封禪，至冬日返入潼關作此詩。³⁸周瀚認為此詩創作年代在 641 年，但根據史料則認為應寫於 638 年。³⁹李久昌認為唐太宗三次經行潼關，但冬季入潼關僅有一次，故持第三種說法（641）。⁴⁰筆者以為此詩應作為西元 641 年世民已稱帝，由洛陽西入潼關至長安所作，故《全唐詩》載「太宗皇帝」，而西元 623 年世

³¹ 北宋·周敦頤，《周子通書》（四部備要（線裝）·子部，上海：中華，1920-1934），〈文辭〉，頁 6。

³²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三民，2022.12，3 版）。

³³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1956.6，1 版），卷 190，〈唐紀〉，頁 5972-5974 高祖武德六年（623）。

³⁴ 《資治通鑑》，卷 195，〈唐紀〉，頁 6135-6137 太宗貞觀十二年（638）。

³⁵ 《資治通鑑》，卷 196，〈唐紀〉，頁 6165-6170 太宗貞觀十五年（641）。案：《通鑑》並未記載李世民巡幸洛陽在西元 641 年哪一月，僅將此事寫在該年正月至三月之間。

³⁶ 《全唐詩》，卷 1，太宗皇帝〈入潼關〉，頁 5。

³⁷ 楊乾坤注釋，《唐詩陝西·天府關中》（西安：陝西人民，2022.4，1 版），頁 1-2。

³⁸ 楊乾坤選注，《唐詩秦嶺》（西安：陝西人民，2016.4，1 版），頁 78。

³⁹ 周瀚，《唐代帝王詩歌與詩壇》（香港：初文，2021.12，初版），頁 45 表 1-1「唐太宗巡幸詩的史料依據」序號 9。

⁴⁰ 李久昌編著，《嶠函：唐詩之路》（西安：三秦，2023.5，1 版），頁 2。

民尚為皇子身分。

詩中述說潼關形勢的表象是「嶠函」、「霜峰」、「冰河」，嶠山、函谷關如衣襟、腰帶屏障長安、洛陽；冰雪覆蓋著山峰也佈滿著潼關道，結冰黃河在潼關城北側轉 90 度東流。動、植物呈現的意象是「古木」、「寒猿」，所謂老樹高低交錯造成視覺疊影，⁴¹猿聲斷續啼鳴，增添行旅者在寒風刺骨中行走在長洛驛道上的情感波動。典故意象有五個，依時間分別是白馬非馬論、紫氣東來、雞鳴過函關、終軍棄繻、丸泥封關。

「高談先馬度」談的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⁴²以形論馬、色論白馬，形、色本不同，此即公孫龍巧辯白馬非馬論。老子被視為道家始祖，道家稱修真得道者為真人或道士，「別（向）真人氣」指的是老子紫氣東來，《史記·老子傳》記載：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⁴³

函谷關關令尹喜與老子皆非尋常人物，尹喜學過星宿，遠處見東方「紫氣浮關」，知有奇人將至，騎著青牛的老子亦知尹喜修為，故得知尹喜希望已著書亦欣然答應而留下五千多字的《道德經》，此經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⁴⁴「安知名不名」即用此意。

「偽曉預雞鳴」用的是雞鳴過函谷關方式。《史記·孟嘗君傳》記載：

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齊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⁴⁵

古代關門日落則閉，雞鳴則開，戰國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急出關而離秦國，門下食客預先學雞鳴，假裝天亮，引起雄雞齊鳴，得以順利逃離。「棄繻懷遠志」用終軍棄繻展志節之事，《漢書·終軍傳》記載：

⁴¹ 參差：「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詳參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2000.12，1版），卷1，〈國風·周南·關雎〉，頁31。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2007.7，1版），卷34，〈江水〉，頁792注：「其間遠望，勢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

⁴² 王琯撰，《公孫龍子懸解》（北京：中華，1992.9，1版）〈白馬論〉，頁42。

⁴³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1982.11，2版），卷63，〈老子傳〉，頁2141。

⁴⁴ 朱謙之撰，《老子校釋》（北京：中華，1984.11，1版），《老子道經》，〈一章〉，頁3。

⁴⁵ 《史記》，卷75，〈孟嘗君傳〉，頁2354-2355。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⁴⁶

終軍被選為博士，從濟南經函谷關入京，關吏在他入函谷關時給予繻，作為回程時出關合符用。終軍表現西入京城飛黃騰達的決心而丟繻，爾後終軍果然有成，以謁者身分行使郡國，憑使節出關。「封泥負壯情」，封泥即丸泥，用的是《後漢書·隗囂傳》典故，其云：「元請以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⁴⁷東漢隗囂的大將王元勸隗囂以兵守函谷關，古代以竹簡書寫，為防私拆，在繩結開啟處，以泥封緊，加蓋印章。封泥象徵函谷關的重要性，即據守雄關內心升起的豪情壯志。

實像是「冠蓋」、「風塵」。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⁴⁸冠蓋如七相五公；杜甫〈夢李白二首之二〉：「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⁴⁹京城的冠蓋對比憔悴的斯人；《唐語林·豪爽》：「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⁵⁰冠蓋是頭冠與車蓋，借指達官貴人。風塵據《抱朴子·交際》：「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⁵¹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⁵²意指官場。「冠蓋往來合，風塵朝夕驚」是詩眼所在，入潼關即入京城，京城是天子所居，自然達官顯要聚集如雲，但也因伴君伴虎，宦途變化往往無法預料。詩題雖為潼關，但因此關位於長安、洛陽的兩京驛道間，函谷關位於潼關東邊，兩關之間隔著桃林塞，關係密切，藉古（函谷關）說今（潼關）之意在於斯。又因入潼關即入都城，皇權政治中心自然是官吏聚集、仕途升降頻繁之險地。

唐代詩題依《唐詩鏡淥》分為雜詩、應制、唱和、集句、歌行、賦得、古風、聯句八類。應制是奉帝命而作，內容多見承歡君意、歌頌昇平、頌讚禮制。⁵³許敬宗〈奉和入潼關〉乃是作詩詞與人相唱和，奉和唐太宗〈入潼關〉詩，其載：

曦馭循黃道，星陳引翠旗。濟潼紆萬乘，臨河耀六師。前旌彌陸海，後騎發通伊。勢踰迴地軸，威盛轉天機。是節歲窮紀，關樹蕩涼颼。仙露含靈掌，瑞鼎照川湄。沖襟賞臨睨，高詠入京畿。⁵⁴

詩文從「曦馭」到「天機」是許敬宗歌詠太宗皇帝領軍西入潼關的盛況。詩中表象是「曦馭」、「星陳」、「翠旗」、「濟潼」、「萬乘」、「臨河」、「六師」、「靈掌」、「川湄」。意象包括「黃

⁴⁶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1962.6，1版），卷64，〈終軍傳〉，頁2819-2820。

⁴⁷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1965.5，1版），卷13，〈隗囂傳〉，頁524。

⁴⁸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考異，《昭明文選》（臺北：五南，2023.10，2版），卷1，班孟堅〈西都賦〉，頁7。

⁴⁹ 《全唐詩》，卷218，杜甫〈夢李白二首之二〉，頁2289。

⁵⁰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2008.1，2版），卷4，〈豪爽〉，頁336。

⁵¹ 晉·葛洪撰，楊明照注，《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1991.12，1版），卷16，〈交際〉，頁422。

⁵² 《全唐詩》，卷213，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頁2218。

⁵³ 蘇慧霜，《唐詩鏡淥》（臺北：新學林，2023.8，初版），頁42。

⁵⁴ 《全唐詩》，卷35，許敬宗〈奉和入潼關〉，頁463。

道」、「陸海」、「地軸」、「天機」、「窮紀」、「瑞鼎」。「曦馭循黃道，星陳引翠旗」，曦是白天，馭是御駕，黃道據《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⁵⁵太陽運行的軌道稱中道、黃道、光道，借指皇帝御駕之路。星陳指夜晚，⁵⁶兩句述說從白天到夜晚，皇帝車隊行進的道路，處處可見儀仗旌旗、旗幟飄揚場景。

由於潼關北臨黃河，是以詩文有「濟潼」、「臨河」，「濟」指渡河，⁵⁷「紆」依鄭玄注「曲也」，⁵⁸「萬乘」依趙岐注「兵車萬乘，謂天子也。」⁵⁹「六師」與萬乘詞意相似，《孟子·告子》：「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⁶⁰因天子人馬眾多，渡河至潼關時隊形彎曲，此謂「濟潼紆萬乘，臨河耀六師」，「前旌彌陸海，後騎發通伊。勢踰迴地軸，威盛轉天機」是對「濟潼……，臨河……」的具體說明。「陸海」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顏師古注：「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⁶¹陸海原意包含雍、梁二州，物資豐富，此處指關中。四句述說前方軍隊抵達關中，後方部隊仍在洛河支流伊水，言其隊伍綿延，氣勢聲威超過旋地（軸）轉天（機）。⁶²

「是節歲窮紀，關樹蕩涼颼。仙露含靈掌，瑞鼎照川湄」，窮紀依《禮記·月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⁶³《初學記·敘事》引南朝梁元帝《纂要》：「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除月、暮節、暮歲、窮稔、窮紀。」⁶⁴窮紀是十二月，歲窮紀即年末，冬季疾風使潼關樹木搖曳。靈掌是仙掌，崔顥〈行經華陰（山）〉：「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⁶⁵仙掌、仙人掌、靈掌實同一座山，廖立箋注：「仙掌，華山東峰名，因其上有五崖比壑破巖而立，自下遠望，略作掌形，相傳河神巨靈開山所留，因以名峰。」⁶⁶可知仙掌山是華山東峰，頂上有狀似掌形的五崖，成因依張衡〈西京賦〉記載：「漢氏初都，……左有嶠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鼎足，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李善注：「巨靈，河神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蹠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尚在。」⁶⁷「二華」疑指華山與仙人掌山，因仙人掌山是華山東側餘脈，本於「一山」（華山），乃河神分為二山。「瑞鼎照川湄」古時黃帝曾在毗鄰潼關、黃河的荆山下鑄鼎，

⁵⁵ 《漢書》，卷 26，〈天文志〉，頁 1294。

⁵⁶ 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1982.7，2 版），卷 19，〈魏書·陳思王植傳〉，頁 564：「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風駕，秣馬脂車。」

⁵⁷ 《昭明文選》，卷 24，曹子建〈贈白馬王彪〉，頁 845：「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全唐詩》，卷 162，李白〈行路難〉三首之一，頁 1684：「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⁵⁸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李學勤主編，《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1999.12，1 版），卷 41，〈冬官考工記·矢人〉，頁 1132：「中弱則紆，中強則揚。」注：紆，曲也。

⁵⁹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2000.12，1 版），卷 1，〈梁惠王〉，頁 3。

⁶⁰ 《孟子注疏》，卷 12，〈告子〉，頁 392。

⁶¹ 《漢書》，卷 28，〈地理志〉，頁 1642。

⁶² 天機：國家的機要事宜。《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孫權傳〉，頁 1122：「君臨萬國，秉統天機。」

⁶³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1999.12，1 版），卷 17，〈月令〉，頁 656-657。

⁶⁴ 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2004.2，2 版），卷 3，〈冬第四·敘事〉，頁 58-59 引。

⁶⁵ 《全唐詩》，卷 130，崔顥〈行經華陰（山）〉，頁 1329。

⁶⁶ 唐·岑參著，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2004.9，1 版），頁 85 注。

⁶⁷ 《昭明文選》，卷 2，張平子〈西京賦〉，頁 39。

⁶⁸鼎象徵祥瑞，湄是水岸，川湄即黃河岸邊，⁶⁹荊山下的鼎照耀著黃河邊，從「仙露」到「川湄」形容潼關地勢。

「沖襟賞臨睨，高詠入京畿」是詩中實像。「沖襟」同「沖衿」，如駱賓王〈夏日遊德州贈高四〉：「霜松貞雅節，月桂朗沖襟。」⁷⁰以霜松對月桂，雅節對沖襟；又如白居易〈祭中書韋相公文〉：「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沖襟弘度。」⁷¹《晉書·韓伯傳》：「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⁷²形容懷祖鑒察力高遠，胸襟寬廣如玉；又如王勃〈七夕賦〉：「矜雅範而霜厲，穆沖衿而煙渺。」⁷³即胸襟淡遠、寬廣。「臨睨」是俯視，兩句以臣子觀察，形容李世民心胸寬廣而富抱負，領軍入潼關至京城，伴隨高歌一曲展現自豪與喜悅。

二、唐玄宗與張九齡、蘇頌、張說

除李世民外，唐明皇也作詩，張九齡、蘇頌、張說臣子們奉和。明皇帝〈潼關口號〉：「河曲回千里，關門限二京。所嗟非恃德，設險到（致）天平。」⁷⁴作於玄宗開元十二年（724）11月東幸洛陽經潼關所作。⁷⁵詩中表象是「河曲」、「關門」，意象則無，實像是「恃德非設險」，「德」跟「險」是詩眼。「河曲」說的是黃河於今陝西、山西自北而南至潼關處折而往東流，潼關將兩京分隔為一東一西，然而潼關雖以險峻「設險」著稱，同時對兩京國家安全如此重要，但仍強調天子行仁政「恃德」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張九齡〈奉和聖製度潼關口號〉：「隱嶙故城壘，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⁷⁶《全唐詩》隱嶙作「嶙嶙」，⁷⁷歐陽修〈盤車圖〉：「淺山嶙嶙，亂石轟轟。」⁷⁸山勢高低起伏之意。潘岳〈西征賦〉：「覓陞殿之餘基，裁岷峨以隱嶙。」李善注：「隱嶙，絕起貌。」⁷⁹不論是隱嶙或嶙嶙皆形容潼關城之高，一方面隨盛世到來，關城重要性隱晦且時間久遠而呈荒涼之景；一方面突顯君王德政廣披，已不需要憑藉關城而依舊能天下太平。「在德不在險」源自魏

⁶⁸ 《史記》，卷28，〈封禪書〉，頁1394：「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⁶⁹ 《毛詩正義》，卷6，《秦風·蒹葭》，頁496：「所謂伊人，在水之湄。」【疏】傳「湄，水隈。」《正義》引《釋水》：「水草交為湄。」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重甌，隈。」隈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隈」。

⁷⁰ 《全唐詩》，卷77，駱賓王〈夏日遊德州贈高四〉，頁829。

⁷¹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1983.11，1版），卷681，白居易〈祭中書韋相公文〉，頁6965。

⁷²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1974.11，1版），卷75，〈韓伯傳〉，頁1995。

⁷³ 《全唐文》，卷177，王勃〈七夕賦〉，頁1802。

⁷⁴ 《全唐詩》，卷3，明皇帝〈潼關口號〉，頁40-41。

⁷⁵ 李久昌編著，《崑函：唐詩之路》，頁3、6。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2008.11，1版），卷1，〈奉和聖製度潼關口號〉，頁54。熊飛校注。蘇慧霜，《唐詩鏡淥》，頁52-53。另說楊乾坤以為是玄宗由洛陽返回長安，經過潼關時隨口所吟的一首詩。詳參氏注釋，《唐詩陝西·天府關中》，頁10。《全唐詩》口號詩研究可見劉萬青，〈口號詩探析——以《全唐詩》為考察對象〉，《健行學報》，33：2（桃園，2013.4），頁87-103。

⁷⁶ 《張九齡集校注》，卷1，〈奉和聖製度潼關口號〉，頁54。

⁷⁷ 《全唐詩》，卷49，張九齡〈奉和聖製度潼關口號〉，頁608。

⁷⁸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2001.3，1版），卷6，〈盤車圖〉，頁99。

⁷⁹ 《昭明文選》，卷10，潘安仁〈西征賦〉，頁359。《全唐詩》，卷118，孫逖〈和登會稽山〉，頁1186：「煙景畫清明，九峯爭隱嶙。」

武侯與吳起對話，《史記·吳起傳》記載：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⁸⁰

魏武侯繼位文侯而續用吳起，向吳起自誇本國有山河之固，吳起提醒君王在德不在險，並舉歷史上的三苗被禹滅、夏桀亡於商湯、殷紂被滅於武王，三苗、夏桀、殷紂無不身處地勢險峻，但因仁德不失而亡。唯有天子施德政才知仁道之美。⁸¹詩中表象是「隱嶙」、「城壘」、「戍樓」，意象是「在德不在險」典故，實像是「王道休」。

張九齡奉和玄宗詩作之外，另有當時號為「燕許大手筆」兩位文人應制，⁸²張說是燕國公，蘇頲是許國公，兩人皆以文章聞名、稱號也相當。蘇頲〈奉和聖製過潼津關〉：「在德何夷險，觀風復往還。自能同善閉，中路可無關。」⁸³潼津關即潼關，「夷險」取其險峻偏意，⁸⁴「觀風」是觀察民風，體察施政得失，⁸⁵「善閉」用《道德經》典故，「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⁸⁶比喻關門控制出入。詩中表象是「夷險」、「觀風」，意象是「善閉」，實像是「在德」。蘇頲提出君王若能時時善體民情，展現上位者之德，國家自能長治久安，如關城發揮宿守之效，甚至可以不設關。

張說〈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丸泥。」⁸⁷天德據《荀子·不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⁸⁸四季更迭，太陽東升日落，不分彼此化育萬物謂之「天德」，天德公平無分，但潼關門將東西千里分隔兩地，並憑藉關城優勢，以少數「丸泥」兵力守城，典出《後漢書·隗囂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

⁸⁰ 《史記》，卷 65，〈吳起傳〉，頁 2166-2167。

⁸¹ 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2007.12，1 版），卷 11，〈周書·洪範〉，頁 464：「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史記》，卷 14，〈十二諸侯年表〉，頁 509：「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2000.8，1 版），卷 4，〈史傳〉，頁 205：「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李娜，〈唐詩中的潼關生態書寫〉，《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7 年第 3 期，頁 13。

⁸²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1975.2，1 版），卷 125，〈蘇頲傳〉，頁 4399-4402。

⁸³ 《全唐詩》，卷 74，蘇頲〈奉和聖製過潼津關〉，頁 814。

⁸⁴ 北齊·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1974.6，1 版），卷 60，〈程駿傳〉，頁 1346：「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

⁸⁵ 《禮記正義》，卷 11，〈王制〉，頁 425：「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全唐詩》，卷 88，張說〈奉和聖制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作應制〉，頁 967：「問俗兆人阜，觀風五教宣。」

⁸⁶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2008.12，1 版），〈上篇·二十七章〉，頁 71。

⁸⁷ 《全唐詩》，卷 89，張說〈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頁 977。

⁸⁸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1988.9，1 版），卷 2，〈不苟〉，頁 46。

也。」⁸⁹東漢隗囂大將王元請纓為主，只需以少許之兵，搭配關城即無後顧之憂。詩中表象是「關門」，意象是「丸泥」，實像是「天德」，以天德比喻天子之德，若皇帝能做到德行廣披無分，則可不倚恃潼關之險。

參、個別過關詩

一、張祜

張祜〈入（潼）關〉：「都城連百二（三百里），雄險北（此）回環。地勢遙尊岳（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亦（昔）龍顏。何事梟凶輩，干戈自不閒。」⁹⁰此詩於唐詩不同卷互見，括弧內為兩處記載不同處。據李久昌考，詩人一生三次入京，詩寫於第三次文宗大和五年（831）秋，被令狐楚表薦入長安求仕入潼關時。⁹¹百二依《史記·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⁹²都城距離潼關三百里，另說都城得潼關之險，二萬人足以抵擋百萬雄兵，雄險指華山和黃河，所謂華山雄，黃河險，華山與黃河在潼關環繞。「地勢到側讓關」則分別敘述華山與黃河險峻，潼關南憑西嶽華山，北有黃河南流在關處轉彎如「側讓關」，前四句彰顯關城形勢。

後四句以秦始皇「虎視」、漢高祖「龍顏」，⁹³開啟秦漢一朝之君，據守關城而立足關中，雖時當時是函谷關，但自古潼關與函谷關同處兩京大道上之險關，以古論今筆法，說明當時反叛的藩鎮梟雄，盧龍、成德、魏博等河北三鎮反叛，朝廷發兵討伐不勝，遂命為節度使再次分立，但也導致干戈頻仍。以秦皇漢武對比藩鎮，前者是天命所歸，憑潼關而王朝久安，後者是未得天命的梟雄，屢屢叩關而亂，表達反對割據，冀求一統，而得天命者意謂歷代有德才能開啟朝代機先，德足以配位，姑且不論當皇帝後的作為，天命與君德仍勝於雄關。詩中表象是「連百二（三百里）」、「岳」、「河流」，意象是「秦皇漢祖」，實像是「梟凶輩」。

二、許渾、溫庭筠

許渾〈行次潼關題驛後軒〉：「飛閣極層臺，終南（童）此路回。山形朝闕（岳）去，河勢抱（入）關來。雁過秋風急，蟬（雞）鳴宿霧開。平生無限意，驅馬任塵埃。」⁹⁴唐憲宗元和二年（807）秋詩人初次赴長安趕考，途經潼關時所作。⁹⁵唐人作詩對於潼關與函谷關的區分是

⁸⁹ 《後漢書》，卷 13，〈隗囂傳〉，頁 524。《晉書》，卷 97，〈四夷傳·西戎·吐谷渾·視羆〉，頁 2541：「以一九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

⁹⁰ 《全唐詩》，卷 18，張祜〈入關〉，頁 183。《全唐詩》，卷 510，張祜〈入潼關〉，頁 5814。

⁹¹ 李久昌編著，《崤函：唐詩之路》，頁 28。

⁹² 《史記》，卷 8，〈高祖本紀〉，頁 382-383。

⁹³ 《史記》，卷 8，〈高祖本紀〉，頁 342-343：「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裴駰引應劭曰：「隆，高也。」文穎曰：「準，鼻也。」司馬貞引文穎曰：「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案：龍顏借指皇帝顏貌。

⁹⁴ 《全唐詩》，卷 528，許渾〈行次潼關題驛後軒〉，頁 6042。

⁹⁵ 李久昌編著，《崤函：唐詩之路》，頁 33。

模糊的，顯示詩人隨興吟詩的文學屬性。「飛閣」即高閣樓，形容潼關城池之高，⁹⁶終童是終軍，因年輕被選為博士，故稱「童」，當時自濟南經函谷關入京；⁹⁷另說指潼關南側的終南山，借指長安，⁹⁸出入必經潼關，故言「此路回」。伴隨西行人關至長安，兩側山峰與西嶽華山相依，黃河在潼關處轉折。又借用孟嘗君食客偽雞鳴於函谷關，⁹⁹佯裝日出「宿霧」散，¹⁰⁰關吏因而開關門，顯然不論是終軍入關或雞鳴地點皆誤以為發生於潼關。

詩人赴京趕考西入潼關，面對關城內的高閣；關城外的山勢與大河，正值秋風雁飛、夜晚霧氣正散之際，勾起無限思緒，因而題詩於潼關驛後窗的牆壁上。¹⁰¹詩中表象是「飛閣」、「山形」、「河勢」，意象是「終童」、「雞鳴」典故，以及觸動內心之「雁」、「秋風」、「宿霧」景象，實像是「平生無限意、驅馬任塵埃」，抒發自身追求理想，馳馬勇往直前，不受任何意念、困難所限，「塵埃」表面是馬匹奔騰揚起的灰土，實則謀取塵世官職的抱負。¹⁰²潼關處成為詩人寫詩、留詩、傳詩之題壁詩功能。

許渾另一首潼關驛樓題壁詩互見於兩處，〈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落）中條。樹色隨山迴，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¹⁰³〈夜行次東關，逢魏扶東歸〉：「南北斷（倦）蓬飄，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關迴（迴），河聲入塞遙。勞歌此分首（手），風急馬蕭蕭。」¹⁰⁴李久昌以為詩寫於唐宣宗大中元年（847）秋，詩人官拜監察御史，自洛陽赴京經潼關時所作；¹⁰⁵孫琴安認為大中年間入為監察御史，因病乞歸，後復出仕，任潤州司馬。此詩應是其赴潤州司馬前，將

⁹⁶ 《昭明文選》，卷 31，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魏文帝曹丕遊宴〉，頁 49：「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昭明文選》，卷 11，何平叔〈景福殿賦〉，頁 408：「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岿峩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乘虛。」北魏·楊銜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2006.2，1 版），卷 1，〈瑤光寺〉，頁 47：「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另說作「跨道」解，陳直校證，《三輔黃圖校證》（西安：新華書店，1980.5，1 版），卷 2，〈漢宮·未央宮〉，頁 41-42：「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為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案：即古代宮殿間連接的通道。

⁹⁷ 《漢書》，卷 64，〈終軍傳〉，頁 2819-2820。

⁹⁸ 李久昌編著，《崑函：唐詩之路》，頁 33。

⁹⁹ 《史記》，卷 75，〈孟嘗君傳〉，頁 2354-2355。

¹⁰⁰ 東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1979.5，1 版），卷 4，〈詠貧士七首〉之一，頁 123：「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全唐詩》，卷 449，白居易〈酬鄭侍御多雨春空過詩三十韻〉，頁 5062-5063：「慘淡陰煙白，空濛宿霧黃。」

¹⁰¹ 軒，窗戶。《陶淵明集》，卷 5，〈閑情賦〉，頁 154：「曲調將半，景落西軒。」

¹⁰² 塵土：《禮記正義》，卷 3，〈曲禮〉，頁 94：「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1961.7，1 版），卷 1，〈內篇·逍遙遊〉，頁 4：「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全唐詩》，卷 216，杜甫〈兵車行〉，頁 2254：「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塵俗：《淮南子集釋》，卷 2，〈俶真訓〉，頁 125：「茫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史記》，卷 84，〈屈原傳〉，頁 2482：「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

¹⁰³ 《全唐詩》，卷 529，許渾〈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頁 6053。江聰平校注，《許渾詩校注》（臺北：中華，2018.7，再版），〈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頁 268：「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山迴，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

¹⁰⁴ 《全唐詩》，卷 884，許渾〈夜行次東關，逢魏扶東歸〉，頁 9991。

¹⁰⁵ 李久昌編著，《崑函：唐詩之路》，頁 34。

到長安時在潼關驛樓而題寫；¹⁰⁶馬茂元與孫氏看法同，當是赴潤州司馬前，入長安選官時所作。¹⁰⁷姑且不論是詩人官拜監察御史入京，抑或後來赴潤州司馬前赴京，均為途經潼關，在驛樓「瓢」酒後，¹⁰⁸觸景生情，題詩於潼關驛樓壁上。

詩題「秋日」，詩文「紅葉」點出詩人西入赴京季節，「蕭蕭」依杜甫〈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¹⁰⁹即風吹樹葉的落葉聲，面對秋風掃紅葉的傍晚時刻，於旅途中在「長亭」稍作停頓，王琦注引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海錄碎事》：「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¹¹⁰古代十里設一長亭供旅人休息，此處長亭與潼關驛疑似地點重疊，故詩人於關驛處休息飲酒並題詩於驛壁。

許渾西經潼關沿途見白雲繚繞「太華」山、細雨落「中條」山，西嶽華山西延山脈依序有松果山、太華山，¹¹¹潼關在黃河南的華山東北，黃河北的中條山西南，因而西行途中會發現樹景隨山脈而「迴」去，¹¹²滔滔黃河於潼關處轉而東流經黃淮平原入遙遠的渤海，¹¹³正好與詩人西行方向相反，故言「樹色隨山迴，河聲入海遙。」詩中表象是「太華」、「中條」，意象是「紅葉蕭蕭」、「酒」、「殘雲」、「疏雨」、「樹色」、「河聲」等撥動情緒起伏的景象或聲音，實像是「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西入潼關即離長安不遠，詩人將赴天子所居「帝鄉」，但仍嚮往「漁樵」生活。高適〈封丘作（縣）〉：「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¹¹⁴王維〈桃源行〉：「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¹¹⁵杜甫〈村夜〉：「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¹¹⁶漁樵是指漁夫與樵夫的捕魚砍柴生活，引申為退隱，即作者在出仕與歸隱之間仍舉棋不定。

溫庭筠〈過潼關〉：「地形盤屈帶河流，景氣澄明是勝遊。十里曉雞關樹暗（靜），一行寒雁隴雲愁。片時無事溪泉好，盡日凝眸岳色秋。塵尾角巾應曠望，更嗟芳靄隔秦樓。」¹¹⁷詩人東出潼關，借景抒情。表象是「地形盤屈帶河流，景氣澄明是勝遊」，潼關地處中條山與華山間，兩山隔黃河相對，黃河於潼關折而東流，此刻景色明亮乃出遊好時機。¹¹⁸意象是「曉雞關樹暗（靜），寒雁隴雲愁」，關隘樹木因夜晚而顯得寧靜，對比報曉的雞鳴聲，用得是雞鳴過函谷關典故，又見秋雁飛往潼關附近山脈，增添詩人惆悵。

¹⁰⁶ 孫琴安編著，《唐詩經典解讀》（上海：上海百家，2009.10，1版），頁285。

¹⁰⁷ 馬茂元選注，《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2021.6，1版），頁663。

¹⁰⁸ 瓢，容量較杯為大的舀水之器。詳參歐麗娟選注，《唐詩選注》（北京：北京大學，2021.3，1版），頁429。

¹⁰⁹ 《全唐詩》，卷227，杜甫〈登高〉，頁2467。

¹¹⁰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1977.9，1版），卷5，〈樂府·菩薩蠻〉，頁321-322注引。

¹¹¹ 佚名著，方輅譯注，《山海經》（北京：中華，2009.3，1版），卷2，〈西山經〉，頁19。

¹¹²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1988.2，2版），二篇下〈辵部〉，頁75：「迴，遠也。」

¹¹³ 陳耀南，《原韻譯唐詩新賞》（香港：中華，2021.7，初版），頁506。

¹¹⁴ 《全唐詩》，卷213，高適〈封丘作（縣）〉，頁2220。

¹¹⁵ 《全唐詩》，卷125，王維〈桃源行〉，頁1257-1258。

¹¹⁶ 《全唐詩》，卷226，杜甫〈村夜〉，頁2440。

¹¹⁷ 《全唐詩》，卷582，溫庭筠〈過潼關〉，頁6748。

¹¹⁸ 《全唐詩》，卷651，方干〈于秀才小池〉，頁7479：「一泓激灩復澄明，半日功夫斲小庭。」

詩人東過潼關後得以放下塵世，全心凝視秋季華山的面貌，¹¹⁹故言「片時無事溪泉好，盡日凝眸岳色秋」，對比出關前心境緊繃，此刻已愜意，兩句仍屬意象呈述。實像則是「塵尾角巾應曠望，更嗟芳靄隔秦樓。」「塵尾」依《晉書·王戎傳》：「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¹²⁰白居易〈齋居偶作〉：「老翁持塵尾，坐拂半張牀。」¹²¹塵尾又稱拂塵，古時清談雅士常執於手。「角巾」有作布衣解，如陳子昂〈唐故朝議大夫梓州長史楊府君碑銘〉：「於是始以角巾應命，褐衣詣闕。」¹²²高適〈答侯少府〉：「江海有扁舟，丘園有角巾。」¹²³或作隱士解，如《晉書·羊祜傳》：「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¹²⁴〈王導傳〉：「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¹²⁵角巾是隱士所戴有稜角的方巾，借指隱士，隱士生活當如布衣般。「曠望」據李善注引《廣雅》：「曠，遠也。」¹²⁶即遠望之意。

塵尾是清談士人手持物，仍在朝為官；角巾則是退隱之士，已在京城勢力外圍，借指詩人出關前後的樣態，潼關因居長安東關，出關象徵離開權力中心而為角巾之士，是以說塵尾與角巾應遠望，因一在朝，一在野。「秦樓」是關中長安代稱，也因為詩人東過潼關，已下野不再朝，是以透過「靄」隔秦樓，感傷霧氣瀰漫關中而不再瞭解帝王決策，心中思念長安之情油然而生。

肆、駐關詩

一、懷古思愁

崔顥〈題潼關樓〉：「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川從陝路去，河繞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煙萬里愁。」¹²⁷詩人在「向晚」時以「客行」身分在潼（津）關題詩，¹²⁸當時天氣值「雨霽」，霽據《漢書·魏相傳》：「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顏師古引臣瓚曰：「霽，止也。」¹²⁹雨霽是雨停，又杜甫〈閣夜〉：「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¹³⁰霽另有轉晴之意，詩人在雨停轉晴之際，喜悅心溢於言表，立即停馬登潼關俯視美景。潼關西臨潼水，潼水匯入渭水後再成為黃河支流，黃河於潼關轉而東流，關城臨黃河南側而置，故又稱潼津關、津樓。¹³¹

¹¹⁹ 《全唐詩》，卷 540，李商隱〈聞歌〉，頁 6186：「斂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

¹²⁰ 《晉書》，卷 43，〈王戎傳〉，頁 1236。

¹²¹ 《全唐詩》，卷 460，白居易〈齋居偶作〉，頁 5243。

¹²² 《全唐文》，卷 214，陳子昂〈唐故朝議大夫梓州長史楊府君碑銘〉，頁 2168。

¹²³ 《全唐詩》，卷 211，高適〈答侯少府〉，頁 2197-2198。

¹²⁴ 《晉書》，卷 34，〈羊祜傳〉，頁 1020。

¹²⁵ 《晉書》，卷 65，〈王導傳〉，頁 1753。

¹²⁶ 《昭明文選》，卷 26，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頁 909 李善注引《廣雅》。《李太白全集》，卷 16，〈古近體詩·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頁 755：「岿崑四荒外，曠望羣川會。」

¹²⁷ 《全唐詩》，卷 130，崔顥〈題潼關樓〉，頁 1328。

¹²⁸ 向晚即傍晚。《全唐詩》，卷 134，李頎〈送魏萬之京〉，頁 1362：「關城樹（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

¹²⁹ 《漢書》，卷 74，〈魏相傳〉，頁 3134。

¹³⁰ 《全唐詩》，卷 229，杜甫〈閣夜〉，頁 2496-2497。

¹³¹ 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一）（鄭州：中州古籍，2019.5，1 版），頁 43：「潼關一名潼津關。」另有濃縮版劉

登潼關往北見中條山，往南見華山，兩山豎立三輔（關中）東側，¹³²而潼關城則控制古代九州，居天下鎖匙角色，九州依《尚書·夏書·禹貢》記載其順序：「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¹³³《漢書·地理志》九州順序同《尚書》。¹³⁴《爾雅·釋地》九州順序：「冀、豫、雝、荊、揚、兗、徐、幽、營」。¹³⁵與〈禹貢〉差別是多幽州、營州，少青州、梁州。無論如何除雍（雝）州之外，其餘可謂在潼關以東，潼關幾乎控制通往關中的天下。位於華陰縣東北的潼關，黃河在潼關處折而東流往古代陝縣而去。詩中表象是「津樓」、「山勢」、「關門」、「九州」、「川」、「河」；觸動內心的「雨霽」、「向晚」、「風煙」則是意象，雨停欣喜而在傍晚、風煙環繞下登關樓；實像是「萬里愁」，潼關是長安東關，長安動靜與關隘息息相關，詩人流露出望向京城距離上的國愁。

岑參〈東歸晚次潼關懷古〉是詩人於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晚春之季，赴長安落第而東歸，途經潼關懷古作品。¹³⁶

暮春別鄉樹，晚景低津樓。伯夷在首陽，欲往無輕舟。遂登關城望，下見洪河流。自從巨靈開，流血千萬秋。行行潘生賦，赫赫曹公謀。川上多往事，淒涼滿空洲。¹³⁷

詩中表象是「津樓」、「關城」、「洪河」、「巨靈」、「流血」；意象是「鄉樹」、「伯夷」、「潘生賦」、「曹公謀」典故；實像是「往事」、「淒涼」。「鄉樹」是詩人長久赴京追求名利的第二故鄉，在晚春傍晚告別長安物景後準備回到真正故鄉，值此到潼關，本欲到與潼關隔河相望，餓死於首陽山的伯夷、叔齊墓，¹³⁸卻無輕舟前往，遂登潼關城而興思古幽情，首先見到黃河南流經關城。

其次提到「巨靈」開啟華山，《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張守節引《括地志》：「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也。注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為兩，今腳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閒也。《開山圖》云巨靈胡者，偏得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¹³⁹華陰以西七座名山有華山、薄山（衰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汶山）。《括地志》注「華、嶽本一山」，

學鐸，《劉學鐸講唐詩——唐詩經典新解》（臺北：複刻文化，2025.2，1版）。秦似主編，《唐詩新選》（武漢：湖北教育，2001.6，1版），頁702：「潼關城樓，因地處關津而稱。」

¹³² 《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頁736：「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又從《漢書》，卷28，〈地理志〉，頁1543、1545-1546可知京兆尹從右內史改、左馮翊從左內史改、右扶風先從右內史更為主爵都尉再改。不論是漢景帝時的左、右內史和主爵都尉，或是漢武帝時改為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位官員管制地區相當於關中一帶，也稱「三輔」。

¹³³ 《尚書正義》，卷6，〈夏書·禹貢〉，頁189-255。

¹³⁴ 《漢書》，卷28，〈地理志〉，頁1524-1532。

¹³⁵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2000.12，1版），卷7，〈釋地〉，頁188。

¹³⁶ 李久昌編著，《嶠函：唐詩之路》，頁14。

¹³⁷ 《全唐詩》，卷198，岑參〈東歸晚次潼關懷古〉，頁2042。

¹³⁸ 《史記》，卷61，〈伯夷列傳〉，頁2123。

¹³⁹ 《史記》，卷28，〈封禪書〉，頁1372。

嶽山即《史記》所稱岳山，華山與岳山本一山，河神將山分為二，神之「腳躡」在首陽山，神之「手盪」在華山（仙掌山），而潼關夾於兩山而置，歷朝在此戰爭不斷，是以「流血千萬秋」，詩人也因首陽山、華山與河神巨靈有關，進而融入潼關詩中。

接著提到發生於潼關的「潘生賦」與「曹公謀」。《晉書·潘岳傳》：「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¹⁴⁰《昭明文選》注潘安仁：「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¹⁴¹西晉潘岳被徵選為長安令，自鞏縣西行，記錄「行行」途中人物、山水而作此賦。「曹公謀」指的是漢獻帝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馬超、韓遂與之僵持於潼關，曹操使反間致馬、韓失和退走涼州，遂取關中，¹⁴²展現「赫赫」智謀。¹⁴³登潼關而憶潘岳赴長安任官途中作《西征賦》之才情；曹操智退關中韓遂、馬超之往事，對比自己落第東歸而生「淒涼」感。

薛逢〈潼關河亭〉：「重岡如抱嶽如蹲，屈曲（氣蹙）秦川勢自尊。天地併功開帝宅，山河相湊束龍門。櫓聲嘔軋中流渡，柳色微茫遠岸村。滿眼波濤終古事，年來惆悵與誰論。」¹⁴⁴詩人於潼關黃河旁的亭臺駐足，眼前所見山岡重疊如抱著華山蹲坐，蜿蜒曲折黃河口字型環繞古秦地，故稱「秦川」，大河對於秦地重要而展現態勢。¹⁴⁵坐落於秦地的唐都長安「帝宅」，乃「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¹⁴⁶是以劉敬說服劉邦定都關中，因山、河之險構成的四塞秦地，物資號稱天府正是天地合璧的產物。「山河相湊束龍門」是華山與黃河在潼關相聚，而潼關則發揮宿衛帝都東門的作用，此龍門是天子進出東大戶的潼關門，以上從潼關的山川形勢造就關中而言。

「櫓聲嘔軋中流渡，柳色微茫遠岸村」描繪行駛於黃河的船隻以及河北岸場景。《正字通·木部》：「槳，行舟具，長大曰櫓，短小曰槳。縱曰櫓，橫曰槳。」¹⁴⁷使船隻前進划水用之長且大的槳稱櫓，因為所過之河為湍急黃河，伴隨搖櫓吆喝聲即「嘔軋」，嘔依顏師古曰：「嘔讀曰謳。」¹⁴⁸嘔與「謳」意近，顯見當時渡河船隻眾多，河的北岸村落因河面寬闊已使柳樹景象模糊。詩中表象是「重岡」、「屈曲」、「山河」；意象是「櫓聲嘔軋」、「柳色微茫」，以划船聲與人

¹⁴⁰ 《晉書》，卷 55，〈潘岳傳〉，頁 1504。

¹⁴¹ 《昭明文選》，卷 10，潘安仁〈西征賦〉注。

¹⁴² 《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頁 34-35。

¹⁴³ 戰國·左丘明撰，鮑思陶點校，《國語》（濟南：齊魯書社，2005.5，1 版），卷 17，〈楚語·恭王有疾〉，頁 260：「赫赫楚國，而君臨之。」韋昭注：「赫赫，顯盛也。」

¹⁴⁴ 《全唐詩》，卷 548，薛逢〈潼關河亭〉，頁 6324。

¹⁴⁵ 自尊：不委屈求全。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1998.7，1 版），卷 17，〈詭使〉，頁 411：「重厚自尊謂之長者。」

¹⁴⁶ 《史記》，卷 99，〈劉敬傳〉，頁 2716。

¹⁴⁷ 明·張自烈編，清·廖文英補，《正字通》（北京：國際文化，1996.1，1 版），〈五辰集·木部〉。《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頁 1278：「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全唐詩》，卷 752，徐鉉〈過江〉，頁 8565：「登艫望城遠，搖櫓過江遲。」

¹⁴⁸ 《漢書》，卷 64，〈朱買臣傳〉，頁 2791 注。

聲象徵熱鬧京城，對比河北岸的柳樹模糊意味遠離帝都；實像是「古事」、「惆悵」，面對眼前大河波濤洶湧，人生際遇與古今往事，終究如黃河一去不復返，世事滄桑，年年累積於心的惆悵感又能與誰分享？潼關臨帝都所塑造的山川形勢，往往在詩人出入關時易有思愁與懷古之言情流露。

孟遲〈新安故關〉：「漢帝英雄重武材，崇山險處鑿門開。如今更有將軍否，移取潼關向北來。」¹⁴⁹詩題新安故關是指漢武帝時徙函谷關於新安縣，《史記·平準書》：「益廣關，置左右輔」，裴駰引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¹⁵⁰《漢書·武帝紀》：「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顏師古引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¹⁵¹漢代函谷關本在弘農縣，武帝元鼎三年（114B.C.）因宜陽人楊僕以當關外民為恥，¹⁵²以自身有大功，建議將函谷關東移於新安縣東，意味關城是界定關內、關外指標之一，關內人與關外人在待遇上是有差異的。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楊僕：「上疏請以家僮七百人徙關於新安，武帝從之，即今新安縣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¹⁵³楊僕自請家僮七百人徙關。李吉甫按語：「項羽坑秦降卒於新安，即此地。今縣城之東有南北塞垣，楊僕所築」，¹⁵⁴楊僕不但散家財，動用人力徙關，且修築徙關後的南北牆，「漢帝英雄重武材，崇山險處鑿門開」說的即是這段往事。接著詩人筆鋒一轉當朝潼關也往北移，其原因是否如漢朝樓船將軍楊僕的提議呢？據《通典·州郡》華州華陰縣記載：「大唐天授二年，移向北，近河為路。」¹⁵⁵武則天天授二年（691），潼關由南原上的隋關城北移至原下近河處的潼水東側。¹⁵⁶詩中表象是「崇山險處」，關城位置的選定以險峻為要；意象是「漢武帝」時楊僕東移關，以及武則天北移關的典故；實像是不同朝代，關城興衰變遷，增添懷古思愁。

陸希聲〈陽羨雜詠十九首·第三首·石兕臺〉：「大河波浪激潼關，青兕胡為伏此山。遙想楚王雲夢澤，蜺旌羽蓋定空還。」¹⁵⁷兕據《爾雅·釋獸》：「兕，似牛。」注：「一角，青色，重

¹⁴⁹ 《全唐詩》，卷 557，孟遲〈新安故關〉，頁 6460。

¹⁵⁰ 《史記》，卷 30，〈平準書〉，頁 1435。

¹⁵¹ 《漢書》，卷 6，〈武帝紀〉，頁 183。同書卷 1，〈高帝紀〉顏師古注引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頁 25。

¹⁵² 《史記》，卷 122，〈酷吏列傳〉，頁 3149。

¹⁵³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1983.6，1版），卷 2，〈關內道〉，頁 35。

¹⁵⁴ 《元和郡縣圖志》，卷 5，〈河南道〉，頁 143。蔡坤倫，〈漢代函谷關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6），頁 27-32。

¹⁵⁵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1988.12，1版），卷 173，〈州郡·華州·華陰縣〉，頁 4513。

¹⁵⁶ 「唐天授二年遷建的潼關城，在潼水（今潼洛川）之西，濱河扼路。」詳參穆渭生，〈唐代潼關述略——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頁 65。案：穆氏以為遷關後的潼關在潼水西邊，並非史實。因《元和郡縣圖志》，卷 2，〈關內道·華州·華陰縣·潼關〉，頁 35 記載：「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顯然潼水在關城西邊。

¹⁵⁷ 《全唐詩》，卷 689，陸希聲〈陽羨雜詠十九首·第三首·石兕臺〉，頁 7913。

千斤。」¹⁵⁸《說文解字·兕部》：「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¹⁵⁹《論語·季氏》：「虎兕出於柙。」程樹德集注：「兕，野牛也。」¹⁶⁰黃河南流沖激潼關折而東流，大河流經河南省，南側有秦嶺東延伏牛山，石兕（牛）臺因山而置。「楚王雲夢澤」是劉邦依陳平計，以「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¹⁶¹透過天子巡狩雲夢澤，將韓信從楚王降為淮陰侯的典故。

「蜺旌」據司馬長卿〈上林賦〉：「拖蜺旌，靡雲旗。」李善注引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¹⁶²五彩羽毛且點綴虹蜺的旗子，虹蜺是彩虹的內虹、外虹，顏色鮮豔是內虹；顏色暗淡是外虹。「羽蓋」依《周禮·春官·巾車》：「有翼，羽蓋。」鄭玄注：「有翼，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¹⁶³以鳥羽毛為飾作成遮日的車蓋。又《宋史·樂志》：「霓旌羽蓋，導儀護衛。」¹⁶⁴「蜺旌羽蓋」後代又作「霓旌羽蓋」，作為指揮軍隊，護衛將領的前導之物，「定空還」是隨著霓旌羽蓋的歸還，戰爭結束、回歸平靜。詩中表象是「大河波浪」、「青兕伏山」；意象是「楚王雲夢澤」，韓信貶為淮陰侯典故；實像是「定空還」，詩人於伏牛山的石兕臺眺望黃河、潼關，遙想劉邦至雲夢澤襲擊韓信往事，懷古之情溢於言表。

徐夔〈憶潼關〉：「洞壑雙扉入到初，似從深窅覩高墟。天開白日臨軍國，山夾黃河護帝居。隋煬遠遊宜不反，奉春長策竟何如。須知皇漢能烏鵲，延得年過四百餘。」¹⁶⁵詩中表象是「洞壑雙扉」、「深窅覩高墟」、「臨軍國」、「山夾黃河」。「洞壑」依《孟子·滕文公》：「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注：「壑，路傍坑壑也。」¹⁶⁶坑洞之意。「雙扉」是門扇，¹⁶⁷「窅」、「覩」分別是阱、睹的異體字，墟是土堆。¹⁶⁸「洞壑雙扉」是指潼關關門，「入到初」從西入到東出，如同「深窅覩高墟」，從深阱看高土堆，比喻關門制限東西往來，關門內外別有洞天。又如天亮太陽降臨潼關，¹⁶⁹黃河從華山、中條山間流過，共同宿衛帝都長安，以上從關門內、外形勢談起。

意象是「隋煬遠遊」、「奉春長策」，前者是《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二年（616）秋七月甲

¹⁵⁸ 《爾雅注疏》，卷 10，〈釋獸〉，頁 366。

¹⁵⁹ 《說文解字注》，九篇下，〈兕部〉，頁 458。

¹⁶⁰ 程樹德集釋，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1990.8，1 版），卷 33，〈季氏〉，頁 1135-1136。

¹⁶¹ 《史記》，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2627。

¹⁶² 《昭明文選》，卷 8，司馬長卿〈上林賦〉，頁 286。

¹⁶³ 《周禮注疏》，卷 27，〈春官·巾車〉，頁 846。

¹⁶⁴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1977.11，1 版），卷 139，〈樂志〉，頁 3279。

¹⁶⁵ 《全唐詩》，卷 709，徐夔〈憶潼關〉，頁 8155。

¹⁶⁶ 《孟子注疏》，卷 5，〈滕文公〉，頁 186。

¹⁶⁷ 《全唐詩》，卷 126，王維〈山居即事〉，頁 1277：「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

¹⁶⁸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1986.12，1 版），卷 1，〈賦·雜著·圻者王承福傳〉，頁 54：「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

¹⁶⁹ 《後漢書》，卷 70，〈荀彧傳〉，頁 2284：「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案：軍國指戰事決策，此處借指潼關的軍事地位。

子記載：「幸江都宮。」¹⁷⁰「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於溫室，時年五十。」¹⁷¹「二年」是隋恭帝義寧二年（618），即大業十四年，煬帝出潼關幸江都未歸而死於江南，故稱「遠遊」。後者是漢高祖時婁敬上書，主張入關定都長安，¹⁷²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劉邦時感念婁敬首謀都關中，用其「長策」，¹⁷³以四季春為首，賜皇帝姓，號奉春君。

實像是「須知皇漢能局鏑，延得年過四百餘」，局鏑據《莊子·胠篋》：「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¹⁷⁴指的是門窗前的上鎖處，此處比喻潼關，漢朝因能固守函谷關，得以綿延國祚超過四百年，重申潼關對於當朝帝都之重要，以古喻今，懷古隋煬帝遠遊出潼關，放棄潼關而無固守京城，最終客死異鄉；漢高祖聽從婁敬良計，憑函谷關天險而守，得以開啟漢朝國祚四百餘年，寄託當朝國君也能以前車之鑑，期許唐祚不斷，表露濃濃國愁。

二、言景表志

張祜〈晚秋潼關西門作〉：「日落寒郊煙物清，古槐陰黑少人行。關門西去華山色，秦地東來河水聲。」¹⁷⁵背景是詩人被令狐楚表薦入長安求仕第三次經過潼關時。¹⁷⁶詩中表象是「日落」、「寒郊」、「煙物清」、「關門」、「華山」、「秦地」、「河水」，夜深、郊寒、人煙少、景色清使詩人西入潼關可清晰見華山，爾後進入古秦地今長安，伴隨東流渭水與南流黃河。意象是「古槐」、「陰黑」觸動旅行者內心世界的感傷。實像是詩人對於入京求名的不確定感，此詩文中未言明部分。

李遠〈贈潼關不下山僧〉：「與君同在苦空間，君得空門我愛閒。禁足已教修雁塔，終身不擬下雞山。窗中遙指三千界，枕上斜看百二關。香茗一甌從此別，轉蓬流水幾時還。」¹⁷⁷詩中表象是「百二關」；意象是「苦空間」、「禁足」、「雁塔」、「雞山」、「三千界」；實像是「香茗」、「轉蓬」、「流水」。詩是詩人贈與潼關寺僧人，苦空間是佛教認為世間一切皆苦皆空，李遠與山僧同處人間，但僧人愛佛門修持，是以裹足寺院不下山。「雁塔」與「雞山」均借指潼關附近的寺院與山。詩人偏好世間半日閒，「閒」與「空門」相對，閒不僅是表象意，也代表人間意象事，而潼關身為長安東關，更是窺知天下事的第一關。

「窗中遙指三千界，……轉蓬流水幾時還」是詩人與僧人的閒談，僧人透過窗中指向三千

¹⁷⁰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1973.8，1版），卷4，〈煬帝紀〉，頁90。

¹⁷¹ 《隋書》，卷4，〈煬帝紀〉，頁93。

¹⁷² 《史記》，卷99，〈劉敬傳〉，頁2716。

¹⁷³ 《昭明文選》，卷52，曹元首〈六代論〉（夏、殷、周、秦、漢、魏），頁685：「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案：長策即良策。

¹⁷⁴ 《莊子集釋》，卷10，〈外篇·胠篋〉，頁342。

¹⁷⁵ 《全唐詩》，卷511，張祜〈晚秋潼關西門作〉，頁5840。

¹⁷⁶ 李久昌編著，《崑函：唐詩之路》，頁28。

¹⁷⁷ 《全唐詩》，卷519，李遠〈贈潼關不下山僧〉，頁5933。

大千世界，¹⁷⁸三千大千是俗世，百二關依《史記·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¹⁷⁹當時的河山之險是函谷關，得以發揮百二雄關作用，此處借指潼關，遁入佛門的山僧指著窗外俗世與斜躺枕頭看潼關，意味對凡塵的消極，與詩人品茗後就此別過，¹⁸⁰曾幾何時能在相聚已不知，恰如「轉蓬」和「流水」，蓬草隨風而紛飛，水流而過不復返。¹⁸¹表達詩人志向與僧人大不同。

許渾〈潼關蘭若〉：「來往幾經過，前軒（山）枕大河。遠帆春水闊，高寺夕陽多。蝶影下紅藥，鳥聲喧綠蘿。故山歸未得，徒詠採芝（薇）歌。」¹⁸²蘭若是梵語阿蘭若簡稱，意指寺院寂靜之地，¹⁸³詩人在潼關附近寺廟，享受平靜，但仍不免聽到熙熙攘攘出關、入關的人群與馬聲。「軒」是貴族所乘有屏蔽的車子，¹⁸⁴「枕」依顏師古注：「臨也。」¹⁸⁵達官貴人乘馬拉車依黃河而行，陸上交通工具之外，黃河上遠處而來的船隻，不論是出入潼關的馬車、船隻均是俗世象徵，與夕陽映照、遠離紅塵的寺廟形成對比。

成群蝴蝶翩翩起舞，形成的「蝶影」穿梭在「紅藥」叢中，綠蘿中可聽見鳥鳴喧囂聲。¹⁸⁶藉由蝴蝶翩翩、鳥鳴聲比喻京城熱鬧場景，觸發詩人內心世界，既回不去故鄉但又想過退隱生活的糾結，是以只能「詠採芝歌」。¹⁸⁷詩中表象是「大河」、「春水」；意象是「軒」、「帆」、「寺」、「夕陽」、「蝶影」、「鳥聲」，實像是「來往」、「故山」、「採芝歌」，出入潼關是求名的表徵，表達詩人在入世與出世間的情感拉扯。

許渾〈秋霽潼關驛亭〉：「霽色明高嶽，關河獨望遙。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條。鳥散綠蘿靜，蟬鳴（稀）紅樹凋。何言此時節，去去任蓬飄。」¹⁸⁸詩為宣宗大中三年（849）秋，許渾托病堅辭監察御史，解職東歸經潼關時所作。¹⁸⁹「霽」據《尚書·洪範》：「乃命卜筮，曰雨、

¹⁷⁸ 案：佛家以須彌山為中心，以鐵周山為外廓，謂之為一小世界；一千個小世界合起來就是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合起來就是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合起來就是大千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和大千世界總稱為三千大千世界。

¹⁷⁹ 《史記》，卷8〈高祖本紀〉，頁382-383及《集解》與《索隱》注引。

¹⁸⁰ 甌：盆、盂等瓦器。《淮南子集釋》，卷17，〈說林〉，頁1172：「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¹⁸¹ 《毛詩正義》，卷1，〈國風·召南·騶虞〉，頁126：「彼茁者蓬，壹發五豝。」《全唐詩》，卷218，杜甫〈遣興五首〉，頁2289-2290：「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

¹⁸² 《全唐詩》，卷530，許渾〈潼關蘭若〉，頁6057。《許渾詩校注》，〈潼關蘭若〉，頁305。

¹⁸³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1979.10.1版），卷20，〈謁真諦寺禪師〉，頁1802：「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

¹⁸⁴ 戰國·左丘明傳，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1999.12，1版），卷11，〈閔公二年〉，頁310：「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昭明文選》，卷16，江文通〈別賦〉，頁571：「龍馬銀鞍，朱軒繡軸。」

¹⁸⁵ 《漢書》，卷64，〈嚴助傳〉，頁2789。《新唐書》，卷37，〈地理志·關內道·京畿採訪使·上都〉，頁961：「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

¹⁸⁶ 《全唐詩》，卷161，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四四，頁1677：「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

¹⁸⁷ 琴曲有〈採芝操〉。《古今樂錄》：「商山四皓隱居，高祖聘之，四皓不出，仰天嘆而作歌。」崔鴻：「四皓為秦博士，遭世暗昧，坑黜儒術，退而作此。」詳見江聰平校注，《許渾詩校注》，〈潼關蘭若〉，頁305。

¹⁸⁸ 《全唐詩》，卷531，許渾〈秋霽潼關驛亭〉，頁6070。《許渾詩校注》，〈秋霽潼關驛亭〉，頁343。

¹⁸⁹ 李久昌編著，《嶠函：唐詩之路》，頁36。

曰霽。」孔安國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¹⁹⁰霽是雨止天晴之意，詩題中可知在秋季景色澄明的潼關驛中亭子所見場景。「巘」依毛亨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¹⁹¹張衡〈西京賦〉：「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駝。」薛綜注：「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¹⁹²仇兆鰲注：「巘，山頂也。」¹⁹³唐以前巘指的是上大下小的小山；唐代指的是海拔較高的山。

詩中表象是「高巘」、「關河」、「太華」、「中條」，因天晴由潼關驛亭可向南眺望秦嶺，近見南流黃河折而東流漸遠，南側為華山餘脈太華山，北側中條山；意象是「鳥散綠蘿靜」、「蟬鳴（稀）紅樹凋」，秋天正值夏、冬季節轉換期，綠蘿叢中因飛鳥散去而顯得寂靜，紅葉凋落蟬鳴稀少，勾起詩人東歸故鄉內心之感傷，離開潼關象徵遠離長安世俗功名；是以實像「任蓬飄」，表達對未來茫然，如蓬草隨處飄。¹⁹⁴

伍、結語

本文擷取唐詩中詩題或詩文載明的潼關形勢詩 20 首作為文本分析，潼關形勢詩分成「過關」與「駐關」兩類各 10 首，進一步區分過關詩有 6 首「奉和皇帝」與 4 首「個別」詩人作品，逐首分析詩中的表象、意象與實像。首先是奉和聖製過關詩有唐太宗與許敬宗，以及唐玄宗與張九齡、蘇頌、張說兩組。〈入潼關〉詩是李世民西入潼關作，進入潼關即到天子所居京城，此地是皇權中心，官吏聚集、仕途升降頻繁地。〈奉和入潼關〉詩是許敬宗讚嘆皇帝心胸寬廣且富抱負，意氣風發，領軍經潼關入京城展現自豪與喜悅。〈潼關口號〉詩是玄宗東幸洛陽經潼關作，潼關雖然號稱險峻且對兩京重要，但天子行仁政才是國家長治之本，所謂「恃德非設險」。〈奉和聖製度潼關口號〉乃張九齡附和帝王之作，以「在德不在險」的天子施德政才是真正仁道。蘇頌〈奉和聖製過潼津關〉詩提出君王「觀風之德」，即善體民情甚於設關。張說〈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認為皇帝將「天德」廣披，則不需置關。

其次是個別過關詩有張祜、許渾、溫庭筠。張祜〈入（潼）關〉詩寫於文宗朝被令狐楚表薦入長安求仕，提出天命與君德勝於雄關。許渾〈行次潼關題驛後軒〉詩作於憲宗朝初次赴長安趕考，入關謀官職抱負。〈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是許渾就任官前赴京經潼關所作，但詩人在出仕與歸隱之間仍舉棋不定。溫庭筠〈過潼關〉書寫詩人東過潼關後放下塵世，出關象徵離開權力核心。

最後是駐關詩有「懷古思愁」與「言景表志」兩類。前者崔顥〈題潼關樓〉以為長安東關的潼關，能得知第一手京城訊息，同時流露從關隘望向京城的國愁。岑參〈東歸晚次潼關懷古〉寫於玄宗朝赴長安落第東歸的憂愁。薛逢〈潼關河亭〉從潼關臨帝都的山川形勢，易使人在出

¹⁹⁰ 《尚書正義》，卷 11，〈洪範〉，頁 467。

¹⁹¹ 《毛詩正義》，卷 17，〈大雅·公劉〉，頁 1308：「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¹⁹² 《昭明文選》，卷 2，張平子〈西京賦〉，頁 62。

¹⁹³ 《杜詩詳註》，卷 16，〈八哀詩·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頁 1403-1404。

¹⁹⁴ 蓬草離根四處飄，詳見《昭明文選》，卷 29，曹子建〈雜詩六首〉之二，頁 1018：「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注：《說苑》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唐代「蓬飄」又作「飄蓬」，見《杜詩詳註》，卷 1，〈贈李白〉，頁 42：「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全唐詩》，卷 224，杜甫〈贈李白〉，頁 2392。

入關時流露古今之愁。孟遲〈新安故關〉以不同朝代關城的興衰而添懷古思愁。〈石兕臺〉是陸希聲於伏牛山石兕臺眺望黃河、潼關，回想劉邦至雲夢澤襲擊韓信，思古之情溢於言表。徐夤〈憶潼關〉強調潼關對於當朝帝都重要性，期許唐祚綿延，展露對國事之愁。

後者張祜〈晚秋潼關西門作〉與〈入（潼）關〉一體同源，皆作於文宗時被表薦入關求仕，藉行旅途中的景色，抒發對入京求名的不確定感。李遠〈贈潼關不下山僧〉透過長安東側的潼關，能得知天下俗事的第一線，詩人愛好人間事，與僧人喜歡空門不同，表達詩人與僧人志向不同。許渾〈潼關蘭若〉以潼關寺廟的平靜與馬車、船隻的喧囂做對比，表達出入潼關雖象徵求名，但詩人仍在入世與出世拉扯。許渾〈秋霽潼關驛亭〉詩寫於宣宗朝離職東歸經潼關，象徵遠離長安世俗功名而對未來茫然。

綜上所述，從潼關形勢詩看長安的眾像，有君王之德勝於關城設置、入關求功名、出關象徵離皇權、退隱之意，以及登關城而興思古愁，進而對國家事的關心與展望等層面。潼關作為長安東關，出入關城具有受皇帝重視與否之重大意義，尤其唐詩中在關城處的「聚離」面向，更可呼應形勢詩，此將是未來著墨的方向之一。

徵引文獻暨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 典籍

戰國·左丘明傳，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1999.12，1版。

戰國·左丘明撰，鮑思陶點校，《國語》，濟南：齊魯書社，2005.5，1版。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2007.12，1版。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2000.12，1版。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李學勤主編，《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1999.12，1版。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1999.12，1版。

漢·劉安撰，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1998.10，1版。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1988.2，2版。

程樹德集釋，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1990.8，1版。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2000.12，1版。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1988.9，1版。

清·王先謙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1998.7，1版。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1961.7，1版。

佚名著，方輅譯注，《山海經》，北京：中華，2009.3，1版。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2000.12，1版。

尉繚，《中國古代八大兵書——尉繚子兵書》，北京：北京燕山，2008.6，2版。

王琯撰，《公孫龍子懸解》，北京：中華，1992.9，1版。

朱謙之撰，《老子校釋》，北京：中華，1984.11，1版。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2008.12，1版。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1982.11，2版。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1962.6，1版。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1965.5，1版。

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1982.7，2版。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考異，《昭明文選》，臺北：五南，2023.10，2版。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2000.8，1版。

晉·葛洪撰，楊明照注，《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1991.12，1版。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2007.7，1版。

北魏·楊銜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2006.2，1版。

北齊·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1974.6，1版。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1974.11，1版。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1973.8，1版。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2008.1，2版。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1992.1，1版。

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點，《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上海：上海古籍，2012.8，1版。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1975.2，1版。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1983.6，1版。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1988.12，1版。

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2004.2，2版。

北宋·周敦頤，《周子通書》四部備要（線裝），上海：中華，1920-1934。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1956.6，1版。

陳直校證，《三輔黃圖校證》，西安：新華書店，1980.5，1版。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1977.11，1版。

明·張自烈編，清·廖文英補，《正字通》，北京：國際文化，1996.1，1版。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1983.11，1版。

（二）詩集

東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1979.5，1版。

唐·岑參著，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2004.9，1版。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1977.9，1版。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1979.10.1版。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2008.11，1版。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1986.12，1版。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2001.3，1版。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1960.4，1版。

江聰平校注，《許渾詩校注》，臺北：中華，2018.7，再版。

二、專書

石雲濤，《唐詩鏡像中的絲綢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20.6，1版。

石雲濤，《絲綢之路與漢唐文學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24.4，1版。

石繼航，《千里向長安——《全唐詩》中的大唐鏡影》，杭州：浙江教育，2024.7，1版。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三民，2022.12，3版。

吳強，《唐代大庾嶺詩路研究》，北京：中華，2024.6，1版。

吳淑玲，《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係》，北京：人民，2015.2，1版。

吳淑玲，《追隨唐人走天涯：驛路唐詩邊域書寫研究》，北京：中華，2024.10，1版。

吳淑玲，《驛路傳詩與唐詩之發展》，北京：中華，2023.11，1版。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2005.7，1版。

李久昌編著，《崤函：唐詩之路》，西安：三秦，2023.5，1版。

李招紅編著，《浙東唐詩之路學術文化編年史》（北京：中華，2022.3，1版）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北京：中華，2023.8，1版。

李德輝，《唐宋館驛與文學》，上海：中西，2019.12，1版。

李德輝編著，《唐宋館驛與文學資料彙編》（上）（下），南京：鳳凰，2014.10，1版。

辛曉娟，《人生得意在長安》，新北：畢方文化，2025.3，初版。

周一士，《中國公路史》，臺北：公路，1957.8，初版。

周瀚，《唐代帝王詩歌與詩壇》，香港：初文，2021.12，初版。

尚永亮，《貶謫文化與貶謫詩路——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作為中心》，北京：中華，2023.7，1版。

胡可先，《唐詩之路與文學空間研究》，北京：中華，2023.3，1版。

孫琴安編著，《唐詩經典解讀》，上海：上海百家，2009.10，1版。

海濱，《西域文化與唐詩之路》，北京：中華，2022.10，1版。

馬茂元選注，《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2021.6，1版。

章雪峰，《唐詩現場》，臺中：好讀，2018.9，初版。

莫道才編，《粵西唐詩之路的探源與詩人尋蹤》，北京：中華，2023.4，1版。

陳耀南，《原韻譯唐詩新賞》，香港：中華，2021.7，初版。

遼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2019.8，3版。

黃賢忠編，《巴渝唐詩之路的文化緣起與地域流布》，北京：中華，2024.7，1版。

楊乾坤注釋，《唐詩陝西·天府關中》，西安：陝西人民，2022.4，1版。

楊乾坤選注，《唐詩秦嶺》，西安：陝西人民，2016.4，1版。

楊瓊、胡秋妍主編，《浙東唐詩之路的會變與嬗變》，北京：中華，2024.4，1版。

靖宇主編，《唐詩多功能辭典》，瀋陽：遼海，2011.4，1版。

寧欣，《從唐詩走進歷史》，北京：新星，2023.4，1版。

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鄭州：中州古籍，2019.5，1版。

劉學鍇，《劉學鍇講唐詩——唐詩經典新解》，臺北：復刻文化，2025.2，1版。秦似主編，《唐詩新選》，武漢：湖北教育，2001.6，1版。

歐麗娟選注，《唐詩選注》，北京：北京大學，2021.3，1版。

蔡坤倫，《唐代關防——以關中四面關為中心》，臺北：秀威，2020.5。

盧盛江編撰，《浙東唐詩之路唐詩全編》，北京：中華，2022.6，1版。

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2001.7，1版。

戴偉華，《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北京：中華，2023.11，1版。

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詩之路》，北京：中華，2022.8，1版。

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專刊，1967.12。

嚴耕望，《治史答問》，臺北：臺灣商務，1985.6，初版。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1988.11，5版。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北：臺灣商務，1992.3，初版。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1999.1，1版。

蘇慧霜，《唐詩鏡淥》，臺北：新學林，2023.8，初版。

參、學位論文

蔡坤倫，〈漢代函谷關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6。

蔡坤倫，〈唐代關防研究——以關中四面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7.6。

四、專書論文

史念海，〈潼關古城的遷徙〉，收錄氏著，《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聯書店，1981.5，1版），頁176-180。

李健超，〈函谷關與潼關〉，收錄氏著，《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西安：三秦，2007.7，1版），頁595-605。

張榮芳，〈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收錄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新文豐，1992.11，初版），頁737-766。

五、期刊論文

艾冲，〈古代潼關城址的變遷〉，《歷史地理》，2002年第18輯，頁122-129。

艾冲，〈潼關創建年代考辨〉，《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頁10-13，轉17頁。

李娜，〈唐詩中的潼關生態書寫〉，《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頁12-19。

張晶、梁建邦，〈歷代潼關軍事設防〉，《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15期，頁69-75。

梁建邦，〈漫話潼關〉，《渭南師專學報》（綜合版），1989年第1期，頁103-106。

梁建邦，〈潼關古城的建制〉，《滄桑》，2005年第2期，頁17，轉24頁。

許正文，〈潼關沿革考〉，《人文雜誌》，1989年第5期，頁93-97。

陳隆文，〈崤函古道「四關」〉，《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頁39-42。

賀潤坤，〈安史之亂中潼關為何失守〉，《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4期，頁47-

劉萬青，〈口號詩探析——以《全唐詩》為考察對象〉，《健行學報》，33：2（桃園，2013.4），頁87-103。

劉樹友，〈「哥舒白谷兩英雄，痛哭催軍萬年淚」——唐軍與安史叛軍的潼關、靈寶之戰探析〉，《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頁27-34。

穆渭生，〈唐代潼關述略——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陝西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63-66。

關治中，〈潼關天險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三〉，《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35-39。

關治中，〈論曹操平定關隴的奠基戰役——潼關之戰〉，《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頁27-31。

嚴耕望，〈我撰「唐代交通圖考」的動機與經驗〉，《興大歷史學報》，第3期（臺中，1993.4），頁1-9。

「蓋」河：基隆旭川河的歷史變遷

陳凱雯**

摘要

本文以官方檔案與報章雜誌等資料為主，探討日治時期基隆旭川運河的興建，以及戰後旭川河與都市發展問題，對於政府與地方在加蓋的爭議與決議過程，進行歷史考查。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執行基隆築港政策與市區改正時，於明治40至41年（1908-1909）將流入市區內的石硬港溪與蚵殼港溪整建興蓋為旭川運河。其所在位置為傳統漢人開發基隆主要市街地，對於基隆港市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重要的地位。戰後因疏濬與違建等問題，運河功能逐漸降低，政府欲與河爭地，在旭川河上加蓋大樓，造成地方對於旭川河加蓋與否有極大爭議，更讓旭川河被視為「基隆的盲腸」。至民國67年（1978），政府最終在旭川河上加蓋三棟大樓，河川一直被掩蓋至今，然而旭川河與都市發展的問題仍然持續。

關鍵字：旭川運河、基隆築港、市區改正、旭川河加蓋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Xuchuan River in Keelung

Chen Kai-we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primarily based on official records and newspaper articles,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uchuan Canal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its impact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Keelung. It also examines the controversy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garding the covering of the Xuchuan River.

The Xuchuan River was construct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s part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Keelung harbor and implement urban restructuring. The Xuchuan River is located in the main commercial district of Keelung, developed by Chines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eelung Por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fter World War II, the function of the canal gradually diminished due to issues such as dredging and illegal construction, and there was controversy over covering the Xuchuan River. In 1978, the government built three structures on the canal, which remains covered today. However, the problems between the Xuchuan River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ill continue.

Keywords: Xuchuan Canal, Port Construction of Keelung, urban plan, Xuchuan River Cover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旭川河為日治時期進行基隆築港與市區改正時所修築的運河，又稱為旭河、朝日河、朝日川等。旭川河位於今基隆市仁愛區，其因日治時期因築港與市區改正，將原本流經港灣南岸的蚵殼港溪與石硬港溪合流所形成的新運河。這條運河長 392.6 公尺，約略為旭川河口向後延伸至當時縱貫鐵道鐵橋位置，¹今基隆市孝一路牛仔街後方的位置(約大德橋一帶)為止。

因這條河目前被三棟大樓所掩蓋，許多年輕市民只能偶爾聽到長輩口中的「崁蓋(khàm kuà)」所在，並不知在基隆市中心腳下流動的這條河流，對於基隆都市發展有著重要的功能與歷史意義。此處是基隆港灣漢人最早開發形成的市街地，亦是商業精華區域，旭川河的出現，也是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對於基隆港灣改造的重要見證。戰後，因旭川河的疏浚與衛生問題，成為長久以來市政之爭議，最終以加蓋大樓方式被隱藏至今。

有關旭川河為主的學術研究並不多，主要集中在近年旭川河上商業大樓拆遷的議題，以河川與都市環境互動關係的相關研究為主。郭漢隆碩士論文〈尋找失憶的港灣城市—基隆河岸空間的研究以旭川和田寮河為例〉，回顧兩條河川的歷史發展，並以研究當時政府與居民對河川在各方面的需要與認同，以環境價值觀念提出政策建議。²賴秋文〈基隆市旭川河復原對地價影響之研究〉，則集中在旭川河加蓋前後，對於土地價值的影響。論文中亦簡要提到旭川河的發展歷史，以及加蓋後對環境的影響。³

跟旭川河的發展習習相關崁仔頂魚市，則有較多的研究累積。張怡玲的〈基隆批發機能魚市場的形成及其空間結構〉，比較基隆魚市場與崁仔頂魚市場的發展、交易模式，對於崁仔頂市場的源流與分析調查頗為詳實，也成為日後撰寫崁仔頂魚市相關論述的重要參考著作。⁴詹恆源的〈夜與魅—基隆市區地景論述：以崁仔頂魚市和林開郡洋樓為例〉，則是以旭川河上兩處顯著的地景作為論述中心，觀察人群對於都市空間的歷史記憶。⁵郭雅芬〈基隆崁仔頂魚市場對其社區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則以問卷調查方式分析崁仔頂魚市對於社區環境問題。曾子良主編《追求安定、邁向繁榮：基隆市兩河流域的人文、歷史與故事》是以西定河與南榮河為主體，描述周遭的人文與歷史故事，其中亦有談到旭川河的歷史、崁仔頂魚市場與政府間的衝突問題等。⁶

綜上所述，有關旭川河的相關研究，雖多有談到旭川河的形成歷史，但多以概略性質介紹其形成，或是在介紹崁仔頂魚市發展時的背景論述，著重在研究當下的觀察與描述分析，有關歷史內容的陳述則多傳抄且並不詳盡，無法了解旭川河對於近代基隆都市形成的重要性。

¹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頁 63。

² 郭漢隆，〈尋找失憶的港灣城市—基隆河岸空間的研究以旭川和田寮河為例〉（桃園：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5）。

³ 賴秋文，〈基隆市旭川河復原對地價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2013）。

⁴ 張怡玲，〈基隆批發機能魚市場的形成及其空間結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7）。

⁵ 詹恆源，〈夜與魅—基隆市區地景論述：以崁仔頂魚市和林開郡洋樓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5）。

⁶ 曾子良主編，《追求安定、邁向繁榮：基隆市兩河流域的人文、歷史與故事》（基隆：基隆社區大學，2021）。

本文主要以文獻資料蒐集與分析為主，並配合田野調查的考察，將旭川河與旭橋的歷史脈絡作一整理，主要運用資料包含日治時期因基隆築港興建的旭川運河時期工程資料，例如《基隆築港誌》、《基隆築港沿革》等，並利用官方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以及當時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等，搜尋相關報導，將旭川河與旭橋的由來。戰後則運用《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檔案以及臺灣省議會、基隆市議會議事錄相關議案的討論，並利用《聯合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等相關報導，了解戰後旭川河與旭橋的整建、疏濬問題，以及加蓋前後的爭議。

另外，因旭川河不同時期有多種稱呼，本文主要以現今常用的「旭川河」為主要敘述，談及日治時期作為運河規劃使用之時，再使用「旭川運河」一詞。

貳、日治時期旭川河的興蓋

基隆位於臺灣北方，港灣面向東北方，三面環山，山多平地少。港灣內有四大河流流入，分別為田寮港溪、石硬港溪、蚵殼港溪與牛稠港溪。位於港灣南岸的石硬港溪與蚵殼港溪，因河流蜿蜒入港，形成大片泥灘。

因山多地瘠，早期基隆住民多從事捕魚或商販維生。清乾隆年間，居民沿著港灣海濱，沿著石硬港溪，挑石於海坡填砌，築蓋茅屋營生，或是搭寮捕魚。隨著聚落發展，沿著石硬港溪也陸續形成暗街仔、媽祖宮口街、福德街、新興街等街肆，並在此建立起民間信仰，建立慶安宮媽祖廟，成為漢人在基隆的重要信仰寄託。可說流入基隆港灣南岸的石硬港溪，接近今旭川河的大概位置，是清代漢人在基隆發展的中心。清代基隆的漢人市街也在港灣南岸開始形成，發展成所謂的「大基隆」，跨越田寮河對岸的基隆港東岸，稱為「小基隆」。

19世紀初基隆港灣南岸已成市街，開港後，聚落與市街發展更為迅速。若對照清法戰爭時法人所繪製的地圖（圖1），在港灣南岸市街中有大片的泥灘地，中間有一條水路可直接通到市街中心，其主要上游來自石硬港溪。另外，靠近港灣西側亦有一條水路，為蚵殼港溪下游，此處較無密集聚落。而港灣東側較為筆直的水路延伸至內陸，即為田寮港溪。19世紀的基隆港灣南岸市街地，即是在三條主要河川與支流蜿蜒繚繞下形成。



圖 1 光緒 11 年（1885）清法戰爭時期法軍測繪基隆港灣圖

資料來源：Eugène Germain Garnot,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資料庫，網址：<http://cdm.reed.edu/cdm4/formosa/>。

一、初代旭川河

旭川河的名稱由來與命名，目前尚不可考，但從日治初期的檔案與新聞報導中可知道，在日治初期已經有旭川與旭橋的稱呼。而且殖民政府稱呼的旭川河，一開始並非是南岸聚落中央媽祖宮口、崁仔頂旁的河流，而是指蚵殼港溪下游流入基隆港灣的河川段。

在明治 31 年（1898）3 月的《臺灣日日新報》即有報導，當時殖民政府要新築基隆的水陸

兩警察署、郵便電信局以及「改造朝日橋」等大小工程。⁷這是目前找到最早對旭橋的文字紀錄。同年6月，渡邊侍從武官來臺視察，報導中提及武官一行人抵達基隆後，大小官員士紳共五十餘名在車站迎接，即由軍官騎馬先導，「橫渡旭橋」後，右轉至位於蚵殼港的陸軍守備隊慰問軍隊。⁸朝日橋與旭橋，日文念法都相同，應指同座橋。而此座旭橋，根據明治34年(1901)臺北縣曾要對旭橋擴建，而對鄰近土地所有者進行獻納徵收，留有一份草圖繪製，即標註旭橋是橫跨蚵殼港溪兩側，連接罾仔寮街與新店街的橋樑。⁹旭橋底下流過的溪流，是否就是為旭川河，在翌年的基隆築港的報導中，也出現了「自停車場附近至于旭川，其排除壅塞之工事，日前全然開闢」，可證明當時將蚵殼港川出海口河段被稱為旭川。¹⁰



圖 2 明治 34 年 (1901) 檔案記載初代旭橋與蚵殼港川

資料來源：〈劉四季外二名基隆旭橋取擴ノ為道路敷地トシテ土地寄付認可〉(1901-09-12)，《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625025。

初代旭川河上游即蚵殼港川，沿岸都是泥地，甚至有紅樹林的地景。¹¹而蜿蜒的河道，常因大水造成災情。明治33年(1900)12月即有新聞報導，基隆的旭橋、義重橋等，正進行水害復舊工程，可能是同年9月13至16日之間襲擊北臺灣的颱風所造成。¹²此次風災造成臺北、基隆等地災情慘重，新聞形容基隆市街「到處氾濫，幾成澤國」。¹³傳統基隆市街在蜿蜒的水路形成，一遇暴雨經常漫淹家屋，對於市街的衛生造成危害，也限制了港口的發展。在日治時期

⁷ 〈諸工事請負の困難〉，《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3月1日，第3版。

⁸ 〈基隆に於ける渡邊侍從武官〉，《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9月6日，第2版。

⁹ 〈劉四季外二名基隆旭橋取擴ノ為道路敷地トシテ土地寄付認可〉(1901-09-12)，《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625025。

¹⁰ 〈築港一斑〉，《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22日，第3版。有關此工程將於後述。

¹¹ 〈面白き胎生植物〉，《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2月21日，第4版。

¹² 〈着手中の復舊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2月20日，第2版。

¹³ 〈基隆被害〉，《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9月18日，第3版。

基隆築港進行與市區改正的改造，成為殖民統治政府所規劃的近代都市，也改變市區的空間紋理，旭川運河也在此時出現。

基隆雖然是北臺良港，開港後漸成商埠，但清朝統治對其建設多注重其國防地位，劉銘傳在臺期間，雖曾有意推動基隆港築造，用以溝通縱貫鐵道的北方貿易港，但最後失敗。至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後，基隆不僅是當時執政者認為的臺灣唯一良港，更因其與日本位置接近，有著重要商業與軍事地位，急欲進行築港。不過在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未穩，當時基隆雖有開進行築港調查，但並未馬上施行。直至兒玉源太郎總督上任後，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積極推動臺灣基礎建設，提出臺灣事業公債進行臺灣縱貫鐵路、基隆築港、土地調查等重要政策施行，基隆築港才正式開始施行。

基隆築港自明治 33 年（1900）設立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開始，終至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斷續的進行各項工程計畫。基隆築港雖時長，分期甚多，此乃因當時經費有限，築港僅能分階段施行之外，也跟當時日益增長的輪船噸位、基隆港貿易成長的快速增加等原因有關。研究者多將基隆築港分為 5 期：

表 1 日治時期基隆築港工程分期表

工程分期	工程目的	工程起迄因素
第一期工程 (1900-1903)	連結日臺交通，濬渫港灣	事業公債通過，後藤新平主導基隆築港
維持期 (1903-1906)	維持第一期成果與築港局運作	國內議會阻止築港預算 日俄戰爭
第二期工程(1906-1912)	為推動殖民產業，建設港口海陸連結設備以及及填埋、運河工程	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殖產興業風潮盛起，加強殖民地經營。
第二期追加工程 (1912-1928)	因應貿易成長需要，擴充碼頭倉庫等設備	受國內行政整理與財政影響，築港工程數度延期，1916-1918 呈現停滯
		一次大戰後貿易量大增，1919 年恢復築港工程
		受關東大地震等影響，築港工程數度延期，原訂1929年完工，提前結束
第三期工程 (1929-1934)	因應貿易成長需要，擴充船席與倉庫量，並設立專用漁港於社寮島	原訂1935年完工，因進行第四期工程提前結束
第四期工程 (1935-1943)	應貿易成長需要，修築外港與防波堤	因內港已達飽和，並預期將來軍事需要，擴建外港，但亦因戰事未完成
		因軍事統制的方便性，加上築港工程停擺，納入港口行政體

		系
--	--	---

資料來源：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頁 145。

第一期築港工程因受限於經費，只以疏濬內港、整理基隆火車站前碼頭為主。而與基隆火車站接近的蚵殼港溪下游出海口，則是築港局首要整理對象。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即有對於旭川河附近工程的敘述：

基隆築港局於去十五日就該地**旭橋通港內之河道**起手辦浚渫工事，而別設通路，以便船舶來往。但是該通航路水流甚淺，退潮之際，其船舶之積物，有逾十擔，即千斤以上者，往來必不能自由。現在基隆廳經以斯旨頒行告示，俾以船舶營業於該港者共聞之，而其浚渫之期則豫定十五日間焉。¹⁴

基隆自停車場附近至于旭川，其排除壅塞之工事，日前全然開闢。目下船舶既得見其交通，該處之幅約十間許，猶要繼續開鑿，以增其濶。又他處浚渫工事，目下專急務進步，以一隻之浚渫船兼行晝夜，勤浚渫夫土砂，即築港局事務，亦因之而頗極繁忙云。¹⁵

據報導，在第一期築港工程時，殖民政府即開始展開對於從清代火車站到原旭川間的浚渫工程。上述引文報導的「旭橋通港內之河道」，即橫跨蚵殼港溪出口的舊旭橋位置；「停車場附近至旭川」，是指清末的火車站位置（約今基隆碼頭西三倉庫、牛稠港出海口右側端）到蚵殼港溪出海口一帶，因船隻須停泊於火車站旁載卸貨物，因此需要濬深港灣。

基隆築港第一期工程於明治 36 年（1903）結束。不過，因築港經費的問題，第一期築港僅對港灣深濬、火車站前的碼頭築造做改變。真正對基隆港市造成深刻影響是在第二期工程時期，旭川運河也在此時期出現。

二、市區改正下的旭川運河

基隆第二期築港開始於日俄戰爭之後。此時日本政府為推動殖民產業，建設港口海陸連結設備以及及填埋、運河工程。第二期築港工程自明治 39 年至 45 年（1906-1912），為期 7 年。其最主要的工程包含建造內港海岸平整深水碼頭，海岸河川堤防工程，以及港內鸞公島、鸞母島的鑿除與港內深濬。不似第一期工程僅著重在港內濬渫工作，第二期築港工程的海陸連接與港市的規劃乃是此期的重點，另外，為配合港市改造，基隆的市區改正也在第二期築港期間進行，建設市區街廓、筆直道路、下水道設施等。¹⁶因此，此期工程可謂是讓基隆港一躍成為國際要港的重要階段，也是奠定基隆市街的發展基盤、徹底改變基隆市街空間的重要時期。

市區改正計畫是由地方政府基隆廳負責，而運河的築造則是由基隆築港局負責。因經費與工程浩大，市區改正採分區、分期進行。明治 40 年（1907）主要是以小基隆地區為先，明治

¹⁴ 〈旭橋告示〉，《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7 月 18 日，第 3 版。

¹⁵ 〈築港一斑〉，《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8 月 22 日，第 3 版。

¹⁶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頁 164-166。

41 年（1908）著手靠近火車站的新店海濱地帶，並且將蚵殼港溪流入車站旁的水道填埋，同時，築港局也在明治 41 年（1908）開始進行田寮港與蚵殼港運河（即旭川運河）的開鑿工程，以及海岸的護岸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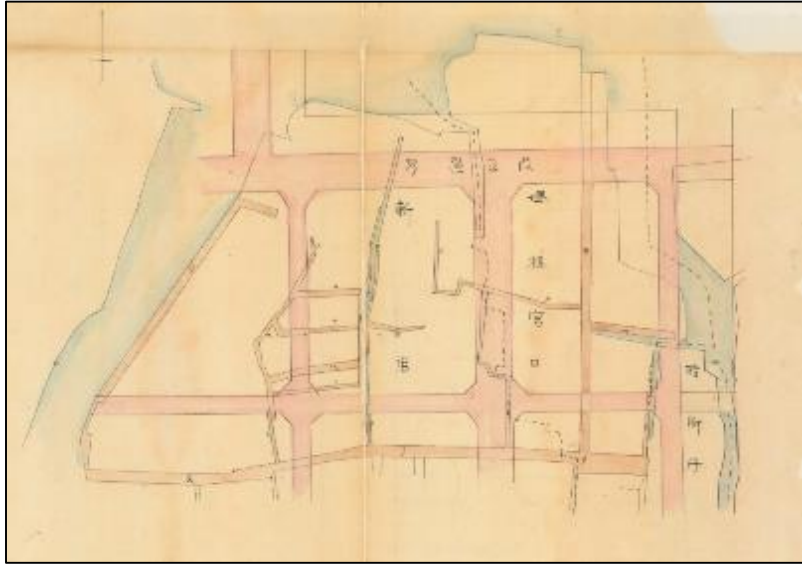


圖 3 大基隆媽祖宮口一帶市區改正圖

資料來源：〈道路敷地地方稅經濟へ譲與ノ件〉（1909-10-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251006。

說明：橘色為原有道路，紅色是市區改正計畫道路，右方的河川將改建為旭川運河，左邊蚵殼港河川將填埋成土地。



圖 4 水路開鑿工程大基隆工區工程區域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出張所編，《基隆築港概要》（基隆：編者 1915），前置頁。

說明：淺黃色部份為舊蚵殼港水道，填埋後一部分變為車站前腹地。

運河築造相關的工程可分大基隆區域與義重橋區域，即後來的旭川運河與田寮港運河。旭川運河的工程是屬於「大基隆區域的水路開鑿工程」，此工程是為了築港工程海岸石垣暨岸壁工程，要將蚵殼港溪的舊水路口閉塞、填埋，而在蚵殼港溪流原迂迴於高砂公園南邊的溝渠狀態支流給改道，將本流引導至鐵路橋下，與石硬港溪合流，貫穿崁仔頂及暗街仔街向北流，與新設的海岸線垂直相交，注入港內。此工程不僅是基隆市區改正的基礎，也是對大基隆街區徹底的改變。

此工程首先要先開鑿新運河水路，自河口先開始開鑿約 18 公尺寬的海岸石垣工程，沿著上游興建近 400 公尺的兩岸石垣，與石硬港溪合流，另外經鐵道橋在獅球嶺兵營地迴轉，與舊有的蚵殼港水路合流。工程區域分為三區域，第一工區為蚵殼港下游水路，寬約 27 公尺、長約 400 公尺；第二工區為蚵殼港上游水路，寬約 11 公尺、長約 290 公尺；第三工區為石硬港溪下游水路，寬約 11 公尺、長約 58 公尺。¹⁷現今所指的旭川河，即屬於第一工區的部份。

工程分為三期進行。第一期首先是開鑿第一區與第三區的水路，且兩條水路會合地點進行挖掘土砂，堰止舊有的石硬港溪口，將溪水導引至舊蚵殼港溪。其次將石硬港溪口南邊的護岸石垣延長約 20 公尺，與北岸往下游的護岸石垣 9 公尺間，卸貨場石垣 27 公尺與石硬港溪形成合流處。再者築造連接海岸石垣、右岸河口約 65 公尺的卸貨場石垣及橋臺、旭橋及同左岸的護岸石垣樓梯等工程，此護岸石垣、卸貨場石垣等，在上游還未掘放水路通水前竣工。

¹⁷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臺北：編者，1916），頁 751-752。

第二期首先建造第一區右岸的卸貨場石垣階梯、橋臺，另外築造第一區左岸河口開始約 72 公尺護岸石垣階梯、橋臺。第一區水路護岸及卸貨場石垣工程完成後，挖掘搬運水路內的土砂，導引舊蚵殼港溪至新舊接續地點的水流。

第三期為在第二期完工後，在下游右岸一部分尚未築造的卸貨場石垣，進行石垣下部的水下工程，以及三處臨時橋的橋臺架設，並且關閉蚵殼港溪舊水路後，下游的土地填埋工程。

此工程自明治 41 年（1908）4 月開工，但工程進行中並非順利。明治 41 年 7 月 31 日因大潮，水路閉關處崩潰，10 月 11 日又遭逢十幾年來未曾有的暴風雨，石硬港溪河水暴漲氾濫，護岸工程提防潰決多處，造成大基隆大部分都淹水。¹⁸而承包商又在施工過程中發現石垣築造處的土質軟弱，加上基隆多雨對工程進度有所干擾，屢屢向官方申請更改經費與工期。因此至明治 42 年 10 月，水路開鑿工程連同追加工程才完工，包含義重橋區域總經費共 15 萬 2 千餘圓，大基隆區域的工程費（不包含人事費）即佔 10 萬 9 千餘圓。¹⁹



圖 5 蚵殼港溪上游水路改道工程

資料來源：《基隆築港沿革》，頁 17。

說明：原書圖說中譯：「為了在市街地使用安全水運的附屬築港工程，規劃本工程，圖為明治 42 年（1909）4 月工程中現況，改修河川寬度 27 公尺、深度退潮下 1.2 公尺，石垣高處為退潮上 2.7 公尺、石垣邊 2.8 公尺，與中央正面的鐵道橋翼相連，此處以上因施工挖掘而阻絕水流。」

¹⁸ 〈護岸工事堤防の決潰〉，《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0 月 15 日，第 2 版。

¹⁹ 《基隆築港誌》，頁 803-805。



圖 6 蚵殼港溪下游水路改道工程圖

資料來源：《基隆築港沿革》，頁 18。

說明：原圖說明中譯：「與前頁（按：指圖 5）上游區域同時期的工程現況，完工的橋樑為木造臨時橋樑旭橋，河川流經橋下直通基隆港灣內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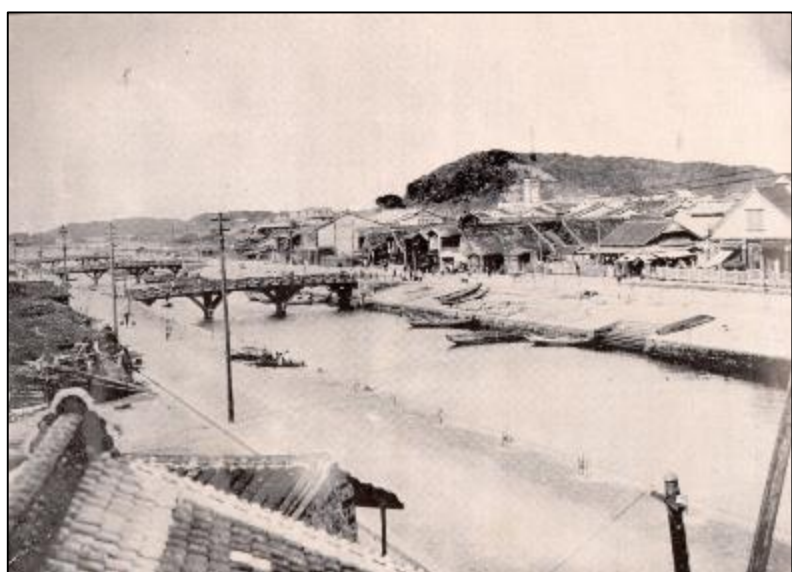


圖 7 完工後的蚵殼港水路及卸貨場

資料來源：《基隆築港沿革》，頁 19。

說明：原圖說明中譯：「明治 45 年（1912）6 月完工後的水路狀況，左岸有約 9 公尺道路，右岸一帶設立卸貨區，此地隔 9 公尺設置寬 9 公尺的道路。右方新建家屋是福德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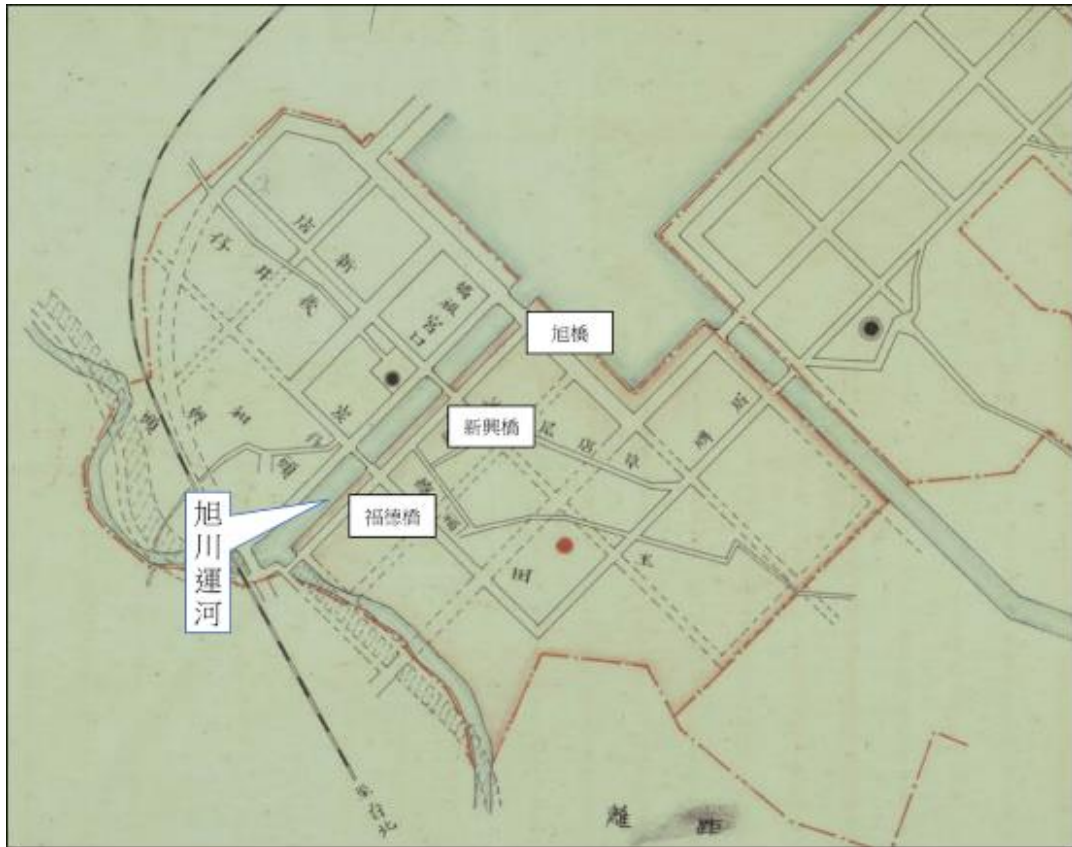


圖 8 旭川運河完工後的基隆市街圖

資料來源：〈警察官吏派出所設置認可ノ件（臺北廳）〉（1910-10-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264034。

三、旭川運河與地方發展

大基隆水路改築工程於明治 42 年（1909）10 月底完成，新興的旭川運河成為大基隆地區重要的景觀。據報導，就在運河建成的翌年，基隆重要的傳統民間習俗中元普渡，就在旭川運河旁從旭橋至福德市場約 3、4 百公尺間舉行，沿路電燈連結，擺放祭品桌，盛裝祭祀的豬公，裝飾物不知數百，熱鬧程度不下三峽。²⁰

對於殖民政府而言，旭川運河除了改善舊市區的衛生外，也提高交通運輸功能。²¹除此之外，對於運送基隆的煤炭亦有相當助益。旭川運河興築工程，對於基隆港灣南岸的市街造成重大的改變，對都市發展而言具有正面意義。

（一）旭川運河的航運

旭川運河的河道，接近過去石硬港川出口的崁仔頂市街，過去漁船能在此進行漁獲交易活動。然因基隆築港開鑿新運河，此處無法繼續原有的漁港貿易功能。因此殖民政府在第二期築

²⁰ 〈基隆だ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9 月 6 日，第 2 版。

²¹ 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第參章頁 3-13。

港工程中，明治 44 年（1911）在小基隆建立三沙灣漁港，週邊設置魚市場、製冰廠、船舶修理廠等，被稱為是日治時期全臺第一座漁港；至昭和 8 年（1933）又在基隆八斗子興建基隆漁港。²²日本當局為了溝通漁港與大基隆地區的鮮魚交易，補助民間造船所建造渡船，往來當時漁港所在地濱町與旭橋之間，供鮮魚批發商搭乘。²³

據先前研究調查，日治時期在旭川旁（今孝一路）的魚行只有 3、4 家，主要是經營批發熟魚和間賣雜貨，海產物多為乾貨，如魚脯、鹹魚等，較少鮮魚，²⁴今孝一路崁仔頂市場仍有遺留日治時期魚行建築。旭川運河建立後，原來崁仔頂的漁獲交易功能，要到戰後才開始發展成現在崁仔頂魚市規模。

旭川既然成為有交通運輸功能的運河，其河川上往來上的舢舨船隻，則是當時最常看到的風景。旭川運河在日治後期為總督府交通局所管轄，卸貨場主要的貨物多為木材、陶瓷器等，因此旭川運河旁有多家木材商行，亦有經營舢舨業者，如媽祖宮口的萬成商行、居於福德的基隆名人林冠世等。²⁵



圖 9 1920 年代的旭川運河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基隆築港出張所編，《基隆港》（基隆：編者，1928），頁 29。

說明：圖中視角為旭川往港灣外看，照片左前方橋樑為新興橋，可見到旭川河中有舢舨、舢舨行走，河中與卸貨場堆放許多木材。

成為航運便利的旭川運河，也成為基隆市民的水上休閒活動空間，如端午節的龍舟競賽，亦多次報導在旭川運河舉行：

基隆市，去十一日，為舊曆蒲節，慶安宮及奠濟宮兩廟前，各演端午戲，港中有龍舟競渡，即驛前舢舨業者一同，裝飾兩艘舢舨，在新興橋與旭橋之間競漕，兩岸觀眾數千，

²²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113-114。

²³ 〈鮮魚仲買人の為 港内無料渡船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0 月 14 日，第 2 版。

²⁴ 張怡玲，〈基隆批發機能魚市場的形成及空間結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7），頁 84。

²⁵ 大瀧幹正，《基隆港及高雄港荷役調查》（東京：港灣協會，1931），頁 17、23-24。

此後擬繼續一週間。²⁶

去八日，為舊端午佳節，本島人方面，各家舉祭，是日被雨掃興，不見如前年，紅男綠女，成群□遊市內。然午後雨稍細，永三旅館，於媽祖宮口，旭川運河，主催龍舟競渡，兩岸舉傘觀覽者，可數千人。此後將繼續一週間。又入夜於媽祖廟前，開演梨園，以祝佳辰云。²⁷

從引文的敘述中，可以想像市民們紛紛聚集圍繞在旭川河兩岸，即便下雨撐傘，也要參與活動的熱鬧情景。甚至有後續報導，因觀看龍舟競賽人數眾多，警察擔心新興橋與福德橋欄杆有腐朽會造成觀眾危險，而一度被中止。最後協調後，以取締在橋上觀看者而得以繼續活動。

28

（二）劃分地方勢力的旭川河

日治時期的基隆築港工程與市區改正計畫，對於基隆市街造成重要的改變。不僅在可視的變化之外，甚至也讓過去地方勢力的做了明確的劃分。大基隆市區因旭川運河被筆直的劃分為二，過去傳統的舊勢力發展，在日治時期也被明顯成為兩方陣營的明確界線。

清末自日治時期宜蘭、基隆地方一直有北管西皮、福祿之爭。北管戲曲因演奏樂器不同，分為西皮、福祿派，並供奉不同祖師爺。宜蘭地區約在清道光年間發展培養北管樂團，練習戲曲陣頭，常在表演或競賽中競爭，進而因細故發生鬥爭成為械鬥事件。光緒年間宜蘭地區紛擾逐漸蔓延至雙溪、基隆一帶。位在新店的城隍廟是福祿派的中心，組成聚樂社；位於玉田祭祀開漳聖王的奠濟宮，則有得意堂的曲館。兩方時而因故衝突，加上市井無賴的挑撥鬧事，經常引起社會案件。此情形從清末延續到日治時期，明治 32 年（1902）基隆廳長甚至還為此發出諭示警告雙方。但衝突狀況頻仍。²⁹據報導，在旭川運河建成之後，隔著兩岸，西岸為媽祖宮、蚵殼港，東岸為玉田、草店尾，兩方持續相互反目，西岸的福德派，以張士文為領導；東岸的西皮派，以林清芳為領導，兩方人馬不時攜械互毆。³⁰在昭和 5 年（1930）更有兩派人馬隔著運河兩岸互相對峙的場面：

基隆市新店方面散在之福祿派第二十二組音樂團，去二日午後六時半，突然招集樂士五十名，團員約五百名，在高砂公園，蓋因元旦，有團員十數名，參謁于玉田聖公廟中，為玉田方面西皮派音樂團員三十餘名，打壞樂器其他約千圓，竝為其所辱。為此復仇，而於同日集合，陽則照恒例以參謁基隆神社，及聖公廟為名，團旗音樂團作先頭舉大示

²⁶ 〈基隆端午節龍舟競渡 繼續一週間〉，《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6 月 14 日，第 4 版。

²⁷ 〈基隆 競渡龍舟〉，《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6 月 10 日，第 8 版。

²⁸ 〈基隆 競渡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6 月 13 日，第 8 版。

²⁹ 陳凱雯，〈基隆奠濟宮之研究(1875-1945)〉，收入於顏尚文主編，《臺灣佛教與漢人傳統信仰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頁 168-171。

³⁰ 〈夜の基隆街は無賴漢の跳梁 良民は戸を鎖して出ず 當局の努力も效果少し〉，《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12 日，第 6 版。

威運動。媽祖宮口派出所森永巡查，急報知本署，各署員，遂行非常召集，往西皮、福祿兩派境界之朝日運河兩岸，阻止之。而聞此之西皮派，亦不能默過，集團員數百名應戰，出動于河邊。兩軍狹河對峙，形勢不穩，由警方努力取締，互一時間餘，始得解散。然署員，猶慮發生大事，徹宵警戒，一面喚主謀者調查云。³¹

從引文可知，旭川運河被視為是西皮、福祿兩派的界線，兩方近千名人馬分據在兩岸，以旗鼓音樂叫囂對峙，即便警察出面制止，卻也無視其存在，要費一小時才結束。在 1930 年代前後殖民政府正對臺灣政治與社會運動大肆彈壓的時期，卻出現這種警方無法控制的狀況。而旭川運河的出現，反而讓兩方勢力更壁壘分明，這恐怕是當時殖民政府始料未及。

（三）運河擴張之議

基隆第二期築港工程完工後，基隆港貿易量突飛猛進遠超過預期，再加上輪船噸位數不斷地增長，因此不斷地持續追加工程。基隆市街因為基隆港也快速發展，官方與民間開始有對市街內的田寮港運河、旭川上游的蚵殼港運河有改修之議。尤其是在第二期築港工程，蚵殼港運河只有下游旭川運河的部份施造石垣護岸，尚有 1 千多公尺沒護岸，田寮港運河更有近 2 千公尺沒有施造護岸工程，運河的土堤隨著時間逐漸崩壞，土砂流入運河中。兩運河中上游都有煤礦場，透過運河順利載送貨物進出，成為當時對運河改修的主要目的。³²

另一方面，若能延長運河流域，更能為市區腹地狹小的基隆增加工業發展的可能性。如蚵殼港運河沿岸有設立海南製粉工場，若能疏濬建設蚵殼港運河，亦能透過船運，節省原料與製品進出的運費。³³

然而接下來的第三期築港工程中，雖然有對田寮港運河的改築，以及石硬港浚渫與船溜的建造，但蚵殼港運河卻遲遲未能動工。此因是在海南製粉會社附近，是陸軍有土地，此處設有陸軍守備隊，若擴張運河規模至此，在軍事上會有妨礙，故陸軍方面始終不願意同意開鑿。³⁴另一個因素，則是蚵殼港運河與縱貫鐵路相交，要解決鐵路架橋等問題，亦相當棘手。當時輿論非常希望當局開鑿旭川運河上游的蚵殼港運河。³⁵目前西定河上游沿岸海南製粉會社附近〈至今安樂市場一帶〉，仍有疑似日治時期的駁坎，是否是因當時議論之後所建設而成，仍待相關資料的搜尋研究。

³¹ 〈基隆西皮福祿兩派 各據運河岸對峙 互一時餘始為警官解散〉，《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 月 5 日，第 8 版。

³² 〈市勢發展上緊要なる 基隆の新施設 兩運河の改修と大船渠の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8 日，第 7 版。

³³ 〈港灣を利用する 基隆三加工業（上）〉，《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6 月 30 日，夕刊第 1 版。

³⁴ 〈基隆蚵殼港運河 陸軍土地未承諾 開鑿工事或至中止 當局及市民缺愁心〉，《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8 月 5 日，第 8 版。

³⁵ 〈蚵殼港運河難關 陸軍而外更有鐵橋 望市協等鼓舞輿論〉，《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8 月 12 日，第 8 版。

參、戰後旭川河的整建與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作為臺灣重要港口以及軍事重地的基隆，港區曾遭受到重大的戰事破壞，市街也遭受波及。據報導，戰後基隆市區內，因受盟軍轟炸損害嚴重，幾乎沒有一棟房子是完整無缺的，³⁶亟待重建。

一、戰後的整建

據戰後調查，戰爭時市區被炸毀的橋樑 6 座，市區內田寮港、旭川、牛稠港運河石垣被毀 130 餘公尺，鋼筋混凝土部分被毀 340 餘公尺，各河口都有大小船隻沉沒其間，需清除後才能開始修復。當時旭川運河沿岸地卸貨場被破壞長達 120 公尺，至民國 36 年（1947）6 月才開始整理修復。³⁷而整個河川運河整理工程，至民國 40 年底，才由基隆港務局委由軍隊協助完成。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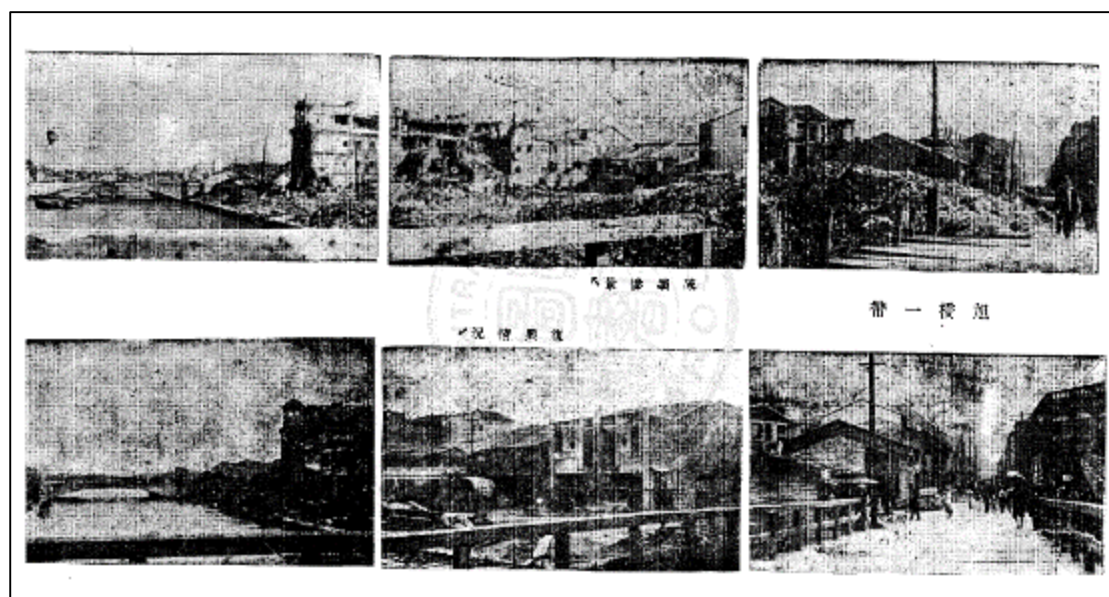


圖 10 戰後初期旭川河一帶修復前後對照圖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年鑑》，前置頁。

說明：此系列照片為站在親民橋（新興橋）往明德橋（旭橋）方向拍攝，左方照片有尖塔高樓為基隆港邊當地郡望林開郡洋樓。

戰後，市區的橋樑也因為政權轉換而改名。旭川上的旭橋、新興橋、福德橋被改為明德橋（今忠一路橋）、親民橋（今忠二路橋）、至善橋（今忠三路橋）。³⁹其名稱是來自儒家經典《大學》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也成為日後三棟加蓋於旭川河的三

³⁶ 〈造成違建原因 申請建築手續麻煩 多抱蓋了再說宗旨戰火洗劫搭蓋聊蔽風雨 也有捐客靠著違建生財〉，《聯合報》，1951 年 11 月 28 日，第 2 版。

³⁷ 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年鑑》（基隆：編者，1947），頁 195-197。

³⁸ 〈兵工建設 提早完成〉，《聯合報》，1951 年 11 月 28 日，第 2 版。

³⁹ 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年鑑》，頁 17。

棟建築名稱。日治時期在旭川運河底接近鐵道處規劃興建和興橋，至戰後民國 44 年（1955）由美援經費撥款興建同風橋，位於仁愛區同風里得名，後改名為仁愛橋。⁴⁰

據陳正祥於民國 47 年（1958）的研究調查，戰後基隆人口增加迅速，旭川河所屬的仁愛區，原本在日治時期已超過 3 萬人口，戰後多增加了 2 萬 5 千人，人口密度甚高。旭川河兩岸多為貿易行、碾米廠的商業區域。⁴¹

重建後的旭川運河，也恢復日治時期的航運。基隆市漁會在旭川河明德橋與親民橋旁設有一小型魚貨拍賣場，漁船舢舨可進出裝卸貨物。⁴²停泊在明德橋旁的漁船，會載運漁貨到魚市場販賣。民國 55 年（1966）基隆港務局統計港內小型漁船及舢舨共 203 戶，其中大沙灣區 48 戶、旭川區 27 戶、和平島 28 戶、三沙灣 27 戶、仙洞 73 戶。⁴³



圖 11 民國 38 年（1949）旭川河口的明德橋（旭橋）

資料來源：郎靜山藝術文化發展學會臉書，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longchinsan/photos/a.398321956968883/390496541084758/?type=3&locale=zh_CN，下載日期：2004 年 2 月 28 日。

二、旭川旁的違章建築

在戰後初期市區重建的過程當中，旭川河上兩岸的違建也在此時出現。當時各大都市皆有

⁴⁰ 〈基市疏運道路及同風橋昨舉行通車典禮 嚴主席親臨剪綵並巡視基市民防工作兵工建設〉，《聯合報》，1955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⁴¹ 陳正祥，《港市基隆之環境與發展》（臺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1959），頁 28、45。

⁴² 〈六百台斤怪魚 游入基隆港被捕 一鏢中的負痛興波 拖著小船港內翻騰〉，《聯合報》，1961 年 1 月 11 日，第 3 版；〈兩條運河設欄地址 舢舨業認為不當〉，《聯合報》，1969 年 4 月 13 日，第 4 版。

⁴³ 〈禁止舢舨航道捕魚 速興建八斗子漁港 基港局在航會報建議〉，《聯合報》，1966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

違章建築問題，基隆市最為嚴重，據民國 58 年（1969）統計，基隆市違建戶多達 1 萬 5 千 8 百餘棟。⁴⁴旭川河兩旁孝一路與愛一路，原本是小船繫船處與卸貨場碼頭所在。戰後基隆市區湧入大量人口，違建問題浮現，在公權力沒有立刻處理的狀況下，旭川河畔也開始有許多違建出現。

民國 42 年（1953），市長謝貫一因旭川河畔的違建屋房屋簡陋，與違建戶具結准予改建為 2 層樓房，共計 72 戶房屋。據報導，當時市府與業主具結留有但書，因此地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港埠用地，若遇公共設施用地需要使用時，應無條件拆除。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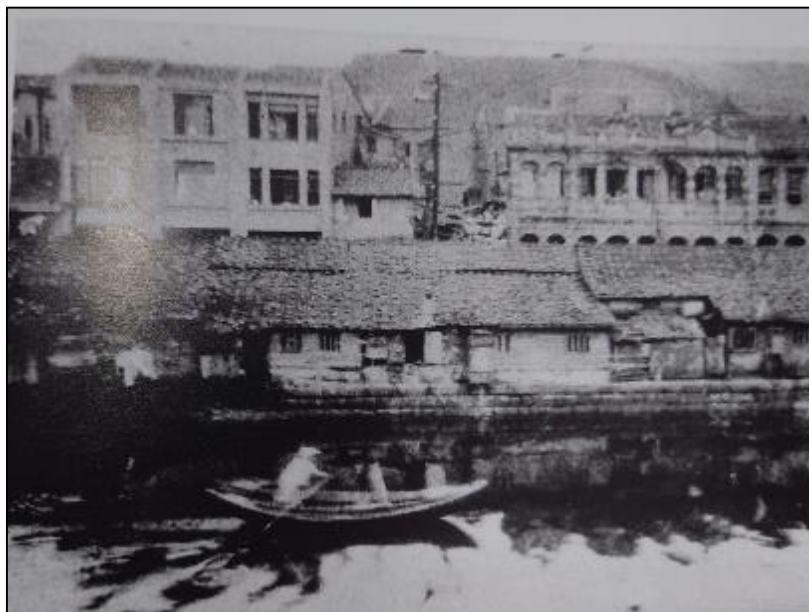


圖 12 戰後初期旭川河一景

資料來源：《基隆開發史：炭仔頂文化》，頁 13。

說明：從房屋背後山景推測此照片應自孝一路往愛一路方向拍攝，河畔上違建當時還是一樓建築，應是在民國 42 年以前尚未改為 2 層樓之前所搭建。

從民國 51 年（1962）的空照圖（圖 13）可看到，旭川河東岸愛一路側，原本是卸貨場的地方，皆有民家整排興建房屋於河道旁。若再對照攝影家鄭桑溪在民國 50 年代所留下旭川河畔的照片（圖 14），亦可以清楚看到違建蓋滿河畔的情況，旭川河東岸已有整排 2 樓形式的住家蓋在原來的卸貨場上。不僅如此，在至善橋上，因鄰近市場，亦有許多攤商搭建臨時攤販於橋上，以及西岸孝一路側亦被攤棚佔滿。當時至善橋被數十戶成衣攤販占用設攤，因每次政府官員查緝時，至善橋的攤棚會暫時拆除，但離開後就馬上恢復原狀，而有「千面橋」之稱。⁴⁶

⁴⁴ 〈怎樣建設基隆 五、違章建築應作妥善處理〉，《聯合報》，1969 年 3 月 27 日，第 4 版。

⁴⁵ 〈基隆愛一路沿河土地 仿照臺北中華路 將變更為商業區〉，《經濟日報》，1968 年 11 月 5 日，第 7 版；〈旭川河岸房屋 究竟是否違建 市府業主各有說明〉，《聯合報》，1969 年 10 月 1 日，第 6 版。

⁴⁶ 〈港濱雨絲〉，《聯合報》，1969 年 9 月 2 日，第 6 版。



圖 13 民國 51 年（1962）基隆市區舊航照影像圖

資料來源：基隆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說明：此照片視角為往基隆港方向拍攝，照片橋樑由近至遠依序為至善橋、親民橋與明德橋，至善橋上尚未有攤棚。



圖 14 民國 55 年（1966）躲避颱風的船隻停泊於旭川河

資料來源：鄭桑溪，《港都舊情：五十年代基隆風貌攝影集》，92 頁。

說明：此照片視角為旭川河西岸往基隆港方向拍攝，照片橋樑由近至遠依序為至善橋、親民橋與明德橋。兩旁違建已為 2 層樓，至善橋上已設滿攤棚。

三、旭川河的淤積

旭川河兩旁的違建，在市區發展快速的過程中，並不是唯一特例。不過，因其位於市中心精華地帶，造成街區觀瞻不佳之外，亦造成施政的許多問題。除了前述旭川河畔因違章建築興建於卸貨場，影響旭川運河原有設計外，更影響旭川疏濬問題。從戰後基隆市議會歷年多有議員提出建議，希望政府能疏濬旭川河。其因除了上游密集開發，造成泥沙自南榮河與西定河流進旭川之外，河岸居民隨意清倒垃圾，也造成旭川河淤積。

運河的疏濬工作本是由基隆港務局負責，然而旭川河遲遲無法順利疏濬的原因，也與河畔的違章建築有關。岸壁上面建築房屋後，岸壁的負荷重量增加，旭川運河疏濬時，很容易造成岸壁連房屋一起倒塌。⁴⁷當時基隆港務局認為，旭川沿岸房屋影響到河岸原本岸壁的穩定，若不將這些違建戶遷建，或是不先加強岸壁的話，會對這些住民造成危險，更會造成法律問題，因此疏濬工程一直未能施行。⁴⁸造成戰後二十餘年，旭川運河一直遲遲無法疏濬。不僅影響航運功能，也造成洪災的危機。



圖 15 民國 60 年代淤積的旭川河

資料來源：翁庭華攝，出自《基隆開發史：炭仔頂文化》，頁 23。

更有甚者，至善橋旁的仁愛市場，是市中心最大市場，沿岸違建居民也隨意的傾倒垃圾，家庭廢水與市場污水直接排入旭川河，使得旭川河變得污臭不堪。加上無法疏濬，每逢大雨，上游西定河、南榮河垃圾便沖至旭川河，再流入基隆內港。據民國 58 年（1969）港務局統計，旭川與田寮河兩條運河出口撈起的垃圾，每年有 3 千噸之多，被視為「基隆的盲腸」⁴⁹

⁴⁷ 〈基隆愛一路沿河土地 仿照臺北中華路 將變更為商業區〉，《經濟日報》，1968 年 11 月 5 日，第 7 版。

⁴⁸ 《臺灣省議會第四屆第九次大會（三）》，頁 3711；〈大沙灣改建補償費 漁民提的要求 港務局不同亦〉，《聯合報》，1966 年 4 月 2 日，第 6 版；〈基隆旭川河岸壁未加強 省令不准房屋改建〉，《聯合報》，1964 年 4 月 1 日，第 6 版。

⁴⁹ 〈兩條運河設柵欄地址 舢舨業者認不當〉，《聯合報》，1969 年 4 月 13 日，第 4 版。

不僅如此，原來旭川河卸貨場旁，小船可在此繫船停泊貿易，或是躲避風浪，但卻因為旭川旁興建起違章建物而有所改變。民國 51 年（1962）9 月愛美颱風過境，漁船進入旭川原本要避風，卻因沿岸淤積、違建戶等因無法於岸壁繫纜繩，而有 2、30 艘漁船將纜索繫在親民橋的欄杆上，結果因上游山洪暴發，水勢與風勢造成 12 艘漁船沉沒或流失。⁵⁰

肆、旭川河「加蓋」

原來在日治時期作為港口運輸與改善市區衛生功能的旭川河，戰後不僅運輸功能喪失，相反地，更變成市區衛生環境的主要毒瘤。也因此，戰後旭川河的整治，也成為市政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民國五〇年代的加蓋爭議

民國 47 年（1958），市政府為整理西定河水道，請求省府撥款，同年 8 月省主席周至柔來基隆視察，面諭市長謝貫一：「此種運河在市中心區暨無用途且妨礙環境衛生，應加築河蓋改良利用」。此為官方首次提出對旭川加蓋政策的言論。市政府即於民國 48 年 7 月向省政府提出「旭川河改良利用案」簽請核准，同年 10 月經省府派公共工程局、水利局、交通處、港務局與市政府各機關開會研議，同意進行加蓋工程。於是請相關單位預估改良經費約 5 千萬，但因經費浩大難以辦理，呈報省政府後，主席周至柔仍回擬鼓勵市民集資改良利用，以民間投資合作經營方式進行。在市府提出「旭川河改良利用案」的同時，顏世昌等人成立中一公司，開始擬定加蓋計畫，並於民國 49 年 3 月與市政府簽約，並向省政府核備。⁵¹

事實上，戰後基隆市政府推動與河川爭地的相關建設並不陌生。民國 45 年（1956），田寮港西邊的船澳被填平，興建惠隆大樓；民國 49 年填平仁五路附近旭川河的船澳，並蓋掉部份石硬港河面，建造了東和大樓。然而時間相差不遠的旭川河的加蓋案，卻引起市民巨大的反對抗議。在民國 48 年底 49 年間，臺灣省政府就接到許多民眾請願，希望制止市政府與中一公司在旭川河加蓋大樓，以免河流淤塞。而在民國 48 年 12 月基隆市議會第 4 屆第 6 次臨時大會中，亦有市議員陳榮強等人以同年發生的八七水災前車之鑑，希望暫緩辦理加蓋案：

本市西定河通明德橋之河面，若在未清掃及完善排水前，如准加蓋房屋，一旦山洪暴發，上流樹木石土充塞，下流明德橋出海之處泥濘在塞，水從合流？勘可憂慮！⁵²

民國 49 年（1960）7 月，支持與反對旭川河的陳情案同時在議會討論。陳耀東等 42 人於市議會提出制止旭川及西定河河面加蓋大樓。其提出說明如下：

查市府原計畫旭川及西定河河面加蓋大樓一案，就其底細，大有阻碍排水，若遇豪雨山

⁵⁰ 〈基隆旭川河內 小漁船互撞 毀了十二艘〉，《聯合報》，1962 年 9 月 6 日，第 3 版。

⁵¹ 「建設廳簽為關於基隆市旭川河改良利用發生糾紛一案謹擬具處理意見請核示案。」（1962-02-23），〈臺灣省政府業務會報第 190 次會議〉，《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507019009；〈基隆市議會第四屆第八次大會議事錄〉，頁 95-96；〈基隆市議會第四屆第九次大會議事錄〉，頁 111-112。

⁵² 《基隆市議會第四屆第六次大會議事錄》，頁 76。

洪爆發時，財產人命之損失則不可設想，際此反攻前夕，省府三申五令飭諭疏散，旭川河適在本市中心，設如加蓋建樓，遇中敵彈河必閉塞，河水則無從出口將若之何，如此栽殃禍民，市民聞訊群起反對堅持到底，謹特連署上陳籲懇俯納輿情，慎審考慮，制止加蓋工程，則功德無量。⁵³

另一方面，中一公司代表顏世昌則提出希望議員支持案。為此，基隆市議會組成專案小組，對旭川西定兩河加蓋問題進行調查，並提出報告書。報告書中對於洪水、污水、河床淤積等問題調查。其中港務局建議旭川河若要加蓋，一定要作到下列四點：1.於河道適當地點建沉沙地；2.加蓋前先將河道岸頂起至河底，應疏濬 45 公尺之深度；3.加強岸壁；4.污水改道排水將不受阻礙。而對於加蓋是否妨礙漁船進入避風的問題，港務局表示旭川河並非避風港，平常雖有小船進出，但實際上為清水及污水排水道。於是專案小組調查案的結果如下：

旭川、西定兩河加蓋後，對增加土地、解除鬧區房荒、繁榮市區、改善環境衛生皆係事實，果排水系統不因河道上加蓋房屋而受此阻礙，則此項措施自屬有益無害。本小組經審慎研究結果，為繁榮地方，似應加蓋，但為預防災害，以策市民安全起見，有關技術問題應由市府邀集有關單位詳細研究。⁵⁴

從議會的調查報告可知，其立場仍傾向加蓋一途。然當時市長已換成林番王擔任，對於旭川河加蓋案並沒有前任市長積極，面對市民的群起反對，市府採取暫不辦理。也因為議會傾向支持，甚至還引起市民要提出罷免議員的風波。然市政府暫不辦理的行為，造成中一公司的損失，也讓中一公司提出抗議，要求市政府履行合約義務，同時仁愛區曲水里里長、八南里居民 3、4 百人、玉清里 5、6 百人也連署支持加蓋案。而仁愛區 30 里里長則堅持反對，向省政府陳情，請飭令旭川運河不得加蓋。⁵⁵因省府表達支持基隆市政府履行與中一公司的合約，使此爭議延燒到民國 53 年（1964）市長選舉，仁愛區市民們甚至要求候選人謝青雲、林番王等人公開表態絕不加蓋旭川河。⁵⁶省府面對此紛爭，最後要求基隆市政府「自行衡酌實情負責處理」。

中一公司後控告市政府對旭川河加蓋不履行契約，而市政府以當初中一公司是與基隆土地開發會訂約，市政府建設局可以不批准，亦無須負責此契約行為。⁵⁷筆者尚未獲得此訴訟最後的結果資料，不過在蘇德良市長任內，以合約內容有「如果在兩年內仍未動工，即予停止契約關係」之條，以此終止契約。⁵⁸

二、疏濬與違建拆除的爭議

⁵³ 《基隆市議會第四屆第八次大會議事錄》，頁 95。

⁵⁴ 〈基隆市議會第四屆第九次大會議事錄〉，頁 111-112。

⁵⁵ 「建設廳簽為關於基隆市旭川河改良利用發生糾紛一案謹擬具處理意見請核示案。」（1962-02-23），〈臺灣省政府業務會報第 190 次會議〉，《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507019009

⁵⁶ 〈基市長選戰激烈旭川河加蓋 又舊事重提〉，《中國時報》，1964 年 4 月 14 日，第 6 版。

⁵⁷ 〈基隆旭川運河加蓋訟案 地院昨天開庭 雙方各執一詞〉，《聯合報》，1966 年 6 月 12 日，第 6 版。

⁵⁸ 〈基隆旭川運河 加蓋契約停止〉，《聯合報》，1966 年 5 月 28 日，第 6 版。

雖然在民國 55 年（1966），市府以暫時停止加蓋而緩解爭議，但是旭川河的疏濬以及違建戶問題仍未能解決。民國 57 年（1968）市府將愛一路沿河土地由河川地帶變更為商業用地，計畫要將沿河 72 戶房屋仿照臺北中華商場改建成三層樓房，愛一路向旭川河延伸 4.2 公尺，新生地作為房屋的綠地之用，並且加固岸壁，以便進行旭川河疏濬。⁵⁹然此案並未獲省方同意。

民國 58 年（1969）市府提出 24 項短程建設計畫，其中包含「旭川河疏濬整建計劃」。當時旭川河整建方式有三個方案：**拆除遷建、加蓋、就地整建**。市政府報請省府後，建設廳認為以拆除遷建最為妥善，引發市議會的激烈討論。後市民向市府陳情，請求依照民國 57 年的決議將旭川河疏濬後就地整建，但省府建設廳仍以拆除遷建為妥，⁶⁰但「惟於執行上如確有重大困難可由貴府自行選擇辦理，本廳亦不堅持反對」。民國 58 年 12 月省主席陳大慶訪問基隆時，亦認為旭川河整建計畫可直接由地方政府核定辦理，不需省核定，授權基隆市政府自行核定辦理。⁶¹

當時地方上的意見分為兩派，一是旭川河上游如南榮河沿岸龍門、文安、崇文、曲水里等里長們與西定河一帶居民，支持市府實施整建拆除計畫。他們認為旭川河自戰後以來未曾疏濬，河岸違章建築的垃圾糞尿均倒入河中，以致環境維生遭受破壞；加上南榮河床日漸增高，下游旭川河多年未能疏濬，每逢豪雨，南榮河沿岸就氾濫成災。因此為維護河道沿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請市政府早日實施拆除整建計畫。⁶²

另一派立場則是愛一路的違建戶，反對拆除，主張就地整建，以利商業發展。違建戶並認為當初謝貫一市長任內已給予房屋所有權狀，並非違章建築。⁶³據報導，當時的輿論以支持拆除整建方案者人數較多。⁶⁴然而拆除後要如何安置違建戶，也是待解決的問題。

除了拆除遷建或就地整建的方案外，第三個選項是加蓋。就在旭川河如何整建議題發酵之時，民國 58 年（1969）3 月聯合報有以「怎樣整建基隆」的系列報導，其中談到旭川河積滿污濁的河水，河岸愛一路旁有無數的違建房屋，旭川河上的至善橋則被凌亂的攤棚所充塞。搭郵輪進入基隆港的中外人士，進港後就可以聞到旭川河的臭味，這些臭未來自違建戶不斷地將垃圾或糞便倒入運河，以致蚊蛆滋生，散發臭味，並使內港經常漂浮垃圾，污穢不堪。不僅影響基隆市民的健康，也影響基隆聲譽。⁶⁵報導中並提出改善方式，以昇高加蓋最為理想：

旭川河的昇高加蓋，必須以不妨害排洪功能為前提，所以工程設計必須審慎進行。原則

⁵⁹ 〈基隆愛一路沿河土地 仿照臺北中華路 將變更為商業區〉，《經濟日報》，1968 年 11 月 5 日，第 7 版。

⁶⁰ 〈旭川河岸違建拆除 引起議員激烈論 今日審查會將繼續討論〉，《聯合報》1969 年 9 月 16 日，第 6 版。

⁶¹ 《基隆市議會第七屆第七次大會/第十、十一次臨時大會議事錄》，頁 314。

⁶² 〈旭川河上游六里 支持市府實施整建拆除計畫〉，《聯合報》，1969 年 9 月 23 日，第 6 版；〈旭川河岸違建問題 部份居民請求 予以全部拆除〉，《聯合報》，1969 年 9 月 25 日，第 6 版。

⁶³ 〈旭川河岸房屋 究竟是否違建 市府業主各有說明〉，《聯合報》，1969 年 10 月 1 日，第 6 版。

⁶⁴ 〈基隆市政府週話 警局長為求指揮靈活 應裝設無線電話 旭川河成為髒亂之尤 須儘速拆除違建〉，《聯合報》，1969 年 10 月 6 日，第 6 版。

⁶⁵ 〈怎樣整建基隆！ 水陸門戶違建交通紊亂 整建市容應先切除盲腸〉，《聯合報》，1969 年 3 月 25 日，第 4 版。

上將愛一路違章建築及攤棚全面拆除，然後整建岸壁，澈底疏濬運河，並在河面超出橋面的高度加蓋，分段建築外表美觀的三層樓房，作為攤販市場，但必須在適當距離流出空隙，另在上游建沉砂池，同時專造挖泥船一艘，定期疏濬河道，以免河道受到淤泥堵塞。這種方式雖然需要龐大經費支應，但可預期良好效果，使目前集髒亂大成的旭川河一帶，變成美麗繁華的水上商場。⁶⁶

從上述報導引文可知，旭川河加蓋所顧慮的是河川疏濬與防洪的問題。其建議方向與前述民國 50 年市議會調查報告中港務局的建議相當接近。

民國 60 年（1971）本地公司邦記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市政府申請投資開發改良旭川河，在此申請計畫中，也將旭川河上以加蓋設置商場為設計。但此申請案在市議會討論中被退回，理由為「旭川河兩岸店鋪整建問題，應由市府會同有關機關及專門技術人員詳細研究，擬定妥善計畫送會再議」。⁶⁷

三、加蓋工程的施行

自民國 47 年（1958）官方開始提出旭川河川加蓋利用後，十幾年來市府對於旭川河無法做出改善的良好對策。隨著淤積、污染狀況日趨嚴重，旭川河被冠上「基隆盲腸」臭名。要處理髒亂污臭的旭川河，同時又能興建樓房容納攤販與違建戶，解決市區土地缺乏問題，於是，河川加蓋的選項終獲得青睞。

民國 62（1973），市長陳正雄與臺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份公司簽訂了「合作開發整建基隆市公園小山及旭川河協議書」，在此協議書中提到此案宗旨：

臺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遵照省政府促進各縣市地方建設發展，厚植地方經濟力量之指示，以提供資金及技術服務辦法與基隆市政府合作，辦理基隆市公園小山開發及旭川河整建，協議共同事項。⁶⁸

臺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於民國 53（1964）成立，為臺灣省政府與國內諸多銀行等投資，省府為最大股東。在這份協議書中，簡要提到雙方的工作內容與責任劃分，以及日後處理出售業務與利益分配等，可惜目前本研究尚未找到更具體的計畫書。不過，從這份文件可知，此項工程是由省營的臺灣土地開發公司所出資，解決了歷年旭川河改建工程所需經費浩大的問題之外，由官方經營機構負責工程，也杜絕了當初因地方派系或人事鬥爭而造成的反對意見。

⁶⁹當時報紙報導，臺灣土地開發公司投資 1 億 3 千萬元，協助基隆市政府開發公園街小山及旭

⁶⁶ 〈怎樣整建基隆！ 四、整建舊市區的技術問題〉，《聯合報》，1969 年 3 月 26 日，第 4 版。

⁶⁷ 《基隆市議會第七屆第七次大會/第十、十一次臨時大會議事錄》，頁 313。

⁶⁸ 《基隆市議會第八屆第二次大會/第二、三次臨時大會議事》，頁 393。

⁶⁹ 當時擔任 6 屆市議員的林朝波曾在議會上表示：「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旭川河加蓋的問題曾鬧的滿城風雨，甚至要罷免我們的議員，所以招致不滿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市府把工程交給民間來作，因此我認為旭川河加蓋工程應該由市府自己來作比較理想。」《基隆市議會第八屆第二次大會/第二、三次臨時大會議事錄》，頁 78。

川運河加蓋建屋，旭川河加蓋建屋部份達 1 億元。⁷⁰工程內容「原則預定加蓋外，並建四層大樓，另保留部份土地，以供道路高架之用。上游攔水壩，亦先作適當處理，俾能早日施工。」

71

此案經議會組成審查小組評估，要求市府要將旭川上游西定河、南榮河的疏濬一同計畫，民國 63（1974）通過。⁷²同年此案獲省府核准，但因河面加蓋建築樓房，與現行都市計畫有出入須變更。⁷³為符合都市法規定，民國 64 年 10 月，基隆市公告變更實施旭川河整建及西定河整治地區都市計畫。目前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中有份〈旭川河整建案〉，⁷⁴即是基隆市政府變更此區的都市計畫公告對鐵路局的通知，此檔案附件有收存「基隆市旭川河整建、西定河整建地區都市計畫變更細部計畫理由說明書」，是目前本研究找到與工程相關的僅有資料。在說明書中提到本案的緣由與目的如下：

本市旭川河位于本市主要商業中心區，為本市西定、南榮河之出口，光復後由於河岸遭不合規定使用之建物，佔用護岸用地，影響護岸加固及河道疏濬，有碍市中心區環境衛生、公共排水、市容瞻觀，甚至污染港口等，故整建旭川河、美化市容而改造舊市區，消滅髒亂為建設都市之重要措施。⁷⁵

另外，說明書中也提到，整建旭川河所需費用浩大，為顧及地方建設財源及都市加速建設，接洽臺灣土地開發公司後同意提供資金及技術服務，幫助地方建設並完成旭川河整建。經省政府指示同意，但須「詳加考慮加蓋後，有無影響疏濬、排水及防空避難設備問題妥善處理」。

76

說明書中也略述工程進行方式。工程分為一、二期，第一期是旭川河整建；第二期是西定河整治，視地方財源分年分期辦理。第一期計畫 2 年 5 個月完成，所需資金預估 93,518,000 元，工程進行項目如下：

1. 違建處理：旭川河西岸孝一路有臨時攤棚 72 攤，東岸愛一路有建築物 73 幢，計 80 戶由本府依法處理。
2. 河道疏濬：於整建工程時疏濬河底淤積。
3. 河面建築工程：旭川河寬 27 公尺自明德橋至仁愛橋間計有三段水面，計畫在三段水面間興建河面四層樓三大棟，建築樓房寬為 21 公尺，長度：甲幢 84 公尺、乙幢 96 公尺、丙

⁷⁰ 〈基市旭川運河加蓋 土地開發公司承建〉，《經濟日報》，1973 年 7 月 21 日，第 4 版。

⁷¹ 〈臺灣土地開發信託公司決在基隆投資 開發八斗子水產工業區〉，《經濟日報》，1973 年 4 月 22 日，第 2 版。

⁷² 《基隆市議會第八屆第三次大會/第四、五、六次臨時大會議事錄》，頁 185-186。

⁷³ 〈旭川河整建加蓋已獲省府核准〉，《民聲日報》，1974 年 10 月 19 日。

⁷⁴ 〈旭川河整建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檔號：0064/220/005/1，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收藏。

⁷⁵ 〈旭川河整建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檔號：0064/220/005/1，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⁷⁶ 〈旭川河整建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檔號：0064/220/005/1，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幢68公尺。

4. 護岸工程：沿愛一路西側及孝一路東側之旭川河現有河岸因年久失修，為配合整體計畫予以新建護岸。

5. 道路工程：分為孝一路整修柏油路面及愛一路拓寬整修路面至拓寬路中，興建12公尺高架道路一條費用浩大另籌財源辦理，在未施工前先在路中心建造2公尺寬分車道綠島。

6. 攔沙壩工程：在旭川河上游與興建攔沙壩及沉沙地用以□連上游流沙。

7. 土地取得：第一期計畫地區土地權屬公有除道路用地依法辦理□用外，建築河面土地依法辦理登錄市有後建築使用。⁷⁷

上述工程內容第1項違建處理，據報導，市府與拆遷戶多次協調，將加蓋大樓的1、2、3層樓安置拆遷戶，愛一路違建業主可分配1樓的店舖。然有部份違建戶不滿拆遷補償，至民國64年（1975）7月，市政府強制拆除愛一路與孝一路的違建與攤棚。⁷⁸據民國67年10月25日市長陳正雄所立於忠二路橋之「整建旭川河碑記」所示（圖16），旭川河加蓋工程在民國64年10月23日開始施工，至民國67年8月12日落成，共耗費2億3,588萬餘元。⁷⁹



圖 16 民國 67 年（1978）整建旭川河碑記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⁷⁷ 〈旭川河整建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檔號：0064/220/005/1，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⁷⁸ 〈拆除愛一路民房及孝一路違建限卅日前自行拆除完畢，自七月一日起強制執行，臺電自來水即停電停水〉，《民聲日報》，1975年6月26日。

⁷⁹ 〈旭川河面加蓋，基市投資八億，將建三幢四層大樓〉，《民聲日報》，1975年7月17日。



圖 17 正在興建加蓋工程的旭川河

資料來源：翁庭華攝，出自《基隆開發史：炭仔頂文化》，頁 24。



圖 18 旭川河上的明德大樓

資料來源：翁庭華攝，出自《基隆市仁愛、安樂區志》，頁 17。

四、加蓋後的旭川河

旭川河上三棟大樓完工後，建築基地座落在仁愛區復興段，屬於市府土地，基地下的旭川河作為排水溝使用。市府優先配售給河岸兩邊建拆遷戶，剩餘部份辦理公開標售，標售的標的

僅限「建物」，不包含土地。⁸⁰

表 2 旭川大樓基本資料表

	地號	地號權屬	面積（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市政府列管 租占戶數
明德大樓	復興路一小 段154地號	基隆市政府	2,710	商業區、道 路	137
親民大樓	復興路二小 段196地號	基隆市政府	3,109	商業區、道 路	154
至善大樓	復興路三小 段46地號	基隆市政府	2,417	商業區、道 路、公園	111
合計			8,236		402

資料來源：賴秋文，〈基隆市旭川河復原對地價影響之研究〉，頁 47。

旭川河加蓋，除了是要解決兩旁違建問題外，更希望能改變旭川河的臭名，然而市民最為擔心的是加蓋後旭川河的排水功能問題。因此在施工中，計畫在上游西定河核建設沉砂池，用以清理上游沖積下來的泥沙，選擇在旭川河底仁愛橋附近。但因民國 68 年（1979）愛一路建設連結高速公路的東岸高架橋，使得沈砂池的工程一直拖延。民國 69 年 9 月 24 日晚間，一場暴雨下在基隆，加上滿潮，整個市區成為水鄉澤國，尤其在旭川河、南榮河與西定河旁情況最為嚴重。甫完工的旭川河加蓋，就成為各界指責造成市區淹水的罪魁禍首。

雖然旭川河加蓋解決了違建問題，但是沿著旭川河上游的西定河、南榮河上游的沿岸居民，仍隨意傾倒垃圾於河中，經常透過旭川河排入基隆港內，造成港內垃圾污染。早在旭川河為加蓋之前，港務局與市政府協調，在民國 58 年（1969）於明德橋出口處設置柵欄，以攔截大型垃圾入港。初期鐵柵欄固定，定時開啟讓漁船進出入，但自旭川河加蓋後，漁船已無法進出，變成固定的鐵柵欄，一旦突然暴雨，河水快速將河中垃圾沖至旭川河口，也造成無法阻撓排水的原因。⁸¹甚至，曾有多次因遭逢颱風而將鐵柵欄拉壞，大批垃圾從旭川河口漂流至港中，污染港區。⁸²

另一方面，戰後曾於明德橋旁設置的漁獲拍賣場，在旭川河加蓋後，親民大樓也在孝一路側另外形成魚市，稱為炭仔頂魚市場。雖然已無旭川河的航運載運漁獲，但透過陸路運輸更跨大貿易網絡，變成全省知名的漁獲交易中心，規模越來越龐大。不過，魚市並非一開始有系統的規劃，在空間、衛生、道路交通等規劃上都產生問題。漁獲交易雖在深夜的孝一路舉行，但並沒有污水處理設施，清洗漁市的污水都直接排到旭川河，淤積在死角與排水溝內的污水腐敗，散發出陣陣臭味。再加上仁愛市場的污水與沿岸居民的家庭廢水亦流入河中，引發民怨。⁸³

⁸⁰ 賴秋文，〈基隆市旭川河復原對地價影響之研究〉，頁 46-47。

⁸¹ 〈山坡密集建屋 水土保持不良 兩港一雨成災 三十年來僅見〉，《聯合報》，1980 年 9 月 24 日。

⁸² 〈旭川河口柵欄損壞 垃圾漂進港區 港局派清潔船清理 正濱漁港船隻沉沒漏油未告發〉，《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3 日，第 18 版。

⁸³ 〈炭仔頂魚市好臭 市民抗議〉，《聯合報》，2011 年 12 月 24 日，B1 版。

為了美化市區、促進經濟發展的旭川河加蓋工程，不僅遮蔽了旭川河，河上的商業大樓底下的污泥、廢水與垃圾，造成環境污染，一旦大雨，河水無法流通，或造成港內污染，居民與官方開始對於旭川大樓有「掀蓋」之聲。民國 90 年（2001）市政府提出「環港核心商業區計畫」，其中欲拆除中正高架橋與明德商場大樓，開闢為 50 公尺寬的綠蔭大道的構想。至民國 98 年（2009）市政府又提出「基隆市臨港中心區附近地區都市更新規劃案」，亦把旭川上的三棟大樓規劃為優先更新區域。⁸⁴不過，因炭仔頂魚市場的去留，以及大樓住戶的拆遷問題，使旭川河掀蓋與否、如何進行，至今仍未能達到共識。

伍、結論

本文以官方檔案、新聞報導與相關研究，重新梳理旭川河的歷史發展脈絡。旭川河的現在位置，接近早期石硬港溪的下游出口，然在日治初期，旭川河是稱呼蚵殼港下游的溪流。明治 39 年（1906）基隆開啟第二期築港工程，配合市區改正，將蚵殼港下游填埋成為基隆火車站用地，河道改築與石硬港溪匯流於基隆港出海，在原來舊市區中心「興蓋」旭川運河。此工程於明治 41 年（1908）4 月開始，明治 42 年（1909）10 月完工，為現今旭川河的正式誕生。

戰後旭川河因兩岸違建戶影響疏濬進行，導致港道淤積，垃圾污水的傾倒排放，再加上運河的功能性降低，政府預推行「加蓋」政策，卻遭受到民意的反對一度終止。但因旭川違建與疏濬問題遲遲無法處理，將旭川河推向基隆市區的髒亂之首。至民國 62 年（1973）市政府與省營體系的臺灣土地開發公司合作，推動加蓋工程，自民國 64 年開始施工，至民國 67 年完工。加蓋後，旭川河的淤積髒亂的問題並未完全解除，「掀蓋」與否卻又變成現今市政上的一大難題。

回顧旭川河的歷史，除了是基隆都市發展的縮影之外，也反映河川與人群、政府相互關係的變化。在清代漢人聚落於基隆港灣南岸開發，利用水路進入到內陸，挑石而上，形成炭仔頂聚落。沿著炭仔頂兩岸，逐漸發展成大基隆市街，蜿蜒於市街的水道，是聚落發展的開始。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為了將基隆港打造為近代化港口，以獲取臺灣物資，進行築港的同時，也配合市區改正，將蜿蜒於市街的水道，興蓋有利衛生與輔助航運的旭川運河。筆直的旭川運河、鋼筋水泥建造的旭橋，成為見證基隆港市蛻變的重要建設與地景。運河上載運著木材、煤炭，以供應殖民地母國所需，對當地人而言，也是往來交易的重要交通要道。

戰後，水路交通逐漸被陸路交通所取代，港灣內已漸漸不再堆放木材、停泊駁船，而是一艘艘的巨輪，旭川河的航運重要性逐漸減低。隨著兩岸違建戶的興建，影響旭川河疏濬，導致垃圾泥沙淤積，而有「基隆盲腸」之稱。執政者認為沒有利用價值的旭川河，唯有改以向河爭地的方式，在河上蓋上商業大樓，發揮其剩餘價值。然而，暫時掩蔽不見的旭川河，卻並未被完全遺忘，在每次的風災淹水、市民走過海岸邊所聞到的臭味，不斷地申告她的存在。

民國 113 年 4 月 3 日的花蓮大地震，造成旭川大樓多處梁柱龜裂、鋼筋裸露，讓更多市民

⁸⁴ 賴秋文，〈基隆市旭川河復原對地價影響之研究〉，頁 48-49。

關注旭川大樓與旭川河的未來。近年來環境意識抬頭，旭川河是否能借鏡韓國清溪川還原水岸景觀，或是像臺中舊市區中的柳川、綠川變成綠化廊道，改善水環境，「掀蓋」而重見天日，仍有許多困難需克服。

參考書目

一、檔案

-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基隆市議會議事錄》，中華民國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二、報紙

- 《中國時報》。
- 《民聲日報》
- 《經濟日報》
- 《臺灣日日新報》
- 《聯合報》

三、專書

- 大瀧幹正，《基隆港及高雄港荷役調查》，東京：港灣協會，1931。
- 洪連成編審，《基隆開發史：坎仔頂文化》，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7。
- 基隆市仁愛區、安樂區公所編，《基隆市仁愛、安樂區志》，基隆：編者，1996。
- 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產業要覽》，基隆：編者，1933。
- 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年鑑》，基隆：編者，1947。
- 陳正祥，《港市基隆之環境與發展》，臺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1959。
-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臺北：國史館，2018。
- 曾子良主編，《追求安定、邁向繁榮：基隆市兩河流域的人文、歷史與故事》，基隆：基隆社區大學，2021。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基隆築港出張所編，《基隆港》，基隆：編者，1928。
- 鄭桑溪，《港都舊情：五十年代基隆風貌攝影集》，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0。
-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築港誌》，臺北：編者，1916。
-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出張所編，《基隆築港沿革》。基隆：編者，1913。
-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出張所編，《基隆築港概要》，基隆：編者1916。
-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圖譜》，臺北：編者，1916。

四、論文

-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 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張怡玲，〈基隆批發機能魚市場的形成及其空間結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7。
- 郭漢隆，〈尋找失憶的港灣城市—基隆河岸空間的研究以旭川和田寮河為例〉，桃園：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5。
-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第三期（2007.12）。
- 陳凱雯，〈基隆奠濟宮之研究(1875-1945)〉，收入於顏尚文主編，《臺灣佛教與漢人傳統信仰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
- 詹恆源，〈夜與魅—基隆市區地景論述：以崁仔頂魚市和林開郡洋樓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5。
- 賴秋文，〈基隆市旭川河復原對地價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2013。

賽音諾顏部盟旗四至八達方位分析： 以蒙古遊牧圖校勘蒙古游牧記及蒙古志

李孟晃*

摘要

本論文以清代賽音諾顏部22旗及附額魯特2旗為分析對象，基於《蒙古遊牧圖——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手繪蒙古遊牧圖及研究》一書中刊布的手繪地圖，逐一比對張穆《蒙古游牧記》及姚明輝《蒙古志》關於盟旗方位的文獻記述，進行系統校勘。分析聚焦於手繪地圖與文獻記述中對賽音諾顏部22旗及附額魯特2旗與其相鄰旗之間的方位差異，並以表格形式呈現校對結果。

本論文不探討手繪地圖與文獻差異背後的成因，而是專注於記錄對比的資料校勘。《蒙古遊牧圖》除了手繪地圖外，還以文字方式描述各旗的「四至八達」方位，涵蓋地名、自然地標及接界旗的細節；相較之下，《蒙古游牧記》與《蒙古志》的文字記述較為簡略，僅記錄旗與旗之間的接連地名及方位。分析結果顯示，手繪地圖所反映的盟旗方位在部分案例中與文獻記述不一致，這些差異被系統化的整理及歸納，為研究清代蒙古地區的行政區劃和歷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依據。

本論文的校勘工作旨在為清代蒙古盟旗方位的研究建立更加精確的數據基礎，同時以賽音諾顏部的個案研究為例，展示地圖資料與文獻記述相互參照的重要性，為未來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支持與研究視角。

關鍵詞：蒙古遊牧圖、蒙古游牧記、蒙古志、盟旗制度、賽音諾顏部

*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教授，E-mail: meng@g2.usc.edu.tw

The Analysis on the Geographic Orientation of the Banners of Saiyin Noyan Banner League : Collating Record of Mongolian Nomadism and Mongolian Chronicles using Mongolian Nomadic Illustrations

Meng-Huang Le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24 banners of the Sain Noyan Banner League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comparing and verifying the geographic orientation descriptions of banners based on the hand-drawn maps published in the book "Mongolian Nomadic Illustrations - Hand-drawn Mongolian Nomadic Maps and Research from the Tenri Library in Japan".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cross-references the geographic orientation descriptions of banners from Zhang Mu's "Records of Mongolian Nomadic Life" and Yao Minghui's "Mongolian Chronicles" and presents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in a comprehensive tabular format.

This study does not delve into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ps and the textual records but rather focuses on meticulous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ison, striving to provide clear and accurate collated data. Beyond the maps themselves, Mongolian Nomadic Maps also includes detailed textual descriptions of the geographic orientation for each banner, incorporating place names, natural landmarks, and neighboring banners. In contrast, the textual accounts in Records of Mongolian Nomadism and Mongolian Chronicles are relatively concise, recording only the connecting place names and basic directions between banne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 some cases, the geographic orientations reflected in the hand-drawn map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textual records. These discrepancies have been organized into a collated table, providing critica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Qing-era Mongolia.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collation effort is to establish a more precise dataset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 orientation relationships of banners in Qing-era Mongolia. It offers new data support for future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 Geographic Orientation of Banners, Records of Mongolian Nomadism , Mongolian Chronicles, Saiyin Noyan Banner Leagu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hih Chi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meng@g2.usc.edu.tw

壹、前言

清代蒙古盟旗制度是清朝統治蒙古地區的重要行政體系，不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也是理解清代蒙古社會空間結構的關鍵。賽音諾顏部作為喀爾喀蒙古四大盟之一，轄有 22 旗及附額魯特 2 旗，其空間方位關係因游牧社會的流動特性及文獻記載的多元性，存在諸多歧異與模糊之處，有待系統性梳理。

關於清代蒙古地區的地理文獻，主要有《蒙古游牧圖》、《蒙古游牧記》及《蒙古志》等重要史料。《蒙古游牧圖》為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手繪蒙古游牧圖，經大陸學者烏雲畢力格教授的整理及研究，包含清末民初四十五幅蒙古地區手繪地圖，集圖像與文字於一體；《蒙古游牧記》為道光年間張穆所著，系統記述外藩蒙古地理；《蒙古志》則是清末地理學者姚明輝編纂的志書，記載蒙古族社會結構與地理分佈。這三部文獻在記述賽音諾顏部盟旗方位時各有特點，也存在諸多不一致之處。然而，學界迄今尚未對這些文獻進行系統校勘比較，導致研究者在利用這些文獻重建清代蒙古地區空間布局時缺乏明確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旨在透過對《蒙古游牧圖》、《蒙古游牧記》及《蒙古志》三種文獻中關於賽音諾顏部盟旗「四至八達」方位記述的系統校勘與比較，以《蒙古游牧圖》的旗界敘述文字與圖面表現為基準，對照《蒙古游牧記》的八方位記述及《蒙古志》的四方位記述，識別異同與訛誤，並探討這些差異的可能原因。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1. 系統整理《蒙古游牧圖》賽音諾顏部 22 旗及附額魯特 2 旗的圖像資料與文字敘述；
2. 比較分析《蒙古游牧記》及《蒙古志》中對應旗的方位描述與《蒙古游牧圖》的異同；
3. 通過表格對比的方式，識別三種文獻中的訛誤、遺漏與不一致之處；
4. 建立更為可靠的賽音諾顏部盟旗空間方位關係框架。

本研究系統化梳理賽音諾顏部盟旗方位關係的文獻疑點，為理解清代蒙古地區的行政區劃與空間組織提供重要參考。

貳、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主要資料來源

(一) 《蒙古游牧圖-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手繪蒙古游牧圖及研究》(以下稱《游牧圖》)：

該書收錄了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中國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間 45 幅蒙古地區手繪地圖，可分為四部分：內外蒙古混合圖 1 幅、內札薩克蒙古各旗圖 18 幅、外札薩克喀爾喀蒙古各旗圖 22 幅及唐努烏梁海與額魯特相關圖 4 幅。這些地圖不僅包含視覺繪製，還附有詳盡的文字說明，描述各旗四至八達的具體方位。此些手繪地圖經大陸學者烏雲畢力格教授整理及研究，並提供釋讀文字以利研究者閱讀。

《游牧圖》的手繪地圖可以視覺方式呈現各旗的方位關係。其手繪地圖分總圖及分圖，手

繪總圖綜繪賽音諾顏部各旗的比鄰關係，分圖則是單一旗的細部手繪地圖。手繪總圖除了圖面各旗方位關係圖外，亦有各旗旗界敘述文字，通常是從東北、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順時鐘敘述；而手繪分圖則各旗在周邊旗界標示山川或地名以及接界之旗名。因此，手繪總圖各旗旗界敘述文字可對照各旗手繪分圖周邊旗界的山川或地名；另外，手繪總圖各旗旗界敘述文字相關接界各旗，亦可在手繪總圖以圖面各旗方位關係，以視覺方式對照檢視。

以賽因諾顏部右翼後旗為例，該旗在手繪總圖的旗界敘述文字如下：

東北自鄂多斯山之鄂博接桑圖山接中末旗界 東自桑圖山至……接左翼中旗界 東南自……至……接右翼前旗界 南自……至……接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界 西南自……至……接中後末旗界 西自……至……接中左旗界 西北自……至扎部中左翼右旗界 北自……至……接扎部中左末旗界

《遊牧圖》的獨特價值不僅在於其視覺呈現，更在於其詳盡的文字敘述，遊牧圖中的文字描述通常包含以下要素：

1. 具體方位指向：明確標註東、西、南、北及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等八達方位；
2. 自然地標：詳細記錄山川、河流、湖泊、敖包等自然地理特徵；
3. 界線起止點：清晰描述旗界的起點和終點；
4. 接界旗關係：明確標示旗與旗接界之具體地名。

(二)《蒙古游牧記》(以下稱《游牧記》)：

是清朝學者張穆所著的史地名著，全書共十六卷，詳述了從蒙古早期歷史至清道光年間蒙古各部的歷史沿革。書中不僅詳細記載了蒙古各部的歷史發展、地理形勢、會盟地點、朝貢路線，還包括山川河流等自然環境的描述。可惜張穆生前僅完成十二卷，後由學者何秋濤整理補遺，使此書得以完整刊行。此書對後世研究蒙古歷史文化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游牧記》無環旗界之地理及接界旗敘述，但提供東、南、西、北及東北、西北、東南、西南等八方位接界旗及接界地名之標示。由於是八方位的地理接界標示，應足以涵蓋環旗整體之接界狀況。

以賽因諾顏部中右旗為例，該旗在《游牧記》的八至方位敘述如下：

東至推河。接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界。東南同。西至哈喇尼屯呼都克。接右翼中末旗界。北至庫勒賽牙。接中左末旗界。東北至薩拉噶額沁。接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界。西北至庫克嶺。接中左末旗界。西南至莫勒楚克。接右翼中末旗界。

(三)《蒙古志》：

是清末學者姚明輝所著的地理學著作，詳細記錄蒙古各部族地理、沿革、制度與風俗的專書。全書內容涵蓋漠南、漠北蒙古各旗的疆域、世系、軍政與文化特徵，引用大量清代官修資料，體例嚴謹，資料翔實，其著作顯示其對蒙古事務有深入理解。《蒙古志》不僅具地理與民

族誌價值，也是研究清代蒙古及邊疆治理的重要文獻之一。

《蒙古志》以表格方式提供東、南、西、北等四方位的接界旗標示，接界地名沒有標示，且忽略盟旗內各呼圖克圖沙比的接界情形，因此，其能提供各旗方位關係的準確度略顯粗略，且常錯誤。

以三音諾顏部三音諾顏旗為例，該旗在《蒙古志》的四方位的表格如下：

表 1 《蒙古志》三音諾顏旗疆界的四方位表格

旗名	牧地	疆 界			
三音諾顏旗	當鄂爾坤河源	右翼中左旗	左翼右旗	中右翼末旗	右翼中右旗

註：此表格在《蒙古志》原為直行，在此依本論文格式改為橫列。

二、研究方法與校勘流程

(一)、三種文獻的比較分析框架

在進行詳細校勘前，本節建立一個系統性的比較分析框架，用以評估《遊牧圖》、《游牧記》與《蒙古志》三種文獻在記述賽音諾顏部盟旗方位時的異同。這一框架將從描述方式、空間認知模式等的兩個維度展開。

1.描述方式的差異：

三種文獻在記述盟旗方位時採用了不同的描述方式，反映了各自的編纂特點：

- (1) 詳略程度：《遊牧圖》描述最為詳盡，不僅標明方位，還記錄地標、界線的具體走向；《游牧記》與《蒙古志》則相對簡略，多僅註明旗與旗間的接連關係及大致方位。
- (2) 空間定位方式：《遊牧圖》強調「四至八達」的全方位描述，透過自然地標和人文要素構建完整的空間網絡；《游牧記》與《蒙古志》則以接界旗號為主要參照系，空間定位相對抽象。
- (3) 地名記錄的豐富性：《遊牧圖》記載了大量微觀地理單元的名稱，包括小型山川、敖包、牧場等；《游牧記》則記錄接界的地理單元，微觀地名較少。

2.空間認知與呈現模式：

三種文獻反映了清代蒙古地區空間的不同認知與呈現方式：

- (1) 圖文結合的視覺認知：《遊牧圖》透過手繪地圖與文字敘述結合的方式，提供直觀的空間視覺認知，便於理解盟旗間的相對位置關係。
- (2) 線性文本的方位認知：《游牧記》與《蒙古志》採用純文本形式描述方位關係，形成線性的空間認知模式，對微觀地理細節的呈現較為有限。
- (3) 方位系統的差異：《遊牧圖》與《游牧記》採用八方位系統，而《蒙古志》僅採用四方位，

這種差異直接影響了空間定位的精確度與全面性。

通過建立這一比較分析框架，本研究可以更系統地理解三種文獻在記述盟旗方位時的異同，為後續的詳細校勘奠定理論基礎。後續章節將基於此框架，對具體旗的方位記述進行系統校勘和差異分析。

(二)、校勘檢視流程

本研究依以下流程校勘及檢視《遊牧圖》與《游牧記》及《蒙古志》的差異：

1. 以《遊牧圖》手繪總圖的旗界敘述文字為起始，目視檢視圖面各旗方位關係是否跟旗界敘述文字一致。
2. 若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與圖面各旗方位關係不一致，則細部檢視手繪分圖旗界敘述文字以及分圖圖面各旗方位關係，以資校正。
3. 確認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各旗方位關係後，檢視《游牧記》八方位的接界旗名與《遊牧圖》該旗八方位旗名是否一致。由於接界方位有認知的差異，所以方位的判斷，將擴及鄰近兩個方位。比如《游牧記》東北方位為 A 旗，若《遊牧圖》東北或北或東等三個方位有 A 旗，可視為兩者的接界旗方位是一致的。由於《游牧記》及《遊牧圖》均是八方位記述接界旗名，兩文獻的接界旗數應不致落差太大。
4. 檢視《游牧記》後，再檢視《蒙古志》。由於《蒙古志》只有四方位，所以方位的判斷只擴及該方位的兩旁的八方位。比如《蒙古志》東方位為 A 旗，就會去檢視《遊牧圖》東北或東南等兩個方位是否是 A 旗。此檢視的方位誤差廣度與檢視《游牧記》是一致的。由於《蒙古志》只呈現四方位，接界的旗數，必然少於或等於《遊牧圖》及《游牧記》的八方位接界旗數。
5. 記錄校勘的結果，對於方位不一致的原因，進行歸納整理。

參、校勘流程及方式示例

依於前述空間認知模式和描述方式差異，本研究整理了賽音諾顏部 22 旗及額魯特部 2 旗共 24 旗之《遊牧圖》與《游牧記》及《蒙古志》之差異比較，請參考附表 1 至附表 24。以附表 2 之中左末旗為例如下表，依序將《遊牧圖》、《游牧記》及《蒙古志》相關資料填入比較表後，後續即進行校勘程序，校勘過程是以註解方式說明相關的校對及結論。

附表 2 中左末旗：和碩親王旗，扎薩克親王額駙那彥圖旗，《遊牧圖》起迄塔哈山腰。

	《遊牧圖》	《游牧記》 ^{註2-2}	《蒙古志》
東北	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東	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後末旗 ^{註2-1}
東南	中右翼末旗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南	中右旗 右翼末旗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右翼末旗 右翼右後旗
西南	青素珠克圖諾們汗沙比	右翼右後旗 ^{註2-3}	
西	右翼右後旗	清素珠克圖諾門罕 ^{註2-3}	左翼左旗 ^{註2-4}
西北	中左旗	中左旗	
北	中後末旗	中左旗	中左旗

註 2-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中後末旗在正北，《蒙古志》東向方位略過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而標示中後末旗，方位記述有誤差。

註 2-2：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游牧記》八方位缺中右翼末旗、中後末旗、中右旗。

註 2-3：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順時鐘方向由西南至西，順序應是青素珠克圖諾們汗沙比接續是右翼右後旗，所以《游牧記》兩旗方位錯置。

註 2-4：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左翼左旗雖在本旗之西，但與本旗不相連接，中間隔了右翼右後旗，《蒙古志》方位記述有誤差。

從註 2-1 至註 2-4，存在著《游牧記》闕漏三個接界旗的記述及兩旗方位錯置，以及《蒙古志》一個接界旗方位有誤，另一個接界旗卻不相接界的錯誤。

然而在校勘的過程，也看到《遊牧圖》存在一定的疏漏。以右翼後旗為例，其北向方位之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就存在錯誤，如附表 20 之註 20-1。因此，透過嚴謹的校勘檢視流程，才能檢視出這樣的錯誤。

附表 20 右翼後旗：一等台吉，扎薩克台吉孟克瓦奇爾連旗，《遊牧圖》起迄鄂多斯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北	中末旗	中末旗	
東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東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南	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末旗 ^{註20-2}
西南	中後末旗	中後末旗	
西	中左旗	中後末旗	中後末旗
西北	扎部中左翼右旗	中左旗	
北	扎部中左末旗 ^{註20-1}	札部中左翼右旗	扎部中左翼右旗

註 20-1：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有誤，應為扎部中左翼末旗，扎部無中左末旗。檢視手繪總圖中末旗旗界敘述文字，中末旗西北為扎部中左翼末旗，而中末旗在本旗之東北，彼此相互檢視，本旗之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有誤。

註 20-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中末旗在東北，東南為右翼前旗、南為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西南為中後末旗。《蒙古志》方位記述有誤。

本研究採用的表格比對法不僅展示了不同文獻間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系統性校勘錯誤的方法。通過八方位的精細分析，能夠發現諸如方位錯置、遺漏、與地理實際不符等問題，從而為建立更準確的清代蒙古地區行政區劃提供了修正基礎。特別是針對《蒙古志》中常見的方位偏差和《游牧記》中的錯置現象，這種比對方法能夠有效識別並提出更合理的解釋。

肆、校勘結果整理

本節將系統性地呈現《遊牧圖》、《游牧記》及《蒙古志》三部文獻的校勘結果。首先，分別針對三部文獻的內容進行校勘整理，清楚標明各自存在的問題與特點；其次，比較《遊牧圖》與《游牧記》、《蒙古志》之間的差異，按照缺漏記述、順序錯置、旗名不符、方位誤記等類別分條列出。讀者可透過附表參照各旗具體情況，並藉由表中註釋了解詳細校勘過程及考證依據。

一、《遊牧圖》《游牧記》《蒙古志》各自內容校勘整理

(一) 有關《遊牧圖》的部分

1. 各旗起迄點皆相合且皆順時針敘述。除了可依據分圖旗界敘述文字比對外，亦可透過手繪

總圖目視方位校勘。起迄點為山者有 12 旗、為鄂博者有 7 旗，其他地名者有 5 旗。

2. 八方位皆有敘述者雖僅附表 20 之右翼後旗，然而各旗界敘述文字皆順時鐘敘述，且起迄點相合，還是可以了解各接界旗的大略方位；另外，再根據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可以更精準確認接界旗的方位。
3. 手繪總圖右翼後旗旗界敘述文字有關北向方位的接界旗是錯誤的。依其敘述，該旗北向方位接界扎部無中左末旗，然而扎部無此旗名，經校勘校正，應為扎部中左翼末旗之誤植，詳見附表 20 之註 20-1。

(二) 有關《游牧記》的部分

特定方位缺漏記述：中右旗缺南向方位的記述，請詳參附表 4 中右旗之註 4-4；另外中末旗缺東北方位之記述，請詳參附表 7 中末旗之註 7-2。

(三) 有關《蒙古志》的部分

1. 特定方位缺漏記述：中後旗西向方位敘述空白，沒有標接界旗名，請詳參附表 11 中後旗之註 11-4。
2. 查無標示之旗名，可能誤植：右翼右後旗東向方位接界右翼中後旗，然而賽因諾顏部並無右翼中後旗，是否是右翼中末旗之誤？請詳參附表 3 右翼右後旗之註 3-2。

二、《遊牧圖》與《游牧記》《蒙古志》兩文獻差異的比較

- (一)《游牧記》與《遊牧圖》相比較，八方位缺部分接界旗記述：附表1 三音諾顏旗、附表2 中左末旗、附表3 右翼右後旗、附表4 中右旗、附表5 中前旗、附表6 中左旗、附表11 中後旗、附表12 左翼左旗、附表22 中右翼末旗、附表24 額魯特前旗。
- (二)《游牧記》與《遊牧圖》相比較，部分接界旗順序錯置：附表2 中左末旗。
- (三)《游牧記》與《遊牧圖》相比較，接界之旗名與本旗實不相接壤：附表6 中左旗、附表8 右翼中左旗、附表12 左翼左旗、附表23 額魯特旗。
- (四)《游牧記》與《遊牧圖》相比較，方位記述存在差異：附表10 右翼前旗、附表11 中後旗。
- (五)《蒙古志》因不記述與各呼圖克圖沙比接界而造成所標示之接界旗方位誤差：附表1 三音諾顏旗、附表2 中左末旗、附表4 中右旗、附表19 右翼中右旗、附表22 中右翼末旗。

(六)《蒙古志》與《遊牧圖》相比較，方位記述存在差異：附表10 右翼前旗、附表11 中後旗、附表13 左翼中旗、附表15 左翼左末旗、附表20 右翼後旗、附表22 中右翼末旗、附表24 額魯特前旗。

三、校勘整理總結

經過《遊牧圖》、《游牧記》與《蒙古志》三種文獻的個別校勘整理，本研究發現各文獻在記載品質上有明顯差異。《遊牧圖》記述最為系統完整，各旗均以順時針方式敘述，起迄點相合，並提供手繪總圖輔助校勘，僅右翼後旗北向接界旗有誤植現象。而《游牧記》則存在特定方位缺漏問題，如中右旗缺南向、中末旗缺東北方位的記述。《蒙古志》同樣出現方位缺漏情形，如中後旗西向方位空白，且有旗名可能誤植的問題，如右翼右後旗東向所記「右翼中後旗」實屬可疑。至於《遊牧圖》、《游牧記》與《蒙古志》三種文獻的詳細校勘比對，本研究發現各文獻在旗界記載上存在多處差異。《遊牧圖》以順時針方式完整記述各旗界，並提供手繪總圖可供視覺校對，整體記述較為完整。而《游牧記》與《蒙古志》則存在方位缺漏、旗名誤植、順序錯置等問題。此外，由於《蒙古志》未記述與各呼圖克圖沙比的接界關係，導致部分方位產生誤差。這些差異顯示出不同文獻間的承襲與演變關係，並為建構清代蒙古地區空間布局提供重要參照。

伍、研究意義與局限

一、研究意義

本研究以《遊牧圖》為基準，系統化校勘《游牧記》及《蒙古志》兩種文獻中關於賽音諾顏部盟旗方位的記述，具有以下學術意義：

1.文獻校勘與整理：

通過表格對比的方式，系統識別三種重要文獻在盟旗方位記述上的差異與訛誤，為清代蒙古地區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文獻基礎。這種校勘工作不僅澄清了現有文獻中的混淆之處，也為後續相關文獻的整理提供了方法論參考。

2.歷史地理空間重構：

本研究通過對比手繪地圖與文獻記述，嘗試重構清代賽音諾顏部 22 旗及附額魯特 2 旗的空間分布與方位關係，為理解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空間布局提供了具體案例。

二、研究局限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

1.文獻時間差異：

《遊牧圖》、《游牧記》及《蒙古志》三種文獻成書年代存在差異，可能反映了不同時期蒙

古盟旗空間布局的變化，而非純粹的文獻訛誤。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討這種時間差異的影響。

2. 文獻編纂目的差異：

三種文獻的編纂目的與記錄重點不同，可能導致方位記述的差異。這些差異在賽音諾顏部諸旗中普遍存在，反映了不同文獻編纂目的與記錄精度的差異。《遊牧圖》作為清朝官方測繪的地理文件，其文字敘述更注重邊界的具體走向和地標指認，提供了較為精確的空間框架；而《游牧記》和《蒙古志》則因學者自我整理及撰述，其資料來源及資料檢視不若官方行政。本研究雖已注意到這一點，但未能深入分析這種編纂目的差異對方位記述的具體影響。

3. 游牧社會的流動性：

蒙古盟旗作為游牧社會的行政單位，其邊界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模糊性，不同於漢地明確的城垣界限。本研究試圖通過文獻校勘建立清晰的盟旗方位關係，但可能未能充分反映游牧社會空間組織的這一特性。

陸、結論

本研究以《遊牧圖》為基準，透過系統化校勘比較《游牧記》及《蒙古志》兩種重要文獻關於賽音諾顏部盟旗方位的記述，完成了 22 旗及附額魯特 2 旗共 24 個旗的詳細校勘工作。經由嚴謹的表格對比分析，本研究獲得以下幾點重要結論：

首先，《遊牧圖》作為集圖像與文字於一體的資料，在記述質量上明顯優於其他兩種文獻。其特點在於採用完整的八方位系統，順時針敘述各旗疆域，並以具體地標、敖包、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徵作為界線指標，為清代蒙古地區空間布局提供了最為可靠的一手資料。儘管如此，本研究仍發現《遊牧圖》存在個別錯誤，如右翼後旗北向接界旗的誤植，這顯示即使最精確的文獻也並非完全無誤。

其次，本研究所建立的表格比對校勘方法不僅識別出文獻間的差異，更具有方法論上的創新價值。這種方法通過八方位的精細分析，系統歸納出文獻中常見的錯誤類型：方位缺漏、順序錯置、旗名誤植及方位判斷偏差。這種類型化的錯誤分析為未來類似文獻的校勘工作提供了範式參考。

再者，本研究所進行的校勘工作超越了單純的文本考證，揭示了清代官方對蒙古地區空間認知的多元視角。文獻間的差異不僅反映了記錄精度的不同，也可能反映了游牧社會空間組織的流動性特徵。因此，在理解清代蒙古盟旗制度時，需要將文獻材料置於其特定的歷史脈絡中考量。

最後，通過本研究的系統校勘，重建清代賽音諾顏部盟旗的空間布局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文獻基礎。這種文獻校勘與整理不僅有助於澄清現有文獻中的訛誤與混淆，更為深入研究清代蒙古地區的歷史地理、行政制度與民族關係奠定了堅實基礎。

展望未來，本研究的方法與發現可擴展至其他蒙古盟旗的研究，通過更廣泛的文獻校勘比較，建立完整的清代蒙古地區空間布局圖景。同時，這些文獻校勘結果是否能與現代地理信息

系統(GIS)技術結合，以期實現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數字化重建，為歷史地理研究開闢新的路徑。

參考文獻

- [1] 張穆，《蒙古游牧記》 台北：蒙藏委員會，民70年。
- [2] 姚明輝，《蒙古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民57。
- [3] 烏雲畢力格編輯、那順達來釋讀，《蒙古游牧圖：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手繪蒙古游牧圖及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附錄：賽音諾顏部 22 旗及附額魯特 2 旗盟旗方位校勘表

附表 1 三音諾顏旗：和碩親王旗，《游牧圖》起迄哈達圖山。

	《游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前旗	右翼中左旗 ^{註1-1}	
東	右翼中左旗	右翼中左旗	右翼中左旗
東南	土部後路左翼後旗	左翼右旗	
南	左翼右旗	左翼右旗	左翼右旗
西南	額爾德尼默爾根諾顏呼圖克圖沙比	左翼右旗 ^{註1-2}	
西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地	中右翼末旗 ^{註1-3}
西北		中右翼末旗	
北	中右翼末旗 右翼中右旗	右翼中右旗 ¹	右翼中右旗

註 1-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東北方位接界中前旗，但《游牧記》北、東北、東均無接界中前旗，《游牧記》八方位缺中前旗。

註 1-2：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西南方位接界額爾德尼默爾根諾顏呼圖克圖沙比，但《游牧記》南、西南、西均無接界額爾德尼默爾根諾顏呼圖克圖之沙比，《游牧記》八方位缺額爾德尼默爾根諾顏呼圖克圖之沙比。

註 1-3：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中右翼末旗應在西北或北，正西應為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蒙古志》西向方位因略過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而標示中右翼末旗，記述有誤。

附表 2 中左末旗：和碩親王旗，《遊牧圖》起迄塔哈山腰。

	《遊牧圖》	《游牧記》 ^{註2-2}	《蒙古志》
東 北	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東	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後末旗 ^{註2-1}
東南	中右翼末旗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南	中右旗 右翼末旗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右翼末旗 右翼右後旗
西南	青素珠克圖諾們汗沙比	右翼右後旗 ^{註2-3}	
西	右翼右後旗	清素珠克圖諾門罕 ^{註2-3}	左翼左旗 ^{註2-4}
西北	中左旗	中左旗	
北	中後末旗	中左旗	中左旗

註 2-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中後末旗在正北，《蒙古志》東向方位略過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而標示中後末旗，記述有誤。

註 2-2：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游牧記》八方位缺中右翼末旗、中後末旗、中右旗。

註 2-3：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順時鐘方向由西南至西，順序應是青素珠克圖諾們汗沙比接續是右翼右後旗，所以《游牧記》兩旗錯置。

註 2-4：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左翼左旗雖在本旗之西，但與本旗不相連接，中間隔了右翼右後旗，《蒙古志》方位記述有誤差。

附表 3 右翼右後旗：多羅郡王旗，《遊牧圖》起訖特勒格爾穆倫山腰。

	《遊牧圖》	《游牧記》 ^{註3-1}	《蒙古志》
東 北	中左末旗	中左旗	
東	-青素珠克圖諾們汗 -右翼末旗	清素珠克圖諾們罕	右翼中後旗 ^{註3-2}
東南	右翼中末旗	右翼中末旗	
南	扎部左翼後旗、扎部右翼前旗	右翼中末旗	右翼中末旗
西南	左翼左旗	左翼左旗	
西		左翼左旗	左翼左旗
西北		中左旗	
北	中左旗	中左旗	中左旗

註 3-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游牧記》八方位缺中左末旗、右翼末旗、扎部左翼後旗界及扎部右翼前旗。

註 3-2：賽因諾顏部並無右翼中後旗，是否是右翼中末旗之誤？《蒙古志》記述應是誤植。

附表 4 中右旗：多羅郡王旗，《遊牧圖》起迄庫克達巴哈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左末旗 ^{註4-1}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東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註4-2} 右翼中末旗 ^{註4-2}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三音諾顏旗 ^{註4-3}
東南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南		^{註4-4}	-額濟納土爾扈特旗 -阿拉善額魯特旗
西南		右翼中末旗	
西		右翼中末旗	右翼末旗
西北	右翼末旗	中左末旗 ^{註4-5}	
北	中左末旗	中左末旗	中右翼末旗 ^{註4-6}

註 4-1：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並無東北方位之敘述，而是從東及南起述，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應可為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或中左末旗皆可。檢視中左末旗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其南接界中右旗。另依手繪總圖北向方位敘述，接中左末旗且終點為庫克達巴哈山，與本旗東及南方位起述的起點相合。因此，本旗東北接界中左末旗，應不失精準。因此，此處補標示中左末旗。

註 4-2：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自西北方位才有明確敘述，東、東南、西南、西等方位之敘述為「東及南自……接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游牧界；由南沿……接右翼中末旗界」。

註 4-3：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三音諾顏旗雖在本旗之東，但不接壤，中間有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蒙古志》記述有誤。

註 4-4：《游牧記》八方位缺南向方位的記述。

註 4-5：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為「西北自莫霍尔特格里山至庫德固尔達巴哈山，接右翼末旗界；北自…至…接中左末旗界」。《游牧記》之西、西北、北等方位皆不見右翼末旗。《游牧記》八方位缺右翼末旗。

註 4-6：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中右翼末旗在本旗之東北，但不接壤，中間有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蒙古志》記述有誤。

附表 5 中前旗：多羅貝勒旗，《遊牧圖》起迄哈勒占達巴哈鄂博。

	《遊牧圖》	《游牧記》 ^{註5-2}	《蒙古志》
東 北	土部土謝圖汗旗	額魯特旗	
東	土部右翼右旗	土部右翼右旗	土部右翼右旗
東南	土部左翼後旗	土部左翼後旗	
南	右翼左末旗 ^{註5-1}	土部左翼後旗	土部左翼後旗
西南		土部左翼後旗	
西	右翼中左旗 三音諾彥旗 右翼中右旗	右翼左末旗	右翼左末旗
西北	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	右翼中右旗	
北	額魯特旗	額魯特旗	額魯特旗

註 5-1：依手繪總圖旗界文字敘述，無西南向之敘述，其南向敘述後，接續是西向之敘述。

註 5-2：依手繪總圖旗界文字敘述及圖面方位關係，順時鐘方向自西南至北，右翼左末旗、右翼中左旗、三音諾彥旗、右翼中右旗、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額魯特旗。《游牧記》八方位缺右翼中左旗、三音諾彥旗、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

附表 6 中左旗：多羅貝勒旗，《遊牧圖》起迄布克德肯秀古蘭古庫庫納。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右翼後旗	右翼末旗 ^{註6-2}	
東	中後末旗	中後末旗	中後末旗
東南	中左末旗	中左末旗	
南	右翼右後旗	中左末旗 ^{註6-3}	中左末旗
西南	左翼左旗	中後旗	
西	中後旗	右末旗	右末旗
西北	右末旗 ^{註6-1}	札部中右翼末旗	
北	扎部參贊 xx 巴彥濟爾噶勒旗 ^{註6-1} 1	右翼後旗	右翼後旗

註 6-1：依手繪總圖旗界文字敘述，無北向之敘述，而是從西北向開始敘述，其敘述終點為布克德肯秀古蘭古庫庫納，為東北向敘述之起點，起迄相合，故該敘述應包含西北向及北向。

註 6-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右翼末旗在本旗南方且相隔太遠，中間隔有其他旗。《游牧記》記述有誤，疑誤植。

註 6-3：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中左末旗順時鐘方向至中後旗(東南至西)，中間尚有右翼右後旗及左翼左旗。《游牧記》八方位缺右翼右後旗及左翼左旗。

附表 7 中末旗：鎮國公旗，《遊牧圖》起迄霍普多布格哩克(山)鄂博。

	《遊牧圖》 ^{註7-1}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土部右翼左旗	^{註7-2}	
東		土部右翼左旗	土部右翼左旗
東南	左翼中旗	土部右翼左旗	
南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西南		右翼後旗	
西	右翼後旗	右翼後旗	右翼後旗
西北	扎部中左翼末旗	札部中左翼末旗	
北		札部中左翼末旗	扎部中左翼末旗

註 7-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敘述，缺東向、西南向、北向之敘述。但其東北向敘述之起點為霍普多布格哩克(山)鄂博，西北向敘述之終點亦為霍普多布格哩克(山)鄂博，起迄相合，因此，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雖只有 5 方位，但應包含整體旗界比鄰狀況。

註 7-2：《游牧記》無東北方位之記述。

附表 8 右翼中左旗：輔國公旗，《遊牧圖》起迄察罕庫圖勒。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前旗 ^{註8-1}	中前旗	
東	右翼左末旗	右翼左末旗	右翼左末旗
東南	土部左翼後旗	土部左翼後旗	
南	三音諾彥旗	土部左翼後旗	土部左翼後旗
西南		左翼右旗 ^{註8-2}	
西		三音諾顏旗	三音諾顏旗
西北		三音諾顏旗	
北	右翼左末旗	三音諾顏旗	三音諾顏旗

註 8-1：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可為中前旗。檢視中前旗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其西接界右翼中左旗。另依分圖目視方位之西北方位之旗界敘述文字之終點為察罕庫圖勒，為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之起點，起迄相合，連界之旗為貝勒棟都布章禪旗，此旗為中前旗。因此，此處補標示中前旗。

註 8-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左翼右旗在本旗之南或西南，但不相接界。《游牧記》記述有誤。

附表 9 右翼末旗：輔國公旗，《遊牧圖》起迄庫德固爾達巴山。

	《遊牧圖》 ^{註9-1}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右旗	中右旗	
東	右翼中末旗	右翼中末旗	右翼中末旗
東南		右翼中末旗	
南	右翼右後旗	瀚海 ^{註9-2}	隔沙漠接額濟 納部 ^{註9-2}
西南	清蘇珠克圖諾們罕沙比 界	右翼右後旗	
西		清素珠克圖諾們罕	右翼右後旗
西北		中左末旗	
北		中左末旗	中左末旗

註 9-1：依手繪總圖敘述文字，只有南向方位是明確的，但起迄皆庫德固爾達巴山，因此，相關連界各旗應是完整環繞旗界。

註 9-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旗南接鄰瀚海，《游牧記》《蒙古志》暫可確認。

附表 10 右翼前旗：輔國公旗，《遊牧圖》起迄哈勒達爾托羅海。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北	左翼中旗 ^{註10-1}	左翼中旗	
東	土部右翼左旗 土部左翼前旗	額魯特前旗 ^{註10-2}	額魯特前旗 ^{註10-2}
東南	額魯特前旗	額魯特前旗	
南	左翼左末旗	左翼左末旗	左翼左末旗
西南	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西	右翼後旗	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右翼後旗
西北		右翼後旗	
北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註 10-1：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土部或左翼中旗皆可是本旗連界之旗，且檢視左翼中旗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其南或西南界接右翼前旗。另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的北向方位敘述終點為哈勒達爾托羅海，與起點相合，並連界左翼中旗，因此，本旗東北接界左翼中旗，應不失精確，在此補標示左翼中旗。

註 10-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額魯特前旗在本旗正南，正東為土部，《游牧記》及《蒙古志》方位記述有誤。

附表 11 中後旗及烏里雅蘇台：輔國公旗，《遊牧圖》起迄塔爾巴哈台山。

	《遊牧圖》 ^{註11-1}	《游牧記》 ^{註11-3}	《蒙古志》
東 北	中左旗	中左旗	
東	左翼左旗 那蘭呼圖克圖	左翼左旗	左翼左旗
東南	扎薩克圖汗旗	左翼左旗	
南	那魯班禪	那魯班禪呼圖克圖	左翼左旗
西南	那魯班禪呼圖克圖 扎薩克圖汗旗	那魯班禪呼圖克圖	
西	扎部右翼後旗	那魯班禪呼圖克圖 ^{註11-2}	註11-4
西北	扎部左翼左旗	烏里雅蘇台	
北	扎部伊拉古克散呼圖克圖沙比界	中左旗	中左旗

註 11-1：《遊牧圖》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之標題為中後旗及烏里雅蘇台。

註 11-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那魯班禪呼圖克圖應在南(亦非西南)，絕非在西，西應是扎部。《游牧記》方位記述有誤。

註 11-3：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本旗順時方向自南而東北，接界相當多的扎部各旗。《游牧記》八方位缺三個扎部各旗。

註 11-4：《蒙古志》西向方位敘述空白，沒有標接界旗名。

附表 12 左翼左旗：輔國公旗，起迄哈查布齊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註12-3}	《蒙古志》
東 北	中左旗 ^{註12-1}	右翼右後旗	
東	右翼右後旗	右翼右後旗	右翼右後旗
東南	扎部右翼前旗	右翼右後旗	
南	扎薩克圖汗旗	右翼右後旗	右翼右後旗
西南		那魯班禪呼圖克圖 ^{註12-2}	
西	那蘭呼圖克圖沙比	中後旗	中後旗
西北	中後旗	中後旗	
北	中左旗	中左旗	中左旗

註 12-1：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可為中左旗，且檢視中左旗手繪總圖文字，其西南界接左翼左旗。另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的北向方位敘述終點為哈查布齊山，與起點相合，並連界中左旗，因此，本旗東北接界中左旗，應不失精確，在此補標示中左旗。

註 12-2：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那魯班禪呼圖克圖雖在本旗之西南，但不接界。《游牧記》方位記述有誤。

註 12-3：《游牧記》少了扎部二旗及那蘭呼圖克圖沙比。

附表 13 左翼中旗：一等台吉，起迄布爾敦溫都爾山鄂博。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末旗 ^{註13-1}	中末旗	
東	土部右翼左旗	土部右翼左旗	土部左翼左旗 ^{註13-2}
東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西南		右翼前旗	
西	右翼後旗	右翼後旗	右翼後旗
西北		右翼後旗	
北	中末旗	中末旗	中末旗

註 13-1：手繪總圖旗界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東北可為中末旗，且檢視中末旗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其南或西南界接左翼中旗。另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的北向方位敘述終點為布爾敦溫都爾山鄂博，與起點相合，並連界中末旗，因此，本旗東北接界中末旗，應不失精確，在此補標示中末旗。

註 13-2：《蒙古志》記述有誤，應是土部右翼左旗誤植為土部左翼左旗。

附表 14 左翼右旗：一等台吉，起迄特布什引哈什滾鄂博。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三音諾彥親王旗 ^{註14-1} 、土部左翼後旗 ^{註14-1}	土部左翼後旗	
東	土部左翼後旗	土部左翼後旗	土部左翼後旗
東南	阿拉善親王旗 ^{註14-2}	土部左翼後旗	
南	伊薩哩	烏喇特前旗 ^{註14-2}	內蒙古烏喇 ^{註14-2} 特前旗
西南		瀚海 ^{註14-2}	
西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沙漠 ^{註14-2}
西北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北	三音諾彥親王旗	賽音諾顏旗	三音諾顏旗

註 14-1：手繪總圖旗界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而是從東向方位起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東北可為三音諾彥親王旗或土部左翼後旗。另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的北向方位敘述終點為特布什引哈什滾鄂博，與起點相合，並連界三音諾彥親王旗，因此，本旗東北接界三音諾彥親王旗或土部左翼後旗，應不失精確，在此補標示三音諾彥親王旗或土部左翼後旗。

註 14-2：依手繪總圖旗界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本旗已在賽因諾顏部之最南部，已臨瀚海、沙漠接界內蒙各部落。

附表 15 左翼左末旗：一等台吉，《遊牧圖》起迄準達巴哈。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右翼前旗 ^{註15-1}	右翼前旗	
東	額魯特前旗	額魯特前旗	內蒙古阿魯特前旗 ^{註15-2}
東南		額魯特前旗	
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額魯特前旗 ^{註15-3}
西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西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右翼前旗
西北	右翼前旗		
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註 15-1：手繪總圖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而是從東向方位起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東北可為右翼前旗，且檢視右翼前旗手繪總圖文字，其南接界左翼左末旗。另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的西及北向方位敘述終點為準達巴哈，與起點相合，並連界右翼前旗，因此，本旗東北接界右翼前旗，應不失精確，在此處補標示右翼前旗。

註 15-2：本旗離內蒙古甚遠，與內蒙古不相接界。《蒙古志》記述有誤。

註 15-3：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額魯特前旗在正東，正南為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蒙古志》方位記述有誤。

附表 16 右翼中末旗：一等台吉，起迄莫霍爾特格里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右旗	中右旗	
東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註16-2}	中右旗	中右旗
東南		瀚海 ^{註16-2}	
南 ^{註16-1}	扎部扎薩克任貝子銜雲敦多爾濟旗 ^{註16-2}	瀚海 ^{註16-2}	隔沙漠接額濟納部 ^{註16-2}
西南	右翼右後旗	札部左翼後旗 右翼右後旗	
西		右翼末旗	右翼末旗
西北	右翼末旗	右翼末旗	
北		右翼末旗	右翼末旗

註 16-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唯一明確標示方位之敘述為南向方位，且起迄皆莫霍爾特格里山。因此，南向方位敘述前提及之連界各旗，俱歸東北、東、東南之區塊，不做細分；南向方位敘述之後提及之連界各旗，亦具歸西南、西、西北、北之區塊，亦不做細分。

註 16-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本旗東南之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扎部扎薩克任貝子銜雲敦多爾濟旗(札部左翼後旗)、連界內蒙之沙漠、瀚海，不易辨識確切分界。暫認可《游牧記》及《蒙古志》之標示。

附表 17 右翼左末旗：一等台吉，起迄察罕庫圖勒。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前旗	中前旗	
東		中前旗	中前旗
東南		中前旗	
南 ^{註17-1}	右翼中左旗	土部左翼後旗	土部左翼後旗
西南		右翼中左旗	
西		右翼中左旗	右翼中左旗
西北		右翼中左旗	
北		右翼中左旗	右翼中左旗

註 17-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唯一明確標示方位之敘述為南向方位，且起迄皆察罕庫圖勒。因此，南向方位敘述前提及之連界各旗，俱歸東北、東、東南之區塊，不做細分；南向方位敘述之後提及之連界各旗，亦具歸西南、西、西北、北之區塊，亦不做細分。

附表 18 右末旗：一等台吉，扎薩克台吉巴爾瓦拉克察旗，起迄準諾爾之桑圖鄂博。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左旗	中左旗	
東		中左旗	中左旗
東南		中左旗	
南 ^{註18-1}	扎部伊拉古克散呼圖克圖	中後旗 ^{註18-2}	中後旗 ^{註18-2}
西南	沙比	烏里雅蘇台 ^{註18-2}	
西	扎部中右翼末次旗 扎部中左翼左旗 ^{註18-3}	札部中右翼末次旗	扎部中右翼 末次旗
西北	扎部右翼右末旗 ^{註18-3}	札部中右翼末次旗	
北	扎部中左翼右旗 ^{註18-3}	札部中右翼末次旗	扎部中右翼 末次旗

註 18-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唯一明確標示方位之敘述為南向方位，且起迄皆準諾爾之桑圖鄂博。因此，南向方位敘述前提及之連界各旗，俱歸東北、東、東南之區塊，不做細分；南向方位敘述之後提及之連界各旗，亦具歸西南、西、西北、北之區塊，亦不做細分。

註 18-2：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雖不包含烏里雅蘇台及中後旗，但依手繪總圖方位目視，烏里雅蘇台、中後旗，中左旗、右末旗交會於一頂點，暫認可《游牧記》及《蒙古志》之標示。

註 18-3：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扎部中右翼末次旗、扎部中左翼左旗、扎部右翼右末旗、扎部中左翼右旗，匯聚在本旗之西至西北方位。暫認可《游牧記》及《蒙古志》之標示。

附表 19 右翼中右旗：一等台吉，起迄奎屯達巴哈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前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東		中前旗	中前旗
東南		賽音諾顏旗	
南 ^{註19-1}	中右翼末旗	賽音諾顏旗	三音諾顏旗
西南		賽音諾顏旗	
西		中右翼末旗	中右翼末旗
西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額魯特旗 ^{註19-2}

註 19-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唯一明確標示方位之敘述為南向方位，且起迄皆奎屯達巴哈山。因此，南向方位敘述前提及之連界各旗，俱歸東北、東、東南之區塊，不做細分；南向方位敘述之後提及之連界各旗，亦具歸西南、西、西北、北之區塊，亦不做細分。

註 19-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額魯特旗雖在本旗東北，但不接界，中間隔有中前旗。《蒙古志》記述有誤。

附表 20 右翼後旗：一等台吉，《遊牧圖》起迄鄂多斯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中末旗	中末旗	
東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左翼中旗
東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末旗 ^{註20-2}
西南	中後末旗	中後末旗	
西	中左旗	中後末旗	中後末旗
西北	扎部中左翼右旗	中左旗	
北	扎部中左末旗 ^{註20-1}	扎部中左翼右旗	扎部中左翼右旗

註 20-1：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有誤，應為扎部中左翼末旗，扎部無中左末旗。檢視本旗東北方位的中末旗，其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中末旗西北為扎部中左翼末旗，而中末旗在本旗之東北，彼此相互檢視，可知本旗之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有誤。

註 20-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中末旗在東北，東南為右翼前旗、南為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西南為中後末旗。《蒙古志》方位記述有誤。

附表 21 中後末旗：一等台吉，《遊牧圖》起迄珠索朗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右翼後旗	
東		右翼後旗	右翼後旗
東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南 ^{註21-1}	中左末旗	中左末旗	中左末旗
西南	中左旗	中左旗	
西		中左旗	中左旗
西北		中左旗	
北	右翼後旗	中左旗及右翼後旗	中左旗及右翼後旗

註 21-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唯一明確標示方位之敘述為南向方位，且起迄皆珠索朗山。因此，南向方位敘述前提及之連界各旗，俱歸東北、東、東南之區塊，不做細分；南向方位敘述之後提及之連界各旗，亦具歸西南、西、西北、北之區塊，亦不做細分。

附表 22 中右翼末旗：一等台吉，《遊牧圖》起迄和勒扎爾達巴哈山。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沙比 ^{註22-1}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東	右翼中右旗	右翼中右旗	右翼中右旗
東南	^{註22-2}	賽音諾顏旗	
南	三音諾顏親王旗	賽音諾顏旗	三音諾顏旗
西南	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 克圖沙比	賽音諾顏旗 ^{註22-2}	
西	中左末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註22-2}	三音諾顏旗 ^{註22-3}
西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註22-2}	
北	扎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沙比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後末旗 ^{註22-4}

註 22-1：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明確方位記述僅東、南、北三個方位。北向方位敘述連界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且終點為和勒扎爾達巴哈山，與東向方位敘述的起點一致，起迄相合，因此，本旗東北方位連界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應不失精準，在此處補標示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

註 22-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順時鐘方向由南至北，依序為三音諾顏旗、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中左末旗、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且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本旗西向方位應連界中左末旗。《游牧記》八方位缺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中左末旗。

註 22-3：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三音諾顏旗在正南偏東南，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在正南偏西南，正西為中左末旗。《蒙古志》記述方位失之過遠。

註 22-4：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中後末旗雖在本旗西北，但不接界，中間隔有中左末旗及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沙比。《蒙古志》記述有誤。

附表 23 額魯特旗(附)：固山貝子旗，《遊牧圖》起迄阿喇勒華鄂博。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額魯特前旗 ^{註23-1} 、土謝圖汗旗 ^{註23-1}	額魯特前旗	
東	土謝圖汗旗	土謝圖汗旗	土謝圖汗旗
東南	中前旗	土部左翼後旗 ^{註23-2}	
南	中前旗	中前旗	中前旗
西南		中前旗	
西	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	中前旗	中前旗
西北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北	額魯特前旗	額魯特前旗	額魯特前旗

註 23-1：手繪總圖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而是從東向方位起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東北可為額魯特前旗或土謝圖汗旗。另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的北向方位敘述接界額魯特前旗，終點為阿喇勒華鄂博，與東向方位敘述之起點相合，因此，本旗東北接界額魯特前旗或土謝圖汗旗，應不失精確，在此處補標示額魯特前旗或土謝圖汗旗。

註 23-2：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土部左翼後旗雖在本旗東南但不接界，中間隔有中前旗、土謝圖汗旗、土部右翼右旗，相去甚遠。《游牧記》記述有誤。

附表 24 額魯特前旗(附) 固山貝子旗，《遊牧圖》起迄莫多圖溫都爾合瑪胡薩哈勒圖溫都爾鄂博。

	《遊牧圖》	《游牧記》	《蒙古志》
東 北	右翼前旗 ^{註24-1} 、土部右翼左旗 ^{註24-1}	土部右翼左旗 ^{註24-3}	
東	土部左翼前旗	土謝圖汗旗 ^{註24-4}	額魯特旗 ^{註24-5}
東南	土謝圖汗旗	土謝圖汗旗	
南	額魯特旗 ^{註24-2}	額魯特旗	額魯特旗
西南	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	札牙班第達呼圖克圖	
西	左翼左末旗	左翼左末旗	左翼左末旗
西北		右翼前旗	
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右翼前旗

註 24-1：手繪總圖文字原無東北方位記述，而是從東向方位起述，但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東北可為右翼前旗或土部右翼左旗。另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的北向方位敘述接界右翼前旗，終點為莫多圖溫都爾合瑪胡薩哈勒圖溫都爾鄂博，與東向方位敘述之起點相合，因此，本旗東北接界右翼前旗或土部右翼左旗，應不失精確，在此處補標示右翼前旗或土部右翼左旗。

註 24-2：敘述兩個地理界接同一旗。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南自阿喇勒華鄂博至額爾坤河，接額口魯特旗界；正南自額爾坤河至哈喇圖山，仍接口魯特旗界」。

註 24-3：依手繪總圖圖面方位關係，土部右翼左旗在本旗東北，似接界似不接界，難以分辨，但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未提接界土部右翼左旗。

註 24-4：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本旗之東界應接土部左翼前旗。《游牧記》八方位缺土部左翼前旗。

註 24-5：依手繪總圖旗界敘述文字及圖面方位關係，東及東南皆接界土部，額魯特在正南。《蒙古志》記述方位失之過遠。

清乾隆年間朴仔籬番界的變遷及界外地土牛角的開墾

池永歆*

摘要

清官方於乾隆26年1月年間設立朴仔籬番界，並興築土牛與界溝，以實踐官方的族群政治理念。「岸裡大社文書」中留存多份文本，論及朴仔籬的土牛界溝的興築與修繕；這是當前最具體地論及土牛界溝的文獻。本研究行文中，將首先論及朴仔籬土牛界溝的設立以及該番界的變遷；其次，將根據相關文本，探討土牛溝外的界外地土牛角的開墾過程。期能經由本研究的闡述，以呈顯出該區域所深蘊的地方性。

關鍵詞：朴仔籬番界、土牛角、界外地、地方性

* 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任教授。通訊作者：通訊作者：池永歆，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E-mail：james@mail.ncyu.edu.tw。

The change of Poaly Aboriginal Boundary and the land reclamation of out-of-bounds Tuniu-jiao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in Qing dynasty

Yeong-Shin Chyr**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乾隆】 in Qing dynasty, the Qing official set up aboriginal boundary and built *Tu-niu Ditch*【土牛溝】 in *Poaly*【朴仔籬】 region, so as to achieve Qing dynasty's ethic politics ideas.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Archive of An-li-she 【岸理文書】 to study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 of the Aboriginal Boundary, and then to discuss the land reclamation of the out-of-bounds *Tuniu-jiao* 【土牛角】。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minate the placeness of *Tuniu-jiao* region.

Keywords : Poaly Aboriginal Boundary (朴仔籬番界), Tuniu-jiao (土牛角), out-of-bounds (界外地)、placenes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眾多的文化群體，曾在台灣這片土地空間上創造了許多地方或地理區，而其文化則賦予了這些地方深刻的歷史性意義。因此，研究者可由地方而探尋到在時間的進程中，所蘊含之社會關係的互動過程。對於這些地方或地理區的研究，常是深具歷史面向之區域研究的關注處；而此類的研究，在資料的收集、分析以及詮釋的觀點上，常跨越歷史學與地理學這兩門學科邊界，以地理學的學術範疇而言，可視之為歷史面向的區域地理或區域史研究，隸屬於廣義的歷史地理學探究。本研究特稱其為地方歷史或地方史（history of place）的研究。當然地方歷史呈顯的特殊性，即是地方本質或特質的展現。這種研究取向，一直受到地理學的區域研究所重視。

本文所要論及的朴仔籬番界外土牛角土地空間，在史料上被通稱為「鹿皮小米餉」埔地¹。「鹿皮小米餉」的徵收，始自屋鑿等社於乾隆 31 年（1766）歸化清朝起²。岸裡社通事潘敦為籌措屋鑿等社的餉稅，而在土牛溝外以權宜的方式，設置「鹿皮小米餉」埔地³，隨後並招漢佃進行墾闢，曾引發一連串的爭議事件。自此該埔地景觀產生改變，並被賦予獨特的地方史的意涵。由「鹿皮小米餉」埔地所引發的爭議，交織著岸裡社群、屋鑿等社、入墾漢人與官方間的互動，而通事潘敦也難脫與漢佃勾結之嫌，這些皆刻劃出該埔地空間所深蘊的歷史性，展現其獨特的地方歷史內涵⁴。

自 1990 年起，曾有數位學者在其論著中，運用不同的觀點論及屋鑿等社的歸化與「鹿皮小米餉」埔地⁵；該些研究成果，部分專注專題式的探討，有些偏向歷史學的敘述。本論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將更廣泛地運用「岸裡大社文書」的文本，將其回置於孕育這些事件的空間中，探究「鹿皮小米餉」埔地所深蘊的歷史性（historicity），以之再現（represent）該區域的地方歷史【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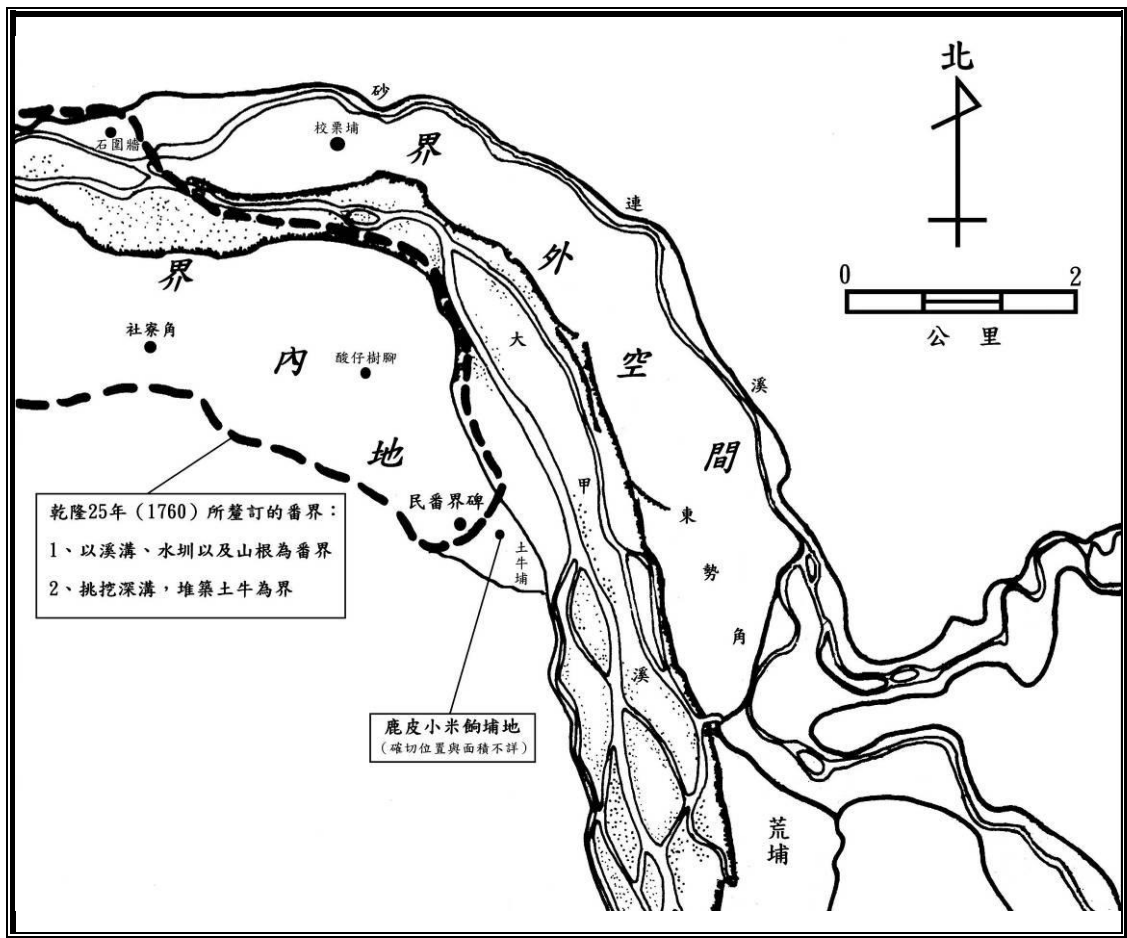
¹ 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頁 93。

² 內文的強調標記，若無特別說明，均為本研究所自行添加。、以乾隆 2 年（1737）起，「改則額徵社餉，改照民丁例，每丁徵銀貳錢」而推算，可獲悉屋鑿等社的番丁數約為 180 多人。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頁 92。

³ 《東瀛識略》（卷二稅餉）對於「鹿皮小米餉」有如是說明：「鹿皮、小米餉，皆徵之歸化生番；以番之捕鹿獻皮並有獻小米者，名其餉也。鹿皮每張折輸銀二錢四分；淡水番社有獻獐皮者，折輸銀數與鹿皮同。小米，惟彰化社番獻納，每石折輸銀六錢」（頁 21）。

⁴ 論文內文的強調標記，均為本研究作者所標示。

⁵ 相關著作包括：溫振華，《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頁 37-42，（台北：日知堂，1992）與《大茅埔開發史》（1999：13-15）、施添福，〈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載於《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頁 39-71（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265-266（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池永歆，《清代東勢角縱谷區的地方史：以「岸裡大社文書」為主軸的論述》，頁 41-68（台北：博揚文化，2011），以及柯志明《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中）》，「藉餉私墾」頁 420-429（台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21）。



【圖一】位於土牛埔的「鹿皮小米餉」埔地

說明：以《台灣堡圖》之「單蘭」、「東勢角」、「水底寮」等圖幅為底圖（1904年調製），改繪而成。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6-01。

貳、番界釐定前朴仔籬界外地的地理情勢

史料對於乾隆 26 年（1761）番界釐定前之朴仔籬界外地的地理情勢，所述不多。根據《諸羅縣志》與「岸裡大社文書」，大抵可有如下敘述。

刊於康熙 56 年（1717）的《諸羅縣志》，形容岸裡社域附近的大甲溪谷景觀為「磴道峻折，谿澗深阻」⁶；而對岸裡社群所在地，形容其具有「山險而深峻」的自然景觀⁷。而生活領域為更往東之空間的屋鑿等社群，曾自述其為東勢角縱谷區界外地一帶的早期居民：「切華等社番，先世原與朴社隣居東勢角、單欄埔等處，地方被漢人層越佔闢，逼移內山林棲穴居，若處草昧之天」⁸。可見大甲溪縱谷區一帶，甚早就為屋鑿等社群的傳統活動領域。

康熙 54 年（1715）岸裡等社歸化清朝，《諸羅縣志》有載：「五十四年，新附生番五社：

⁶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雜俗」，頁 99。

⁷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 34。

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598：140-01。本研究標示的代碼，皆為原件右上角的原始編碼。

岸裡社、掃掠社、烏牛難社、阿里史社、樸仔籬社（以上各社俱在縣北）」⁹；當年 11 月 1 日諸羅知縣周鍾瑄給土官阿莫的信牌上，形容岸裡社群為「惟有一二深山窮谷足跡不到，語言難過，向化無由」¹⁰；隔年的 11 月 9 日周鍾瑄發給岸裡社群的曉諭中，如是描述岸裡地域的景觀：「切穆等原屬化外，皆無見聞，茹泉食菓，不異飛禽走獸」、「前為化外異類，今則為盛世王民」¹¹。此外，《諸羅縣志》，在其「風俗志·雜俗」，且對岸裡諸社的原住民族有如下描述¹²

番姓健嗜殺，雖內附，罕與諸番接；種山射生以食，縫韋作幘。冒其頭面，止露兩目；鹿皮作衣，臍下結一方布，聊蔽前陰，露臀跣足，茹毛飲血；登山如非，深林邃谷，能蛇鑽以入；舉物皆以負載；居家則裸，惟不去方布。

這些描述，顯然充滿漢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突顯異己群體在生活方式上與漢人的極大差異：野蠻、非文明與無教化的異族。

這些看法係以漢文化的優位立場為度量異己文化的標準，遠方異族的「歸化」與服膺教化，得以彰顯漢文化的優越，顯然深具漢文化的帝國主義色彩。隨著岸裡社群的歸化、納餉與服教化，這些社群的活動領域，已屬於界內空間。官方於乾隆 26 年（1761），在當地挑築土牛溝、劃定漢番地界，使得地權空間得以釐定¹³；番界以東的大甲溪河谷地帶的東勢角縱谷區，仍被列為界外空間；界外地雖禁止漢人私越入內，不過仍許熟番出入其間，進行打牲與耕種活動¹⁴。

參、官方對朴仔籬番界的釐定及界外地土牛角的私墾活動

一、乾隆 26 年朴仔籬番界的釐定以及土牛、土牛溝的修築

自康熙以迄光緒年間，隨著漢人高度經濟取向的墾闢活動的挺進，使得界內邊區空間隨著番界的釐定，迅速地往先前的界外地擴張，逐漸地深入到隸屬內山原住民的傳統活動領域。

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於康熙 61 年 6 月（1722 年 7--8 月）抵台，隨後巡行各地、考察民俗風情（1722-1724）。爾後，他根據巡台期間的見聞，完成的《台海使槎錄》「番界」一節中，就明白地指出漢人遭原住民殺害的本質，係漢人「利在開墾」、「越界佔侵」，因而多遭生番殺戮的情況¹⁵。為遏止此一情勢，黃叔璥提及：官方曾於康熙 61 議定在台灣沿山邊區空間設立界碑，嚴禁漢人越界活動；半線地區議定設番界的地點有：「半線之投掠溪漚、貓霧揀之張鎮莊」兩地¹⁶。隨後，藍鼎元在《東征集》的〈覆制軍遷民劃界書〉中，曾引述清廷「劃界遷民」的

⁹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42。

¹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H2385。

¹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H2285-2。

¹²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雜俗」，頁 99。

¹³ 資料來源：石岡土牛國小民番界碑的碑文。

¹⁴ 資料來源：《清奏疏選彙》，頁 41。高山的奏疏題為「陳臺地事宜疏」（頁 39-44）。

¹⁵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67。

¹⁶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67-168。

檄文¹⁷。他顯然不甚贊同此般作法，而對此檄文提出更為周慮的看法。當時立界的目的，是要使得漢人無法窩藏於界外、生番亦不能出界為害，由之進而區隔漢人與生番的生存空間。

番界政策的落實，始於乾隆朝初葉；不難想見該時漢人「利在開墾」，而大規模往沿山邊區「越界佔侵」的情況應甚為普遍。據《清高宗實錄選輯》所載，在乾隆朝設屯之前，就曾有多份釐定番界或劃清界限的奏議。

福建布政使高山於乾隆 9 年（1745）12 月 18 日上呈〈台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奏摺¹⁸，提出具體且明晰原則，而厲行族群政治策略。「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之議，成了清官方構想台灣族群空間分佈理想化的形式¹⁹。乾隆 11 年（1746）5 月 13 日，戶部議覆「閩浙總督馬爾泰等議奏布政使高山條奏台地民番事宜」²⁰，要求地方官親履會勘、並「立表定界」，於一年內完成造冊。前述高山於乾隆 9 年年底的奏摺裡提及「番民地界之宜，照舊劃清也」，應被遵循。或即，可視此次的番界勘定，為承襲康熙、雍正時的舊界，而略作調整。

乾隆 15 年（1750）7 月 2 日，戶部等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定台灣府屬廳縣生番地方界址」²¹。隨後在乾隆 23 年（1758）3 月閩浙總督楊應琚奏「酌定防範台灣事宜」：「台民墾種，侵越熟番地界，應查明挑溝，畫清界限」²²。此次要清查的要點，是漢人侵墾熟番土地的問題，並建議要挑築土牛溝，以之定界。

乾隆 25 年（1760）8 月 3 日，閩浙總督楊廷璋上奏〈台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奏摺²³。奏摺內文表明：自乾隆 15 年（1750）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清查定界」，繼任總督楊應琚奏明後，委由台灣鎮道率地方官「遍歷查勘」，最後在楊廷璋擔任閩浙總督時完成清釐，進而要「酌定章程」。此章程共分四項，有關番界部份提到：彰化縣與淡防廳則因「侵墾漸近內山，每致生番逸出為害」，因此擬定多種劃定番界措施（挖深溝、堆築土牛）。他對於彰化縣與淡防廳兩處處設立番界的處置方式，有明確的論述。奏文明定：彰化縣與淡防廳兩地的番界，係以現有的車路旱溝、溪溝水圳與外山山根，這些地形景觀為分界；若無現存地形景觀者，則以挖溝、築土牛為分界。楊廷璋所擬定的番界清釐與勘定章程，即是朴仔籬漢番界碑與土牛界溝設立的憑藉。

當前位於石岡土牛國小的朴仔籬的漢番界碑，設立於乾隆 26 年（1761）1 月²⁴，立碑者為當年的彰化知縣張世珍【任期自乾隆 23 年 3 月起、迄 26 年 5 月（1758--1761）】。本石碑的重

¹⁷ 資料來源：《東征集》〈覆制軍遷民劃界書〉，頁 40。

¹⁸ 資料來源：《清奏疏選集》，頁 39-44；《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21 冊，頁 424-437。兩份文本相對照，內文稍有差異。引文已根據《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稍加修正。

¹⁹ 有關此種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敘述，可參閱：柯志明，〈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台灣史研究》，22 卷 2 期（2015 年），頁 45-110。

²⁰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51。

²¹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79。

²²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118。

²³ 資料來源：《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4 冊，頁 200-212。此奏摺較為精簡內容，亦載於《清高宗實錄選輯》，〈楊廷璋條奏「清釐清釐台屬邊界，酌定章程」〉，頁 126-127。

²⁴ 此界碑歷多次遷移，最後才安置土牛國小校園內。。

要性，在於透過碑文，可清楚獲悉乾隆朝所擬定的土牛、溝界景觀的實質大小。番界不再是單純的人文分隔線，而是具體的景觀、深具族群政治意義的景觀。石碑的文本如下：

奉憲勘定地界，勘定朴仔籬處，南北計長貳百捌拾五丈五尺，共堆土牛壹拾玖個，每土牛長二丈、底闊壹丈、高捌尺、頂闊陸尺，每溝長壹拾伍丈、闊壹丈、深陸尺，禁人民逾越私墾。

乾隆貳拾陸年正月 日 彰化縣知縣 張立

由於預定設立番界的朴仔籬空間周遭，並無「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等實質地形景觀，因之以人工方式「挑挖深溝，堆築土牛」作為番界。

由碑文可獲悉，當時官方對於土牛溝界有如下規定：朴仔籬溝界南北長有 285 丈 5 尺（約 857 公尺），共堆築長 2 丈（6 公尺）、底寬 1 丈（3 公尺）、高 8 尺（2.4 公尺）、頂寬 6 尺（1.8 公尺）的土牛 19 個，預計土牛之間築有多條長 15 丈（45 公尺）、寬 1 丈（3 公尺）、深 6 尺（1.8 公尺）的深溝。不過根據「岸裡大社文書」所載，土牛溝界實際長度為「西南自北，朴子窩山小根橫截至大甲溪洲，計長二百八十九丈五尺」²⁵，總長約為 869 公尺；此外，根據當時所繪的圖幅所示，最後並未在土牛前後之間挖掘多條長 15 丈的深溝，而是在土牛西側處，築出西南向北的界溝【圖二、圖三、圖四】。

乾隆 26 年（1761）1 月所釐定的朴仔籬番界，大費周章地挖掘界溝、堆疊土牛以及立碑，日後仍需修葺維護。貓霧揀巡檢司戴宏度於乾隆 26 年（1761）8 月 20 日，所開立的差票²⁶，對於朴仔籬土牛界溝的修築、維護與修葺，有具體說明²⁷。據此差票，可歸納出官方對於朴仔籬土牛界溝的維護與查勘的要點：（1）每年委由笨港縣丞在二、八兩月前往土牛界溝進行查勘；（2）土牛與界溝的維護，原先議定由在附近墾耕的「佃民」負責，不過照實際的施行狀況來看，其維護與修葺，最終成為岸裡社通事潘敦需負責的要務「岸裡大社文書」留存多份文書載有官方要求通事與土目去查勘、修葺土牛溝界²⁸，想必這對岸裡社群是一大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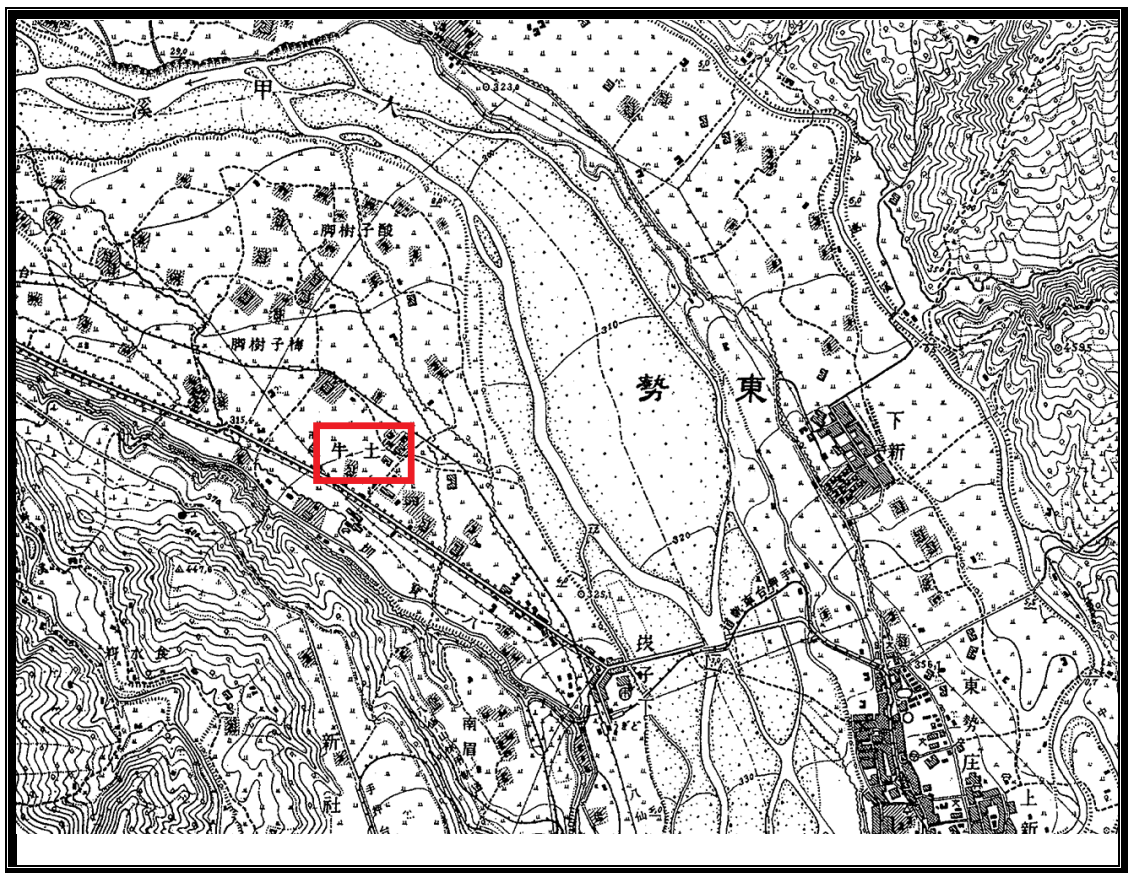
在「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的圖幅上，未見有論及朴仔籬界址或界碑的文字，可見該地的界碑與界址（土牛與界溝），係在乾隆 25 年（1760）完成清釐番界並繪製番界圖後，由地方官員向上呈報而獲准修築的，立碑者為當年的彰化知縣張世珍。但未見史料對此過程有所敘述。

²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45-01。

²⁶ 戴宏度自乾隆 24 年（1759）6 月起、迄 27（1761）年 5 月，擔任貓霧揀巡檢司。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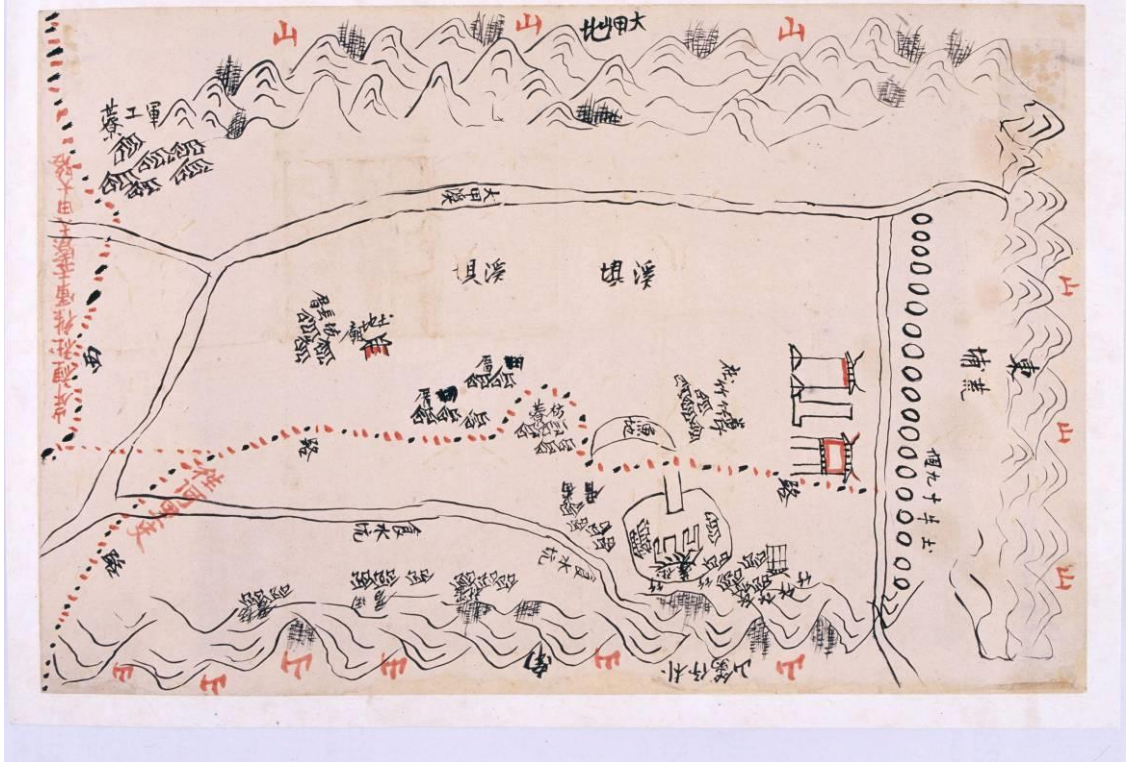
²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02-02。文本中的「本府憲余」，係台灣府知府余文儀。

²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07-01；AL00951：020-02；AL00952：081-01。



【圖二】朴仔籬漢番界碑與土牛溝界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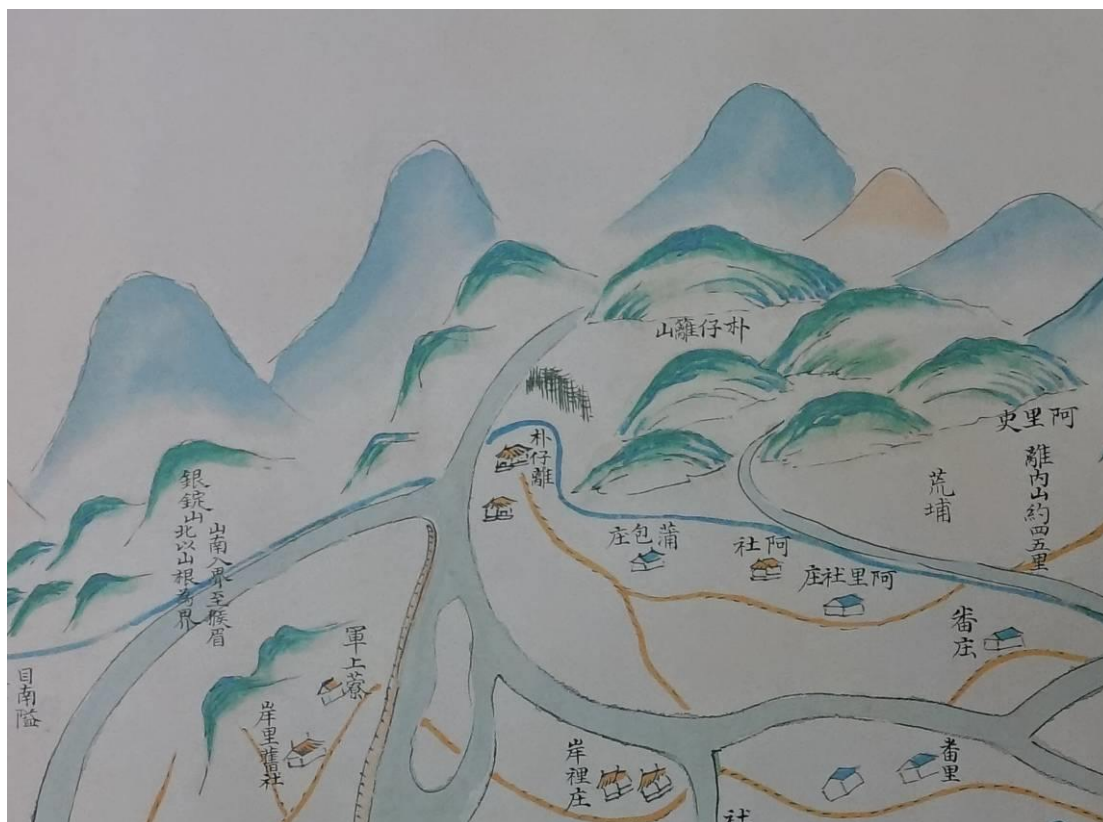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台灣地形圖》（1925）「東勢」圖幅。



【圖三】乾隆中葉朴仔籬東方的土牛溝界

說明：此圖繪製的確切時間不詳，應為乾隆 26 年（1761）設置界碑後所繪；因軍工寮未遷到朴仔籬社域，由此可推測：繪圖時間大約為乾隆 26 年迄 32 年（1761-1767）之間。圖片上特別標明「土牛十九個」，符合界碑所言。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AH2249。



【圖四】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鄰近「朴仔籬」圖幅

資料來源：「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

二、屋鑿等社的歸化與界外土牛角埔地的私墾活動

清乾隆中葉以前東勢角縱谷區一帶，為河谷交錯的地形，因之有著適合農耕的河階地；此外，當地林木蓊鬱，故林產資源富饒。儘管官方於乾隆 26 年（1761）1 月立定朴仔籬番界，嚴禁漢人入內，但縱谷區豐富的自然資源，想必早在番界釐定之前，就為漢人所覬覦。

乾隆 27 年（1762）2 月貓霧揀巡檢司戴宏度曾下令²⁹：「立着通土，即撥番三百名，協同鄉保甲，迅往所轄沿山一帶界溝外，將奸民所種雜糧等物件、搭蓋艸寮，毋分日夜槩行砍滅拆毀，毋得刻延干咎」³⁰；由此可獲悉：漢人甚早就已進入彰化縣沿山土牛溝外進行私墾，墾耕已略有成果，並搭建草寮以便長久定居。不過此差票所言的確切地點則不詳。

在屋鑿（鑿）、末毒、與獅子等 13 社於乾隆 31 年（1766）歸化清朝後³¹，土牛溝外的地表景觀，逐漸發生改變。因該些社群的歸化，通事潘敦為籌措餉稅，而以權宜的方式私墾界溝外的土牛側埔地，即爾後通稱的「鹿皮小米餉」埔地，使得漢佃得以越出土牛溝外，進入縱谷區

²⁹ 戴宏度自乾隆 24 年（1759）6 月起、迄 27（1761）年 5 月，擔任貓霧揀巡檢司。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60。

³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10-02。

³¹ 以乾隆 2 年（1737）起，「改則額徵社餉，改照民丁例，每丁徵銀貳錢」而推算，可獲悉屋鑿等社的番丁數約為 180 多人。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頁 92。

的界外荒埔進行墾闢。

「岸裡大社文書」的「乾隆四十七年台灣府、淡防廳會審解殺死林媽等二十八命生番文稿」，對於屋鑿等 13 社的歸化過程有詳細記載³²。由該文本可獲悉：屋鑿等 13 社的歸化，係源自乾隆 31 年岸裡社通事潘敦的招徠而來³³。潘敦生前曾派遣漢人吳貴協助處理屋鑿等社的社務，以及交換山產。官方對於屋鑿等 13 社歸化清朝的說辭則為：「眾社番畏威懷德，俱請輸誠歸化」³⁴。此種說法，隱含著清官方或漢文化傳統之文化帝國主義的色彩。隨後在乾隆 32 年（1767）6 月，彰化知縣韓琮為確認屋鑿等社是否真要歸化清朝，曾令潘敦「傳由巴仕等出山認納」，並要其具結擔保³⁵；且議定自當年起，「每社每年貢納鹿皮餉四張、小米稅四石，每年共該鹿皮餉五十二張、共納小米稅五十二石」以為餉稅；官方則是「按年兩次酌賞由巴仕等塩布」³⁶。

潘敦招徠屋鑿等社歸化清朝，顯然他對以後屋鑿等社需年納的餉稅，已有所計畫。爾後，屋鑿等社的總土目由巴仕等人曾在呈給知縣韓琮的稟文中，提到權宜的解決方法³⁷：

……仕等生長內山，三飧以薯芋為糧，穿則鹿衣為衣，並無耕種，鹿皮小米兩餉無從所納，只可會同通事與各土目人等酌議具呈，稟請朴仔籬土牛側荒埔一塊，准仕等鑿闢成田，年收利息，上可供納兩餉，下或有余，仕等亦可贍活……。

屋鑿等社為使餉稅有著落，於是向官方稟請開墾位於朴仔籬「土牛側荒埔」，認為開墾成田後的租粟，不僅可用來繳納鹿皮小米餉，若有剩餘也可充當番社口糧。這項建議，在乾隆 32 年（1767）閏 7 月 20 日，獲得官方同意³⁸。同日立即以土目由巴仕等人的名義，上呈知縣的稟文中提及³⁹：開墾這塊界外埔地，係獲得知縣等官方的首肯，並持有官方所給的諭示，因此若有「地保、土棍藉私墾名色詐騙事」，將稟官究辦。當然，由巴仕的這些說法，就是要強調開墾這塊土牛側荒埔的合法性。隔天潘敦在呈給知縣韓琮的稟文中提到⁴⁰：這塊作為鹿皮小米餉埔地，知縣曾到此親自查看，而他也會遵從諭令，前去踏明這塊位於土牛側荒埔的四至；此外，埔地的土名僅被稱為土牛埔。「岸裡大社文書」中，並未明載這塊餉埔的大小。

隨後，這塊土牛側荒埔在官方的認可下，曾招漢佃入墾，也發生過非法私墾、越墾事件，而引起官方徹查⁴¹。屋鑿等社的總土目由巴仕在稟文中所提及的這些看法，顯然背後的主使者

³²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H2315：021。

³³ 潘敦（生年不詳、歿於 1771 年），其原名音譯為敦仔阿打歪，漢名潘敦或潘敦仔，為岸裡社群頭目。他於乾隆 23 年（1758）11 月被任命為岸裡社第一位非漢人通事【第三任】，迄 36 年（1771）病逝止，在任 12 年多。資料來源：《台灣歷史辭典》網路版，「潘敦」條目（許進發撰）。

³⁴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上冊）》，頁 150。

³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70-01。韓琮自乾隆 29 年（1764）11 月起、迄 32 年（1767）9 月，為彰化知縣；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57。。

³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5-01、AL00951：070-01。

³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5-01。知縣同意由巴仕等人的時間點為閏 7 月 20 日，可見上稟的時間應在此之前，確切時間則不詳。

³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6-01。

³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5-01。

⁴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6-01。引文中原以△代表潘敦，本研究自行補上潘敦二字。

⁴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70-01。

應為岸裡社通事潘敦等人。由巴仕可能也不懂漢文，因之這張稟文當委由他人代筆，採納的用語，皆為漢人的思考方式，並非「自我」的書寫。而稟文的文本，也留給研究者許多探討空間：潘敦稟官設立鹿皮小米餉埔地，以籌得屋鑿等社應納之社餉的作為，是權宜之計抑或藉籌餉而營私？

潘敦招徠屋鑿等 13 社於乾隆 31 年（1766）歸化清朝，且自乾隆 32 年起就需每年納餉稅。屋鑿等社的歸化，儘管官方的說法是：「眾社番畏威懷德，俱請輸誠歸化」⁴²，「岸裡大社文書」僅以這些社群願意「歸化投誠」⁴³，但實難以看出其有自發性的歸化動機。其歸化清官方係由潘敦招徠而來，潘敦究竟以何說詞勸誘屋鑿等社群，也未有詳載。此外，屋鑿等社每年需繳納的餉稅，對他們來說更是一項額外的龐大負擔；潘敦就構想以「朴仔籬土牛側荒埔」，這塊鹿皮小米餉埔地，所招漢佃墾耕而得的租粟，充當這些歸化番社需年繳的餉稅與口糧。顯然以此方式，稟官開墾這塊界外埔地，伊始就產生許多爭議，隨後引起彰化知縣的注意與徹查⁴⁴。

屋鑿等社的餉稅為「二月開征、四月玩半、十月全完」⁴⁵。不過自乾隆 32 年起，屋鑿等社需年納的餉稅，就屢未完納，而頻遭官方催討⁴⁶。根據潘敦的稟詞所示：於乾隆 33 年（1768）2 月，屋鑿等社的總土目由巴仕與通事潘敦在官方許可下，就招得漢佃黃懷春為「傭工」，代為開墾土地⁴⁷。但實際上，雙方卻早在乾隆 32 年（1767）10 月，就與漢佃黃懷春等人訂定開荒契⁴⁸。但因河埔地的開墾工程浩大，短期內難有成效，想以租粟當為餉稅，實有困難。因之屋鑿等社無法按時完納餉稅，時有所見。

乾隆 33 年 5 月，新任的彰化知縣成履泰⁴⁹，遣官差要通事潘敦速辦屋鑿等社的餉稅⁵⁰；根據當月給信差的「信票」所示，其對於屋鑿等社需納餉稅，有詳盡說明⁵¹：

……每社每年獻納鹿皮肆張、小米肆石，以作稅糧一案，請自乾隆三十二年為始，按年局期分別輸納，造報充餉等，因蒙此案，縣先蒙 憲檄業，經前縣飭差押追去後，延今未挽完納。茲蒙前因合行嚴催，為此票仰原差洪用迅往該地，立着該通土敦仔等，速將屋鑿、獅仔等十一社，應完三十二年分鹿皮小米餉稅，併三十一年前獻鹿皮十三張，刻即遵照議詳，變價折紋庫銀四十兩八錢……。

據此「信票」可獲知：屋鑿等社尚未完納的餉稅，包括乾隆 32 年（1767）份以及乾隆 31 年（1766）前需獻納，而折「紋庫銀四十兩八錢」的鹿皮 13 張【圖五】。

⁴²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上冊）》，頁 150。

⁴³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H2315：021。

⁴⁴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70-01、AL00951：070-01。

⁴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48-01。

⁴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32-01。

⁴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70-01。

⁴⁸ 該開荒契文本載於柯志明的《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中）》（頁 424），係由巴仕於乾隆 32 年 10 月與黃懷春所訂立。

⁴⁹ 成履泰從乾隆 33 年 4 月起，接任韓琮，擔任彰化知縣。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57。

⁵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13-01。

⁵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H2276。

爾後，知縣成履泰曾多次派官差向潘敦催繳，而在乾隆 34 年（1769）2 月 16 日官差的稟文中仍可見到「屋鑿等四社，欠卅二年鹿皮小米餉銀三十六兩九錢六分，又欠三十三年分鹿皮小米餉共銀三十六兩九錢六分」⁵²；即 32 年份與 33 年份的餉稅未完納。該年 7 月 1 日，官方仍催繳屋鑿等社「本年分併三十一年分貢獻鹿皮小米餉項艮」⁵³，到了 12 月 8 日官方又在催繳 34 年份的餉稅⁵⁴。此後屋鑿等社的餉稅有無完納，未見到相關記載。屋鑿等社時常拖欠餉稅，或許這是隨後在乾隆 48 年（1783）12 月就任理番同知的唐鑑⁵⁵，會對其是否真想投誠歸化感到疑慮的緣由；乾隆 49 年（1784）9 月 8 日的文件上記載著⁵⁶：

……本年九月初七日，挾該生張鳳華呈稱：屋鑿、獅子等八社生番，約會出山、投誠歸化，並無假偽等情。挾此，除批示外，合行札飭到該生張鳳華速即会同岸裡社通事潘明慈，土目潘啟萬、大屋壠，帶領八社土目，先行進城，聽候訊供……。

或即，理番同知唐鑑雖由張鳳華稟告獲悉⁵⁷：屋鑿等生番「約會出山、投誠歸化，並無假偽等情」；但為詳加確認，仍要求張鳳華與通事潘明慈等人會同屋鑿等社土目，一同到彰化縣就訊。歸化後的屋鑿等社，要年納餉稅的需求，應促使岸裡社通事潘敦對於鹿皮小米餉埔地招漢佃墾闢的舉動，更加地具急切性；而這片界外埔地，則因招漢人墾耕的舉動，自乾隆 33 年（1768）年初起就引起官方的注意，隨後並多次進行徹查⁵⁸。

⁵²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23-01、AL00953：032-01、AL00953：50-01。

⁵³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77-01。

⁵⁴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04-01。

⁵⁵ 唐鑑自乾隆 48 年 12 月起，擔任北路理番同知。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56。

⁵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4：166-01。

⁵⁷ 張鳳華為岸裡社首任通事張達京之子。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張達京子孫五房全立闔分家業簿抄本」，AH2319。

⁵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70-01。



【圖五】乾隆 33 年催繳屋整等社餉稅的「信票」

說明：此文件為官方催繳屋整等社所欠的餉稅，而由彰化知縣成履泰發給官差的信票。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AH2276。

三、界外土牛角埔地開墾所引發的爭議與潘敦的角色

這塊土牛界外之「鹿皮小米餉」埔地的開墾，似乎招漢佃入墾後不久，就引發爭議。

乾隆 33 年（1768）4 月 5 日貓霧揀巡檢司汪國順⁵⁹，給官差陳富美的差票上，對事情原委有詳盡說明；其對查報土牛界外地私墾的過程，有如下敘述⁶⁰：汪國順經由鄉保劉淑全的稟報，獲悉黃禎慶（即黃漢）等人於界外私墾⁶¹，並親自勘查，而得知有黃禎慶等人在距離土牛溝外數里處，架建草寮、私墾荒埔。汪國順並曾將此事稟告當月新任知縣成履泰。爾後汪國順要求

⁵⁹ 汪國順於乾隆 30 年（1765）12 月就任貓霧揀巡檢司。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60。

⁶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70-01。

⁶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05-01。

潘敦等人前去查勘：私墾者的姓名、何人募集這些漢佃入墾；並且要求官差陳富美將開列的 17 名「私墾奸民」以及相關人等帶到彰化縣「訊明詳究」。這份文書，是對東勢角土牛溝外私墾活動的最早記載。

由這份巡檢司汪國順所開立差票可獲悉：黃禎慶等人於「土牛埔」所私自墾闢的荒埔，距離土牛溝有數里，是一塊位於山腳下的埔地。由於不屬由巴仕稟官開墾的「鹿皮小米餉」埔地之內，因此是「越墾」、「與原字不符」的埔地。同年的 5 月 18 日，潘敦在稟文中，對於屋鑿等社的歸化納餉、稟請開墾荒埔等原委有詳明的陳述⁶²。潘敦在稟文中對知縣成履泰所做的說明，有如下數個要點：

- (1) 在乾隆 32 年（1767）閏 7 月 20 日，獲得知縣韓琮等人同意⁶³，准許屋鑿等社開墾「朴仔籬土牛側溪南界地」；想必當時係在潘敦稟告該地為「無碍民番」的狀況、且有納餉稅的壓力下，知縣才予准墾這塊界外地，使屋鑿等社得以「耕種輸納」。
- (2) 到了乾隆 33 年（1768）2 月，潘敦就以屋鑿等社係為「归化生番，耕牛農器百無一有」，再加上該「生埔俱係石头、樹头，一時開垦費用工本許多，若棄地不墾，餉稅艱整百逐年無可完征」等等理由，而在知縣同意下，招得身為朴仔籬社的社記漢人黃懷春（又化為黃開春⁶⁴）等人墾闢此荒埔⁶⁵。
- (3) 潘敦更進一步指出：招得的漢佃黃懷春屬於傭工性質，當「幫垦開荒成田之后，付仕等自耕供納餉稅」，亦即等到黃懷春把荒埔墾闢成田後，會將田園交給屋鑿等社，讓他們自行耕作、繳納餉稅。
- (4) 就此稟文來看，潘敦要向官方說明的是：黃懷春幫墾的荒埔，係他所稟稱之屋鑿等社用以繳納稅餉的「土牛側溪南界地」；而「在土牛數里之外越墾」的吳禎慶、黃發禎等人，並非由巴仕與潘敦所招墾。潘敦的這些說法，部分實有推諉與矛盾之處。

開墾「鹿皮小米餉」這塊埔地的漢人黃懷春，係由潘敦招募而來。雙方當時約定的確切埔地四至為「東至埔尾、西至土牛側旱溝為界、南至山崁、北至溪墘為界」⁶⁶；四至所包括的空間範圍，幾乎就是土牛溝往東與大甲溪之間、向南一直到最南邊之山崁間的所有埔地。儘管乾隆 33 年（1768）4 月 5 日巡檢司汪國順所開出的差票上稱黃禎慶等人為私墾、越墾以及「與原字不符」⁶⁷；潘敦呈給知縣稟文的說詞亦是：黃禎慶等 15 戶「在土牛數里之外越墾」，非由他所招募，「並不識為何人，無從查覆」。不過這些私墾地，似與「鹿皮小米餉」埔地相鄰近。

⁶²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70-01。

⁶³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6-01。

⁶⁴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32-01；AL00951：059。

⁶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59-03。根據柯志明的《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中）》（頁 424）所徵引的「開荒字」文本，由巴仕係於乾隆 32 年 10 月就與黃懷春訂定開墾契約。

⁶⁶ 資料來源：《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上冊）》，頁 363-364。

⁶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70-01。

黃懷春與黃禎慶兩群人間有何關係，未查閱到「岸裡大社文書」中，有相關文件的記載。不過人數不算少的兩群人同時在鄰近的土地空間上墾闢，身為黃懷春之招募人的潘敦，對這些狀況未能掌握，實啟人疑竇。

貓霧揀巡檢司汪國順所指稱之越墾、私墾的狀況，潘敦未能知悉，當中實有所蹊蹺。究其實，這塊土牛側的稱為鹿皮小米餉荒埔，原先就以為屋鑿等社籌餉稅的特殊理由而稟官開墾。屋鑿等社的社民原本就不善耕作，潘敦卻自稱：待傭工黃懷春等開荒完成後，將由社番「自耕供納餉稅」。這說法實屬虛應之詞，實則為招漢佃開墾作準備。潘敦與由巴仕等人呈給官方的稟文中，僅指稱這塊稟墾的埔地為「朴仔籬土牛側荒埔」或「土牛埔」；雖然知縣要求潘敦前去踏明荒埔的四至、並稟明，但官差也可能在未經詳查、甚或默許的狀況下，准其墾闢。由爾後黃懷春立給夥眾的分耕字來看⁶⁸，向官方稟明的埔地四至與招漢佃所言的四至，兩者差異極大；或即知縣所准墾之位於土牛側的鹿皮小米餉荒埔，僅是黃懷春等人在潘敦私下准許墾闢之大片荒埔的一部分；而由黃禎慶等人開墾的埔地全屬私墾與越墾地，則是越出「鹿皮小米餉」埔地之外的土地空間。

此外，向官方舉發土牛側荒埔有私墾一事者為鄉保劉淑金，而非通事潘敦本人；整起事件，難脫通事與私墾者相互勾結的情事。是否有多批漢人同時覬覦這塊土地利益，引發糾紛而告官，使得知縣成履泰要求徹查，未見相關文書記載。隨後徵引的「岸裡大社文書」文本，將顯示出潘敦對此並非不知情。

根據爾後的相關文件來看，彰化知縣成履泰，並未贊同潘敦的說詞；在乾隆 34 年（1769）2 月 24 日，成履泰開給官差的差票上，可看到他的態度⁶⁹。成履泰嚴正申明：黃禎慶等 15 戶漢佃「私墾朴仔籬土牛邊界地」，即土牛側埔地的開墾舉動，是非法的，因此要求官差將相關人等限期帶到縣衙訊問；也可看出，他對於官差等人的推諉、「久杳無到案，該差玩延已極」，甚感不耐煩，因之要其迅速辦理。隨後成履泰在 6 月 17 日時，再度要求傳喚潘敦、黃懷春與黃文待，徹底追究相關人等的責任⁷⁰。潘敦等人終在成履泰的嚴厲催促下，於 7 月時赴縣城就訊⁷¹；官方命令其自當年 8 月起，不得由黃懷春等人代墾這塊「鹿皮小米餉」埔地。潘敦在當月 25 日呈給成履泰的稟文中⁷²，允諾將遵照知縣的裁決，「不敢再招別佃，併假借僱工名色墾地」。此外，知縣並要求潘敦要「別尋處所，貼納番餉，不得容留黃懷春等，仍在此地墾種」⁷³。後續的發展，則可看出潘敦並未完全遵從知縣的裁定，仍任從黃懷春等人於附近一帶活動【圖六、圖七】。

⁶⁸ 資料來源：《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上冊）》，頁 363-364。

⁶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66-01。

⁷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74-01。

⁷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047-01。

⁷²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014-01。

⁷³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047-01。



【圖六】乾隆 34 年 12 月大甲溪南岸一帶開墾圖（局部）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AH2250。



【圖七】乾隆中葉土牛側與朴仔籬內埔墾闢埔園圖（局部）

說明：此圖繪製的確切時間不詳。由於未於圖上標示出在乾隆 35 年（1770）遷至東勢角的軍工寮，因之其繪製的時間可推測為在此之前⁷⁴。土牛溝外的埔地，為《岸裡大社文書》所指稱的「土牛側埔地」；鹿皮小米餉埔地為此地的一部分，但確切大小與四至則不詳。圖上標明的「朴仔籬社^番原墾埔園」、「厰米小番」（厰）應位於緊鄰土牛埔地的台地上；而「朴仔籬番厰」與「番田」，應位於更高的新社台地（朴仔籬內埔），可見當時已有不少朴仔籬社民遷移到當地居住與耕種。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AH2248。

乾隆 35 年（1770）3 月 18 日，知縣成履泰開出的差票中，提及黃開春（黃懷春的化名）、黃阿崙與陳保生等人在鄰接朴仔籬山後一帶自認佃首，「招集黨夥立於山埔頂，越出界外私墾埔園」，私墾田園達 300 多甲。知縣並直指通事潘敦「通同包庇，私向收租」，使黃懷春等人得以越墾朴仔籬界外⁷⁵。同月的 28 日，潘敦因「年邁衰疾」，而由副通事他灣四老代呈知縣的稟文中，則極力撇清包庇私墾一事⁷⁶。潘敦極力說明的是：他應訊返回岸裡社後，隨即遵照知縣的裁示，要黃懷春等人「罷墾搬出」，並無包庇。但黃懷春等人依舊未離開，係「因爺台詳覆府憲，又蒙仰仍將黃懷春等示責發落，黃懷春因而遷移畱未出」；亦即，潘敦本人尚未收到彰化知縣將此案呈報台灣府的「示責發落」批示，因此黃懷春等人依舊停留於該地。知縣成履泰

⁷⁴ 另據柯志明的《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中）》（頁 426）對此圖有如下敘述：「四月二十三日彰化縣衙門的書役蘇任因為鄒應元撤令彰化與日縣調查土牛角私墾事，也舉命抵達當地繪圖回報。蘇任所畫的地圖基本上符合敦仔五月十八日回報汪國順稟文的內容。」本研究未能掌握相關史料，無法提出詳盡說明。

⁷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21-01。

⁷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047-01。

則對潘敦的稟詞未予採信，而明白地指出身為通事的潘敦，在這件私墾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包庇、縱容與推諉。顯然知縣要對黃懷春等人於界外地的私墾舉動，要加以訊問究責。他隨即在當年的 4 月 6 日所開出的差票上，諭令頭役張秀立刻將相關人等帶往彰化縣訊問⁷⁷。12 日又開出差票，要頭役張秀立刻前往當地拘拿黃懷春等人，限定在當月的 15 日前，將一千人等帶到彰化縣應訊⁷⁸。知縣對於這件界外私墾的案件，有無究責發落，並未見相關文件進一步的記載。

黃懷春除了曾在乾隆 33 年（1768）2 月開墾這塊「鹿皮小米餉」埔地，而成了官方要究責的私墾界外地的案犯外，他也曾在界外的東勢角山場，從事「私墾、築建房屋」的舉動，該年的 10 月 24 日，知縣成履泰曾派官差拘拿相關人等，「定限三日內，一齊稟到赴縣以憑訊究」⁷⁹；但這些人並未准時赴訊。隔年的 8 月 18 日，知縣再度發出差票，想對這些「蓋寮、越界滋事」者進行訊問⁸⁰，不過也未見到他們赴訊的資料。

雖然潘敦在乾隆 36 年（1771）4 月病故⁸¹，但這塊埔地並未因此而停止開墾。乾隆 38 年（1773）3 月，黃懷春等人在岸裡社通事阿打歪希的招墾下⁸²，再行墾土牛側的荒埔。以下為黃懷春立給夥眾的分耕字⁸³：

立分墾耕字人：黃懷春。今因岸社通事阿打歪希，同土目由巴仕、由民容、茅歪、瓦旦等，復招春復墾土牛側埔地一塊，東至埔尾、西至土牛側旱溝為界、南至山崁、北至溪墘為界。當日議定四址內大租，癸巳年起，乙未年止，每年共納租粟六十石滿正，三年後每年另加租粟四十石，湊成一百石，作二十股均分，四址草地亦作二十股均分……。期開此埔租粟，癸巳年起，各字內納社租粟三石滿正；乙未年止，各字內納社租粟五石滿正，俱要年年完納。其田園永付耕作，春不敢轉墾他人；如租不完而累墾主者，任墾主同通事招別耕作，不敢霸耕踞住……。

批明：如退下手，當通聞莊眾，不得私退，再照。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 日。

在見人：黃烈、黃寶玉

立分墾耕字人：黃懷春

⁷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25-01。

⁷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32-01。

⁷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39-01。

⁸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89-01。

⁸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4：052-01。

⁸² 阿打歪希為岸裡社第四任通事，任期為乾隆 36 年到 38 年（1771-1773）。

⁸³ 資料來源：《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上冊）》，乾隆 38 年（1773）黃懷春所立的「分墾耕字」，頁 363-364。

此「分墾耕字」言及：「復招春復墾土牛側埔地一塊」，即清楚表明這塊埔地就是先前那片「土牛側荒埔」，即潘敦招募黃懷春開墾的鹿皮小米餉埔地。

此次由岸裡社通事阿打歪希與由巴仕等人，再次給黃懷春等人開墾，計有 20 股人參與這塊土牛側埔地的墾闢工作，多少人為原先股夥無從完整獲悉。這張「分墾耕字」議定：開墾的前 3 年，即自乾隆 38 年（癸巳、1773）起、迄乾隆 40 年（乙未、1775）止，每年每股需納大租粟 3 石；開墾成田園後，每股需納大租粟 5 石⁸⁴。這些租粟當由岸裡社收取後，代納屋鑿等社的餉稅或充為該社的口糧。

到了乾隆 40 年（1775）8 月，岸裡社通事潘輝光上呈知縣馬鳴鑣的稟文中⁸⁵，對於該社需代納的「鹿皮小米餉」有詳盡敘述⁸⁶。稟詞提及：在乾隆 39 年（1774）12 月朴仔籬社新設通事後，他就提出屋鑿等社的鹿皮小米餉應改由朴仔籬社代納⁸⁷。可見代納屋鑿等社的餉稅，對岸裡社來說是一負擔，因而通事潘輝光想中止代納。不過新任知縣馬鳴鑣並未立即答應，而在批示上要求官差查明：「是否應該新設通事潘習正等完納」、「抑係潘輝光藉詞推卸」。

爾後，官方確實將屋鑿等社的餉稅，改由朴仔籬社代納。在乾隆 44 年（1779）間，曾發生漢佃抗納租粟的情事，副通事潘習正無力應付，而稟告知縣張東馨，藉由餉差而處理抗租一事⁸⁸。稟文提及：林公蔭等 32 名漢佃所積欠的租粟達 375 石，因之朴仔籬社無法代納屋鑿等社的餉稅，並且無法支付守隘社民的隘糧。是否鹿皮小米餉埔地的餉租，部分被充當為隘糧，或是另有隘埔在它處，則未見相關文件的記載。隨後，於這塊鹿皮小米餉埔地墾耕之漢佃當繳納的餉租，亦曾被朴仔籬社番侵占；在乾隆 54 年（1789）1 月 25 日，獅子等社總土目也橫呱丹等人呈給理番同知黃嘉訓的稟文提到⁸⁹：潘敦死後，餉租屢遭朴仔籬社番侵佔，致使屋鑿等社土目稱其「無養生之資」。或許是漢佃抗納餉租，以及餉租曾遭朴仔籬社侵占的原因，構成岸裡社通事潘明慈在乾隆 49 年（1784）稟官請墾東勢角與水底寮界外埔地的理由，他的說詞為：可以「年納丹等口糧谷石」⁹⁰。可見岸裡社通事要以屋鑿等社口糧不足、需代納餉稅等理由，進而稟官入墾位於縱谷區的東勢角與水地寮一帶的界外地。

就「鹿皮小米餉」埔地的開墾，所引發的這些爭議來看，通事潘敦實有包庇私墾漢佃之嫌，甚或整起稟官開墾「鹿皮小米餉」埔地的舉動，難以跳脫藉餉私墾的營私動機。當然這些歷史事件，構成該區域獨特的地方歷史內涵。

⁸⁴ 若以一甲田通常年納 8 石大租谷來推算，黃懷春為墾主所墾闢的這塊「土牛側埔地」開墾成田園後需年納 100 石大租谷，換算成面積則至少為 12 甲多。

⁸⁵ 潘輝光為岸裡社第五任通事，任期為乾隆 38 年到 44 年（1773-1779）。馬鳴鑣自乾隆 40 年 4 月到 43 年 8 月（1775-1778）任彰化縣令。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57。

⁸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142-01。

⁸⁷ 此文件稱「新設通事潘習正」，但在有關潘習正的文件上卻稱其為「朴仔籬社副通事潘習正」，令人費解。在乾隆 45 年 11 月卻稱「朴仔籬社通事潘習正赴轅辭退」。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4：130-01。

⁸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200-02。

⁸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8：136-01。

⁹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東勢角土地開墾紀錄」，AH2334：001-003。

肆、乾隆49年番界的重新釐定與設屯後土牛角埔地的地權歸屬

一、「番界紫線圖」對界外土牛角埔地的地權釐定

乾隆 49 年（1784）的「番界紫線圖」，原題名為「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圖幅上以紅線、藍線以及紫線，描繪出不同時期的番界；其對台灣地表景觀的呈現，則置焦於描述沿山邊區空間⁹¹。此外，本圖幅最上部有一萬四千多字的四縣一廳圖說，詳述清丈、劃界後對於界外土地的處分，如准墾或禁墾等。因之，「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就是當時為杜絕因爭墾邊區土地所引發之糾紛，而全面對界外地清釐、並加以定界的具體成果⁹²。番界紫線圖，係以番界藍線圖為底圖，添加當時詳加清釐界外地所得資料後，繪製而成；可視為是乾隆 49 年全面清釐番界內外空間成果的圖像化產物。因之，此圖可更具體呈現乾隆 25 年迄 49 年之間（1760--1784），將近 25 年期間界外空間的變遷⁹³。番界紫線圖的文化意義，凸顯出乾隆朝末葉時，大清帝國所認定之台灣邊區的圖像，以之確認其於台灣的統治空間。

在「番界紫線圖」圖幅上，以藍線與紫線，標誌出舊的朴仔籬土牛界溝（「挑溝築土牛」的舊界），以及依據「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為原則，所清釐勘定的新番界。先前位於溝界外、毗鄰大甲溪的階地土牛角埔地，圖幅上註有「小米田」；此次勘界後，被劃歸紫線以西的新增界內地，並載以「請墾」字樣。該地即「鹿皮小米餉」埔地。圖幅上所載「圖說」，詳列此次清丈、劃界後，對於朴仔籬土牛界溝外的私墾土地，所做處分，有助於了解此次勘界後，當地地權空間變化狀況【圖八、圖九】。圖說論及土牛角的界外埔地的文本如下：

土牛角：現丈柯六院等田柒拾貳甲壹分玖厘捌毫零參忽；內民耕田陸拾甲零參厘捌毫零參忽，番耕田壹拾貳甲壹分陸厘；荒埔肆甲叁厘貳毫，石埔貳拾參甲貳分伍厘柒毫陸絲。

查該地係一件遵札飭知事乾隆叁拾貳年間，奏明臺地攸武乃社拾叁社生番向化，每社歲輸納鹿皮肆張、小米肆石，折徵紋庫銀肆拾叁兩陸錢捌分。據屋鑿、末毒等社番呈請前項埔地，墾種小米納稅，應請准其墾種，仍舊輸餉，免其報陞、再納供課。查該地倚山傍溪，地勢平坦，浮鬆磽确，貼近原築溝牛界限，今立定以向東溪俱為界。

據圖說所列，土牛角埔地有如下數種類型的地目：民耕田 60.03803 甲、番耕田 12.16 甲、荒埔 4.032 甲以及石埔 23.2576 甲；最終建議將「土牛角壹處民耕田陸拾甲零叁厘捌毫零叁忽另條請免陞科」。當時官方對於界外土牛角埔地的民耕田「免陞科」的說法，或許考量其租粟既要作為屋鑿等社需納的餉稅，也另充為該社群的口糧，而做此考量。否則依照圖說的實質作法，

⁹¹ 資料來源：柯志明，〈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台灣史研究》，22 卷 2 期（2015 年），頁 48-49、68-70。

⁹² 資料來源：（1）林玉茹，〈「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與十八世紀末的台灣〉，《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林玉茹等主編】，頁 14-46（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5）。（2）林玉茹、畏冬，〈林爽文事件前的台灣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台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台灣史研究》，19 卷 3 期（2015），頁 47-94。

⁹³ 資料來源：林玉茹，〈「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與十八世紀末的台灣〉，頁 14-16、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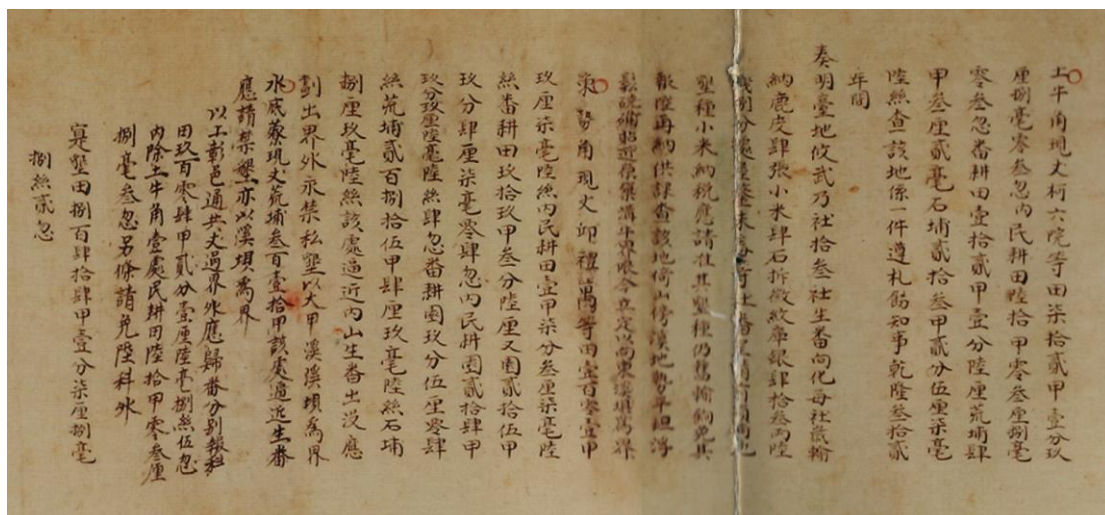
界外民耕田若「離生番尚遠」，大都會以准墾、歸番招墾與報陞等等作法處分。

就政治疆界的變遷來說，原屬界外的土牛角埔地，經此舉措，被劃定為界內地，成為大清帝國台灣府彰化縣轄內的邊區地。



【圖八】「番界紫線圖」圖幅上的朴仔籬番界

資料來源：《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



【圖九】「番界紫線圖」論及土牛角的圖說

資料來源：《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

二、設屯後的「鹿皮小米餉」埔地

在乾隆 53 年（1788）議定社屯後，官方曾對於東勢角縱谷區的界外地進行清丈。「岸裡大社文書」的「東勢角土地開墾紀錄」，詳載當年 12 月理番同知黃嘉訓對於這塊土牛側埔地的處理⁹⁴：

……又丈得毗連東勢角之土牛角，共民耕田八十甲零八分七厘八毫二絲零八微，石埔二十三甲三分二厘九毫六絲……其毗連東勢角之土牛角丈溢田園亦應定等征租完納充餉。

經丈量後，土牛角埔地的民耕田有 80.878208 甲，扣除乾隆 49 年「番界紫線圖」的圖說所列民耕田（60.03803 甲）後，尚有 20.840178 甲屬於丈溢田園，其租粟則需「定等征租充餉」，即充為「屯餉」。潘敦在乾隆 32 年（1767）閏 7 月原報墾的鹿皮小米餉埔地⁹⁵，仍依番業「例免陞科歸屯」的原則處理，這部分應包括民耕田（60.03803 甲）與番耕田（12.16 甲）。可見自通事報墾鹿皮小米餉埔地後，土牛側埔地的開墾活動，除有漢佃的私墾與越墾外，也有朴仔籬社民的自墾。儘管該空間有數種不同的地權屬性土地，隨後，該地區被統稱為「土牛角餉田」，亦由通事負責招佃耕種⁹⁶：

⁹⁴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東勢角土地開墾紀錄」，AH2334：006、AH2334：016。

⁹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6-01。

⁹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299、AL00777、AL00778。

立轉批執憑字：岸裡社總通事潘明慈。今有原佃黃雲玉，併項黃永可、黃好、柯六院、楊觀保墾耕土牛角餉田伍處，四至坵段載在原墾約內，遞年原納鹿皮小米餉租叁拾貳石捌斗叁升肆合。因本年遇遭洪水沖壞田甲，慈親到丈明，將原租額內議減壹拾石，遞年寔納餉租貳拾貳石捌斗叁升肆合，其屯租仍照冊內原配供納。永為定例，不得爭多減少。今欲有憑，立轉批執憑字壹紙，付照。

代筆（戳記）

乾隆伍拾柒年柒月 日立轉批執憑字（戳記）

立轉批執憑字：岸裡社總通事潘明慈。今有原佃蔡愛墾耕土牛角餉田壹處，四至坵段載在原墾約內，遞年原餉租壹拾石零叁斗捌升。本年因遭洪水沖壞田甲，慈親到丈明，將原租額內議減肆石叁斗捌升，遞年寔納餉租陸石，其屯租仍照冊內原配供納。永為定例，不得爭多減少。今欲有憑，立轉批執憑字壹紙，付照。

代筆（戳記）

乾隆伍拾柒年柒月 日立轉批執憑字（戳記）

立轉批執憑字：岸裡社總通事潘明慈。今有原佃江元昌墾耕土牛角餉田壹處，四至坵段載在原墾約內，遞年共納鹿皮小米餉租叁拾陸石貳斗。因本年遇遭洪水沖壞田甲，慈親到丈明，將原租額內議減壹拾肆石，遞年寔納鹿皮小米餉租貳拾貳石貳斗，其屯租仍照冊內原配供納。永為定例，不得爭多減少。今欲有憑，立轉批執憑字壹紙，付照。

代筆（戳記）

乾隆伍拾柒年柒月 日立轉批執憑字（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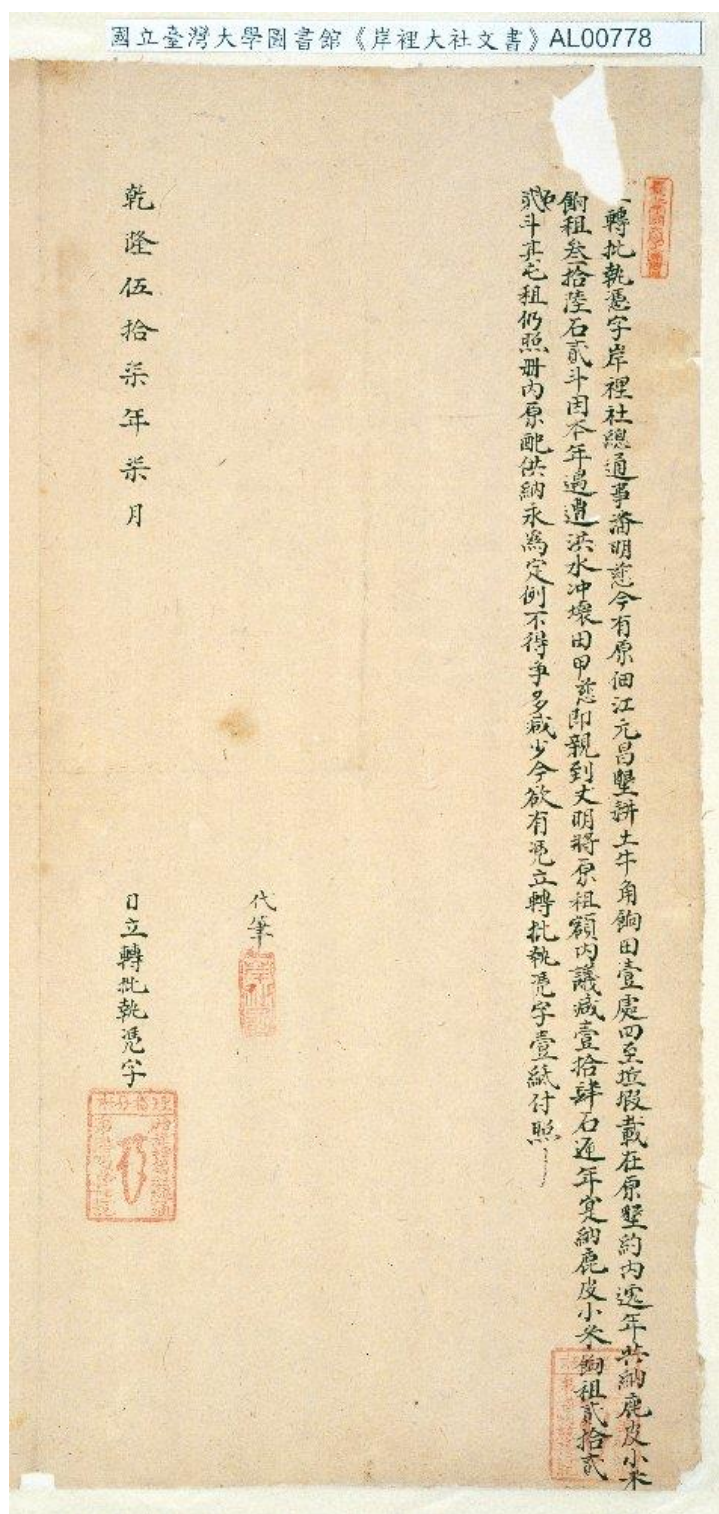
通事開立給原漢佃「轉批執憑字」的緣由，係乾隆 57 年（1792）大甲溪水暴漲沖毀部分土牛角餉田的田地，因之通事以減租方式，彌補漢佃的損失。

根據三張契字文本來看，田地未受溪水沖毀之前，漢佃每年分別繳納 32.834 石、10.38 石與 36.2 石餉租，共 79.414 石。通事稱黃雲玉等人為原佃，可見些漢佃當已在土牛角墾耕一段時間。這幾塊地均需繳納兩種大租：「鹿皮小米餉租」與「屯租」；由此可見，這些漢佃所耕種的土地，同時包括原先報墾的土牛側荒埔，也包含需納「屯租」的丈溢田園。這幾張契字所開列的漢佃，有黃永可與柯六院 2 人，曾在乾隆 34 年（1769）2 月 24 日知縣成履泰開出的差票上，被列為私墾土牛側埔地的「垦犯」⁹⁷；可見至少有這 2 人已在當地墾耕 20 多年。而這些漢佃又與乾隆 38 年（1773）3 月復贖這塊餉埔的黃懷春等 20 股人，有何關係⁹⁸，並未有相關文

⁹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066-01。

⁹⁸ 資料來源：《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上冊）》，頁 363-364。

件足資說明【圖十】。



【圖十】乾隆 57 年 7 月通事潘明慈給漢佃的「轉批執憑字」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岸裡大社文書」影像檔，AL00778。

究竟潘敦原先在乾隆 32 年（1767）報墾的「鹿皮小米餉」埔地有多大？本研究作如下的

推測。

以岸裡社通事阿打歪希在乾隆 38 年（1773）3 月，復招黃懷春等人所墾墾之土牛側埔地「東至埔尾、西至土牛側旱溝為界、南至山崁、北至溪墘為界」為這塊餉埔的大小，由 20 股漢佃將埔地墾成田後需年納 100 石租粟來推算，可略獲悉⁹⁹。以「上則田」每甲地年納大租 8 石來推算，則年納 100 石租粟的土地面積，至少為 12.5 甲，若定等為中、下則田，則面積會更大。由此可略知：這塊餉埔至少為 12 甲以上。而屋鑿等社的鹿皮小米餉，需年納銀三十六兩九錢六分，折算為 52.5 元（壹員折官鑄紋銀 7 錢）¹⁰⁰；以清代平均谷價一石值佛銀壹員計算，屋鑿等社需年納餉 52.5 石。照潘敦原先的說法，該餉埔的租粟，扣除餉稅外，若有餘裕則可充當番社口糧¹⁰¹。光是上述 3 張「轉批執憑字」所載原需繳納的餉租¹⁰²，就為 79.414 石，已超過屋鑿等社需年納餉銀。自乾隆 38 年起，就有為數不少的漢佃在界外的土牛側荒埔墾闢；乾隆 49 年（1784）的「番界紫線圖」的圖說，載有民耕田 60.03803 甲，到了乾隆 53 年底（1788），漢佃已完成 80.878208 甲土地的開墾，內含 20.840178 甲丈溢田園¹⁰³。或即潘敦等人藉由代納番餉而私墾的土牛側荒埔，實難以由表面的理由看待，雖言為權宜，但藉籌餉而營私似乎是更好的解釋。

根據相關文件來看，這塊位於土牛側的埔地，有部分為朴仔籬山頂社的分社加羅佛社（加六佛社）的社民自墾的土地；即「番界紫線圖」的圖說中的番耕田 12.16 甲。亦即，就地權屬性而言，除有需年納「鹿皮小米餉租」與「屯租」的埔地外，尚有社民自管的田園¹⁰⁴：

立當社分撥田業永定歸管字：朴子籬社副通事潘榮興。山頂加羅佛社土目阿沐阿打歪、甲頭打馬高等。今有加羅佛社番婦馬六干阿烏轄，昔年承管遺下，有祖業田四處，一處在東勢角、一處在九房屋庄坎下河唇、一處在土牛等處、一分在石岡庄井頭，計共大小四分……。

嘉慶捌年癸亥五月 日立分撥田業字……

土牛側埔地，何時有朴阿籬社民到此墾耕，並無文件足資說明。自此後，亦未見「岸裡大社文書」中，對於鹿皮小米餉埔地有進一步的記載。

伍、結語

自乾隆 26 年（1761）1 月釐定朴仔籬番界後，界溝、土牛與界碑構成區隔縱谷區的界外與界內空間的實質景觀。劃歸為界外的土牛側荒埔，為大甲溪的河階地，因其平坦且取水不難，

⁹⁹ 資料來源：《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上冊）》，頁 363-364，乾隆 38 年（1773）黃懷春所立的「分墾耕字」。

¹⁰⁰ 根據王世慶的研究：「光緒五年（1879），彰化縣投契稅之銀元一元與紋銀之折率則為七錢，即紋銀一兩等同銀元 1.43 元」（頁 145）。資料來源：王世慶（2001）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銀錢比價變動初探，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頁 141-172，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¹⁰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5-01。

¹⁰²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299、AL00777、AL00778。

¹⁰³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東勢角土地開墾紀錄」，AH2334：006、AH2334：016。

¹⁰⁴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769。

應甚早就吸引對土地有所覬覦之漢人的注意。

根據「岸裡大社文書」的文本可獲悉：潘敦為籌納屋鑿等社的歸化餉稅以及口糧，所稟官墾闢的土牛溝外的土牛側埔地（鹿皮小米餉埔地），伊始就糾纏在法令的嚴禁與權宜、甚或通事等人藉籌番餉而營私的嫌疑之間。歷經數任彰化知縣的處理，做法略有不一。雖越界墾闢是明令禁止，但迫於繳納餉稅的壓力，使得官方以默許、甚或不嚴加反對的模糊態度下，准岸裡社招漢佃墾闢，而以租谷代屋鑿等社繳納餉稅或為番社口糧。

潘敦伊始就以屋鑿等社係為「歸化生番，耕牛農器百無一有」，再加上該地為生埔，開墾需要甚多工本費用，以及繳納餉稅的迫切性等理由，而在知縣同意下，招得漢人黃懷春（即黃開春）等人墾闢此荒埔¹⁰⁵。雖說這是權宜之計，但以本研究對「岸裡大社文書」文本的引用與闡釋來看，「鹿皮小米餉」埔地的開墾，實難脫通事潘敦勾結漢佃，進行營私之嫌。以開墾這埔地之漢佃黃懷春的身份來看，他曾在乾隆 32 年間（1767）擔任岸裡社社記，就此而論，他絕非一般的漢佃¹⁰⁶。本研究在此作如下推論：或許有漢人集團欲墾闢界外朴仔籬土牛側荒埔，而請託潘敦；潘敦則藉由屋鑿等社歸化後需年納「鹿皮小米餉」的說辭，稟官而准墾該地，使得這批漢人得以入墾界外地。以此方式，屋鑿等社並無損失，且雙方各取其利。

這種權宜甚或營私的舉措，使得覬覦土地利益的漢人，得以開墾土牛溝外的荒埔；可說是漢人隨後大舉入墾東勢角縱谷區河階地的開端。隔著大甲溪，而與鹿皮小米餉埔地相望之東勢角界外空間的墾闢，與軍工匠在此伐樟取料，有著密切的關係¹⁰⁷。匠人因採料之故，可自由進出該地；想到界外地活動的漢人，透過與匠人或通事的勾結，而藉匠人之名而出入界外空間，從事「私墾、抽藤、吊鹿、築窯燒炭」等活動¹⁰⁸。土牛溝外「鹿皮小米餉」埔地的開墾方式，甚或東勢角界外空間荒埔的墾闢，皆涉及到數個族群之間利害的糾葛，這可說是東勢角縱谷區所深蘊的歷史特色，也是了解東勢角縱谷區地方歷史、地方性不可或缺的一環。

¹⁰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59-03。

¹⁰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32-01。

¹⁰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055-01、AL00955：081-01。

¹⁰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173-01。

徵引文獻

一、史料與地圖

「國立台灣大學藏岸裏大社文書」(複製紙本),岸裏大社文書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1998)。

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影像檔。

【網址：<http://formosa.ntm.gov.tw/dasir/index.asp>】

「國家文化資料庫」,《岸裡大社文書》影像檔。

【網址：<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載於林玉茹等編著,2015,《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載於施添福,1991,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46-50。

《東瀛識略》(丁紹儀撰),台灣文獻叢刊第2種。

《台海使槎錄》(黃叔璥撰),台灣文獻叢刊第4種。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灣文獻叢刊第152種。

《清高宗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186種。

《彰化縣志》,台灣研究叢刊第48種。

《諸羅縣志》(陳夢林編纂),台灣研究叢刊第55種。

《台灣地形圖》(1998年遠流出版公司複製),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九州出版社),第21冊。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九州出版社),第44冊。

二、後人撰述資料

王世慶

2001 〈十九世紀中葉台灣北部銀錢比價變動初探〉,《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頁141-172,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柯志明

2015 〈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台灣史研究》,22(2)：45-110。

柯志明

2021 《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中)》,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21)

林玉茹

2015 〈「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與十八世紀末的台灣〉,《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林玉茹等主編】,頁14-46,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林玉茹、畏冬

2015 〈林爽文事件前的台灣邊區圖像：以乾隆49年台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台灣史研究》，19（3）：47-9

從廈門到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的重構到解殖

吳鵬基*

摘要

從台灣民間信仰的立場而言，以台灣為主體的優位並未明顯被確立，其主要原因在於追溯其歷史脈絡時，往往牽涉到移民的原鄉根源問題，這無論是在祖先信仰的崇拜演變，抑或是共同信仰的形成，均容易因源頭的追尋，不自覺地陷入傳統民族主義的框架之中，而忽略了其自跨域移民的當下，便已開始發生質變，甚至是在移入台灣扎根後的在地化樣貌，以至於相關的宗教信仰難以在心靈上達到解殖。以近年在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田調的案例來看，過去在論述和書寫上，頗有從歷史論述將移民前後的區域文化作一融合的企圖，並強調其歷史脈絡中的根源，以完整其一元論的權威理解，並成為一種刻意經歷史調查所後設出來的地方共識。然而，隨著林希元信仰於移民在台灣社會中的生活經驗踏溯，這種後設的地方共識，顯然無法解釋移民入台之初，對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的認知和理解，也無法表明何以移民會對民間傳說有自身的著重面向，或者是難以對其當代地方共識、祭祀標的的結合有所契合與交代，由此更遑論多元論述的共存。對此，本文欲從歷史文獻出發，還原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林希元，以凸顯其在中國形成信仰後，與最初移民認知上的相異處，並在隨時間推移下，探討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在台所自成一格的脈絡，以及其如何實踐在地化，進而解殖該信仰的一元論權威理解，以達到台灣優位的多元論述結盟。

關鍵字：林希元、彰化王功、台灣移民、信仰解殖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pogi101300@gmail.com

From Xiamen to Changhua : A Reconstruction and Decolonisation of Lin Xi-Yuan Worship in Wanggong

WU, PENG-CHI*

Abstract

In terms of Taiwanese folk beliefs, a perspective where Taiwan takes predominance has not been clearly established.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tracing of historical context, which involves the issues of immigrants' origins. When searching for ancestral origins, people might unknowingly be trapped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thus affecting how ancestral worship evolves or how common religious beliefs are formed. However, people often ignore the fact that alterations in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ready occurred along with the crossing of borders. In fact, these beliefs have also gained a new, localised appearance after being rooted in Taiwan. Overlooking these factors makes it difficult to spiritually decolonise relevant beliefs. Recent fieldwork on local ancestral worship surrounding Li Xi-Yuan, a wise gentry from Wanggong, Changhua, reveals that in previous historical discussions and writing, researchers made quite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s as one: those prior to and after emigration. Emphasising on the origins of historical context, such methods completed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authority as a monistic concept, thus creating a local consensus deliberately posited th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However, such a meta-local consensus clearly fails to represent how those who first settled in Taiwan originally perceived and understood religious beliefs surrounding the Lin Xi-Yuan ancestral temple, since these beliefs are influenced by immigrants' life experiences in Taiwanese society over time.

Furthermore, these artificial afterthoughts could neither explain why immigrants have their own focus on particular aspects of folklore, nor clarif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consensus and subjects of worship, let alone support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discour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restore Lin Xi-Yuan's character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By doing so, researchers could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orshipping of Lin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w the first immigrants who settled in Taiwan perceived said beliefs. Additionally, this restoration process also enables researchers to explore how, over the passage of time, a unique context of faith was created around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Lin Xi-Yuan in Taiwan. Consequently, researchers could contemplate how the process of localisation was implemen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aith, thus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decolonise the monistic understanding of authority related to the worshipping

* PhD in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pogi101300@gmail.com

of Lin. Ultimately, an alliance of discussion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while also prioritising the role of Taiwan, could be formed.

Keywords : Lin Xi-Yuan; Wanggong, Changhua; Immigrants in Taiwan; Decolonisation of Religious Faith

壹、前言

在論述移民所帶來的台灣民間宗教信仰時，過往多會以其根源作為起始，並重視在原生地的發展，進而忽略其隨移民渡台後，移民所賦予的本質轉變，甚至是習慣以擷取台灣當地信仰的祭祀、儀式片段，以貼近其原鄉的特質，這對於以台灣為主體的宗教在地涵化，無異於是削足適履，以致於失去自身的信仰脈絡，而形塑出與在地化信仰的一元化論述。這一方面源自於移民後代對於原鄉根源追溯的情結，也囿於政權所意欲塑造的家國連結，陷入了傳統民族主義的框架之中，忽略了移民自跨域的當下，該信仰便已開始發生質變，最終難以凸顯以台灣移民文化為主體的優位，也難以達到宗教信仰在心靈上的解殖。

以近年開始為人所關注的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來看，其過往在論述和書寫上，強調傳統歷史當中，明代的士紳林希元是如何形成為人所崇拜人物印象，而其根據地是位於中國的廈門，亦將移民前後的區域文化作一熔爐式的整合，以完整其一元化的論述權威，但實際上這種以傳統歷史為主流性的論述，顯然掩蓋了移民來到台灣後，其自身宗教信仰的發展脈絡，長期以往便形成了一種刻意強調與歷史連結所後設出來的地方共識，這也是何以文化上的去殖民卻遲遲尚未開始，而「臺灣文化」的優位卻尚未確立。¹然而，從近年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所編輯的刊物逐步考察，以及口述訪談的進行，可以發掘出相關信仰在移入台灣扎根之後，不僅僅是有其在地化的樣貌，甚至是有著圍繞著林希元神像所產生的敘事脈絡，且有多種面向表明，其已經從單一姓氏的唐山祖信仰，轉化為在地公眾的共同信仰，也因此在此的論述和認知上，也從封閉的一元化，走向開放的多元化，也在祭祀和儀式上含有更多的包容性，呈現出更多在地化的元素和靈活性。

對此，本文欲從傳統明代歷史文獻出發，藉以還原中國明代社會中的林希元，以呈現其是以中國明代歷史的何種面向形成信仰，繼而從民間故事流傳的脈絡來探詢廈門、金門烈嶼及彰化在選材與著重面向上的不同，並解析區域上是如何抉擇林希元究竟是聖賢、祖先，還是神明？對於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又是如何形成自成一格的敘事脈絡？以及其又是如何從祖先信仰走向共同信仰，以實踐在地化的需求？最後則是透過在地情感的建構，來說明該信仰是如何解殖一元論權威的理解，以達到台灣優位的多元並存的論述。

貳、明代史上的林希元

一、史料、文獻中的記載

生於明代中期的閩南仕紳林希元（1481-1565年），字茂貞，少時又單名巒，號次崖，別號為武夷散人，為福建省同安縣翔鳳里麝圃山頭村人（今廈門市翔安區新店鎮）。其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進士，最初授官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至明嘉靖世宗即位，乃上疏〈新政八要〉

¹ 吳睿叡，《思想的受困：世界重返臺灣》（新北市：衛城出版社，2016年），頁15。

²，主張廢除前朝所設的十三省鎮守內臣，一時聲名大噪，因而被拔擢升官，但隨即因執法剛正不阿與長官爭執，遭貶為安徽泗州判官。在泗州任官的期間，適逢當地水災、饑荒，內亂伺機而起，林希元透過古代治荒的方法，結合自身一系列的試驗，終在三年後將災荒弭平，後因巡按御史酒醉而無禮對待，其乃辭官歸鄉。³

在林希元歸鄉的三年間，中央朝廷爆發了「大禮議」政爭，為了應付首輔楊廷和等保守勢力，與明世宗同為南方人的中央政要張璁、桂萼乃向林希元謀劃策略。⁴待政爭過後，林希元重新被起用為南京大理寺副，並擢升廣東案察司僉事兼嶺南堤學，重新挽救了當地瀕臨破產的鹽、屯二政。⁵而後又因天下饑荒四起，其乃將過往於泗州救荒的經驗總結上疏〈荒政叢言〉⁶，獲得明世宗賞識，並且頒行天下，隨後再被推舉為南京大理寺丞，滿三年後再改認為北京大理寺丞。於大理寺丞任內多次就遼東兵變一事向當權強諫，而被貶為欽州知州。由於欽州當時百廢待舉、民不聊生，且接壤的安南又有政變，因此林希元除了悉心治理欽州外，也藉此倡議主戰安南以收復失土，因此中央朝廷再次擢升其為廣東按察司僉事，並分巡海北兼管兵備珠池，以負責徵集主戰安南的武力。⁷然而，中央朝廷對於用兵安南的意見不一，並且展開政爭，使得林希元最終以拾遺罷官歸鄉。

由於林希元出身於福建同安海濱之地，當地本是依海維生、饑荒寇盜的多發之地，這也無疑使得林希元自幼便有了海洋意識，當時明朝中央厲行海禁的政策之下，林希元也透過早年的親身經歷，將此一地域的秩序和運作，反映在其地方施政上，因而帶出了全然不同於中央海禁構想下的地方視角。從明弘治五年（1492年）所發生的一次海寇侵擾事件，即深刻地形成了少年林希元對海洋貿易的認識，整起事件的事發地為白嶼下方的劉伍店（即今廈門劉五店港區），林希元由此理解到盜劫當地漁民的海寇，原來是裂嶼（即今小金門烈嶼）做轉口貿易的洪姓大族，且地方官員亦參雜其間，以致後來遭受侵擾的地方求助無門。⁸這無疑開啟了少年林希元對於透過海洋進行貿易的觀念，也因此在此後的許多思考、作為上，均凸顯了其成長於沿海的地方觀點與視角，所以在林希元歸鄉閑住後，仍舊是以鄉官的身分，關懷家鄉的事務。

對於中央政府海禁政策的限制下，該地的海洋商貿實際上另有一套屬於該地域性的隱藏秩序，其中海寇、倭患騷擾劫掠的問題頻繁，而佛郎機人並非冊封國卻非法來華貿易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對此，林希元認為即便中央有海禁政策，仍應該以當地民生為優先，因此其除了多次以書信為地方官提供禦寇的策略外，也企圖為有利於民生的佛郎機人來華貿易做政策建議。首先，他認為佛郎機人的到來不但有助於沿海居民的生計，對寇盜的勢力也能有所節制；再者，特別是在沿海地區發生飢荒時，大量窮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多會投身寇盜，使得地方治安

²（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18年），卷一，頁1-8。

³（明）蔡獻臣，〈林次厓先生傳〉，收入《林次厓先生文集》，頁481。

⁴（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復京中故人書》，卷五，頁130。

⁵（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陳民便以達明詔疏》，卷一，頁26-31。

⁶（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頁13-25。

⁷吳鵬基，《明嘉靖年間林希元的地方治理觀念與實踐》（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4年），頁140-199。

⁸（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39、41。

失序、造成破壞，因此在兩相權衡之下，佛郎機人的來華貿易，無疑是利大於弊，所以應該以地方民生和秩序為考量，以突破明代的祖制，讓佛郎機人按例抽分、合法繳稅。⁹然而，隨著寇盜問題的日益嚴重，海禁政策的執行也日趨嚴格，中央厲行海禁政策的大員朱訥，開始掃蕩沿海盜寇，甚至是直接封港，企圖訴諸武力，以極為強硬的方式，將海禁政策貫徹到底。

儘管有許多跡象表明，林希元家族也在從事海上貿易，並且頗具影響力，以至於許多船隻會掛上林府的旗號往來海上。這在厲行海禁的朱訥眼中看來，林希元就是違反海禁、通番接濟的窩主。不僅利用貢舶貿易與海禁政策的限制，趁機交通沿海私商，與外國商人互市，從中獲取暴利，因而獨佔民間貿易之利益，市反抗傳統海禁政策的中心勢力。¹⁰對此，林希元也加大力度展開了種種的反駁，並進一步凸顯地方對海貿依存的現實情況，他也以此為依海維生的在地生民發聲。而後朱訥的死，雖讓海上貿易更加的繁盛，但治安失序的狀況也更加嚴重，以中國人為主的倭寇集團橫行海上、四處劫掠地方。而與此同時，剿滅倭寇、開放海禁的聲浪也逐步成形，其中以林希元最初倡議設置的安邊館，以視沿海為邊疆以安之，其後安邊館演變為靖海館的靖海弭寇的功能，¹¹最後改為海防館的海防管理兼督舶餉等工作，乃至於最終海澄增設縣治等，¹²這一切過程都影響了後來的海禁開放，可以說林希元從在地方民生方面著力，最後影響國家整體政策制定的走向。

另一方面，以林希元的生平表現來說，不僅僅是在政治方面的呈現，另一個較為人所關注的點則是在學思的應用上。從其生平的學思來說，因出生於閩泉海濱之地，所以自幼的成長環境、學習過程都圍繞著父族輩所擁有的海濱產業，這也讓林希元從小的訓練、思維和理念，致力於解決地域社會的實際問題。雖說在踏入仕途的過程中，他仍不免要接受傳統儒家經學的洗禮，但不同於典型的單一師承，在對經學義理的學習過程中，林希元有著更多的是與友人的討論、闡發與辯證，這也讓其在傳統儒學一脈相承的學習框架有所突破。林希元在學無常師的狀況下，以儒家的經學義理定位其為生民立命的目標，而從史學中的案例去汲取經驗，而將其父所教授的實用性技能徹底應用，可以說其將所有的學思實踐到了地方治理層面，¹³這也是何以其作為在受到地方社會崇拜之餘，亦能依靠學思將精神延續，以至於形成信仰。

綜觀上述來說，林希元在仕宦方面有許多的歷程，大致是以中央大員到地方鄉官，再從地方鄉官而為在地鄉紳，當中經歷了多次身分的轉變，但不變的是其透過自身的學思和理念，堅持以地方治理的角度來看待國家政策的利弊與虛實，甚至不惜以自身的仕途來爭取真正能惠及地方民眾的政策。而以著力點來看，林希元從漳泉海洋貿易與盜寇的問題，到泗州災荒的荒政賑濟；從廣東鹽、屯與學政的改革，到北方大同、遼東兵變的處理；從欽州的重建振興，到主

⁹ 吳鵬基，〈十六世紀閩南士紳林希元的海貿觀念〉，收入《「從 Formosa 航向東亞」海洋史論文集》，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未刊稿。

¹⁰ 林麗月，〈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0年），第8期，頁100。

¹¹ 劉玉婷，〈「朱訥之死」與閩南士紳林希元——兼論嘉靖年間閩南區域秩序之變遷〉，《明史研究》，第20期，頁25。

¹² 吳鵬基，〈明嘉靖年間林希元的地方治理觀念與實踐〉，頁261。

¹³ 吳鵬基，〈明嘉靖年間林希元的地方治理觀念與實踐〉，頁42。

戰安南收復失地；從地方的請賑、禦寇，到海貿弛禁、設安邊館等，表現出了其在鄉土、海洋、貿易、邊疆的觀念和治理意識。雖說林希元多次遭到貶謫，在其文集中也多次表達出鬱鬱不得志的情緒，但從後見之明來看，林希元的爭取和犧牲，確實也為往後的地方民眾帶來了正面的利益，因此從其在當時代的相關作為來理解，林希元本身便不再只是作為明代的歷史人物存在而已，更重要的是為地方生民立命的精神傳承。

二、民間傳說的流傳脈絡

對於林希元其人其事，除了史料文獻方面成文記載外，尚有許多流傳自民間的鄉野雜談和傳說。然而，這類的民間的鄉野雜談、傳說並未見於林希元的文集或其著作之中，甚至也未曾出現在當時代的史料文獻記載，然從現今的民間口述訪談與敘事採集中，有關林希元的鄉野雜談、傳說之傳布，實際上比其在歷史方面的真實作為來的廣泛，且傳承上也多半較為人所熟知。對於民間的鄉野雜談、傳說的流傳來看，實際上在不同的地域社會中，有著地域社會間本身所呈現出來的差異性，除了在流傳脈絡上會凸顯該地域社會所著重的面向外，在內容方面也會有所變化，進而形成現今關於林希元信仰上的不同面向。

以廈門同安地區流傳的鄉野雜談與傳說來看，其所採集到的民間故事、軼聞約略有十則，包括：〈大嶝探親種樹〉、〈收烏鴉精〉、〈反迷信（辭教）〉、〈認親〉、〈目金錢做人（木雞腿）〉、〈白嶼約言〉、〈帶兵征討越寇〉、〈鬥氣彭欽廣〉、〈贊家鄉〉、〈直斷犬噬鶴〉¹⁴，但從金門大嶝島、烈嶼流傳至臺灣彰化的相關鄉野雜談和傳說，較為人所熟知的則是有〈大嶝探親種樹〉、〈收烏鴉精〉、〈反迷信（辭教）〉、〈認親〉、〈目金錢做人（木雞腿）〉等；另外，從後來各地的口述採集紀錄中，彰化地區則有收入了一篇〈作女婿〉的傳說。¹⁵由於僅於廈門同安當地流傳的幾則鄉野雜談、傳說來看，〈白嶼約言〉是在講述時任南京大理寺丞的林希元，因見少年洪朝選談吐不凡，便將姪女林瑞英嫁與他，並以家族私產白嶼作為嫁妝，而後白嶼也成為洪厝村洪朝選之父洪鄭川的祀業；¹⁶而〈帶兵征討越寇〉則是在敘述因越寇入侵廣東沿海，時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兼管珠池兵備道的林希元擺兵布陣、動員百姓，使明軍不戰自勝的故事，此一故事可與《文集》相佐，但該鄉野雜談與傳說則更具故事性。¹⁷至於〈鬥氣彭欽廣〉是在說明林希元舉官前因家境貧寒，致使其妻受財主彭廣欽調侃，待日後彭廣欽因殺人背負命案，時任南京大理寺正的林希元拒絕收賄、秉公審理的軼事，而此事則在《林氏家譜》可佐；¹⁸而〈贊家鄉〉則是以明嘉靖皇帝忌憚林希元家鄉風水極好，恐出賢能與之爭天下，因此派周德興到山頭點穴、斷龍脈。另外，〈直斷犬噬鶴〉是林希元任大理寺評事時，獵戶的家犬咬死宮娥的鶴，為免獵戶受宮娥與太監聯手治罪，因此以司法論斷、護民。由此不難發現，僅流傳廈門

¹⁴ 林水波 主編，《理學名宦林希元》（北京：中國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202-221。

¹⁵ 林水樹、陳國政，《濁世廉臣林希元祖》（彰化縣：林希元祖廟第十七屆管理委員會，2023年），頁49-58。

¹⁶ 相關說法曾於2006年5月間，於廈門翔安區馬巷鎮陳下厝村發現一份簽訂於1913年的〈白嶼約言〉，當中曾寫道：「白嶼為洪厝洪鄭川公祀業。」而洪鄭川即為洪朝選之父。

¹⁷ （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賞功謝恩疏》，卷三，頁71。

¹⁸ （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2-4。

同安的鄉野雜談和傳說，多是以林希元為宦後的施政作為進行相關情節的增添，雖說在內容上有許多荒誕、誇誤之處，但多以廈門同安當地的概況為背景，且其出發點也較為貼近史實，其中也不乏有遺址或是文獻可徵。

至於以金門、彰化地區所流傳者的相關內容來看，〈大嶝探親種樹〉是以林希元中舉後，初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後歸省，到金門大嶝島田墘村拜訪母舅鄭撞遲，因見前來迎接的鄉親長老年紀多中、壯年，經查才發現此地深受西北部的海風侵襲，導致村民多中年夭折，因此乃率民堆七星沙墩，並廣植防風林以護當地生計。而〈收烏鴉精〉相傳是發生在大嶝島與蔡厝之間，退潮後會顯現一條名為「蔡厝蹠」的沙洲可走，但傳說該處有一隻烏鴉精，見人踏蹠，便會幻化成美女蠱惑路人，再藉機啄瞎路人雙眼、攝其精血，時任私塾執教的林希元，為了為民除害，乃隻身過蹠，並以襁褓勒死烏鴉精。從這兩篇的內容架構來說，在金門、廈門和彰化地區所流傳的版本均相差無幾，大概都呈現了林希元對於金門大嶝島方面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在走訪當地踏查時，仍然可以見到號稱是當年林希元所親手植栽的喬木及退潮後的沙洲，而後續的篇章則在版本上存在極大差異。

對於〈反迷信（辭教）〉的故事則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林希元在擔任私塾時，因遭人譏笑得錢不如僧人一夜為亡者念經超渡，憤而撰詩反諷神佛之迷信；另一說則是員外禮聘林希元教子讀書，但員外之子不受教，而員外未能嚴管，反而求道禮佛、聘僧說法，因此林希元憤而辭教，並撰詩反諷神佛迷信。而這兩種版本當中所提及的詩文皆相同。另一方面，對於〈目金錢做人（木雞腿）〉，大概是彰化地區最為人所熟知的故事，然而彰化所流傳的版本也與廈門有所差異。在彰化地區所流傳的版本，大致是講述林希元中進士前窮困潦倒，乃削木頭當作雞腿，沾上醬油以畫餅充飢，但恰巧鄰居的雞隻走丟，而鄰居又見林希元餐餐均食雞腿，便誣陷林希元偷雞，後在觀音廟擲筊，觀音也直指是林希元偷雞，但最後卻是在其倒塌的書簍中看見被壓住的雞隻，並取出木雞腿澄清，這才還林希元清白，而在林希元中舉之後，為免神佛迷信之說，因此憤而拆廟。至於在廈門所流傳的版本，則是雞隻在書簍被尋獲後，林希元百口莫辯，含冤莫白，待中舉後，便鑄造錢佛觀音並當眾砸毀、廢掉宮廟，藉此告誡世人莫「目金錢做人」。

而〈認親〉在廈門則是相傳林希元是由蔡姓人家過繼到林家，待林希元中舉後，兩家人搶認親的故事，但在金門地方上則轉變為施姓人家所過繼，至於彰化地區則是又轉變為陳姓人家。然而，值得一提，彰化王功地區部分也祭拜林希元的陳姓，依據此一基礎，其亦認同為林希元的姻親或後代，顯見在各個地方上與林希元家族連結不同狀況。最後關於〈作女婿〉則在民間有眾多版本，雖說主人翁也各異，但內容如出一轍，以林希元作為主角，大概是敘述其未顯貴時，遭到妻家冷落、羞辱，待中舉後則又受到岳父母的款待，顯盡民間社會的世態炎涼、嫌貧愛富，然而依據林希元於《文集》中，並未有相關的紀錄，甚至不乏其對於妻子娘家人物逝世的悼念與追憶，因此該故事或許僅是呈現出早期閩南民間對於中舉的一種社會氛圍，並將此附會於林希元身上。

如果從地域性的流傳脈絡來分析，〈大嶝探親種樹〉、〈收烏鴉精〉等相關事蹟的發生地本

身就位於廈門同安與彰化之間的金門大嶝島，而此地亦為林希元母親鄭瑞娘的娘家，至於金門烈嶼的洪姓大族則與林希元有姻親及商貿關係，是以金門大嶝島、烈嶼皆有相關故事的流傳。而〈認親〉則凸顯了各地域社會基於連結聚族的需求，而將故事對象有所轉換，至於〈反迷信（辭教）〉、〈目金錢做人（木雞腿）〉、〈作女婿〉都是以富人之家驕縱凌貧為背景，其中〈作女婿〉則又與臺灣民間故事〈李門環〉極為相似，¹⁹儘管〈作女婿〉在口述採集中，是以林希元做為主人翁，但故事情節對照歷史文獻進行考證，實際與林希元在親友關係間的互動狀況差異極大，因此該篇可能有張冠李戴之嫌，或是基於當地社會的需要而加以移植成說。

對於地域社會而言，民間的鄉野雜談和傳說顯示了該區域對於人物崇拜所形塑的共識，也意味著該區域基於融合、聚族等實際需求，對於這類鄉野雜談和傳說透過口傳故事有所選擇，甚至是有所加工、改編。以金門、彰化地區所選擇和加工、改編的〈大嶝探親種樹〉、〈收烏鴉精〉、〈反迷信（辭教）〉、〈目金錢做人（木雞腿）〉、〈認親〉、〈作女婿〉等篇章，其內容多集中在林希元的清寒苦讀、奮鬥為民精神，且在實際的主旨上，也多半是以證明其高尚的人格意志為主軸，顯示該地域社會對源自同一標地的民間故事與傳說的著重部份，表現出了基於在地化需求而從不同方面將林希元作為典範的仰賴和信任，這不僅表現在移民社會所重視的風土生存環境的改造、不畏遭人貶低的艱苦打拼精神，也形塑出現今廈門、金門及彰化地區對於將林希元作為祭祀對象的不同詮釋。

參、場域、意識的變遷

一、聖賢、祖先或神格化

對於林希元的定位，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本身有不一樣的定位，但其神格化的形象可謂發生甚早。對於明代社會來說，其當官為宦時是作為地方聖賢的存在，但卻已有初步神格化的情形出現。從文獻之中探尋，這樣的狀況大概有三次，最早的一次是林希元在遭貶官泗州救荒，因其救荒的形象與作為深植於泗州人民心中，因此在他去職之後，當地人民「憶昔謫判泗州，救荒弭盜，所活二千餘人，家家畫像而神事焉。」²⁰再者，則是林希元被貶官欽州時，因積極建設百廢待舉的欽州，以進行禦寇和收復安南失土，並調整當地稅務、政策，以還財於民、活絡地方資本，所以在去職後，收到門人的書信得知「生祠既建……知士民有委曲為予之意。」²¹這兩次均是林希元在世時，當地民眾將其神格化進行祭拜的例子，至於第三次則是在林希元逝世後，且較為確切地以神像、專祠的型態所出現，即是現今位於廈門市同安區大同鎮孔廟右側蘇頌祠堂後面的「林公祠」，據傳始建於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²²然此說未見於文獻。另外，依據明、清時代所修撰的《林希元家譜·文武二進士配享議》中所載：「甲辰（1724年）新廟落成，粧彩神主，孫子奉迎，紳衿入賀，彬彬文雅，嘖嘖稱贊，莫不以名賢起敬、理學為

¹⁹ 林水樹、陳國政，《濁世廉臣林希元祖》，頁 51。

²⁰ （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跋門人張銳書》，卷十二，頁 331。

²¹ （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跋門人張銳書》，卷十二，頁 331。

²² 林水波 主編，《理學名宦林希元》，頁 154。

尊……。」²³該新廟落成應是指位於同安麴園山頭村的「理學賢祠進士第」²⁴，而根據上述所載，顯見在清雍正二年（1724 年）該祠第落成之前，便已有造像膜拜，至落成後才又「粧彩神主，孫子奉迎，紳衿入賀」，而該祠第內的神像仍尚存至今，未遭到毀壞。

從林希元在世時的「畫像而神事」、「生祠既建」，一直到逝世後的「林公祠」、「粧彩神主」，可以見到明、清時期對林希元膜拜、祭祀的形成模式，始於其對地方有所作為，在去職之後，地方民眾或許基於感念，也或是認為其能在災荒時有所庇佑，因此會將其造像作為神祇膜拜，這也可以視為林希元神格化的初始。

由於從文獻上的紀錄來說，林希元被神格化的事發地為泗州、欽州，但今日考察安徽、廣西一帶，目前尚未有發現祭祀林希元的相關舉措存在，顯見林希元最初的神格化型態並未有所延續，反而是在其出生地，當地人以「文宗廷尉」、「理學名宦」、「進士第」等聖賢鄉宦的角度，對林希元進行祭祀與崇拜，並且延續至今。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麴園林氏家廟之中，相關的族系、後代日益繁衍，而林希元所屬的族系也開始有所分支為三房，這也意味著林希元出生地對其的祭祀與崇拜，除了聖賢鄉宦的形象外，也有朝向祖先信仰型態發展的態勢，而對於林希元以祖先信仰型態發展的顯著特徵，便是從廈門往漳州向海外擴散出去的移民祭祀林希元的型態與方式。

從移民的擴散路徑探尋，大致有二條路徑：其一是漳州海澄縣到金門烈嶼，再轉往東南亞；其二則是從漳州海澄縣出海到臺灣彰化王功。由於烈嶼當地的洪姓大族也和麴園林氏有姻親關係，加上林希元於《家譜》所記載到明弘治五年（1492 年）所洪姓大族勾結地方官，而促發的海寇侵擾廈門劉伍店港區事件，²⁵均可佐證漳州海澄縣與金門烈嶼間的來往時間甚早，且互動應當也較為頻繁，而後有一支林氏家族由金門烈嶼轉往新加坡、汶萊，但具體的時間尚不得而知。至於從漳州海澄縣出海到臺灣彰化王功的起始，以當地的口述訪談及《麴園林厝份族譜》的考察，林氏家族是由四房第九世的林晉壁、林晉玉兩兄弟於明崇禎十二年（1639 年）遷台，而臺灣是時為荷蘭統治。²⁶從這兩條路徑來看，前者所發生的時間跨度較大，但其間有明顯的時間斷層，而後者本身雖有確切的時間點可依循，但後續仍有其他房的子孫陸續抵台，時間跨度大致可以延伸到清代中期，例如：林希元所屬的三房第十世、十一世的小英官及其子因逢鄭成功入海，而沿海地區被迫遷界，當時「男女入居界內，不許一人出界，而界外之田園悉皆拋棄，播遷之民十戶九困，不衣不食，相繼淪沒。」²⁷在向內遷界後，小英官之子因無以為繼，乃「從父越界，以取日食，負劫移徙而圖安身……」。自展界以後，雖竭力經營，而家計亦不能成立，年登五旬謀利于臺灣，以水土不宜，遂以身故。」²⁸由此可以瞭解到，小英官及其子為求生存多次越界、移徙，即便後來遷界範圍有所放寬，但仍無法滿足家計，因而渡海來臺。另

²³（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 73。

²⁴ 林水波 主編，《理學名宦林希元》，頁 156-157。

²⁵（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 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 25。

²⁶ 林火能 等編纂，《麴園林厝份族譜》（彰化：林厝份族親會，1994 年），頁 114。

²⁷（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 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 104。

²⁸（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 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 115。

一個關於彰化王功更顯著的例子，則是三房第十三世的子孫林哲，其因「在家不得經營，欲圖外出，因往台灣，亦不能作農，病死臺地番仔挖王爺宮，係山頭人之住所焉。」²⁹文中的「番仔挖王爺宮」即為彰化王功的舊稱，而此地不能作農，屬於倚海維生的海濱之地，因此本在廈門同安倚海維生的麝圃山頭村林氏家族也在此地定居，儘管在對林希元的崇拜上有相同的根源，但從移民的渡海遷居他鄉謀生的角度而言，對於林希元的崇拜實際上已與該信仰的原生地產生了不同的思維模式和自我詮釋。

以彰化王功的林希元聖賢祖廟來說，廟中最早的林希元木造神像，相傳是由四房第九世的林晉壁、林晉玉兩兄弟於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渡海攜至台灣，³⁰而在移民的思維脈絡中，林希元則是明顯形成了唐山祖的信仰型態。由於當時臺灣雖為荷蘭統治時代，但實際上在該地區的發展脈絡中，似乎未見荷蘭東印度公司顯著經營的跡象，而是由遷台的林氏家族二、三、四房在此地戮力經營，在祭祀信仰方面，雖有王爺、媽祖等共同信仰，但在家族及其地方對外的互動上，則是圍繞著以林希元為核心的唐山祖信仰，並且開始發生在地化的轉換，以發展出自身的敘事脈絡，以擴大其信仰的影響圈，逐漸演變成不同於廈門的信仰模式，而是形成王功一帶的共同信仰與在地化共識。

二、自成一格的敘事脈絡

對於林晉壁、林晉玉兩兄弟攜林希元神像入台以來，彰化王功地區便圍繞著林希元神像形成了自身的脈絡，不同於廈門地區的祭祀著重在林希元本身為官仕宦的歷史，彰化王功地區則更加強調的唐山祖信仰來到台灣的發展，以及神像本身在地方上所彰顯的實用性和當地人所嘖嘖稱奇的事蹟，這顯然已經預示了林希元信仰在台灣的新發展與敘事脈絡。

對於林晉壁、林晉玉兩兄弟的渡台動機來看，據傳：兩兄弟原於廈門同安的西山上游的水源地耕作水田，而陳姓則是在東邊下游的水尾地耕種，每年春耕雙方為了爭搶水源，時常發生爭執，就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兩兄弟為了林氏的水田權益挺身而出，最終引發了林、陳間的械鬥，兩人因而逃亡海外來到彰化王功地區。³¹事實上，對於該場械鬥並未記載於《同安縣志》或清代所編纂的家族譜之中，其真實性尚無從稽考，但在通過彰化王功林氏家族的口述認知，並比對彰化王功後來所自編文獻，可以肯定的是，在當代的地方共識中，四房第九世的林晉壁、林晉玉兩兄弟，本身是帶著逃亡、脫離政權的意識，並攜帶林希元神像渡海來台，就在兩兄弟來台後，林氏家族的二房及林希元所屬的三房第十世、十一世、十三世基於經濟謀生的理由，也陸續冒險渡海來到台灣彰化王功。³²

由於在早期的印象中，孤懸海外的台灣，不僅是海盜賊寇的多發之處，彰化王功更是臨海

²⁹（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123。

³⁰ 林連宗，《林希元生平暨祖廟興建紀實》（彰化縣：著者自版，2017年），頁40。另有一說則是於十七世紀中葉清乾隆年間，由金門烈嶼分靈輾轉來台，然考察金門烈嶼和彰化王功的神像型態，卻有外型和祭祀風俗上的顯著差異。林火能等編纂，《麝圃林厝份族譜》（彰化：林厝份族親會，1994年），頁494。

³¹ 林連宗，《林希元生平暨祖廟興建紀實》（彰化縣：著者自版，2017年），頁12-13。

³² 筆者透過田野調查，目前彰化芳苑鄉有二房、四房的林氏宗祠，但並未有三房的宗祠，而在族譜方面，則是有三房、四房的族譜，二房的族譜仍在徵集中。

未開的蠻荒之地，對於林氏家族而言，最初攜帶林希元神像來台的理由，除卻林希元在歷史上有救荒、禦寇和開港通商的功績，亦如共同信仰中的媽祖、王爺等，有祈求海上、闢荒和醫病等效用外，尚有因遷徙欲紮根異地的祭祖需求，隨著林希元神像的來台，也象徵著林氏的祖先在此地安居，因此彰化王功地區也成為林氏家族的遷徙開拓的根據地，開始招攬包括第十三世邦字輩的家屬，以及二、三房的堂兄弟親族，一同來台開拓並且聚族而居。³³

在林氏家族來台後，對於林希元及其神像本身的詮釋，開始有在地化的適應狀態。從對祭祀林希元的起始點來看，據清代續修的《林希元家譜》所載：「迨脩《世宗實錄》時，史館乎本禮部行本省提學查公生死之年月，稱欲為公立傳，茲則〈荒政叢言〉特上之青史矣，仍命有司理學特祠，提學王公世懋祀公學宮。」³⁴顯見當時代的廈門在祭祀上，特別著重林希元在「文宗廷尉」、「理學名宦」、「進士第」等聖賢鄉宦的層面或事蹟，並非作為祖先信仰來崇祀。事實上，即使是現今廈門的林氏宗族，對於祖先的崇祀仍會追溯至林希元的曾祖父林屯叟，並不以林希元為起始。

不同於廈門所著重的聖賢鄉宦，台灣彰化王功地區則是直接將林希元神像作為唐山祖進行崇祀，而這也使得此地區對於林希元民間傳說有所偏重，似乎忽略了有關林希元生前為宦的部分。如同前所述及的〈大嶝探親種樹〉、〈收烏鴉精〉，強調了作為祖先的林希元，對於地方的建設與功勞，而〈反迷信（辭教）〉、〈目金錢做人（木雞腿）〉標榜了林希元的人格，以說明作為其後代所必仿效的精神與準則，〈作女婿〉則是彰顯了移民胼手胝足，不畏他人貶低的意涵。較特別的是在〈認親〉故事中，林希元被過繼的對象，從廈門版本中的蔡姓轉為彰化版本的陳姓，以早期彰化王功地區不同庄之間為了爭奪養蚵用地，時常發生「庄拚庄」的械鬥，以當時彰化芳苑的另一移民大宗便是穎川、鑾井陳姓來看，這類故事的轉變或許說明了一種異姓移民間團結合作的策略，以至於現今彰化芳苑的部分陳姓也認定自身為林希元的後代。

現今林希元聖賢祖廟中，共有兩尊主要的林希元造像，其中一尊被稱為「來台開基祖」，另一尊則是被稱為「在台二代祖」，兩尊的材質皆為烏沉香木。前者是由林晉壁、林晉玉兩兄弟渡海帶來台灣的，而後者則是由鹿港師傅重新雕刻而成的，至於為何會有兩尊林希元的造像，這其中的緣由是與日治時期所發生的一起神尊盜竊案有關。³⁵該案的時間推估約為 1904 年，當時林希元的「來台開基祖」造像為了協助指點木料竊案便以桃枝出字，然而嫌疑犯卻因心虛，唯恐偷竊木料一事遭發現，因而將林希元的神像盜走，並以刀砍、焚化神像頭部，但因神像烏

³³ （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 29。

³⁴ （明）林希元始修（清）林道坦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頁 68。

³⁵ 據地方曾經歷該事件的當事者老林連宗筆述：日治時期王功地區為了發展地方建設，因此備有許多的木料，但卻常常遭竊，是時王功警察所的巡佐要求保正想辦法抓賊，而保正在無計可施的狀況下，乃求助林希元神像桃枝出字，即便所顯現的字直指犯人為「通之外孫」，但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該案乃不了了之。然而，「通之外孫」烏蹄仔卻因作賊心虛，連夜將林希元神像偷走，並打算以柴刀劈砍投入灶火焚化，但僅僅砍了神像部分頭部投入灶火中，便散發出陣陣濃厚的烏沉香氣，為了怕香氣驚動左鄰右舍，因此決定帶往海邊埋藏，後來烏蹄仔也因此發瘋。而後在西元 1948 年，當時正在念小學四年級的林連宗，為了添補家中燒飯柴火，在長輩的授意下，乃將家前炭腳處的「木麻黃樹頭」挖回家曝曬，直至傍晚長輩返家，突見院中的「木麻黃樹頭」好似佛像，後在林連宗的祖父指認下，才確認該樹頭正式遭竊失蹤多年的來台開基祖——林希元神像。

沉香木的材質，經火焚燒而香味四散，未免盜神像一事東窗事發，最終將神像其餘部分埋藏於海邊，直至 1948 年才被意外尋獲，並且修復供奉。在林希元的「來台開基祖」造像失竊的這段期間，彰化王功的林氏宗族另外聘請了鹿港的神像雕刻師重新以烏沉香木雕刻林希元的造像，並以「在台二代祖」稱呼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代行了「來台開基祖」的許多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台二代祖」的神像造型，為鹿港雕刻師根據眾人口述所雕刻、彩繪而成的，之後在找回「來台開基祖」時，鹿港雕刻師又再仿照「在台二代祖」和眾人的口述進行修復，因此兩尊造型相似的林希元造像，不僅神情差異頗大，在冠冕的部分也來自台灣鹿港雕刻師的理解，而與原鄉林希元造像的冠冕也有所不同。

對於林希元「來台開基祖」造像失竊時，林氏家族隨即再請鹿港雕刻師雕刻「在台二代祖」的舉措，實際上有其積極的意義。由於當時對林希元的崇祀，已從最初的唐山祖信仰，逐漸轉換成地方上的共同信仰，祭祀圈的範圍也開始擴大，已經並非單純的僅有林氏家族在祭拜，也開始有異姓鄰人或是他庄的人前來膜拜。而在祭祀的涵義上，除了相關的平安祈福、慎終追遠外，求醫、問事、互助、闢荒或調解糾紛，亦成為了祭拜林希元神像的一項動機。由此便可以瞭解到，對於林希元的詮釋已發生了質變，從早期明、清歷史的單一敘事，直到林希元神像開台後，便已開始廣納、吸收各種的鄉野雜談，並且有其在台的自身敘事和任務，這也表明了一種不同於林希元原生地廈門的脈絡儼然形成。

三、林希元精神的在地化

對於林希元信仰的討論，如若僅是從各區域在信仰上所著重的面相進行探究，勢將導致林希元信仰在東亞區域間（廈門、台灣、金門、東南亞）所展現的整體樣態有所割裂，甚或是在差異性的討論上淪為片面敘事，因此儘管從廈門、彰化兩地的祭祀動機出發，可以瞭解過去以廈門為主的明代歷史性解釋佔有主流地位，但在前述的分析上，彰化王功則是專注在唐山祖信仰為起始，並就林希元的神像為主軸，將民間傳說有所選擇和應用，以形成自成一格的敘事脈絡。然而，這是否意味著關於彰化王功對林希元信仰的崇祀，僅有移民在信仰上的動機和需求，而直接撇除了關於林希元在明代為宦的歷史脈絡？又或者彰化王功地區對於相關的歷史脈絡又是置於何種面向？實際上，對於相關問題的探尋，在與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的長期田調與訪談中發現，其已悄然地將林希元治道為宦的歷史脈絡有所提取，並且進行了一系列的在地精神轉化。換句話說，也就是彰化王功林氏家族將林希元視為唐山祖信仰的背後，隱含著林氏家族本身對於歷史上林希元於朝野為宦思想、作為的崇拜和奉行，而這也轉化成林氏家族來台後，如何維繫、凝聚家族意識的在地化精神表現。

對於林希元在民間文學的方面來看，其本身大都從民間傳說故事、現存的林氏祠廟等角度進行敘述，如 1980 年代所整理出來的〈林希元的木雕像及其他〉³⁶、〈林希元反迷信〉³⁷、〈林

³⁶ 彭炳華，〈林希元的木雕像及其他〉，收入《同安文史資料》（廈門市：同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1984 年），冊四，頁 113。

³⁷ 顏立水，〈林希元反迷信〉，收入《同安文史資料》（廈門市：同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1984 年），冊

希元種樹》³⁸等，而彰化王功地區也藉此著重在林希元發跡時的人格與精神，以表達該地所欲強調的道德教育、警世智慧與幼學教育，由此也凸顯出彰化王功移民的自我內在道德觀。而在《林次崖先生文集》與林希元的易、理思想研究上，一直以來均是其相關研究的大宗，這與閩南理學直接承自南宋朱熹一脈，以及福建為明代理學的重鎮有關，而林希元自稱承蔡清的哲學思想，繼而發揚、創立學說，終為明代中期的易、理思想大家，雖說彰化王功當地不見得對於易、理思想有深入或獨樹一格的見解，但卻有文風教化與為人處世上的意義。

而從林希元在安徽泗州的救難災荒經驗，或是針對明代廣東欽州開拓荒蕪的精神，實際上也體現在彰化王功移民救荒災難的互助，以及不畏艱苦開拓的祭祀核心。由於在明代的荒政論述上，林希元依其泗州救荒的經驗，總結出一折〈荒政叢言疏〉，內容敘述其對古往今來救荒方法所進行的歸納和試驗，並將各種方法加以調整、修改，以對應泗州救荒的環境。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對應於彰化王功沿海一帶，移民時常遭到氣候不良、海水侵襲而陷入生存的困境，與泗州的水災頻仍、飢荒時起的情狀有所相似，對此林氏家族傳統上會透過爐主制度，以林希元的救荒精神做為號召，負責主持贍養救濟、互助扶貧的工作，並且恢復屢遭天災破壞的謀生環境。至於今日位於廣西的欽州，因作為林希元地方治理與官場歷練的一大主軸，因此也是移民所關注的一項焦點。從林希元自撰的《欽州志》³⁹中可以得知，當時明代中央財政失能的狀況下，欽州位於中國與安南接壤的西南邊陲，自然是百廢待舉，當時儘管林希元是遭貶官而來到欽州，但其仍舊秉持其清廉、為民的精神，將欽州整體帶回正軌。而這樣的特點，也讓彰化王功的移民或是地方治理上，喜以林希元的為官之道自居，以作為拉近與當地民眾的距離，或是取得當地民眾信任的前提和途徑，這對於彰化王功的移民在公共服務方面，有著對為宦者的正向約束和道德影響。

另一方面，海洋作為福建沿海居民賴以維生的場域，伴隨著林希元在世時對於海禁的解除與海澄縣月港的開放，海洋也成為了移民渡海來台的交通與謀生方式。從年少林希元於明弘治五年（1492年）所認識到的海寇侵擾事件，似乎便注定其日後對海洋貿易上會有所作為。從其任內多次率兵、民擊退海盜、賊寇外，到後來對於佛郎機人（葡萄牙人）的到來，他也做出了許多辯護，甚至有突破明代祖制，欲讓佛郎機人按例抽分、合法貿易等舉措，甚至捲入了朱紈蕩海自盡一事，最終在明代海貿弛禁史上，林希元透過管理機構的層層演進，促使了漳州海澄設縣，並在明隆慶元年（1567年）開港通商。⁴⁰而在清代續修的家譜中，也幾次提到林氏後人曾與將產業轉賣鄭芝龍，甚至追隨過鄭成功於海上進行貿易，這些都顯示出在林希元對海洋意識及貿易維生的開放性思想。⁴¹而以這種角度出發，也就不難理解林氏家族何以在原生地遭遇

四，頁114-115。

³⁸ 顏立水，〈林希元種樹〉，收入《同安文史資料》（廈門市：同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1984年），冊四，頁116-117。

³⁹ （明）林希元，《欽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冊19》，台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85。

⁴⁰ 吳鵬基，《明嘉靖年間林希元的地方治理觀念與實踐》，頁230-231。

⁴¹ 吳鵬基，〈十六世紀閩南士紳林希元的海貿觀念〉，收入《「從 Formosa 航向東亞」海洋史論文集》，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未刊稿。

嚴重的械鬥後，義無反顧地選擇攜帶林希元神像勇於冒險渡台，並且來到了與原鄉麴園埭（圍海造田）環境相似的彰化王功一帶，繼續依靠著大海維生。

從彰化王功林氏家族的移民角度出發，大致可以瞭解其將林希元治道為宦的歷史脈絡鎖定在民間文學、易理思想、泗州救荒、欽州治績和海上貿易等層面，而這些面向的提取，皆與移民所到社會場域相關，並且將此因地制宜的進行在地精神的轉化，形成一種社會共識以利於該地的凝聚與發展。而這也意味著林希元在歷史上的作為和思想，除了是移民作為後世行為參照典範的唐山祖外，也逐漸在祭祀上成為護佑災荒、順利拓墾、海上平安，甚至是送子添丁的神靈，在這樣相當實際的複合性功能之下，有關林希元信仰的祭祀圈也有所擴大，因其與彰化王功當地人的生活開始緊密結合，影響所及並不僅是林氏家族的祖先崇拜與信仰，而是開始遍及當地其他的異姓人士或家族。這種因於移民和地區特質，進而將歷史涵化的過程，也表明了信仰並非一成不變，或是僅有單一脈絡的解釋，而是會隨著不同的環境需要，形成一種動態、演變的社會共識。

肆、落地生根在地化

一、祖先到共同信仰

從歷史文獻、民間傳說、崇祀目的和敘事脈絡來說，彰化王功的林希元聖賢祖廟已然不僅僅只是以明代歷史所建構的一元化解釋和傳統建構，而是有著區域間的當代多元化表現。在對於林希元從唐山祖到共同信仰的演變過程，除卻轉化歷史脈絡而形成的在地化精神外，實際上也與其祭祀組織的變化息息相關，隨著祭祀組織的演變，也會很直接地影響祭祀圈的擴大，甚至是與台灣當地其他縣市的廟宇間來往、分靈，展現出更多樣的在地型態。

以彰化王功的林希元聖賢祖廟肇建之前，作為林氏家族唐山祖的林希元信仰，起初是以家庭祭祀的型態所出現。早期林氏家族會輪流將林希元「來台開基祖」造像輪流請至家中負責供奉，並非是以家廟的形態出現，通常會在每年林希元的千秋誕辰日（農曆 9 月 30 日）進行擲筊，並選出一位爐主和四位頭家，而林希元「來台開基祖」造像主要是安座在爐主家中，四位頭家則是要出資協助各種儀式和慶典，待來年再透過擲筊，將神像和餘下資金轉交給新爐主。對於爭取爐主的誘因，除了具備林希元神像認證聲望、事業興旺以外，只要獲得安座機會的爐主，家中均會添男丁，⁴²（林連宗 2017:44）因此家族、人丁興旺的誘因下，林希元「來台開基祖」造像成為了爭相供奉的對象。另一方面，隨著林氏家族與在地的連結和開枝散葉，關於林希元信仰在當地日常生活中的分量也日益加重，當地庄民只要是病痛、疑難雜症，多會將林希元的神像從爐主家中請至公廳，藉著林希元祖的乩身驅動桃枝寫詩詞、賜藥方，藉此以緩解庄民的身體病痛。由於當時賜藥方均需從林希元祖神像底座刮削木屑做為藥引，因此當地也盛傳一句俚語：「俺祖那有聖，尻川就要痛。」⁴³由此可知，林希元信仰從最初的唐山祖信仰，進而

⁴² 林連宗，《林希元生平暨祖廟興建紀實》，頁 44。

⁴³ 林水樹、陳國政，《濁世廉臣林希元祖》，頁 8。

形成海貿關土的守護神，甚至是因其在明代災荒賑濟的意象，而成為醫療、施藥的護生神靈，而這也是林希元祖信仰轉化成地方共同信仰的表徵。

由於林希元造像儼然已成為了地方日常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共同信仰，這也是何以林希元「來台開基祖」造像於 1904 年遭竊時，林氏家族會急於聘請鹿港雕刻師，重新再雕塑一尊林希元「在台二代祖」造像，以繼續滿足當地信眾在日常生活上的需求。至於當時被懷疑盜竊林希元「來台開基祖」造像的嫌疑犯——烏蹄仔，據說後來因此瘋瘋癲癲的，似乎是在藉此來躲避群眾的懷疑和追問，因此王功當地也流傳了一句俗諺：「烏蹄仔偷請希元祖——假肖！」⁴⁴由此也可以說明林希元造像失竊的過程，而考察兩座林希元神尊，亦可以確切地證明該事件的真實性。實際上，至 1948 年原失竊的「來台開基祖」神尊被尋回後，兩座神尊開始有了任務上的分工。為了避免神尊再次遭竊，經過林氏家族商討，「來台開基祖」除了每年在爐主家移轉外，不再至公廳舉行任何祭典，如果遇到鄉民請託辦事或拜天公時，則是由「在台二代祖」代為出公廳。⁴⁵而在神尊失而復得後，更加深了該地對林希元聖賢祖的信仰，除卻該神尊在宗教上的祖先、神靈意義以外，或許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才是何以林希元聖賢祖信仰會在當地會如此受眾的原因。

隨著兩座神尊的事務性分工，林希元聖賢祖信仰顯然有著更進一步的凝聚和擴大。主要是「來台開基祖」失而復得的緣故，因此是以林氏家族內部輪轉為主，對於林氏家族及其親屬有更強的凝聚，而「在台二代祖」則是以凝聚本身的基礎上，再次擴大其對外關照的地方信眾，甚至是影響了戒嚴時期的地方軍事建物的拆遷。這種共同信仰的形成到擴大，是以 1982 年當地信眾聯合林氏家族肇建林希元聖賢祖廟作為最顯著的表徵。⁴⁶由於當時建廟的地基與軍方的國有土地相連，且在相連的土地上有軍事碉堡和瞭望台，佔據了部分的建廟地基，對此為了取得完整的建廟地基，且避免軍事設施有損廟宇的觀感，林氏宗親乃透過同鄉的立委、縣長出面與軍方多次協調，後在軍方考量該軍事碉堡與瞭望台早已呈現廢棄狀態，並未有實際的運作，因此乃同意拆除還地，而林希元聖賢祖廟也成功地於當年度的農曆九月落成，而在神尊座位的安排上，「來台開基祖」坐鎮大殿神龕正中，且永駐不再出廟，而「在台二代祖」方便進出神龕，代表「來台開基祖」參與各式參香慶典，則坐鎮在左邊第一順位。

而林希元聖賢祖廟的建成，對於林氏家族在台傳承了數百年的爐主制度也開始有所變革。由於神尊已永駐不再出廟，以方便各地方的信眾隨時可以參拜、求事，因此每年輪轉於爐主家中供奉的型態也自然消停，但每年仍然會擲筊選出一位爐主和四位頭家，除了不再專門由爐主供奉外，其餘的例行性事務依舊維持。由此可知，林希元聖賢祖的供奉場域，已然從私家場域走向了公眾領域，而在場域的開放後，也意味著林希元聖賢祖廟跳脫了宗祠的概念，直接地定

⁴⁴ 林連宗，《林希元生平暨祖廟興建紀實》，頁 46-47。

⁴⁵ 林水樹、陳國政，《濁世廉臣林希元祖》，頁 78。

⁴⁶ 對於現今林希元祖廟的建置過程，還要追溯到吳紹欽、林玉女夫婦的發願捐地建廟。林玉女最初是在海灘上挖取、撿拾海鮮貼補家用時，結識了檢海哨崗的士官長吳紹欽，不久兩人結為夫婦，後在 1982 年因吳紹欽患重症，乃向林希元祖發願，若能脫險，當獻地建廟，而在痊癒之後，乃履行承諾無償獻地，不足的部分則由宗親林東立、林有利補足。

位在異姓共祀的公廟，隨著非林氏家族參與的人數增加，以及公眾對於林希元聖賢祖廟的需求和貢獻程度的加大，為了能讓更多人分享林希元聖賢祖恩澤，林氏家族也順應著多元開放的趨勢，在 2003 年首次開放非林姓的信眾參與爐主、頭家的擲筊，之後由洪姓擔任爐主，⁴⁷這也是林希元聖賢祖作為共同信仰制度化的開端。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林希元聖賢祖廟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也有持續開枝散葉、四處扎根的現象，此一現象具體表現在 2003 年首次開放非林姓的信眾參與爐主、頭家擲筊後，開始有與其他廟宇進行分靈的做法。

總結來說，該廟的肇建並非是出自唐山祖信仰的祭祀，而基於共同信仰的緣故和需要，因此其從渡海來台所顯示出的差異化，到自成一格的敘事脈絡，以至於最終走向多元開放的型態，除了彰顯出林希元聖賢祖的在地化過程，也說明了其從中國古代歷史、民間傳說的一元化敘事脈絡，在來到台灣之後，透過祖先信仰和宗教的在地涵化，無論在場域或者是受眾上，均走向了多元開放的論述。

二、在地情感的建構

從現今地方公眾對林希元本身的情感來說，其建構了地方願意合作、互信的共識，甚或是使信眾相信在地優位的社會紐帶。通常為了能較為系統性地闡述公眾情感脈絡，會針對該地的公眾情感脈絡進行分析，以建立起一套兼顧歷時性與共時性雙重要求的在地公眾情感系統。⁴⁸而在這一方面的考察，如同「情感是靈活的，反本質主義，反決定論，社會建構主義的，具有文化相對性和獨特性。」⁴⁹顯見情感並非一成不變外，個體在與社會情境、文化脈絡互動下所產生、建構的情感，也有著相對應的文化價值及獨特性，由此當能瞭解地方從情感所衍伸的共識與在地優位的社會紐帶。

如從情感來探討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則可以區分為三個面向：個人對於林希元的情感投射、地方公眾對於林希元的動態情感框架，以及個人和公眾在對於林希元聖賢祖信仰的復古與創新。首先是個人基於自身所處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設身處地的思考林希元聖賢祖的歷史脈絡和宗教定位，藉以形成個人對於林希元情感的投射；再者，是地方公眾從宗教信仰的層面上，以不斷動態演變的各種物質與非物質所呈現的情感框架；最後，則是個人以自身所建構的情感投射，在考察地方公眾對於林希元所形塑出來的信仰情感後，不斷地進行參與交流、溝通磨合，以呈現的情感互動，以達到地方共識與在地優位的情感狀態，而這也會成為共享、解決共同體範圍內的好處或問題的關係基礎。

以個人的情感投射來說，無論是林姓、非林姓，可以是攜帶林希元神像渡海來台的移民，也可以是之後陸陸續續跟進來台的移民，也或者是來台移民在此地所繁衍的後代，當然也可以是本身就在當地出身的平埔族。其在所處時代的當下，對於彰化王功地區的社會環境自是有一

⁴⁷ 林水樹、陳國政，《濁世廉臣林希元祖》，頁 83。

⁴⁸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21。

⁴⁹ （德）揚·普蘭佩爾（Jan Plamper）撰 馬百亮、夏凡譯，《人類的情感：認知與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頁 17。

定的認知，因此帶著這樣的認知情境去設身處地的體察林希元本身，皆會產生個人對於林希元的情感投射。這種也許是對歷史文獻的閱讀和口耳相傳，也可能是對民間故事的同理與共感，無論是基於真實的歷史脈絡，或者只是杜撰、附會的後設認知，這都已經是居住在彰化王功地區的個人，對於林希元本身獨具、特有的情感，而這些個人單方面的情感，實際上都是當地情感的單元。

如果進一步將視角延伸到當代地方社會中的公眾，則可以看到不同於個人對於林希元的情感詮釋，而是有著地方公眾對於林希元情感的動態框架。這種地方公眾對於過往人物的情感動態框架，通常以宗祠、寺廟或是紀念館等形式最為顯著，也可能具體表現在對於神像的來歷、服儀裝飾、祭祀場域或供奉儀式等，而這種情感動態框架很顯然是來自於長時間累積和變動的結果。在累積方面，它有著個人對林希元情感的不斷疊加，進而形成地方公眾所能接受的樣態；而在變動上，則有可能是來自於累積的結果，或是突發式的轉變，例如：神像的失竊、失而復得，或是空間場域的改變所造成的儀式、制度的改變等。

至於對於其內涵的來看，儘管該人物或許僅存在於歷史文獻的寥寥章節之中，抑或是有為數不多的實物傳世，但在歷經許多歲月後，其從具體物質的存在，進而昇華為非物質的精神或資產，就會對當代的地方社會產生意義與影響，因此對於地方公眾來說，即便在歷史文獻方面並非老嫗能解，就其在歷史上的生平，在地公眾也都不一定能夠侃侃而談，但卻能基於信仰或是實用的目的，對於過往人物成為地方信仰產生一套說法 and 見解，因此如果能將「日常生活」作為分析性概念，那麼我們對於文獻史料的認識也會發生變化，⁵⁰從而瞭解在地公眾的動態情感框架。

以現今彰化王功地區的林希元聖賢祖廟來說，其情感基礎的建構，除了是個人的情感投射外，地方公眾對於林希元聖賢祖的動態情感框架也是凝聚個人的要素。在最初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透過廟方委員的講述，得以瞭解到希元祖神像遷台的時間和過程，並且最初由林氏家族輪流擲筊擔任爐主，以恭迎至家中祭拜，但隨著許多神蹟的展現，例如：以桃枝出籤詩指點迷津、刮下神像底座為藥引救疾貧苦、護佑鄉民風調雨順出海平安等，所服務的鄉民日漸眾多，且不再侷限於林氏後人，乃逐漸成為地方上的共同信仰。在這段廟方委員的講述中，他們會自豪地以「俺祖」（台語：我們的祖先）來稱呼林希元，並在過程中習慣用「我們」來取代「我」作為主詞，也常常會在各種名詞之前加上「我們的」來說明彰化王功林希元所形成的區域和群體，甚至可以明顯感受到當地公眾以身為林希元後代子孫的自信，以及圍繞著林希元神像所形成的當地鄉土情懷。而其中對於林希元神像在台灣的種種故事，除有當事人現身說法外，林氏家族也不吝於展現廟中的文物、神尊以供證明，以顯示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的開放、包容性。

在個人透過各種參與、互動以被地方接納，甚至是融入該信仰之後，地方公眾也能接受個人基於自身的情感和經驗，不斷地就每一次的活動有所復古和創新，以遵循過去的慣例，但又有別出心裁之處，此點可以從林希元聖賢祖廟不斷加入異姓成員，從事歷史、文化書籍的編纂，

⁵⁰ 常建華，《日常生活的歷史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三探》（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16。

或是與不同廟宇的分靈、參香，以及融合台灣在地信仰如土地公、觀音、虎爺的祭拜可見一斑。這樣有關於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的情感建構，重點便在於個人和地方公眾透過林希元聖賢祖廟而對彼此產生了一種穩定的相互期待與生活模式，進而該地方的共識與在地優位情感，達到此一目的的關鍵，便在於林希元聖賢祖所提供的物質、非物質的共享，這或許能夠視作臺灣民族主義作為地方社會樣貌的雛型。總而言之，彰化王功的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作為該地區的共同信仰，伴隨其所發展出來的在地情感建構，並非是封閉、單一的情感認同，而是具備可溝通互動、開放包容的情感認同，這也使得該地區的林希元信仰所的發展樣貌，相對於其它地區，顯得更加的多元、靈活，以繼續接納和擴大其祭祀圈的範圍。

伍、結論

從歷史文獻的考察來說，以林希元本身為起始，可以瞭解到其在當時代的活躍性，以作為官宦的林希元來說，其思考途徑是以生民立命為優先，因此在許多兩難、艱困的局面，為了堅持一己之信念，常常不惜得罪當權，以至於屢遭貶謫。然而，在諸多的逆境中，往往也考驗出其令人尊崇的人格，這也是何以其還在世時，便有被神格化的跡象，以至於在其逝世後，轉而以聖賢鄉宦的形象被立廟膜拜，但隨著其家鄉的生存環境日趨惡劣，就在其逝世後不久，明末清初的移民先後來到台灣，並將所攜帶的林希元神像作為唐山祖祭祀，由此也與其原生地廈門的祭祀方向有所差異，甚至是在同一根源的歷史內涵與民間故事上有所偏重和抉擇，以至於產生了不同的發展。

以彰化王功林希元聖賢祖神尊所產的敘事脈絡分析可知，該信仰已並非僅是著重在明代歷史所建構的單一敘事發展或解釋，而是圍繞的神尊造像所呈現出因應在地化需求而自成一格的敘事脈絡，而這樣的敘事脈絡也使得彰化王功的林希元聖賢祖不同於廈門所祭祀的脈絡，而是有著多元化的樣貌。由於在林氏家族渡台後，將林希元作為唐山祖祭祀，而這樣的祭祀方向，有助於林氏家族將林希元在歷史上的功績轉化成因應彰化王功社會環境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為了能夠策略性的與當地異姓融合，進而發展出符合當地社會現況的民間故事。

而隨著時間的推進，林氏家族在台開枝散葉，所連結的當地異姓也日漸增加，對於林希元聖賢祖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需求也有所依賴，因此乃逐步發展為共同信仰，標誌著共同信仰的完全底定，可以從爐主家廟到地方公廟，在朝向異姓爐主出現的過程得知，而這也是屬於彰化王功對於林希元信仰所獨有的模式。基於這樣的開放性，其在地情感的建構也呈現出個人與在地公眾互動的雙向性，這種互相接納、復古又創新的情感動態框架，仍不斷的擴大和增添多元論述，由此也達到了台灣在地宗教信仰上的解殖。

總而言之，林希元信仰在台灣的發展歷程中，展現出了其靈活、適應性，而彰化王功的林希元聖賢祖廟信仰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在地環境和需求不斷演進，以形成了具有獨特地方色彩的信仰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林希元的信仰實際上是東亞的區域性信仰，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例如：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均有祭祀林希元的相關廟宇，然而其所呈現的地域性樣貌仍有待日後的考察與剖析。

徵引文獻

一、專書

- (明)林希元,《欽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冊19》,台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85。
- (明)林希元始修 (清)林道坦 續修,《林希元家譜》,福建師範大學藏。
- (明)林希元著 何丙仲校注,《林次崖先生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
- (明)林希元著 林海權點校,《林次厓先生文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18年。
- (德)揚·普蘭佩爾(Jan Plamper)撰 馬百亮、夏凡譯,《人類的情感:認知與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 吳睿叡,《思想的受困:世界重返臺灣》,新北市:衛城出版社,2016年。
- 林水波 主編,《理學名宦林希元》,北京:中國文化出版社,2016年。
- 林水樹、陳國政,《濁世廉臣林希元祖》,彰化縣:林希元祖廟第十七屆管理委員會,2023年。
- 林火能 等編纂,《麤圃林厝份族譜》,彰化:林厝份族親會,1994年。
- 林連宗,《林希元生平暨祖廟興建紀實》,彰化縣:著者自版,2017年。
- 常建華,《日常生活的歷史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三探》,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
-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

二、期刊論文

- 吳鵬基,《明嘉靖年間林希元的地方治理觀念與實踐》,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4年。
- 吳鵬基,〈十六世紀閩南士紳林希元的海貿觀念〉,收入《「從 Formosa 航向東亞」海洋史論文集》,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未刊稿。
- 林麗月,〈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0年,第8期,頁100。
- 劉玉婷,〈「朱紉之死」與閩南士紳林希元——兼論嘉靖年間閩南區域秩序之變遷〉,《明史研究》,第20期,頁25。
- 彭炳華,〈林希元的木雕像及其他〉,收入《同安文史資料》,廈門市:同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1984年,冊四,頁113。
- 顏立水,〈林希元反迷信〉,收入《同安文史資料》,廈門市:同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1984年,冊四,頁114-115。
- 顏立水,〈林希元種樹〉,收入《同安文史資料》,廈門市:同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1984年,冊四,頁116-117。

廟宇・公學校・社區實踐：從《樸樹之蔭》論應用史學的歷史人文

梁右典

摘要

應用史學的核心意義是要能將歷史發生的事件，透過當代史學觀念將其事件意義彰顯並得以讓讀者明白當中意涵，增加並落實文化實踐在讀者心中的認同。其中廟宇與學校皆是當中重要的載體，得以構成歷史人文的具體樣貌。文化實踐的時間空間取決於史學書寫者、流傳者與實踐者三者關聯，本文以日據時期《樸樹之蔭》的書寫意義，給當時的公學校學生閱讀，即所謂 History for the student(s)並在當代如何透過公領域（public sphere）的歷史，達到一定程度上的 History for the people(s)的過程。在當代應用史學的文化實踐中，則是透過種種的歷史儀式感，例如當今舉辦的「『樸樹之蔭文化溯源』感恩典禮」、當地信仰中心配天宮的來龍去脈、以及在地歷史的考察實踐意義，展現一種從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到社區實踐的歷史人文的在地化與當代性。

關鍵詞：廟宇、公學校、社區實踐、《樸樹之蔭》、應用史學

Temple, Public School, Community Practice: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Humanities of Applied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Shade of the Hackberry"

Liang, YuTien

Abstracts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applied history is to be able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through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concepts, allowi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 and to increase and implement the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practices in readers' minds. Among them, temples and school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forming the specific appearance of history and humanity. The time and space of cultural practice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writers, spreaders and practitioners. This article uses the writing significance of "The Shade of the Hackberr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o read to the public school students at that time, which is the so-called History for the student(s) and how to achieve a certain degree of History for the people(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In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applied history, it is through various historical rituals, such as the "Gratitude Ceremony of "Cultural Traceability of the Shade of Hackberry Tree" held today, the ins and outs of Peitian Palace, the local belief center, and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of local history. Meaning, showing the loc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nature of history and humanities from public history to community practice.

Keywords : Temple, Public school, Community Practice, "Shadow of the Hackberry", Applied History

壹、前言

歷史教育不僅僅是存在於課堂知識的建構。此方面至少有兩種意涵：第一，歷史教育不能完全透過文字知識的建構完全支撐，第二，歷史教育須從課堂之外的情境吸收學習，兩者不可偏廢，要能相輔相成。因此，歷史乃是介於知識建構與情境感受之兩端，此中光譜為何值得探索，也需要有更多個案作為分析。如今教育環境已不再告知學子學習歷史僅須記憶背誦，不但無助於史學應用，而且對於陶冶歷史人文之素養也是容易造成負面效果。可以列舉歷史作用的說法甚多，基本上都不僅僅是個人讀史的體會，而是建立在大眾對於史學皆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能夠某種程度的普遍性與應用性，其複雜性更是涉及政治、法律、經濟等等複雜面向，不斷進行改革調適也就成為近二、三十年來最常見的教育議題。¹學界也有學者留意到「歷史的公共使用」(usages publiques de l'histoire/public uses of the past)或「歷史的政治使用」(usages politiques du passé/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的問題。²因此，所謂的「歷史」與「用處」(使用)，乃是較多伴隨著「公共」與「政治」層面，不是純粹的讀史心得。歷史是記載過去發生的人事時地物，究竟是歷史的必然與偶然說法，也凸顯人之作為主體性的存在意義，以及互動過程中的倫理意涵，或造成衝突並思考如何解決，邁向更為成熟健康的社會環境。近來學者就存在主義與社群主義兩種本真理念，探討自主性作為教育目的之合理性且進行反思，理應在此兩端之間取得平衡。³因此，學校與周遭環境的結合，包括廟宇、教堂或其他信仰中心，如何思考社區實踐的種種面向，將社區生活更為緊密地牽連一起，如此也可以開始論述何謂史學應用，當中具有人文精神，所以也才得以論述何謂應用史學的歷史人文。

如何將史學活用，首先應當界定明確定義，歷史應當如何認識，理解過程會產生何種變化，最終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可能答案，而且是否經得起重重考驗，成為真正可以成為應用史學，也得以適用於歷史人文的範圍。關於此方面研究甚多，宋佩芬曾就歷史教學中的 Historical Empathy 進行文獻梳理與意見闡發，他比較 Dilthey 與 Collingwood 兩位最具代表性學者說法是：

Dilthey 與 Collingwood 不同之處，在於 Collingwood 主張他的思想是理性的，排除了直覺與感覺對歷史理解的功能；Dilthey 則認為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認知 (cognition)、情意 (feeling) 與意志 (will) 的互動影響了我們的抉擇。⁴

理性、認知、情意與意志都是造成我們認識之所以如何，以及為何不夠穩定、產生變化的因素，而且在不斷互動過中也會造成影響，或歸於理性或感性兩大層面。Collingwood 的思想史家，

¹ 高明士：《歷史教育》第 14 期（2009 年 6 月），頁 21-34。

² 戴麗娟：〈法國歷史教育的歷史與晚近發展：兼論記憶法律所引起的爭議〉，《思與言》第 56 卷第 3 期（2018 年 9 月），頁 232-233。

³ 簡成熙：《教育研究集刊》70:1 期（2024 年 3 月），頁 123-161。

⁴ 宋佩芬：〈什麼是歷史教學中的 Historical Empathy？〉，《教育研究集刊》第六十七輯第二期（2021 年 6 月），頁 11。

強調理性在認識歷史發展的重要⁵；Dilthey 是哲學家，更訴諸且加上情意與意志的層面⁶，他們的共同之處也都強調個人經驗十分重要，不是超脫世俗的絕對者，而是相對於人際網絡當中。在華人社會中，歷史就存在於廟宇、學校課堂、以及所住的社區鄉里之間。

貳、論《朴樹之蔭》的歷史人文

廟宇、公學校與社區實踐是橫跨時代的議題，也是地理環境緊密相聯的區域觀念，本文所論朴子地區，位於嘉義縣海線城市，過去相關研究主要以碩士論文為主，例如張君豪《朴子——一個近海街市的歷史變遷》⁷、邱美惠《朴子地區傳統刺繡工藝發展現況與策略之探究》⁸、李佳芳《朴子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研究》⁹等等，包括歷史學與藝術學的學科視角，許多研究生深入朴子地區作定點研究，無疑對朴子研究起相當顯著的作用。從歷史學來看，過去對朴子研究多半聚焦於原先舊名「樸仔腳」改成新名「朴子」(1920 年)的過程，比如是「地名」、「街勢」、「市志」，以上可在「朴子街役場」時期的官方資料可以獲得¹⁰。此外，則是隨著傳統刺繡工藝的蓬勃發展，例如上述研究論文，以及相關政府機關計劃案研究。¹¹還有文史工作者的投入，例如邱奕松纂修的朴子市志。¹²其中研究面向觸及甚多，包括朴子歷史建構、考量本土視野、重視產業發展、以及諸多俚語流傳故事等等，但是當中還有值得闡釋的空間，即是關於應用史學，如何就此推廣歷史人文的精神。

關於《朴樹之蔭》的內容及其要義，書背有一段文字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成書的來龍去脈與關懷面向：

「朴樹之蔭」，內容記載的是一九三四年當時以及更早以前有關樸仔腳(現在的朴子市)的地方事。包括有宗教信仰、迷信、交通、農業、朴子的鼠疫、公共衛生、樸仔腳事變、治安、民間見聞、傳說、媽祖廟(現在的配天宮)的由來、牛稠溪(現在的朴子溪)的變遷、王得祿的事蹟等等，並附有鄉土史年表、人口、農作物、行業、教育、民俗活動及寺廟等多種調查統計資料。這本書係由當時在朴子公學校(現在的朴子國民小學)任教的日籍教師分別執筆，經彙集後用手刻鋼板的方式以朴子公學校的名義，於一九三

⁵ Collingwood, R. G. The idea of history (Rev.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⁶ Dilthey, W. 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orks,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human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⁷ 張君豪：《朴子——一個近海街市的歷史變遷》，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⁸ 邱美惠：《朴子地區傳統刺繡工藝發展現況與策略之探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⁹ 李佳芳：《朴子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¹⁰ 朴子街役場編印：《朴子沿革誌》，朴子：朴子街役場，1921 年。以下分別出版於《朴子街勢一覽》(1931 年)；《朴子街勢一覽》(1934 年)；《朴子街要覽》(1935 年)；《朴子街上水道布設工事概要》(1935 年)。東石郡役所：《部落振興會施設概況》，朴子：東石郡役所，1938 年。

¹¹ 陳席卿、鄭淑琴：《刺繡鄉情樸仔腳成果報告書》，嘉義縣：嘉義縣文化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嘉義縣朴子市公所研究，2005 年。

¹² 邱奕松纂修：《嘉義縣志(卷四教育志)》，嘉義，嘉義縣政府，1991 年。《朴子市志》，朴子：朴子市公所，1998 年。

四年七月出版發行。近年來，台灣本土意識提昇，政府重視鄉土教育，是一件好事。當年朴子公學校之所以發行這一本書，用意是要作為國民教育的輔助教材，以幫助學生瞭解鄉土的事務，喚起他們對於鄉土的關懷。回想當年日本在台灣推行的是殖民教育，當然是灌輸學生對日本國的忠誠心與愛國心。然而，在國民基礎教育的小學教學上，竟然如此重視鄉土教育，由任課教師以在當地的所見所聞為背景資料，撰寫輔助教材。當年日籍教師對於鄉土教育的用心與重視，令人敬佩。¹³

朴子於 1920 年從樸仔腳改名至今，相關歷史教育多半要從檔案、論文得知，鮮少有從鄉土教育立場出發，因為書中譯者會說「當年日籍教師對於鄉土教育的用心與重視，令人敬佩」之語；同時，又因是「殖民教育」所致，也不免帶有「對日本國的忠誠心與愛國心」。書中涉及朴子信仰中心——配天宮媽祖廟、朴子公學校以及朴子各個社區所發生的地方事，可謂結合「國民教育」與「鄉土事務」，當中的「歷史人文」是可見的，「應用史學」的範圍也可以從此獲得認識。

林初梅曾比較 1930 年代時期，關於灣生與臺灣學童的認同問題，發表〈比較日治時期小／公學校的鄉土讀本：灣生學童的鄉土意識及臺灣學童的日本認同〉，內文提到：

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小學校詳述日本領臺前的歷史，讓灣生學童認識臺灣，而公學校則代之以日本領臺後的治績，期待透過近代化的描述，凝聚臺灣學童對日本統治的認同。¹⁴

兩者差異在於如何認識臺灣現況，包括日本如何領臺至今，以及日本領臺後的治績。換言之，鄉土認同與政治認同難以區分，因此史學應用上也不免帶有濃烈的政治氛圍，以致於在「鄉土」與「國土」之間，被賦予不同的認識重點與功能使命。因此，要如何訴說應用史學的實際範例，在此段時間的歷史教育也就成為值得論述的議題，亦有其思考面向值得點出，日本學者近藤孝弘指出：

歷史科和其他學習領域相比較，是極度缺乏實用性的一個科目，但卻是賦予我們身為一國國民定義之有效方法。¹⁵

本文無意商榷何謂國民定義之議題，但是此處「國民定義」基本上涉及「認同」，不必然是政治方面，而可以是對於歷史人文的重視，這是應用史學可以著力之處。而《朴樹之蔭》所提的廟宇、公學校與朴子地區的生活面貌，能夠讓讀者感受鄉土生活，包括自然與人文景觀，根據學者研究：「日治時期所編輯的鄉土讀本，無一例外，皆受到高度的評價」¹⁶，理應對於當代史

¹³ 朴子公學校日籍教師群著，施嘉明譯：《朴樹之蔭》，臺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7 年。

¹⁴ 林初梅：〈比較日治時期小／公學校的鄉土讀本：灣生學童的鄉土意識及臺灣學童的日本認同〉，《臺灣學通訊》第 93 期（2016 年 5 月），頁 21。

¹⁵ 近藤孝弘：《國際歷史教科書對話》（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年），頁 2。

¹⁶ 林初梅：〈台灣鄉土教育思潮中的「日本」：鄉土教材及教科書如何詮釋「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灣學誌》第二期（2010 年 10 月），頁 113。

學研究充滿實質意義。

至於，《朴樹之蔭》的內容與價值，應當如何定位，可以從當時公學校的教師〈序言〉可見：

現在，我們朴子公學校大多數的在校生和畢業生，都是以朴子街為鄉土，自覺有責任將來要為其發展而努力的人。因此，為了使學生充分了解鄉土，學校日常的教學必須更加鄉土化。於是，從前年開始，全體教職員分工合作，從事各項鄉土教育資料的調查。去年，更進一步對於如何將這些調查所得的資料，納入各相關教育課程的具體方案，進行研究討論。再者，另以現今鄉土材料為主，特別為高學年兒童及畢業生撰寫學習讀本。這些工作若多少有助於認識鄉土，並拋磚引玉，鼓勵更多人因為關心鄉土而從事鄉土研究，則幸甚。本書在匆忙中完成，文具的推敲不很充分，材料也從比較有趣味的部分挑選，既無連貫性也無統一性。因此，作為鄉土讀本深感不足，今後想逐步修補修正。昭和九（一九三四）年七月。¹⁷

從公學校教師的〈序言〉可以歸納幾點並展開論述：第一，「自覺有責任將來要為其發展而努力的人」，前提建立在對於鄉土的認識，借用現今應用教學的要義來說，即是包括「認知、情意、技能」的合一，也是看重推動鄉土教育的功能在於「培養學生對鄉土的情感及責任心」。¹⁸第二，關於「鄉土教育資料的調查」，書中附錄二，介紹「鄉土的調查方法」，包括「自己的房屋」、「本街的人口動態」、「土地價格的變動」、「本街的職業」、「本街的農業」、「交通調查」、「部落別的各项調查」、「寺廟的調查」、「教育」、「遊戲、娛樂的調查」、「街民性的調查」、「本街主要日常用品的價格」、「兒童每年例行的慶典活動表」、「死亡者調查」等等，基本上扣合街民的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活需求，也反映朴子在當時正在步入逐步穩定成長的階段，更重要的是「教導學生如何做調查，並告訴學生調查統計的重要性」（頁 98）。關於如何做鄉土調查，先前學界也進行調查報告，可以做法及其他需要留意事項包括：

(1)師資方面：應由政府培養鄉土教學的專門師資，或是訓練種子教師來負責教授鄉土課程；(2)課程安排方面：由政府統籌負責整個課程教材的規劃，制定共通的教材大綱或標準，或是制定將鄉土教學融入其他各科教授的原則，作為各校參考的依據；(3)課程內容方面：授課應以質的考量為重，提出要能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就是除讓學生了解傳統背後的意義外，也能在賦予新的生命與意義，並以可以引起學生們興趣的主題為教授內容。教授之主題應「從小到大」，譬如從學校，延伸到社區，再到社會，以循序漸進的方法進行。同時亦要考量學生吸收和負擔的能力，並且要注意在內容上要能夠取得不同族群間之間的平衡與和諧；(4)課程教授方面：需要有家長的配合和協助，

¹⁷ 朴子公學校日籍教師群著，施嘉明譯：《朴樹之蔭》，序言頁 5。

¹⁸ 蔡清田、雲大維：〈影響國小教師鄉土教育課程決定因素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第二十九期（2007 年 12 月），頁 114。

更要與社會環境有所配合，結合社區的相關資源，尋求相關單位的支援。¹⁹

目前學界所列鄉土調查應留意事項，從師資、課程安排、課程內容與課程教授著手，大致上是課程設計的範圍，如今需要再考量資訊素養的學習應用，使得史學應用得以與科技結合。因此，在目前的調查方面也會採用結構化的問卷調查²⁰，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但基本上在《朴樹之蔭》已有基本規模，而且調查有地緣關係，也伴隨著對居住環境的深切認識。這是他國也常見的現象，例如戴麗娟在其〈法國歷史教育的歷史與晚近發展：兼論記憶法律所引起的爭議〉²¹提到：

而長期與歷史科相伴隨的地理教育，使學童認識自己所生活的鄉土、國土，有助於形塑共同體的感受，也讓不同移民的後代對國家疆域產生認同感。

在《朴樹之蔭》可以看到歷史與地理教育的結合，甚至保留許多現今看不到的景觀描述，鄉土與國土感受建立在共同生活的環境，觀察與調查是對其深入認識的不二法門。書中針對對象是公學校學生，並沒有觸及日本學生，而且隨著二戰結束，離成書時間十一年，至少影響一批不算少數的學生，但因時間與關注角度等等因素，未來得及開展日本學生的學習狀況，或是公學校學生畢業之後，對於鄉土的認識情況是否仍有日益增進認識，則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此外，關於「納入各相關教育課程的具體方案」與「鼓勵更多人因為關心鄉土而從事鄉土研究」，對於現今教育課程設計也具有啟發作用，更重要的是理論知識與實地調查的結合，具有課程統整的功能與意義，而且之所以要鼓勵更多南關心鄉土，不僅僅著重在「認同」一類意涵，其實就其普遍性意義來說，「多元智力」的概念學習與運用，能夠透過應用史學的歷史人文達到多樣指標。例如賴羿蓉、李田英〈多元智力與教學〉²²，在此文中提到：

Gardner 的多元智力理論特別強調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應避免只使用單一種的教學策略或教學活動，以避免在次教學策略中處於弱勢的學生無法有效率的學習，教師應盡量利用多元的管道幫助學生學習，讓學生能在不同的教學方式中，利用自己的強勢智力來學習或是在這些多元的教學活動中發展其較為弱勢的智力。

回到《朴樹之蔭》作者群來看，實已包括多元智力的內容，例如語文表達、邏輯—運算（分類、分等、概括、推論）、空間、人際、內省等等，在當時年代實屬不易。而且，就此來看似乎不分「強勢」或「弱勢」智力，反倒是強調一種風土民情的內涵，將調查資料賦予更豐富的歷史人文精神，很能凸顯應用史學的意涵。

¹⁹ 林珊如：〈台灣國中與國小鄉土教育教師資訊需求與搜尋行為調查報告〉，《圖書資訊學刊》第4卷第1/2期（2006年6月/2006年12月），頁69。

²⁰ 可參考 Case, D. O. *Lookin for Information: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eeking, Needs, and Behavior*. Academic Press, 2002.

²¹ 戴麗娟：〈法國歷史教育的歷史與晚近發展：兼論記憶法律所引起的爭議〉，《思與言》第56卷第3期（2018年9月），頁257。

²² 賴羿蓉、李田英：〈多元智力與教學〉，《科學教育月刊》第222期（1999年9月），頁8。

參、論《朴樹之蔭》的應用史學內涵

本文論《朴樹之蔭》用意在於凸顯它的應用史學內涵，可以從書中附錄一〈致鄉土的青年〉得知：

重要的是要培養能觀察鄉土全貌的眼光，有價值的一定要盡量去發展，不好的就要加以捨棄，並向外引進他人的長處。有心的人在路上走，看到兩旁的樹木，相信不會忘記在那裡隱藏著的學問。他會想：那些樹木有什麼用處？為達成某種目的有無其他更好的樹木等等問題。²³

培養能「觀察」鄉土全貌的「眼光」，不是僅有調查數據，而是為何要做之觀察心態與方法，以此培養一種整體眼光，方能分辨得出有無價值的鄉土史料，能夠進一步去蕪存菁，避免無謂的支蔓。目的讓所在土地上的人事物愈來愈好，為達到此種目的，自然會提問設想，應當如何使其更進步。在此先了解所處生活無疑是首要之務。法國大史學家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說：

了解活生生之物的本質，實在是歷史學者的主要特質。²⁴

此句要義不僅僅是歷史學者的主要特質，同時也是一般讀歷史的學子所應留意之主要特質，歷史用處在於其可提供「了解活生生之物的本質」，而不是記憶與背誦。換句話說，應當是能夠興起對於時空種種構成因素具有有機的、全面的綜合認識、研究與批判，逐步往其「本質」層次靠近。倡導鄉土史的芬柏格也提醒留意不要淪為井底之蛙，所以提醒全體可以照亮部分，部分可以照亮全體的說法。²⁵對於鄉土史或地方史的閱讀不能限於部分，同時亦有其積極作用，可以達到部分與全體相互呼應。綜合以上兩位學者之說，歷史應用的價值在此得到有力的凸顯，《朴樹之蔭》的作者更是鼓勵學子應當能夠留意「觀察」，拓寬「相關領域」，明辨「價值」且得以加以「發展」。如此看來，也不僅僅是思辨本質一類的智力活動，也能提供改善所處環境的動力與目的。

《朴樹之蔭》的應用史學內涵，能與教育哲學理念相契合，史學與哲學及教育學可融合並用，陳玉玲〈論鄉土教育的理論基礎〉內容提到²⁶：

在鄉土教育的課程設計方面，從 Rousseau 的自然主義和 Locke 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中可知，應該儘量設計讓兒童從自我親自的生活體驗中，領悟出自然的純真與本善……在鄉土教育的教材方面，從 Dale 的經驗塔理論與 Dewey 的實用主義來看，凡是學生用其全部感官來親自參與的直接經驗與活動，他們都有很高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才能使學

²³ 朴子公學校日籍教師群著，施嘉明譯：《朴樹之蔭》，頁 67。

²⁴ 布洛克（Marc Bloch）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年），頁 47。

²⁵ 可參考 H. P. R. Finberg, *The Local Historian and His Theme*.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5.

²⁶ 陳玉玲：〈論鄉土教育的理論基礎〉，《國民教育研究學報》第四期（1998 年），頁 157。

習者主動地建構知識，成為有意義的學習。

不論是哪一家學說，從《朴樹之蔭》所述內容來看其理論呼應，其實都可見到許多教育哲學的影子。「感官體驗」、「親身經歷」、「知識建構」等等皆可從史學中獲取得知，不脫離從身旁歷史著手，豐富孩童的認知、情意與技能。

要如何應用諸如《朴樹之蔭》的內容，參照現今學者研究，可以找到某種程度上的聯結。可參考吳品賢〈地方教育如何為鄉村發展增能？兼論美濃如何使其可能〉²⁷內文提到：

在培力學生農藝身體知識與鄉土文化力的同時，創生人們對經濟與發展的另類認知，便是促成鄉村雙重性對話的開始。龍肚國小與美濃的地方教育提供的，不僅是農意識與認同感，經由身體實作與行動參與，也提供行動者為了回應農村問題、改變城鄉結構關係的另類行動模式。在情感上，我訪談的年輕校友無論是否從事社區相關工作，皆流露出對家鄉、對農村的情懷，以美濃或南臺灣的就業為優先選擇。

鄉土知識現今稱為「鄉土文化力」，關於身體知識、實作課程也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環節，並與「農藝」息息相關。同時也對於人們看待經濟與發展的認知不盡相同，可以在「本地」與「他地」之間進行「雙重性對話」。上述引文是以美濃地區為探討中心，不僅是對於對農意識與認同感，也強調實作與參與，建立另類行動模式。而且，此種模式執行帶動下，能夠吸引或延續對於家鄉、對農村的情懷，至就業返鄉的契機與動力。

肆、結語

《朴樹之蔭》書末有一篇〈致鄉土的青年〉，很適合作為本文結語，試徵引段落如下並加以闡述：

想起小時候的我，時常聽到「自家的年糕比不上您家的小米丸子」這樣的話，年輕人只要是時髦的事，不假思索就去追求流行，甚至認為這就是發展，就是進步。這樣的人好像很多。對於每日見慣的事物，反而不知道其價值。有人評論本島人的衣服說：「本島服是全世界第一經濟且便利的衣服」，這是很值得大大玩味的一句話。總是勞動至為便利，洗衣服時也不必解開一顆扣子。儘管如此，青年人竟脫下便利的衣服，特意改穿不便於勞動的衣服。有一戶人家，兒子繼承家業後，就將父親在住家周圍長時間苦心培植的木麻黃活牆，毫不惋惜的加以伐倒，改築為磚牆。²⁸

「改築為磚牆」這是因為考慮氣溫與土壤原因，而又必須建立在對於家鄉環境的深切認識。可惜的是多數人習焉而不察，也不明白長輩何以如此，僅是代代相傳而已，更甚者竟然毫不珍惜，反而適得其反。如此一來，自然視歷史於無用之處，不知其價值，但又自相矛盾，如同上述所

²⁷ 吳品賢：〈地方教育如何為鄉村發展增能？兼論美濃如何使其可能〉，《臺灣社會學刊》第 71 期（2022 年 6 月），頁 33。

²⁸ 朴子公學校日籍教師群著，施嘉明譯：《朴樹之蔭》，頁 66。

言「本島服是全世界第一經濟且便利的衣服」，但同時又做出「改穿不便於勞動的衣服」。此皆是日常生活小事，卻在當時公學校教師的細心觀察下得以保存這些史料，也可以讓讀者想像當時情景，其實心理距離並沒有那麼遠。如今看來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從 **History for the student(s)** 到 **History for the people(s)** 的過程解讀。歷史如何活用，首先得走入人群之中，能夠產生連結，創造意義，並且留心生活周旁的細節，得以讓生活與史學打成一片，逐步思考、參與及實踐，終將獲得一種「應用」的樂趣。換言之，歷史在其中的人文思想常常被忽略不談，但在當中實在可以處處發現趣味，《朴樹之蔭》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材，由此看到當時的廟宇、公學校與社區實踐，皆環繞於日常生活，如今亦不遠，仍是朴子地區的重要地標，凝聚認同情感，有賴於對史學應用與應用史學的認知實踐日益深刻，發揮當中的歷史人文精神。

參考書目

- 布洛克 (Marc Bloch) 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
- 朴子街役場編印：《朴子沿革誌》，朴子：朴子街役場，1921年。
- 朴子街役場編印：《朴子街上水道布設工事概要》，朴子：朴子街役場，1935年。
- 東石郡役所：《部落振興會施設概況》，朴子：東石郡役所，1938年。
- 朴子街役場編印：《朴子街要覽》，朴子：朴子街役場，1935年。
- 朴子街役場編印：《朴子街勢一覽》，朴子：朴子街役場，1931年。
- 朴子街役場編印：《朴子街勢一覽》，朴子：朴子街役場，1934年。
- 吳品賢：〈地方教育如何為鄉村發展增能？兼論美濃如何使其可能〉，《臺灣社會學刊》第71期（2022年6月），頁1-56。
- 宋佩芬：〈什麼是歷史教學中的 Historical Empathy？〉，《教育研究集刊》第六十七輯第二期（2021年6月），頁1-39。
- 李佳芳：《朴子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 林初梅：〈比較日治時期小／公學校的鄉土讀本：灣生學童的鄉土意識及臺灣學童的日本認同〉，《臺灣學通訊》第93期（2016年5月），頁20-21。
- 林初梅：〈台灣鄉土教育思潮中的「日本」：鄉土教材及教科書如何詮釋「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灣學誌》第二期（2010年10月），頁107-125。
- 林珊如：〈台灣國中與國小鄉土教育教師資訊需求與搜尋行為調查報告〉，《圖書資訊學刊》第4卷第1/2期（2006年6月/2006年12月），頁49-76。
- 近藤孝弘：《國際歷史教科書對話》，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年。
- 邱奕松纂修：《朴子市志》，朴子：朴子市公所，1998年。
- 邱奕松纂修：《嘉義縣志(卷四教育志)》，嘉義：嘉義縣政府，1991年。
- 邱美惠：《朴子地區傳統刺繡工藝發展現況與策略之探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高明士：《歷史教育》第14期（2009年6月），頁21-34。
- 張君豪：《朴子——一個近海街市的歷史變遷》，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陳玉玲：〈論鄉土教育的理論基礎〉，《國民教育研究學報》第四期（1998年），頁143-164。
- 陳席卿、鄭淑琴：《刺繡鄉情樸仔腳成果報告書》，嘉義縣：嘉義縣文化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嘉義縣朴子市公所研究，2005年。
- 蔡清田、雲大維：〈影響國小教師鄉土教育課程決定因素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第二十九期（2007年12月），頁89-122。
- 賴翠蓉、李田英：〈多元智力與教學〉，《科學教育月刊》第222期（1999年9月），頁2-15。

戴麗娟：〈法國歷史教育的歷史與晚近發展：兼論記憶法律所引起的爭議〉，《思與言》第56卷第3期（2018年9月），頁231-270。

戴麗娟：〈法國歷史教育的歷史與晚近發展：兼論記憶法律所引起的爭議〉，《思與言》第56卷第3期（2018年9月），頁231-270。

簡成熙：《教育研究集刊》70:1期（2024年3月），頁123-161。

Case, D. O. *Lookin for Information: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eeking, Needs, and Behavior*. Academic Press, 2002.

Collingwood, R. G. (1994). *The idea of history* (Rev.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lthey, W. (2002). *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orks,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human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 P. R. Finberg. *The Local Historian and His Theme*.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5.

史學與合唱藝文的應用結合： 以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音樂企劃為範例

鄭睦群*

以八角塔男聲合唱團草創於2005年，起初為多位淡江中學校友的興趣團體，成員主要都是基督徒，活動也以為教會獻詩服事為主。在經多年發展後，如今不論是營運規模或是藝術水準，在台灣的男聲合唱團排名第三。不僅多次在國家音樂廳、衛武營音樂廳演出，國內外賽事亦屢獲佳績，2024年7月更奪得寶塚國際室內合唱大賽同聲組銀獎，25隊參賽隊伍名列第十名。八角塔男聲合唱團之所以能穩定成長，除了摸索自己的商業模式之外，音樂會或是專輯企劃皆以歷史為經緯，並以基督宗教與台灣人文為主軸，在票房或銷量上亦有亮眼的表現。例如2015年出版之專輯《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榮獲第27屆傳藝金曲獎之「最佳宗教專輯獎」，也在2018年8月在國家音樂廳舉辦專場音樂會；2024年10月舉辦的「台灣的棒球詩篇」音樂會，除了創下與中華職棒大聯盟合辦的先例，會後球迷的廣大迴響更敲碗成功台中場與高雄場。本文以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音樂會與專輯企畫為敘事中心，研究史學與合唱藝文結合產業文化的實際案例，期待引發更多討論與火花。

關鍵字：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台灣的棒球詩篇、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應用史學

* 作者係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創團團長與現任營運總監，輔仁大學/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y and choral arts:

Take the Octangle Male Choir's business plan as an example

Cheng MuChun

The Octangle Male Choir was founded in 2005. It was originally an interest group of many alumni of Tamkang Middle School. Its members are mainly Christians, and its activities are mainly dedicated to singing poems and serving the church.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now ranks third among male choirs in Taiwan in terms of scale of operation and artistic level. Not only has it performed many times at the National Concert Hall and Weiwuying Concert Hall, but it has also won many good result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etitions. In July 2024, it won the silver medal in the unison category of the Takarazuka International Chamber Chorus Competition, ranking 10th among the 25 participating teams.

The reason why the Octangle Male Choir has been able to grow steadily is that, in addition to exploring its own business model, its concerts and album planning are all based on history, with Christianity and Taiwanese humanities as the main axes, and they are also successful at the box office or sales. Eye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the album "MacKey's Life Psalms Journey" published in 2015 won the "Best Religious Album Award" at the 27th Golden Melody Awards. A special concert was also held at the National Concert Hall in August 2018; it will be held in October 2024 The "Formosan Baseball Saga" concert not only set a precedent for being co-organized with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CPBL),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fans after the concert prompted the Octangle Male Choir to add concerts in Taichung and Kaohsiung.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certs and album planning of the Octangle Male Choir as the narrative center, studies the actual case of combining history and choral art with industrial culture, and hopes to spark more discussions.

Keywords : Octangle Male Choir, Formosan Baseball Saga, MacKey's Life Psalms Journey

壹、關於八角塔男聲合唱團

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淡江中學的合唱傳統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源自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長老教會)設立的新北市立淡江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淡江中學)，而該教派也被稱為「唱歌的教會」。1872年3月9日，加拿大首位海外宣教士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俗稱馬偕博士)抵達淡水，展在北台灣的宣教生涯。雖然教界與學界通常認為吳瑪利宣教師(Margaret Mellis Gauld, 1867-1960)是台灣的「教會音樂之母」，但筆者認為馬偕博士才是奠定「唱歌的教會」的最關鍵者。不論是帶著地方教會信徒動輒數小時的唱詩歌，又或將詩歌列入理學堂大書院 (Oxford College, 俗稱牛津學堂) 的教育，事實上都是在耕耘長老教會唱詩歌的沃土。⁴⁶⁵

淡江中學的創校與其合唱傳統可追溯至日治時期，有著濃厚的基督教色彩。1914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宣偕叡廉牧師(George William Mackay, 1882~1963)設立淡水中學校(淡江中學前身)，該校不僅北部長老教會的教育重鎮，教會學校的屬性更強化了音樂教育中的唱詩傳統。1921年，被譽為「台灣橄欖球之父」及「台灣合唱之父」的陳清忠自日本同志社大學歸國，除出任淡水中學校的英文教師之外，也在校內組織了全台第一個男聲合唱團，為淡江中學開創了獨特的男聲合唱傳統，也曾遠赴日本巡迴演出。二次大戰結束後，曾在皇民化時期被日本財團接管的淡水中學校重新回到長老教會旗下，校名也曾「淡水」改為「淡江」。1950年代淡江中學與純德女中合併為男女合校，但男聲合唱文化(合唱團與四重唱)依舊延續至今，並且在1994年設立音樂專班。⁴⁶⁶

二、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起源

2005年3月5日淡江中學校慶的午後，幾位昔日參加四重唱的校友因懷念過往在校的唱歌的回憶，因此決定組織校友四重唱，延續以信仰的熱愛及對歌唱的喜好，當時的團名是「淡江中學校友四重唱」。創團之初的活動主要是參與母校聖誕節慶的獻詩，以及到各地教會的分享與幫助學校募款，當時團員人數大約是八位研究所與大學在學學生。也因此但成立幾年後「兵役」成為最大的挑戰，面臨人數流失甚至是解散的危機。時任創團團長的鄭睦群在與團員溝通之後，決定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向在校學弟積極宣傳，期待畢業後加入校友四重唱；另一方重新定義團隊聚集意義，不僅為了興趣與信仰，更要在藝術價值上不斷精進，並且在2010年以母校美麗的建築「八角塔」作為團名。2011年，四重唱決定改組擴大為「男聲合唱團」，除了接納非淡江校友加入外，也聘請林坤輝老師擔任指揮一職，並逐漸朝專業之路前進。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自成立以來，累積了豐富而多元的演出資歷，足跡遍布國內外。早期他們活躍於校園與教會場合，例如在淡江中學校慶及聖誕節大禮拜演出、並且開始巡迴各地教會，

⁴⁶⁵ 鄭睦群，〈與馬偕同行的詩歌〉，收於鄭仰恩主編《論述與傳承：紀念馬偕來台宣教150周年論文集》(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22)，頁181~182。

⁴⁶⁶ 蘇文魁，《八角塔下——淡江中學校史》(台北：淡江高中，2019)，82~84、135~138。

多年來台灣北中南許多城鄉教會都曾留下八角塔的歌聲，也奠定了該團在長老教會的基本盤。在藝術舞臺方面，八角塔在 2013 年 5 月受邀前往歐洲，與「安慰之聲」共組「長老教會節慶合唱團」代表該教派參加德國「史托克教會國際音樂節」。2016 年 8 月，八角塔首次在國家演奏廳演出，並且在 2018 年 8 月站上國家音樂廳的舞台，此後便多次在衛武營音樂廳、國家音樂廳、台南文化中心、嘉義文化中心等國家與地方場館舉辦售票音樂會，演出深獲聽眾回響且票房不俗。八角塔現任團長為鄭睦群教授，指揮李建一教授，並有一位全職的行政專員。⁴⁶⁷全體團員約 35 位，其中亦有多位支領鐘點費的專業歌手。

三、專輯出版與賽事獲獎記錄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近年在各種比賽與獎項上表現亮眼，在傳統藝術金曲獎(以下簡稱傳藝金曲獎)方面，2014 年發行的專輯《傳承·悸動》入圍了傳藝金曲獎「最佳宗教專輯獎」；2015 年發行的《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更一舉奪下第 27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宗教音樂專輯」殊榮，成功將詩歌與馬偕的人生歷史敘事結合，並且獲得評審的青睞。合唱賽事方面，八角塔近年積極參與全國性合唱競賽，成果豐碩。在全國社會組合唱比賽中，八角塔男聲合唱團曾於 2022 年勇奪男聲組金質獎(冠軍)，2024 年再度拿下男聲組金質冠軍。2022 年八角塔在桃園國際合唱大賽獲得銅桃獎(季軍)，也在該年台北國際合唱音樂大賽囊括三項金牌。2024 年再獲桃園國際合唱大賽銀桃獎(亞軍)。2024 年 7 月，八角塔首次遠征日本參加寶塚國際室內合唱大賽，最終獲得寶塚國際室內合唱大賽同聲組銀獎(亞軍)，在全球 25 支參賽隊伍中總成績排名第十。這是八角塔首面海外賽獎牌，也確定該團具有國際等級的藝術水準。⁴⁶⁸

貳、台灣合唱團的獲利模式

台灣的合唱團體種類繁多，單就藝術價值與經營類型此兩方面而言，本文略分為專業合唱團和全由愛好者組成的業餘合唱團，並從以下七個面向分析合唱團的獲利方式與差異。

一、演出收入

儘管音樂會的門票收入可部分支應團隊運作，然而大型音樂會涉及場地租金、製作成本等，高水準演出往往收支難以平衡，票房收入僅能涵蓋部分開銷。⁴⁶⁹根據統計，台灣表演團隊在 2022 年間共舉辦了 3,065 場售票演出，觀眾人次約 58 萬，亦另有超過 3,500 場為非售票公益或推廣演出。⁴⁷⁰這顯示台灣過半是演出並非以營利為目的，而是在自我實現、培養觀眾與推廣合唱藝術。此外，業餘合唱團多在地方文化中心或學校禮堂演出，票價較低，甚至採自由樂捐形式。而在商業演出方面，專業水準和知名度的合唱團較有機會取得較高的商演收入，業餘合唱團則反之。

⁴⁶⁷ 鄭睦群主編，〈台灣的棒球詩篇：Team Taiwan 世界冠軍特別場節目冊〉，頁 8。

⁴⁶⁸ 鄭睦群主編，〈台灣的棒球詩篇：Team Taiwan 世界冠軍特別場節目冊〉，頁 7。

⁴⁶⁹ [https://par.npac-ntch.org/tw/article/doc/D99EPH3J9L#:~:text=](https://par.npac-ntch.org/tw/article/doc/D99EPH3J9L#:~:text=,)，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⁷⁰ [https://taiwantop.ncafc.org.tw/upload/reports/20230607/19dd0d9a1ec84497892b0a7285604779/19dd0d9a1ec84497892b0a7285604779.pdf#:~:text=](https://taiwantop.ncafc.org.tw/upload/reports/20230607/19dd0d9a1ec84497892b0a7285604779/19dd0d9a1ec84497892b0a7285604779.pdf#:~:text=,)，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二、公部門補助

政府提供的補助是許多合唱團營運的重要支柱，例如文化部「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每年遴選國內優秀團隊給予營運經費支持。⁴⁷¹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藝會）每年分期接受申請並核發補助金供藝文團體製作節目、委託創作或國際交流等。這類補助款可協助團隊支付排練場地、行政人事和節目製作等費用。各縣市文化局亦設有藝文補助專案，提供小額經費支援鼓勵本地團隊。對於資深的專業團隊，政府經費往往占其年度預算相當比例，遠高於票房等自籌收入。⁴⁷²專業合唱團較能持續獲得文化部或國藝會的大額補助，業餘合唱團則須競爭地方較小額的補助，有時僅能補貼場地或部份製作成本。

三、企業或民間贊助

大型企業出於社會責任（CSR）或提升品牌形象的考量，熱心支持藝文活動。如台北愛樂合唱團歷年活動常獲得企業與基金會贊助，贊助名單中不乏銀行和高科技公司等知名單位。民間贊助則包括個人捐款、社會團體，以及團員自發性集資。專業合唱團通常會透過贊助人計畫等方式吸引愛樂人士捐助，例如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設有年度贊助人名冊，列出對合唱團有金錢支持的企業與個人，以茲感謝。⁴⁷³業餘合唱團方面，團員繳納的會費和在地社區熱心人士的小額捐助，也常幫助團體應付基本開銷。

四、教育推廣

專業合唱團常利用其專業師資開辦合唱訓練課程、聲樂工作坊或指揮大師班，向社會招生收取學費。一方面培育未來觀眾與歌者，另一方面取得課程收入支撐團務。許多合唱團與中小學、大學合作舉辦合唱觀摩、講座，或擔任校內合唱社團指導。例如國立實驗合唱團（隸屬於國家兩廳院旗下）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優勝團隊聯合音樂會等活動。⁴⁷⁴業餘合唱團則多半在自身人力所及範圍內進行社區和校園推廣，義務性質居多。例如地方合唱團下鄉到國小教孩子唱歌，或與大專院校合唱團結為姐妹團交流，這些活動主要目的在傳播合唱樂趣，收益通常只有基本的車馬費與鐘點費。

五、錄音與出版

專業合唱團通常定期錄製 CD 專輯或數位單曲，除了為團隊留下重要記錄，銷售樂迷及教育機構也有部分收入，並且在音樂會會場、網路商城甚至大型書店販售。此外，團隊將錄音上架至數位音樂平台（如 Spotify、YouTube 等）也能獲取串流分潤，雖然數位平台收益不高，但能擴大樂曲傳播範圍。相較之下，業餘合唱團較少有資源自行製作專輯。他們有時在重要里程

⁴⁷¹ <https://www.ncafroc.org.tw/>，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⁷² <https://www.tpf.org.tw/sponsor#:~:text=>，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⁷³ <https://www.tpf.org.tw/>，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⁷⁴ https://depart.moe.edu.tw/ed2600/News_Content.aspx?n=E491D1720010EE05&sms=D4AB88F29491B48F&s=1B063450991C541E#:~:text=，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如成立周年或參賽紀念)時錄製簡單的 CD 作紀念,通常由團員集資製作,非以營利為目的。

475

六、周邊商品與品牌經營

典型的周邊商品包括團服、紀念 T 恤、音樂會紀念品(如海報、徽章、樂譜簽名本)等。台灣部分知名合唱團會設計具有團隊特色的商品,於音樂節或演出現場販售,周邊商品銷售可獲利並凝聚粉絲向心力。例如台北愛樂合唱團 50 週年時推出限量紀念商品,就吸引許多支持者購買留念(據台北愛樂基金會網站公告)。良好的商品設計不僅能帶來直接收入,也是宣傳團隊理念與特色的流動廣告。相比之下,業餘合唱團的周邊商品銷售較為有限。一來其粉絲群相對小眾,二來缺乏設計與大量製作的資源,通常僅製作團員演出服或團體制服供內部使用,很少視其為對外販售商品。⁴⁷⁶

七、國際競賽效益

國際巡演與參與國際合唱比賽,從長遠看可為團體帶來多重延伸效益。雖然出國演出本身往往需要龐大經費投入(旅費、食宿等),短期內未必直接盈利,但其帶來的無形收益不容忽視,在國際大賽中獲獎可大幅提升合唱團的知名度與專業形象。此類國際殊榮不僅為國爭光,也令該團體在國內外更受矚目,進而吸引更多贊助與合作機會。且政府和企業往往樂於支持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優異的團隊,因此國際得獎帶來的後續效益包括:更容易申請到政府的國際交流補助、企業以冠名方式贊助出國、媒體曝光增加等。

綜合以上各面向,專業合唱團仰賴公部門與企業資助的比例較高,因為高水準的音樂會通常也伴隨著較高的成本。但事實上,業餘的合唱團的音樂會收入相當有限,通常也是賠本來完成登上舞台的自我實現。同時,演出企劃的類型也會影響票房的好壞,因為將牽涉能否吸引與引起聽眾與其共鳴。

參、台灣合唱團演出企劃類型概述

近年台灣各類型合唱團(校園合唱團、社區合唱團、專業合唱團、宗教合唱團等)的演出呈現多元發展趨勢。在演出企劃方面,可概略歸納為主題音樂會、跨界合作、公民參與、公益性演出、節慶演出以及比賽或巡演等。

一、主題音樂會

主題音樂會是許多合唱團常見的企劃形式,透過設定明確的主題來串聯曲目,賦予音樂會獨特風格與意義。此類音樂會通常圍繞某一理念、故事或音樂主軸,例如特定作曲家作品、文化題材或社會議題。透過統一的主題,團隊在曲目選擇上更有方向性,也能加強演出的敘事性

⁴⁷⁵ 沈管玉,〈合唱團員專業度對票房之影響—以高雄四個立案合唱團為例〉,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頁 12。

⁴⁷⁶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5874#:~:text=](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5874#:~:text=,),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與情感連貫。發展趨勢：近年來，許多合唱團傾向結合在地文化元素或時代關懷作為主題。例如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在 2021 年的《印象臺灣》音樂會，即以臺灣豐富的人文景觀為主軸，邀集國內外多位作曲家聯手創作，以人聲勾勒出台灣繽紛多元的文化印象。⁴⁷⁷

二、跨界合作

此類企劃打破純合唱的框架，將人聲與其他表演藝術、樂種結合，創造新穎的演出形式。常見的跨界包括：與交響樂團或傳統樂團合作演出大型作品、與舞蹈、戲劇、馬戲、影像等藝術結合創作音樂劇場，或是與流行音樂、原住民音樂、爵士等不同風格音樂人合作。發展趨勢：近年台灣合唱界對跨界嘗試愈發積極，大型創新企劃頻出。例如台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TACC)在 2022 年推出跨界巨作《命運的劇場—布蘭詩歌》，首度將合唱演出結合馬戲、舞蹈、燈光、劇場影像等元素，打造震撼的全方位視聽體驗。⁴⁷⁸

三、互動參與

互動參與型的合唱演出強調觀眾或社區的直接參與，模糊傳統表演者與觀眾的界線，讓合唱成為社群共創的活動。此類活動通常走出正式劇場，深入公共空間或社區，或者設計可以讓民眾一起唱、一起互動的橋段。形式包括：街頭或商場的快閃合唱、社區內的交流音樂會、觀眾互動式音樂會（如帶領觀眾一起合唱特定歌曲）、大型共唱活動（如百人合唱、千人合唱）、以及線上線下結合的虛擬合唱參與等。發展趨勢：近年各地政府與合唱團體開始注重將合唱藝術帶入民眾日常生活。例如桃園合唱藝術節自 2019 年起即規劃「社區音樂會」，邀請許多在地社團型人聲團隊參與，提供公開交流和演出機會。2022 年的社區音樂會更進一步走進鬧區商場，在中壢 SOGO 百貨戶外廣場舉行「雙城人聲」演出，強調轉角遇見藝術，逛街也能聽見無伴奏的人聲合唱演出。⁴⁷⁹

四、社會公益演出

公益性演出指以服務社會、傳達公益理念為宗旨的合唱團演出企劃，此類演出不以商業收益為目的，而是強調關懷弱勢、社會倡議等價值。演出地點往往在醫院、養老院、育幼院、社區中心或戶外義演舞台，曲目選擇上也傾向溫馨感人、脛炙人口的作品，以拉近與觀眾的距離。發展趨勢：台灣合唱團長期以來都有參與公益的傳統，近五年尤甚。許多社區合唱團與企業合唱團固定每年赴長照機構、偏鄉學校慰問演出。例如基隆市愛樂合唱團在 2022 年與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合作，前往市立仁愛之家養護中心為長者獻唱公益音樂會，精選多首長輩耳熟能詳的經典老歌如《好好愛我》、《神鵰俠侶組曲》，讓爺爺奶奶們聽得既開心又感動，彷彿回到年輕

⁴⁷⁷ <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430003626649755653?srsId=AfmBOopCDJKfMmgofjo2A5uIhSblgINZf-K6GVS KkA8hILLDWVgCWwd3>，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⁷⁸ <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445931102584446978?srsId=AfmBOoraxoonyda6B-KRrN2SMl5B0-T3pApZ1uRz yrZ2qWWvO75AqweA>，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⁷⁹ <https://vfty.org/2022/concert-twincities#:~:text=>，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五、節慶演出

節慶演出是配合各類節日慶典或藝術節活動而舉辦的合唱演出企劃，例如新年、聖誕節等大型文化節期間，內容常緊扣節慶主題，營造喜慶或莊嚴的氛圍。這類企劃包括新年音樂會、節日慶典合唱演出、國際合唱節等。發展趨勢：台灣各地政府與合唱團體合力打造許多節慶合唱品牌。以新年音樂會為例，自 2018 年起在臺南開始的《府城新年音樂會》系列便蔚為風氣。2021 年的府城新年音樂會已是第四屆，以「東西方戲劇音樂交響詩篇」為主題，邀請作曲家改編多首中外經典戲劇與電影配樂，並由台灣藝術家交響樂團結合多達 250 人的合唱陣容演出，把觀眾耳熟能詳的旋律透過龐大編制重新詮釋，打造兼具國際與本土精神的音樂盛會。⁴⁸¹

綜觀前述企劃類型，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音樂製作通常具有強烈的歷史敘事性，賦予超越歌曲作者本身的價值與意義。以下就該團 2015 年 8 月發行的專輯《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以及 2024 年 10 月 14 日音樂會「台灣的棒球詩篇」作為範例，分析如何將合唱音樂結合歷史敘事。

肆、《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企劃概念、曲目解說與迴響

一、製作背景與概念

《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是八角塔男聲合唱團於 2015 年 8 月推出的專輯，其主題圍繞北台灣長老教會開拓者馬偕博士的生命歷程。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團長鄭睦群身為歷史學者，為了凸顯馬偕博士的生平故事，在研讀馬偕的自傳與日記後，從中挑選出馬偕一生中最喜愛、且具有歷史場景意義的 11 首古老聖詩。這些詩歌曾出現在馬偕生命的重要時刻，與他的宣教足跡緊密相連。為了串聯詩歌與人生軌跡，專輯特別加入了 2 首全新創作的（1872 序曲）及重新編曲之〈最後的住家〉。⁴⁸²

此專輯的選曲有著明確的歷史文化脈絡，製作初衷之一是紀念長老教會在台宣教 150 週年，並且設法超越坊間流傳已久的〈最後的住家〉。〈最後的住家〉的歌詞改編自為馬偕 1895 年出版回憶錄之序文，旋律及編曲目前以何家駒、鄭智仁及李奎然三個版本最廣為人知。但從馬偕的日記與傳記中可以知道，馬偕十分熱愛唱詩歌，並且能從多首聖詩來傳講其生命故事。例如 1882 年 7 月 26 日，馬偕在牛津學堂（今淡江中學前身）開辦時，帶領會眾高唱聖詩〈天下萬邦、萬國、萬民〉，象徵福音傳遍萬國的願景；又如馬偕與家人團聚時，最愛齊唱〈耶穌愛我我知明〉這首詩歌，營造溫馨的家庭時光；甚至在晚年病重之際，馬偕的學生曾圍繞在他病

⁴⁸⁰ [https://tw.news.yahoo.com/%E5%9F%BA%E5%B8%82%E6%84%9B%E6%A8%82%E5%90%88%E5%94%B1%E5%9C%98%E5%85%AC%E7%9B%8A%E6%BC%94%E5%87%BA-%E4%BB%81%E6%84%9B%E4%B9%8B%E5%AE%B6%E7%82%BA%E9%95%B7%E8%80%85%E6%BC%94%E5%94%B1-105528307.html#:~:text=](https://tw.news.yahoo.com/%E5%9F%BA%E5%B8%82%E6%84%9B%E6%A8%82%E5%90%88%E5%94%B1%E5%9C%98%E5%85%AC%E7%9B%8A%E6%BC%94%E5%87%BA-%E4%BB%81%E6%84%9B%E4%B9%8B%E5%AE%B6%E7%82%BA%E9%95%B7%E8%80%85%E6%BC%94%E5%94%B1-105528307.html#:~:text=,)，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⁸¹ <https://www.musico.com.tw/events/>，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⁴⁸² 鄭睦群主編，〈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專輯手冊〉，頁 4。

榻旁吟唱〈我認救主無驚見誚〉，虔誠的歌聲使奄奄一息的他突然挺身握拳、眼泛淚光，表示若有機會願再為主多做工。⁴⁸³這些歷史片段都成為專輯選曲的重要依據，使專輯每首歌曲都承載一段馬偕生命故事。專輯名稱中的「行旅」亦點出概念，聽眾將隨著歌曲展開一場詩歌與信仰的旅程，見證馬偕博士為臺灣奉獻一生的歷史。⁴⁸⁴

二、專輯曲目解說⁴⁸⁵

(1) 大時代下的宣教使命：1872 序曲—攬是為主基督

此首為專輯開場的全新創作，由劉立薰作曲填詞，1872 年則是馬偕開始在淡水宣教的年份。坊間經常將「寧願燒盡，不願朽壞」當成馬偕的座右銘，但這其實是後人對馬偕人生的評價。在馬偕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所做的一切都為了基督，因此有學者認為「All for Christ」或許更適合作為馬偕的座右銘，這也是這首序曲背後的意涵。⁴⁸⁶

(2) 母親膝上的甜美回憶：牧者冥時看守羊群

馬偕出生時的左拉村沒有主日學，孩子們平時由父母在家教導聖經與教理問答，禮拜天則上教會聆聽牧者傳講上帝恩典的信息。在馬偕的孩提時代，每個安息日的夜晚他都坐在母親的膝上，重複聽媽媽唱著「夜裡當牧羊人在伯利恆草地上看守他們的羊群」。這首曲子在馬偕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深深感受到信仰的甜蜜。馬偕母親所唱的詩句即《聖詩》第 87 首的〈牧者冥時看守羊群〉，馬偕的家庭教導與母親的詩歌，讓人想起〈箴言〉22 篇第 6 節的經文，「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他到老也不偏離」。或許上帝就是透過這首詩歌與兒時甜蜜的信仰回憶，把宣教的種子放進小馬偕的心中，最後成為對台灣的祝福。

(3) 畢業典禮的祝福與差遣：天下遍遍各邦國

1867 年 9 月，馬偕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就讀，並且完成了三年的學業。1870 年 4 月 26 日的畢業典禮，依照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傳統，教授與畢業生將畢業證書放在草地上，在校園裡手牽手圍成圈，並一同唱著〈來自格陵蘭的冰山〉與〈相繫相伴有福氣〉。唱完後馬偕十分敬重的賀吉博士(Charles Hodge, 1797~1878)走入圈中，以顫抖的聲音，舉起雙手為所有人祝禱，眾人在淚中道別。當晚馬偕便啟程回加拿大，不久後前往愛丁堡大學進修。普林斯頓神學院在 1812 年與普林斯頓大學分離，至今依舊屹立於美國紐澤西州。許多台灣神學院的學生畢業後進入該校深造，學成歸國後繼續在台灣神學院服事，成為馬偕的學弟與學妹。〈來自格陵蘭的冰山〉即《聖詩》第 203 首的〈天下遍遍各邦國〉，從原文歌詞中可以感受到當代宣教士到異鄉傳福音的殷切，成為一首呼召的詩篇。

⁴⁸³ 鄭睦群，〈與馬偕同行的詩歌〉，收於鄭仰恩主編《論述與傳承：紀念馬偕來台宣教 150 周年論文集》(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22)，頁 171~181。

⁴⁸⁴ 鄭睦群主編，〈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專輯手冊〉，頁 7~28。

⁴⁸⁵ 內容參照鄭睦群主編，〈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專輯手冊〉，頁。

⁴⁸⁶ <https://tcnn.org.tw/archives/17096>，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4) 揮別英國長老教會的盛情：我行迷路耶穌近倚

1871 年 12 月 5 日上午，馬偕搭船抵達香港，不久後又前往汕頭，接受英國長老教會熱情的接待。英國長老教會在 1847 年派賓威廉到亞洲開拓宣教禾場，1851 年以廈門為灘頭堡，1858 年再立汕頭為另一中心，並且在 1870 年與倫敦宣道會、美國荷蘭改革宗宣道會共同組織廈門「和會」。1871 年，廈門「和會」出版了 59 首版的《養心神詩》，不僅成為日後各廈腔聖詩的基礎，馬偕也把它帶進了北台灣。1926 年台灣大會出版的《聖詩》選了六首自廈門傳來的中國風曲調，〈我行迷路耶穌近倚〉便是其中一首，收錄於《聖詩》第 194 首。專輯就以這首曾經傳唱於廈門的曲調遙想馬偕於此地的簡短腳蹤，並向當年在中國的宣教士致敬，在大清帝國統治的神州大陸播下福音的種子。

(5) 抵台與原住民的首次相遇：真主上帝造天地

1872 年 3 月 9 日，馬偕在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士李庥(Hugh Ritchie, 1840~1879)與德馬太醫師(Matthew Dickson, 1844~1921)的陪同下在淡水登陸，他深深地被此地所感動，心裡「歡愉到真想高興的拍手」。3 月 11 日，馬偕與李庥一行人從淡水南下，沿途經過中壢、新竹，苗栗、大甲，並且進入平埔族的大社、內社，最後在 3 月 24 日回到大社。天黑後眾人在靠近河床的樹林下停歇，準備在此用餐與過夜，並砍了些小樹枝鋪平後作為睡床。正當大家吃飽之後，突然有人開始吟唱聖詩，詩歌的聲音迴繞在樹林間。當晚馬偕並沒有馬上睡著，他「觀看天上的星星，思考創造它們的上帝」，這是馬偕在日記中首次提到台灣原住民的歌聲，往後幾年他也認為原住民的音樂特質確實高過漢人。大夥兒於隔日離開大社前往埔社，並由當地的原住民陪同，男子們腰間配上刀與攜帶火繩槍，因為他們害怕山裡的部落視他們為叛徒，山林間瀰漫著緊張的氛圍。有些平埔族確實會運用自己的曲調來吟唱聖詩，這首〈真主上帝造天地〉之曲名為「大社」，可能是馬偕南下時採集大社一帶的巴宰族曲調，現收錄於新《聖詩》第 5 首。美國學者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也曾於 1873 年在埔社收集到與今日〈真主上帝造天地〉極為類似的旋律。

(6) 以淡水為名的詩調：上帝創造天與地

淡水是清末北部長老教會的重要根據地，馬偕在此地開設教會、學校與醫館，並且建立自己的家庭。雖然日治時期北部長老教會的宣教重心逐漸移往台北城，但此地永遠是北部長老教會起源所在，身為北台首聖的淡水教會至今已有 144 年的歷史。馬偕宣教的對象包含了漢人、平埔、高山等原住民族，一生開拓了 60 間教會。馬偕透過旅行訓練學生，思索自然界中所蘊藏的偉大訊息，而他也在淡水的住所建了自己的小博物館，陳列在台灣宣教途中所收集的一切。這些收集品除了有形的標本、神明偶像之外，也包含了無形的音樂。〈上帝創造天與地〉為新《聖詩》第 6 首，曲調名為「淡水」。根據駱維道教授的研究，馬偕的外孫柯設偕在一封給其岳父蕭安居牧師的短信中指出，〈上帝創造天與地〉之譜為馬偕採集與改編原住民的曲調而來。

(7) 論戰群儒與嚴清華決志：永遠與主居起

1872 年 4 月 19 日上午，一位年輕人拜訪馬偕位於淡水的住所，並且一連幾日帶了不少讀書人(當中亦有秀才)一同討論基督與儒釋道三教信仰。4 月 23 日晚間，一位舉人領著二十位讀書人進入馬偕家中，並且展開一連串的辯論，而這位年輕人似乎在觀察些什麼。在激烈的辯論後，馬偕以「上帝是創造者」向他們講解了兩個小時，最後這群儒生禮貌地離開了。這位年輕人不久後又折了回來，馬偕念聖詩〈日日離家更近〉給他聽，他聽了之後感動表示決定學習這屬天的道理，馬偕也邀請他與之同住，學習之餘也幫馬偕整理房舍及料理食物。這位年輕人就是嚴清華，馬偕的第一個信徒、學生，也是北台灣首位本土牧師。這首〈日日離家更近〉(A Day's March More Nearer Home)就是《聖詩》第 355 首的〈永遠與主居住〉，這首曲子經常出現在馬偕的日記中，不只學生喜歡唱，更是不少牧長與信徒臨終或葬禮的慰詩(如黎約翰、陳火、陳塔嫂、連和、劉百總等)，馬偕稱之為「永遠的 41 首」(指養心神詩)。

(8) 船難落水後的夜晚：咱人性命無定着

1872 年 11 月 23 日，馬偕結束對學生的課業複習後，大家一同外出前往海邊，搭乘一艘小船出航。結果回來的時候船隻因碰到了水中的竹竿而翻覆，眾人都落了水。恰巧有漁夫在附近並前來把船翻正，最後大家都爬上船。不知是否因為虛驚後感嘆與幽默，當天晚上馬偕便選了〈咱人性命無定着〉來吟唱，因為他連自己都認為白天差點就淹死了。〈咱人性命無定着〉收於新《聖詩》第 465 首，曲調名「木柵」，可能是源自南部的平埔調。

(9) 雞籠廟口前的信仰見證：我認救主無驚見謫

嚴清華是位聰穎、好學的學生，馬偕習慣稱他「阿華」，兩人同住相互學習，馬偕教導他白話字與聖經教裡問答，阿華則修正馬偕的台語發音。1872 年秋天馬偕與阿華初到雞籠，在一間廟宇前準備傳教，四周充滿憤怒的群眾，有些人還是阿華的舊識。馬偕請阿華向他們說說話，但只見阿華低頭不語。馬偕便唸了〈我認救主不驚愧恥〉，接著兩個人就這樣唱了起來。這首聖詩給了阿華勇氣，以堅定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見證；1873 年 2 月 9 日禮拜日，馬偕為阿華等五位信徒受洗時，馬偕同樣以〈我認救主無驚愧恥〉堅定他們的心，並在隔週日為這五人進行聖餐禮。這首〈我認救主不驚愧恥〉即新《聖詩》第 532 首〈我認救主無驚見謫〉，當時本地人改教必須承認非常大的壓力，因此該詩歌不僅記錄了北台灣信徒的首次見證、受洗與聖餐禮等珍貴的歷史時刻。

(10) 牛津學堂矗立砲台埔頂：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1879 年底，馬偕返回故鄉加拿大探親，並向鄉親們報告他在台灣的宣教事工，引發了相當大的迴響。1881 年 10 月 12 日晚上七點半，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首府的伍德斯多克市(Woodstock)舉辦了送別馬偕的晚會，晚會在全體會眾以高昂的歌聲吟唱「詩篇 100 篇」(Old Hundredth)中拉開了序幕。馬偕在晚會演講中提到教育對宣教的重要性，也感謝加拿大鄉親對此事的奉獻，因為「往昔那種到處流浪的逍遙學園的日子現在就要過去了」，未來牛津學堂將

蓋在居高臨下之處，「俯視著淡水港和大片綠野，在遠處橫臥著壯觀的山脈」。這趟旅程最後募集了 6,215 元加幣，馬偕也在 1881 年 12 月 19 日回到了淡水。1882 年 7 月 26 日晚間 8 點 30 分，牛津學堂同樣在「詩篇 100 篇」的歌聲中設立了，除了馬偕與其學生之外，英國領事、教會信徒、各界代表，以及當時主持台北防務的名將孫開華提督也出席了這項典禮，那是一千五百人的盛大場面。這首「詩篇 100 篇」即新《聖詩》第 230 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其曲調亦稱「Old Hundredth」，傳唱至少超過四百年。

（11）手術中的聖詩：我目擡起向天

1873 年 10 月 23 日，美國密西根大學的教授史蒂瑞前來拜訪馬偕，他來台灣收集貝類樣本。儘管兩人相處愉快，但馬偕也承認協助史蒂瑞整理貝殼等動物時「在我的房中有可怕的氣味」。有一回馬偕外出數日，史蒂瑞將白話字配上音符寫在黑板上，帶著學生練唱詩篇 100 篇與 121 篇，被稱為「植物學家之歌」。這首詩篇 121 篇即新《聖詩》第 40 首〈我目擡起向天〉。1891 年 4 月 4 日，林格醫生(L. E. Ringer)幫崙仔頂教會(今三角埔教會前身)長老李恭切除臉部的纖維腫瘤，馬偕在旁施予麻醉。手術中李恭居然還可以「清楚且音準正確」地唱出〈我目擡起向天〉的一部分，看來馬偕的麻醉技術相當老練，腫瘤也被乾淨移除。馬偕雖然不是正規的醫生，但他來台後即運用醫療技術接近台灣民眾，減輕老百姓肉體的痛苦，拔牙的故事至今仍舊讓人津津樂道。

（12）美好的家庭時光：耶穌愛我我知明

馬偕在台灣除了醫療、宣教與教育之外，在婚姻上也選擇與本地女子成親。1878 年馬偕與五股張聰明女士成婚，婚後育有兩位女兒偕瑪連(Mary Ellen Mackay, 1878~1959)、偕以利(Bella Catherine Mackay, 1880~1970)，以及獨子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 1882~1963)，他非常重視孩子的家庭教育。1900 年 3 月 13 日，當晚偕叡廉就要回到香港的學校去了，出發前全家整天都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捨不得，叡廉提議在他離開之前，要大家一起唱漢文版的「耶穌愛我」，由他自己彈風琴伴奏。這是最後一次馬偕全家一起唱詩歌的記錄，到了年底他因為喉癌連話都沒辦法說了，甚至必須由學代替他上課。這首「耶穌愛我」即新《聖詩》132 首的「耶穌愛我我知明」，是一首相當著名的兒童詩歌。在全家唱完「耶穌愛我」之後，偕叡廉於晚間七點三十分搭船離港，馬偕形容當晚是「晴天，寧靜的天空」。

（13）最真切的告白：終曲，最後的住家

1900 年 5 月 19 日，馬偕搭乘輪船抵達南方澳，準備巡視噶瑪蘭平原的教會，最後在 5 月 29 日回到淡水，聲音開始逐漸沙啞。但馬偕認為那只是一般感冒，依舊持續訪視教會、講道等日常工作。同年十月，馬偕被醫生建議暫時停止說話與工作，使喉嚨有機會休息，此時馬偕才開始保持安靜，以寫板書或是讓學生代替他上課。之後馬偕曾至香港與台北治療，但病情並未徹底好轉，1901 年 2 月甚至必須在喉嚨開洞好讓膿水流出，身體與心理都承受了極大的痛苦，連飲食都成為折磨。1901 年 5 月 30 日，馬偕輕聲告訴柯玖：「醫生說沒指望了。」1901 年 6

月 2 日下午 3 點 55 分，他像睡著般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時隨侍在側的有偕夫人、叡廉、瑪連、以利、柯玖、陳清義、吳威廉牧師(William Gauld, 1861~1923)與羅為霖醫師(William McClure, 1856~1956)。6 月 4 日，馬偕安葬於座落在今日淡江中學的墓園，長眠他一生最後的住家，台灣。

三、《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之迴響與獲獎

《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專輯推出後，在宗教界與音樂界都獲得了廣泛好評。許多音樂評論人讚賞這張專輯獨特的選題與精良的製作，認為其成功將人文、藝術與信仰融為一體。專輯以合唱音樂見證歷史，題材別開生面，不僅豐富了台灣音樂創作的題材，也展現了宗教音樂的深度與感動力。聽者普遍反應專輯內容感人至深，從歌曲中更深入地認識了馬偕博士的生平故事。

時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林芳仲、長老教會禮拜音樂委員會主委陳琇玟、馬偕醫學院校長魏耀揮、教會歷史學者鄭仰恩、《宇宙光》雜誌主編瞿海良、天韻合唱團製作人廖雅慧等各界人士聯名推薦這張專輯。眾多牧長前輩在推薦辭中肯定專輯結合歷史與信仰的創舉，認為透過聆聽這些詩歌，福音的種子將在人們心中萌芽。天韻合唱團的製作人廖雅慧盛讚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演唱「溫暖且充滿屬靈力量」，馬偕生平故事與詩歌交織讓人深受感動。⁴⁸⁷合唱界人士也注意到，這是台灣少見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合唱專輯，體現了合唱藝術在題材上的多元可能。專輯發表音樂會於 2015 年 8 月 15 日在淡水真理大學禮拜堂舉行，當天湧入約 450 位聽眾，共同參與這場音樂饗宴。⁴⁸⁸

2016 年 8 月，《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榮獲第 27 屆傳統暨藝術音樂金曲獎「最佳宗教音樂專輯獎」，該獎項是台灣音樂界對宗教音樂類型最高榮譽的肯定。獲獎顯示出此專輯無論在製作品質、藝術表現或是主題意義上都達到了頂尖水準，最終從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奪得大獎，替長老教會與宗教音樂爭光。專輯製作人鄭睦群團長在領獎時表示，將榮耀歸給上帝，並感謝團隊的付出與神的帶領。⁴⁸⁹八角塔曾在 2018 年 8 月 14 日及 2019 年 2019 年 3 月 30 日，假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彰化員林演藝廳舉辦「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音樂會，票房開出紅盤，盈餘有效挹注合唱團經營。而《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專輯迄今銷售已超過五千張，實為台灣本土合唱專輯難得可貴的佳績。

伍、台灣的棒球詩篇企劃概念、曲目與迴響

一、企劃概念

棒球被譽為台灣的「國球」，也是最能串起台灣人認同以及喜怒哀樂的運動，但並非一開

⁴⁸⁷ 參照《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專輯封底。。

⁴⁸⁸ <https://tcnn.org.tw/archives/9250>，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5 日。

⁴⁸⁹ <https://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00652e5932dc9a38a21aa445a69d506085b422bf>，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

始就是如此。1895 年，台灣成為日本領土，棒球也隨著近代的教育體系進入這座寶島，當時的名字叫做「野球」。起先，這是屬於在台日本人的運動，因為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都是以日本人為主。但台灣人不斷力爭上游，愈來愈多年輕人進入中等學校的體系，因此也更多年台灣學子投身棒球運動。終於，1931 年的夏天，嘉義農林棒球隊以台灣人、原住民與日本人的陣容，勇奪日本甲子園亞軍。這是台灣人第一次，深深感受到這項運動與自己的認同與悸動，也奠定了日後所謂「國球」的基礎。1945 年，台灣改朝換代，棒球這項運動卻持續扎根這片土地，並且經歷了各種大時代。1970 年代，我們是世界的「三冠王」，多少人深夜守著電視觀看越洋比賽；1980 年代，我們首次拿到奧運獎牌，確立台灣進入世界棒球五強的地位；1990 年代，中華職棒成立，台灣棒球產業化，職棒球賽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2000 年代，儘管簽賭風波重創，幸好有陳金鋒等旅外好手，在世界盃、亞錦賽等國際賽事為台灣人打出希望。⁴⁹⁰2016 年，傳奇名將陳金鋒退休，象徵一個偉大事代的結束，卻也看見更多年輕球員，以及台灣未來棒球希望。

因著團長鄭睦群對歷史、棒球與合唱的專業與喜好，八角塔男聲合唱團以棒球為主題，與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於 2024 年 10 月 14 日在國家音樂廳共同舉辦「台灣的棒球詩篇」音樂會，這是台灣棒球結合音樂及歷史敘事的創舉。例如嘉義農林學校之校歌，講述棒球與台灣人的重要連結；眾人耳熟能詳的〈望春風〉，卻是戰後台灣棒球隊最早在國外唱出的旋律；中華職棒聯盟主題曲，見證亞洲第三個職業棒球聯盟的誕生；張雨生〈我學會飛翔〉，這是 2003 年台灣闖進奧運的歷史記憶；滅火器的〈曾經瘋狂〉，讓多少台灣人掉淚，向我們永遠的第四棒陳金鋒致敬。而下半場仍舊以棒球為主題，吟唱美國、日本等世界各國的棒球歌曲，讓與會聽眾能國際的文化交流。所有歌曲皆委請專家重新編曲，並且禮聘名主播徐展元擔任導聆人。

二、音樂會曲目詳解 ⁴⁹¹

（1）1970 年代越洋轉播球賽的開頭曲：Mister Cannibal

1978 年的《民生報》報導：中華青棒隊於台北時間明天上午八時半，與美南隊爭奪勝部冠軍之戰，及廿日上午六時冠軍決賽，台視及中廣將作越洋實況轉播。中華青棒隊比賽的時間是早上八點半和六點半，與現在民眾看 MLB 的時間差不多。順帶一提，如同 YES 電視臺的片頭音樂一樣，臺視轉播棒球也有專屬音樂，那就是 Mister Cannibal 這首歌，原唱是 Andy Fisher，這段輕快的旋律可說是乘載了 1970 年代臺灣人看棒球轉播的回憶。

（2）台灣人棒球認同的重要起點：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校歌

1928 年，嘉義農林學校的棒球隊成立。起先，成績不甚理想。直到近藤兵太郎擔任教練之後，嘉農棒球隊的成績才漸入佳境。1931 年，嘉農在島內先後擊敗台中一中、台中二中、台南一中、台北商業，並獲得代表權，得以前進甲子園。最後，嘉農一路連勝神奈川商工、札幌商

⁴⁹⁰ 孟峻瑋等著，《台灣棒球百年史》（台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26 年），頁 13~203。

⁴⁹¹ 內容參照鄭睦群主編，〈台灣的棒球詩篇音樂會手冊〉，頁 19~35。

業、小倉工業等隊伍，對札幌商與小倉的比賽甚至是大比分勝出，不過在冠軍戰輸給中京商業。嘉農雖未獲得冠軍，但也締造臺灣球隊前所未有的佳績，也是台灣人棒球認同的重要起點。

（3）戰後代表隊遠征海外的名曲：望春風

1955 年 6 月 29 日，台灣棒球之父謝國城先生即率領中華棒球隊前往韓國交流，在韓國漢城、仁川、大邱、釜山等重要城市舉行九場國際友誼比賽，在韓預定停留半月，七月中旬再經日稍事停留返國。在韓國期間，中華棒球隊也接受韓國僑界的款待，僑界指定隊員之一的洪太山上臺獻唱「望春風」。順帶一提，洪太山是早年中華隊的四棒打者，有臺灣貝比魯斯之稱，而「望春風」則是膾炙人口的臺灣民謠。

（4）棒球母國的歷史羈絆：早慶戰組曲

《聯合報》1962 年 12 月 29 日的報導，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的棒球於 31 日搭機來臺：日本早稻田及慶應兩校的棒球對抗賽，已有八十年的歷史，被譽為世界大學界三大對抗賽之一，與英國牛津、劍橋兩校的划艇賽；美國哈佛、耶魯兩校的橄欖球賽齊名。…（中略）…早、慶棒球對抗賽自創始以來一直是在東京舉行的，本年度改在台灣比賽，主要得力於早、慶兩校在台同學會會長黃朝琴與連震東的敦促。黃朝琴與連震東都是在日治時期分別前往早大與慶應留學的學生，兩人戰後也都活躍於政壇。1963 年 1 月 1 日，兩校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行比賽，結束之後又各自與臺灣的球隊交手。透過早稻田與慶應兩間學校來臺舉行棒球的這件事，也可一窺戰後台日之間的羈絆。

（5）1980 年代揚威成人棒壇：跟著感覺走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是中華隊首次參加奧運棒球賽事，本次中華隊由嚴孝章擔任領隊，總教練為吳祥木，陣中有郭泰源、莊勝雄、趙士強、楊清瓏、林華韋、吳復連、李居明、林易增、涂忠男等人。中華隊在預賽中先後以 1-2 敗給美國，值得一提的是，郭泰源在對戰美國時，飆出 158 公里的速球，技驚四座。中華隊隨後以 13-1 和 10-0 大比分差分別擊敗多明尼加和義大利，以小組第二名晉級交叉決賽。在交叉決賽中，中華隊與日本鏖戰至延長賽，最終以 1-2 惜敗。銅牌戰中，中華隊面對韓國再次進入延長賽，最終在第 14 局上半由楊清瓏擊出關鍵的兩分全壘打，幫助球隊以 3-0 擊敗韓國，贏得銅牌。蘇芮的《跟著感覺走》非常適合呈現 1980 年代的氛圍，以及中華隊奧運之旅的開始，就像歌中唱的「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

（6）1990 年代棒球產業化的新時代：職棒元年

1989 年 10 月 23 日，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由兄弟象、味全龍、統一獅、三商虎四支球隊組成了最初的聯盟陣容。中華職棒初期，人氣鼎盛，然而在 1996 年，簽賭案的爆發將聯盟推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然而，正如會歌所言，「縱然汗水和淚在臉龐，經過失敗後絕不憂傷」，中華職棒在各方的努力下逐漸走出陰霾，重建信心。進入 21 世紀，中華職棒迎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2003 年，中華職棒與台灣大聯盟合併。隨後幾年，聯盟不斷完善制度，推動了職業棒球的普及與發展。「看我們三振、封殺、守備強，揮出勝利的全壘打。」會歌中描繪的

精彩場面，在中華職棒的賽場上不斷上演。從張泰山、陳金鋒到林智勝、王柏融，一代又一代的球星在這片綠茵場上揮灑汗水，創造傳奇。他們不僅是台灣棒球的驕傲，更是激勵著無數年輕人追逐夢想的榜樣。

（7）台灣甲子園的初嘗試：金龍旗與天生好手

金龍旗於 1995 年首次舉行，直至 2003 年落幕，雖然存在的時間不長，但卻是臺灣棒球史上非常重要的比賽。金龍旗由年代電視臺主辦，透過實況轉播，使得臺灣民眾能在電視上觀看這項賽事。金龍旗的賽制是單敗淘汰制，只要輸球就沒有下一場，因此比賽非常刺激。參與金龍旗的學校，除了傳統的棒球名校，也有一般的普通高中。儘管一般高中的實力不及傳統棒球名校，但是透過金龍旗比賽，也讓不同學校的球員之間，能有互相切磋交流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金龍旗還有一首膾炙人口的主題曲「天生好手」。這首充滿活力的歌曲不僅成為賽事的標誌，也激勵了無數年輕球員追逐棒球夢想。

（8）簽賭風暴後的強心針：再出發

2001 年 11 月，第三十四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在台灣舉行，共有十六支球隊參賽。本次中華隊以六勝一負的成績晉級八強，最終獲得季軍。這場賽事不僅展現台灣選手的實力、凝聚全民的熱情，讓受假球案衝擊的中華職棒得以復甦，許多選手更是透過這次機會，展現自我的實力。任賢齊的〈再出發〉也是該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的主題曲。這首歌曲以台語演唱，充分展現台灣本土特色。歌詞中「風大雨大太陽大，誰卡大聲誰就贏」、「天大地大我雄大」等句子，展現了台灣人不畏艱難、勇於挑戰的精神。「再出發，再出發吧」的副歌，更是鼓舞人心，激勵球員和球迷共同為台灣棒球的未來奮鬥。〈再出發〉成為了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棒球歌曲之一。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它仍深深烙印在許多棒球迷的記憶中。著名球星周思齊表示，這首歌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棒球歌曲。他會在國際賽事中反覆聆聽這首歌，藉此克服緊張和壓力。

（9）闖進雅典奧運的感動：我學會飛翔

2003 年，第 22 屆亞錦賽在札幌舉行，攸關中華隊能否參與隔年的雅典奧運。本次中華隊在徐生明總教練的率領下，派出了一支實力堅強的陣容，成功徵招旅外球星王建民、張誌家、陳金鋒、許銘傑等人。這次的對手分別為韓國、日本、中國。其中韓國日本是以職業棒球明星陣容來參加，韓國隊如李鍾範、李承燁、林昌勇，日本隊如松坂大輔、上原浩治、小笠原道大、高橋由伸等人，都是一時之選。這次賽事對韓國的比賽，可說臺灣棒球史上經典的一役。2003 年 11 月 5 日的中華南韓戰，中華與韓國雙方纏鬥到第九局，中華隊還兩分落後，危急時刻，由陳致遠擊出關鍵安打追平比數。第十局下半，高志綱敲出再見安打，幫助中華隊以 5：4 擊敗韓國。這場勝利被視為中華隊邁向奧運的轉捩點。接下來中華隊雖然不敵日本，但在最後一戰擊敗中國，以 2 勝 1 負的成績順利取得雅典奧運參賽權。張雨生的《我學會飛翔》就是象徵這次賽事的歌曲。歌詞中「我學會飛翔，飛向最高，飛過鷹族的訕笑」等句讓人聯想起運動員勇於挑戰、永不放棄的精神。

(10) 杜哈亞運的逆轉神曲：燒肉粽

2006 年 12 月 7 日，杜哈亞運的冠軍戰，由中華隊對上日本隊。九局下半，中華隊六比七，一分落後日本隊，此時一人出局，二三壘有人。輪到「大師兄」林智勝上場打擊，面對日本隊投手高崎健太郎，林智勝與他周旋到兩好三壞滿球數，接著鎖定一顆變化球，擊出逆轉再見安打，將壘上的張建銘、陳金鋒送回來得分，中華隊最後以八比七贏得比賽，並以五勝零敗的佳績，獲得亞運金牌。林智勝擊出安打之後，中華隊從休息室一湧而出，電視機前的國人也非常興奮，至少是品嚐勝利的果實，不用再「雖敗猶榮」、「自我安慰」。此時，場內突然響起熟悉的旋律，仔細一聽居然是搖滾版的「燒肉粽」，讓場內臺灣味濃厚許多。

(11) 向台灣巨砲陳金鋒致敬：曾經瘋狂

陳金鋒，綽號「台灣巨砲」，是我國首位在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出賽的選手。1999 年，陳金鋒以 68 萬美元簽約金加入洛杉磯道奇隊，開啟了他的美國職棒生涯。在小聯盟期間，他展現出驚人的實力，在高階 1A 聯盟創下 31 支全壘打、31 次盜壘的優異成績。2002 年 9 月，陳金鋒終於登上大聯盟舞台，實現了無數台灣球員的夢想。2005 年 7 月，他終於在大聯盟擊出生涯首支安打並貢獻兩分打點。2006 年，陳金鋒回歸台灣，加入中華職棒 La New 熊隊。他在中職的表現更加出色，2007 年，他更以驚人的 0.382 打擊率奪得打擊王寶座。2016 年 9 月，陳金鋒在桃園國際棒球場舉行引退儀式，為他輝煌職業生涯畫下句點。為此，滅火器樂團特地製作《曾經瘋狂》致敬陳金鋒。

(12) 永遠的大聯盟之夢：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對於喜歡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的球迷而言，或許曾在觀看轉播過程中聽到這首歌，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創作於 1908 年，由 Jack Norworth 填詞，Albert Von Tilzer 譜曲。1927 年，Norworth 對歌詞進行了部分修改，形成了現在我們所熟知的版本。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的旋律悠揚清快，生動描繪看球的樂趣，像是與朋友一同前往球場，為主隊熱情吶喊。這些元素完美呈現棒球賽的氛圍和魅力。在 MLB 的比賽中，這首歌常在第七局攻守交換時全場觀眾會起立，齊聲高唱，在一些重要的比賽中，還會邀請名人來帶領全場歌唱，為整個活動增添更多亮點。

(12) 王貞治與巨人軍：闘魂こめて

巨人隊隊歌「闘魂こめて」於 1963 年誕生，是巨人隊第三代隊歌。這首歌由椿三平作詞，古關裕而作曲。「闘魂こめて」不僅在球場上播放，甚至作為 JR 東日本水道橋站的發車音樂，充分體現了它的影響力。談到巨人隊，就不得不提到王貞治。王貞治起先以投手身分加入巨人隊，但是在總教練水原茂的建議下，棄投從打，21 年的職業生涯共擊出 868 支全壘打，贏得世界全壘打王的美名。讀賣巨人隊與台灣關係密切，巨人隊於 1968 年 2 月曾來臺春訓。會長正力亨，總教練川上哲治，教練荒川博等，以及投手金田正一、內野手王貞治、土井正三、長島茂雄、柴田勳等選手一行四十七人浩浩蕩蕩來臺，在台中棒球場進行春訓。此後，巨人隊多

次派隊來臺，如 1990 年、2008 年巨人隊都曾派隊來臺與中華職棒隊伍交流。總之，讀賣巨人隊是日本職棒的象徵之一，其隊歌「闘魂こめて」更是日本棒球文化的重要旋律。而王貞治的傳奇經歷以及巨人隊與台灣之間的聯繫，則體現了棒球運動在台日關係之中的重要性。

（13）關西王者阪神虎：六甲おろし

阪神虎成立於 1935 年，是日本職棒中央聯盟的老牌強隊，球隊初名為大阪虎隊，1961 年改名阪神虎隊。阪神虎擁有龐大的球迷群，與讀賣巨人同為日本最受歡迎的球隊之一。阪神虎隊歌「六甲嵐」（六甲おろし）創作於 1936 年，是日本職棒現存最古老的球團歌。歌詞由著名詩人佐藤惣之助創作，作曲家古關裕而譜寫。這首隊歌充滿激情，反映了阪神虎的奮鬥精神，深受球迷喜愛。每當阪神虎贏球，球迷便會高唱「六甲嵐」慶祝。這首歌不僅在球場內響徹雲霄，阪神虎與台灣有著深厚淵源。多位台灣選手曾效力阪神，包括吳昌征（1944-1949）、郭李建夫（1993-1998）、陳大豐（1998-2000）、林威助（2003-2013）、蕭一傑（2008-2012）、鄭凱文（2009-2012）、呂彥青（2018-2020）和陳偉殷（2021-2022）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於林威助，其返台於 2021 至 2022 年率領中信兄弟兩度拿下總冠軍。

（14）甲子園的熱血與榮耀：栄冠は君に輝く

「栄冠は君に輝く」發表於 1948 年，由加賀大介作詞、古關裕而作曲。是日本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的會歌，展現了日本人對高中棒球的特殊情感。日本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俗稱夏季甲子園）、選拔高等學校棒球大會（俗稱春季甲子園）是日本最受矚目的高中運動賽事，它始於 1915 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每年在兵庫縣西宮市的阪神甲子園球場舉行。「栄冠は君に輝く」不僅經常在開、閉幕式中演唱，也是電視轉播的主題曲，成為日本國民共同的記憶。

（15）台灣甲子園的再嘗試：黑豹旗與動靜之間

2013 年，「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簡稱黑豹旗）開打，黑豹旗的創辦理念是效法日本甲子園的精神，不分科班或一般同好社團均可參賽，為高中棒球提供一個舞台。黑豹旗在每年 10 月至 12 月舉行，已成為台灣高中棒球界的年度盛事，不僅吸引了不少球隊參與，也是許多球員圓夢的機會。黑豹旗的特色之一是「挖紅土」儀式，參賽球隊在比賽結束後，可以將球場的紅土裝入小袋中帶回，作為青春回憶的紀念，〈動靜之間〉即為首屆黑豹旗之主題曲。

（16）近年台式應援的熱情：寶島的啦啦隊組曲

中華職棒目前一共有六支球隊，分別是富邦悍將、中信兄弟、統一 7-ELEVEn 獅、樂天桃猿、味全龍、台鋼雄鷹，本組曲就是由這六支球隊的主題曲或應援曲組成。包含 2023 年富邦悍將的應援曲是《藍色狂潮》、中信兄弟 2020 年的應援歌《我們兄弟》、統一 7-ELEVEn 獅 2014 年經典嗆司曲〈統一尚勇〉、2020 年樂天桃猿應援曲《勇敢樂天》激勵球員勇往直前、2021 年味全龍年度主題曲《龍袍使命》，以及新軍台鋼雄鷹 2022 年之嗆司曲、《氣蓋山河》展現出新軍的雄心壯志。

三、迴響及反饋

「台灣的棒球詩篇」在體育圈引發了熱烈共鳴，許多棒球人親自出席了首場音樂會，包括中信兄弟隊甫引退的看板球星周思齊（剛於 2024 年球季結束後引退）和富邦悍將新任副領隊林威助等現役、退役選手共 30 餘位。球員們難得正裝走進音樂殿堂，成為現場焦點之一。周思齊曾在音樂會的發佈記者會中表示，有時在賽前緊張時，也會透過聽歌來回想當初是如何克服緊張和壓力，像是 2013 年經典賽在東京出賽也不斷重複聽，回味當時的國際賽狀況，想想怎麼克服比賽壓力、拿下勝利。⁴⁹²中華職棒聯盟會長蔡其昌非常肯定本企企劃，也感慨地回顧職棒草創年代相對單調的加油聲（例如早期球場裡僅有「便當便當、揮棒落空」的口號），對比今日每位球員擁有專屬應援曲的盛況，足見台灣棒球文化與音樂密不可分。⁴⁹³他特別提及《望春風》、《燒肉粽》、《雨夜花》等老歌乃至台視棒球轉播開場音樂，都深深烙印在棒球迷記憶中，如今透過音樂會重新呈現，意義非凡。⁴⁹⁴整體而言，體育界人士從球員到聯盟高層，都對音樂會給出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棒球圈一次難得的人文盛事，突顯棒球之於台灣的不只是運動，也是情感與文化的象徵。

除了專業人士，各年齡層的一般觀眾與廣大球迷對「台灣的棒球詩篇」音樂會也有著熱烈迴響。首演當晚，不少親臨現場的球迷在網路論壇分享觀後感，表示從國家音樂廳中聽見平日於球場耳熟能詳的應援歌曲，感到十分新奇又感動。有老球迷激動留言，認為用合唱團唱出應援曲十分好聽，身為老球迷看到現在的規模著實感動。而當聯盟官方和八角塔陸續在網路釋出當晚片段後，點閱分享數不斷攀升，更加深了未能親臨者的嚮往。不少人留言「跪求巡迴全台棒球場演出」，期盼將音樂會帶進明年球季各地的棒球場，讓更多南北觀眾與球員共享這份感動。對此，2025 年 3 月 1 號與 9 號，聯盟與八角塔特別在台中中興大學惠蓀堂與衛武營音樂廳，舉辦「台灣的棒球詩篇：Team Taiwan 世界冠軍特別場」，一方面回應球迷的熱情，另一方面也加演〈就一起〉、〈世界都看見〉等棒球名曲，歡慶台灣勇奪 2024 年世界棒球 12 強冠軍，也將啦啦隊員帶上了衛武營音樂廳的舞台。⁴⁹⁵

綜觀各平台與現場反應，一般觀眾與球迷普遍對此音樂會抱持驚喜、感動與自豪的心情，不僅稱讚節目精彩，更以身為台灣棒球迷而驕傲，深感台灣棒球文化的底蘊與魅力在此獲得了完美體現。鄭睦群在衛武營謝幕致詞時說道，「歷史如果不持續訴說，就有可能會被遺忘」，期望能透過如此結合棒球、歷史與合唱的企劃，傳承專屬台灣人的歷史記憶。此外，音樂會的贊助與門票收入也確實帶來不小的獲利。

⁴⁹² <https://www.cna.com.tw/news/aspt/202408190105.aspx>，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5 日。

⁴⁹³ <https://udn.com/news/story/7001/8170986>，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5 日。

⁴⁹⁴ 鄭睦群主編，〈台灣的棒球詩篇音樂會手冊〉，頁 4。

⁴⁹⁵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4952979>，搜尋日期：2025 年 4 月 5 日。

陸、結語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皮國力在《史學玩應用：臺灣應用史學探索集》發表了一篇〈臺灣「應用史學宣言」〉，其中提到應用史學「它是一種運用史學方法創造附加價值，甚至是產值的技術。它要能和業界結合，而且要和實際工作能力配合，創造人文與歷史系學生的就業市場。」
「大學人文與歷史科系應開放從事『應用史學』相關產業的學者加入，而評鑑制度不得以發表演論文為唯一標準，而可以用發明、產學、展演、創作等形式來取代純研究，藉由研發量能來教育、深化人文系所人才之能力、協助歷史系所學生全面革新社會形象與能見度。」⁴⁹⁶

皮教授所言甚是，特別是提到「創造附加價值」及「產值」，簡言之就是有實質意義的「變現」與「營收」。在台灣，不論是專業與業餘合唱團體，能夠以音樂會票房或專輯銷售達到實質營收者確實不易。然而八角塔男聲合唱團，不論是《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專輯或音樂會，或是「台灣的棒球詩篇」系列音樂會，皆能發揮應用史學與藝術成就之企劃說服聽眾，以實際的購買行為轉化為對營運的支持，並且持續進步與生存至今。

應用史學的討論在台灣已相當多年，亦累積不少珍貴的純學術與產學合作成果，但或許可以再思「歷史普及」、「跨領域運用」以及「實際產值」之間的差異，更細緻探究「應用史學」未來歷史系所在「聘任」、「升等」與「評鑑」的各種可能性。期盼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相關經驗，能為國內「應用史學」提供更多的火花與參考。

⁴⁹⁶ 皮國立、楊善堯主編，《史學玩應用：臺灣應用史學探索集》（新北：詰閱人文工作室，2024），頁 14。